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民国要闻探秘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编者的话

民国史通俗刊物《民国春秋》双月刊，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创办于 1987 年 1 月，至今年底已历 10 载，出刊 60 期，600 余万字。虽然本刊在史学期刊中发行量是较高的，但仍有很多读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能订到本刊，或没有能订到前几年的本刊，并以此为憾。而本编辑部又一时出不了《民国春秋》合订本，不能弥补这部分读者的缺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民国春秋〉杂志菩苹》，以应众多读者阅读之需。

本刊创办 10 年来，承读者厚爱，专家、学者扶持，始终保持了自己显明的特色，在林林总总的期刊激烈竞争中，占有了相当的优势。先是被评为全国历史专业类核心期刊,继之又荣获华东地区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1995 年夏获江苏省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本刊同仁精心组稿，精心编稿，使刊物真实可信，清新生动，贴近社会，贴近读者，始终呈上升趋势，在读者中影响日广。

不但新近出版的《民国春秋》以题材新、史料新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而且数年前刊于《民国春秋》的文章，重读之下，也别有一番情趣。本刊有保存价值、使用价值、研究价值。海内外数十家报刊，包括《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文汇报》及台北《传记文学》等，都转载过本刊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过本刊数十篇文章。编写某些民国史书籍，更是须以本刊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如撰写关于审讯汪伪汉奸的书籍，必得要参考本刊，因本刊有的文章纠正了一些图书的谬误，甚至补正了档案史料中的疏失。

《〈民国春秋〉杂志荟萃》共分四册：《民国要闻探秘》、《民国要人剪影》、《民国要案寻踪》、《民国艺苑风景线》。《民国要闻探秘》，收入角度较小，写法较新、真实再现民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民国要人剪影》，收入生动记叙民国军政、外交等名人一生经历重要侧面或片段的文章；《民国要案寻踪》，收入详细描述民国重大的、轰动一时的、至今人们知之尚少的暗杀事件和诉讼事件的文章；《民国艺苑风景线》，收入深刻反映民国电影界、戏剧界和文化各界名人的风貌、情操、遭遇、成就的文章。4 册字数共 100 多万字，约占《民国春秋》创刊以来所载文章总字数的大约 1/5。《民国春秋》10 年所刊文章，大体集粹于此编。

读者对本书有何批评、建议，对《民国春秋》有何批评、建议，望随时指陈，不吝指正。

民国要闻探秘——《民国春秋》杂志荟萃

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最早究竟是由谁透露出来的？仅是怎样透露的？许多史著和文章对此语焉不详。笔者在阅读民国史料时，发掘到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史料。现据此谈点一管之见。

1914 年的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顾及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日本则利用这一形势，趁机加强在华的侵略势头，企图排斥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特务在华活动十分频繁。早在大战爆发前夕，日本参谋本部就已获得情报，得知袁世凯确有做皇帝的念头。所以，这一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很注意加强与袁世凯身边一些人的联系，以了解袁世凯的心态，掌握袁世凯的动静。

1914 年 8 月，离大战爆发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把中国的青岛租借地及其周围地区，

包括胶州湾在内交给日本。德国当时虽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日本遂派军在山东登陆，德军在做了两天的象征性抵抗后投降。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并想进一步全面控制中国政府。

到了 1914 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在 1915 年的 1 月 18 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会见了袁世凯，面交充分暴露日本政府狼子野心的《二十一条》。当日置益陈述完《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后，袁世凯十分吃惊，当时他表情严峻，回答说：“ 此条款请与外务部会商。 ”临行，日置益威胁说：“ 如秘密（指《二十一条》）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第二号是关于满蒙，第三号是关于长江流域，第四号是关于福建省，第五号是关于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中国武器的标准化以及全国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问题。

袁世凯与日使会见后内心是非常不平静的。据顾维钧 1960 年对胡适的入室弟子唐德刚（美国纽约市大学教授）口述历史时说，袁世凯在与日置益见面后，就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同日本谈判的方针，并让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再次任命职业外交家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之后，袁世凯单独召见了陆徵祥，经过密商后，决定不顾日本的威胁，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陆徵祥离开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后，立即找来了顾维钧。顾维钧当时任外务部主事兼英文秘书。顾接受命令后，立即携带《二十一条》文本，秘密送往美国公使馆。陆徵祥的原意是先交给英国的路透社，而顾维钧却首先送往美国公使馆。美国新闻界得到《二十一条》后，如获至宝，立即予以公布。消息传出后，迅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更是

深深地震惊了美国政府,并对 1921 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在以后几个月的中日马拉松式谈判过程中，每天下午或第二天，顾维钧都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英美通报谈判情况。

由此可见，最早向全世界披露日本试图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的是美国，而授意泄露《二十一条》的则是袁世凯本人，陆徵祥参与其事，顾维钧是具体执行者。遗憾的是这其中还有许多细小的情节无从核查清楚，盖其原因是顾维钧所保存的 1931 年以前的文件，收藏在天

津他的私宅，而其中有关这部分的文件全部丢失。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指示陆徵祥、顾维钧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新闻界呢？

原来这是他的一个计谋。围绕《二十一条》，中日双方举行谈判，袁世凯的策略是尽量拖延。他指示陆徵祥，“要尽可能拖延下去。”而日本方面则想尽快结束谈判，尽快签字订约。为了执行袁世凯的指示，陆徵祥想出了许多办法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徵祥则提出每周开一次会，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中日双方会谈三次。袁世凯之所以采取拖的策略，是为了期待西方列强出面干预。这就是袁世凯要把《二十一条》的消息和内容透露出去的原因。袁世凯的本意是想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借助欧美的力量来牵制日本，以便在复辟帝制问题上少付出一些代价。美国政府在得到《二十一条》的消息后，确也向日本政府施加过压力，美国政府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自己的驻日

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尽管这样，袁世凯还是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到 1915 年 5 月 7 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 48 小时答复。袁世凯不甘心放弃做皇帝的念头，结果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于 5 月 9 日签订了《二十一条》。这样，不仅袁世凯为国人憎恶和唾骂，而且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陆徵祥也成为众矢之的。

赵映林

张宗祥帮助蔡锷脱险真相

天津《今晚报》于 1986 年 5 月 16 日登载了一篇《关于蔡锷脱险的新解》的文章，首次披露：当年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羁绊，潜逃出京的历史功臣，是现代著名学者、画家、书法家张宗祥，而非外界历来所传言的小凤仙。嗣后，上海《文汇报》于同年 10 月 4 日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改题为《帮助蔡锷脱险非小凤仙》；《报刊文摘》亦加以转载。

《新解》依据何在？作者说：最近在浙江省图书馆发现了张宗祥先生所撰《记一幕猴戏》，在其后记中说：“ 袁世凯要‘ 追蔡之信 ’首先是由陈公侠（陈仪）得悉的，由于其他人都参加了进步党会，‘ 皆袁氏注目 ’，很难接近蔡锷，唯有张宗祥平时‘ 不参加任何党会 ’，无‘ 政治色彩 ’，而‘ 追蔡之信 ’又事关重大，因而

富有爱国之心的张宗祥毅然决然自动要求担当起去送信给蔡锷的重任。蔡锷乘火车逃离北京，直往天津，也是由张宗祥一手安排，并亲自陪同前往的 ”。笔者近日有幸翻阅张宗祥手稿《记一幕猴戏》，反复研读，觉得手稿所记与《新解》作者所谈大相径庭。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006_1.bmp}

《记一幕猴戏》中提到蔡锷离京赴津、东渡日本之事计有两处。一处为正文第 9 页第 1 面：“ 又数旬而蔡氏易装遁矣。袁氏知蔡遁，命陈仪追之。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知此事，陈仪又木强，忠于所事，不能说之纵蔡，于是赶陈前先至津，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迨陈至津，历访蔡之友人，均不得踪迹，废然以返。 ”另一处见后记：“ 予向不参加任何党会，因百里（蒋方震）识松坡（蔡锷），二人皆进步党，往还意气之间当相得。公侠追蔡之信既得，他人皆袁氏注目，予时一冷曹，且无政治色彩，乃自任之，速蔡行外，兼在津市赁一宅。 ”

将《新解》文字与张老的叙述两相对照，不难看出，《新解》的错误之一是：将后记中“ 乃自任之，速蔡行外 ”解为张宗祥在北京给蔡锷送信并安排和陪同蔡锷前往天津。殊不知蔡锷早已“ 易装遁矣 ”，而张宗祥“ 乃自任之，速蔡行外 ”就是自告奋勇赶至天津，“ 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 ”。据有关史料，蔡锷离京赴津是得到袁世凯批准的，并非秘密行事。当时，蔡锷已患喉症，经日籍医师证明和向袁世凯请假获准，于 1915 年 11 月住入天津日本医师开设的共和医院，趁机加紧筹划和布置反袁事项，并经常往返京津之间。所谓张宗祥一手安排和陪同蔡锷

逃离北京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蔡锷最后一次由北京去天津是 1915 年 11 月 17 日，同月 19 日即离津潜往日本，然后转道赴滇。张宗祥急匆匆赶往天津送信从情理推测，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二、三天里。

“ 新解 ”的错误之二是：将袁世凯命陈仪到天津追蔡锷误解为“ 袁世凯要‘ 追蔡之信 ’首先是由陈仪得悉的。 ”张文说“ 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 ”，指的是蒋百里。蒋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早陈仪两年。陈仪受命之后向蒋透露了消息，蒋因陈仪此时固执愚忠，不能说服，转而与张宗祥商量，张宗祥乃自告奋勇接过了任务。袁世凯命陈仪追蔡，而追蔡之信首先由蒋百里得悉，这才是张老自述的原意。

在关系反对帝制斗争成败的关键时刻，蔡锷的同谋者蒋百里为什么想到了一介书生的张宗祥？张宗祥又为什么慨然允诺，甘冒危险充当报警信使？

原来，蒋、张是浙江海宁同乡，又是同庚。1898 年年仅 17 岁的张宗祥就已与蒋百里在切磋学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因为两人的友情非同一般，蒋才放心透露机密，张也毅然自告奋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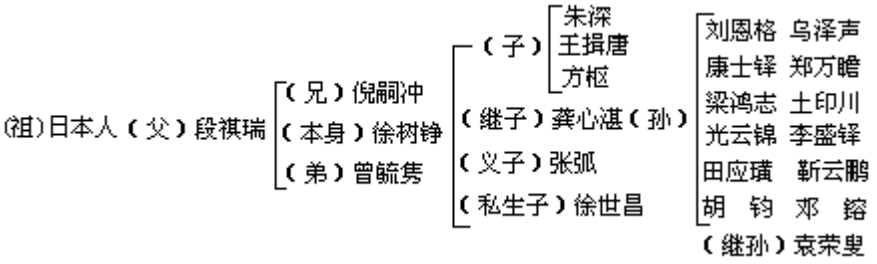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张宗祥对反袁斗争的贡献是，在蔡锷行将转道日本赴滇的前夕，及时报答，挫败了袁世凯最后一次的追蔡阴谋。这就是这段历史的真相。

李性忠

（第 6 页为蔡锷照片）

一桩对民国总统的“名誉诽谤”案

1919年9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篇　　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某君戏作”，以诙谐幽默、辛辣嘲讽的笔致揭露了安福系对外卖国，对内独裁的嘴脸，由此引出了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名誉诽谤案”。那么，这篇“戏作”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以致对簿公堂。原来该文将安福系各主要人物加以分类，排成如下世系表：



并加以说明，指出安福系成立后，一味依靠日本人，与之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等合同，肆意出卖国家主权，不言而喻，日本人是安福系的“祖”。该系以段祺瑞为首领，一切行动唯段马首是瞻，而段不亲自出面，显然为“老太爷”，为“父”。徐树铮为段的心腹干将，无论表面上还是事实上皆是“主体人物”，而王揖唐为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代小徐出面组织，精心筹划，充任党魁，“非克家令子而何？”倪嗣冲自始至终协同徐“捣乱”，挟势力吓人，在小徐与靳云鹏争宠失意后又尽力为之排忧解难，自是“贤兄”无疑。曾毓隽主持党务，势力介于徐、王之间，“非弟而何？”朱深长司法部，与小徐关系极深，在其权限范围内处处承顺小徐，方枢前任国务院秘书长，即小徐替身，其为议和代表亦代表小徐，无疑，朱、方“皆佳儿也”。龚心湛原非安系，只因热心作官，投入门下，而安福系除用龚抵挡风浪以外，对他却不很爱惜，“恰合螟岭子之地位”。张弧新近投入安福系，为安福系收买非法议员数十人，又竭力为王揖唐效劳，自是“新结拜之干儿也”。徐世昌为非法国会选举产生的总统，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亦无疑也”。至于其他人的地位皆在上述诸人之下，而皆有“承家分产之望”，“名之以孙亦宜也”。惟有袁荣叟本为研究系骨干，近投安福系门下，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则螟岭孙之得意者”。

这篇“惹祸”的文章发表后，北京政府恼羞成怒，遂委派穆安素律师为代表，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起诉，指控《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并票传该报经理邵仲辉（即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二人到庭。10月1日，邵、叶二人延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自行投案。10月3日，法院开庭，首先由原告律师提出控告理由，接着邵、叶二位被告进行申辩。随后，双方律师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被告律师林百架首先为被告作无罪辩护，陈述了三条理由：（一）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言论的权利；（二）原告控案，应由北京当局派员来沪，提出充分证据；（三）原告指控的文词原为游戏性质的政策批评文章，未违反宪法规定，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况且，该文本意是为了促进中国有良好政府，俾中国人民永享和平之福，并无任何侮辱意义。进一步言之，即使法庭认为被告举动越出了宪法规定的自由范围，也不能认为被告有罪。总之，原告实际提出的证据与控告实际依据的法律之间相距甚远，毫无

符合之处，不能视为有效，法庭应将此案注销。

被告律师辩护后，原告穆律师当即起身反驳，称《民国日报》所载之文足以促使社会舆论讥笑“大总统及在职官员”，不但侮辱了他们，而且容易引起民众对他们的轻视。他认为，对此案应从四方面考虑：（一）被侮辱者之地位；（二）侮辱之方法；（三）侮辱时间及方法；（四）侮辱人之地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二位被告身为报馆主笔，皆受过高等教育，明知该文有侮辱性质而不加删裁，仍旧刊用，用心极为险恶。不仅如此，此文一经登载，使得南北和谈双方愈难接近，于中国未来和平前途大有妨碍。总而言之，被告以上海为避地，极尽诽谤、侮辱之能事，贬损政府官员声誉，情节恶劣，无疑应受到法律严惩。

法庭在听取双方辩论后，进行了庭议。迫于安福系的淫威，作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称《民国日报》所载文章本意良好，颇有价值，惟“侮辱大总统”一层属实，案情重大，最终判邵、叶二人各罚洋 100 元。轰动一时的“名誉诽谤案”就这样匆匆结案了。

方平

云南一九二０年“洋人质”事件

1920年初，云南发生过土匪两次掳走“洋人”，借以要挟地方政府，把他们编队组军、甚至“划地保商”的事件，反映出西南边省当时的多个社会面。官、匪双方，斗力斗智。结果“洋人质”或乘机脱逃，或被官方谍报员营救，全部安然脱险，在民国史上留下了发人深思的一页。

美国医师夫妇荒山被掳

1919年冬，在藏南开设医院的美国斯德温医师夫妇，到云南省城昆明度假。圣诞节过后，他们转向滇西，打算北上经武定县，渡过金沙江，返回西藏。

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正在扩军备战，妄图向省外扩展势力范围。他在省内拉伕封马、加税增捐，弄得百业凋敝，社会动荡不安。由于集中精力加强军备，对一些三五成群的路劫盗

匪，长期掉以轻心，并未认真设法，加以肃清。而当零星散匪啸聚一起，成了“气候”，就不容易对付了。当时横行滇西、滇中，拥众数千的杨天福匪部，就是那样由小到大、由弱而强，洗村劫寨，不断危害民众的一股。

斯德温知道云南道路不靖的情况，但按当年政府规定，外国人出行，沿途各县都得派武装护送。斯氏过高估计乡团力量，有恃无恐，雇马前行。单他的行李和在滇购买的土特产，就有64驮。

云南交通落后，汽车还没有出现。省内各县间往来，主要依靠步行或骑马。斯德温一行拥有60多匹马，就像来往于省内各地运货的一个马帮！从昆明到禄丰，平安无事。然而，1月3日，从县城远郊大腰站出去不远，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下，埋伏在两旁的杨部喽啰20余人，一拥而出。禄丰县公署所派乡团8名，看到遇上土匪，当即开枪抵抗。可是寡不敌众，反被土匪打死了1名。

斯德温夫妇和他们携带的大批物品，被匪众连人带马，一起掠走了！

7名团丁逃回禄丰县城，“洋人”被掳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首先引起外国教会神职人员的不安。当地天主教堂神父列文，急电法国驻滇领事馆，要求转请云南督军公署，迅速设法“招安”杨天福，保证斯德温夫妇的生命安全。

在外国领事敦促下，唐继尧指令禄丰县知事，会同列文和地方士绅，设法和杨天福接头。同时，命令主管滇中及周沿地区军事的第三卫戍区，派出步兵第十四团，由设于禄丰的第一剿匪指挥部指挥，跟踪搜索，加强监视，相机出击。

经过地方设法，官方的“招安”要求，终于传达到匪部。这时，斯德温夫妇被掳已将一个月了。

接受“招安”的条件

杨天福决没有料到掳来了“洋人”。他就是滇西人，自从1914年脱离军营，投入“绿林”后，岳母、妻子部被关押在县牢内，财产也完全被没收。虽然多次设法营救，都没有成功。他手头而今有了“洋人质”，因而看出营

救家属的一线希望。于是，他吩咐不准瓜分掠来的财物，并要手下头目，妥善照顾斯德温夫妇的生活。

接到要“招安”他的信息后，杨天福开了窍。他既要营救被押家属，也要保全地位和实力。他估计，手里有了政府急于索回的两名“洋人”，政府同样受到牵制，有很大可能会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2 月中旬，第一剿匪指挥部收到了杨天福的回信。他首先表明，自己是云南人，“因为宵小倾陷，铤而走险，遭遇时会，聚众至万。长年剽劫，终非了结”（引文照原函直录，下同），因而愿意投诚，“以靖地方”。

杨天福要求，他的部众投诚后，政府必须“按照游击队编制，按月按名发饷”；愿意回乡者发给保护证件，“使众弟兄各得其所，安心度日”；留下编队者和他们携带的武器，仍由他“完全管率，以免分散滋事，并足以备国家缓急之用”；被扣押的家属，被没收的财产，要全部释放和发还。投诚后，听从政府调遣，如不出省，枪弹由他自备，勿须政府拨济，出省“则需政府补充子弹，调换枪只，每次以 20 只为度，不敢格外苛求”。

信中还提出保证，今后，东至滇东北的东川、昭通，南至阿

迷（开远），西至大理，在这片辽阔的区域内，如果再发生抢案，杨天福愿意负完全责任！

来信提出，双方可以约期在附近米槽天主堂中磋商具体办法。在这段时期内，杨天福担保不再抢劫。同时，政府军队“亦不得包藏诡谋，乘机袭击，以免冲突，贻害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法国领事必须出面，担保杨天福今后的生命、财产安全。

官、匪双方谈判破裂

唐继尧同意双方进行磋商。由管外交的云南交涉署派出一名科长，会同禄丰和邻县罗次两县县知事，到米槽和匪方代表吴营长见了面。

按照杨天福的部署，吴某带领官方代表，到土匪临时驻地，会见了安然无恙的斯德温夫妇。

2 月下旬，磋商正式举行。

官方代表的心态并不平衡。认为既然诚心接受“招安”，杨天福为什么还要继续“管率”部众？会谈还没有开始，便罩上了一层阴影。

双方磋商的焦点，始终集中在“洋人质”问题上。政府要求，立即释放斯德温夫妇；匪方则坚持，必须答应他们提出的全部条件，才能放回“洋人”。

双方相持了四五天，出现了僵局。

一直关注此事的美国驻华公使，从北京派参赞德利来到昆明，和地方政府共商妥善办法。唐继尧除要求和杨天福部接头的官绅，“设法劝谕该匪将斯医生送还”外，也命令剿匪指挥

部，以重兵监视米槽，设如不能索回“洋人”，就用武力进行解决。

杨天福认为唐继尧并无“招安”诚意，2 月底，乘官军不备，挟持斯德温夫妇，深夜撤离禄丰县境，经由罗次，退到武定去了。

驻军得报后，立即派兵追击。但已为时过晚，追之不及。仅在罗次县境内，把后撤的匪方代表吴营长击毙。

磋商完全破裂了！

武定多的是深山老林，地广人稀，地形比禄丰远为复杂。土匪来去无定，难觅踪迹。

军方一筹莫展，只得会同县公署，派出多名侦探（谍报员当时的通称），化装为普通乡民，四出查访匪踪。武定驻军营长杜国珍，则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洋人”。

英国牧师被掳　美国医生获救

在和官方的磋商中，杨天福进一步认识到“洋人质”的价值。他对唐继尧政府拒绝接受条件感到恼火。当退入武定县境、途经偏僻的小乡他谷时，把当地基督教堂中的3个英国人，牧师王怀仁（华名）和高心田（华名）夫妇，连同中国教友晏某、何某、马某3人，也一起掳走了。他想利用掠来的5名“洋人质”，胁迫唐继尧就范。

然而，出乎杨天福意外，高心田夫妇非常机灵，当股匪北退到梅子箐地方的时候，看到匪众稀稀拉拉，疏于防备。夫妇俩抓住这个机会，在坡路转弯的地方，冒险往密林中一窜，躲藏起来。匪徒们也竟然没有查觉，等他们过去了很久，高氏夫

妇才走出密林。他们熟悉地理，于是步行来到最近的元谋县城。

元谋驻军正准备把高心田夫妇送回武定，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于意外的事。

斯德温夫妇也有着落了！侦探查知，他俩被安置在武定远郊、接近元谋县境的他腊乌地方，因远离县城，土匪估计军队难以前来，看守非常松弛。

侦探深夜摸黑，到斯氏夫妇被囚之处，带领他们乘夜出逃。未费一枪一弹，夺回了美国“人质”。在乡团协助下，斯氏夫妇同样被送到元谋，和高心田夫妇会合了。

稍后几天，武定县公署准备了“花红彩轿”，把两对洋人接进了县城。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却不能安心。杨天福手中，还有着英国牧师王怀仁！

由于两对“洋人质”的脱险，形势似乎越来越严重起来。

匪首的动态

3月6日下午，杨天福在武定县属麻地粱子地方，得知高心田夫妇中途脱逃到元谋的事，又急又恨。晚间，他组织了四五百名匪众，扬言追捕在逃的“洋人”，攻向元谋县城。驻军即时出动，半路击溃了匪众。

杨天福退回麻地梁子后，严峻的形势使他踌躇起来。最后，把王怀仁唤到身边，自己口授，让他写好两封信。晏某和何某两位教友，作为前往武定的信使而被释放了。

两封信，中文短信写给驻军营长，警告不能派兵追击，否

则“必伤外人”。英文信写给高心田，要求他上报英国驻滇领事，和唐继尧商谈。除同样警告不能派兵追击外，还建议当局，把滇西一带地区，划为杨天福的“保商区域”，准他抽取“厘金”（税款）。“若准所请，由政府指定地点，撤去军队，双方派员会商”。

杨天福接着南撤，被掳去的马姓教徒乘乱逃回。只有王怀仁，被匪众带走了。

最后一个“洋人质”出险

官方的侦探继续活动，其中有个名唤贺家运的，在土匪撤退途中，被当做普通乡民，掳去充当力伕，随队同行。

3 月 9 日下午，贺家运在元谋西南的牟定县境内，看到被土匪挟持南行的王怀仁。他们原就相识。于是，扛着一袋粮食的侦探，故意靠近了英国牧师。土匪们都忙着赶路，对王怀仁并不特别留意。然而，前后十来步间，都有着三三五五的匪徒。贺家运只能匆匆告诉王怀仁，要他夜间警觉一些，自己将设法来找他，和他一道逃走。

这一夜，匪众在牟定境内的麦厂留宿。居民们早已跑到附近的山间躲藏起来。土匪挨家搜查，粮食和值钱的衣服都被掠走。他们最后集中到一个打谷场上，利用搜来的大铁锅，垒石成灶，生火煮饭。饭后，到空无一人的民房住宿，王怀仁由三名土匪带着，也住进了民间的平房。

跑路跑得太疲乏，顷刻间，匪众全部沉入梦乡。一直留意“洋人”行踪的贺家运，悄悄地摸黑入门，和早已在等候他的王怀仁会合，一道逃离匪窟，向荒郊跑去。

两个人跑了半夜，碰到了巡夜的团警，贺家运说明情况，要求把他们护送到附近的猴井。次日，得到急报的剿匪指挥部，派兵前来，把王怀仁接到了禄丰。

最后一个“洋人质”出险了，驻军没有了顾虑，对溃匪发动了猛烈攻击。杨天福连连失利，边退边抢，使得滇西的匪情，突然变得严重起来。

杨天福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对策。滇西各县间，山多林深，出现了兵来匪散，兵去匪聚、继续抢劫的局面。到 4 月中旬，杨天福又忽然出现在禄丰西邻的广通县境，还到他家的祖坟杨家茔地扫了墓。而当步十三团俞营闻讯赶到，他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余闻：杨天福的覆灭

从 5 月到 8 月，杨天福匪部依旧活跃在武定、罗次一带，一度还抢掠了昆明西邻的安宁县郊乡村。但在政府军认真进击下，实力逐日削弱，连参谋长简希贤都被活捉，“解省正法”。

在不利的处境中，杨天福审度形势，终于作出了“无条件投诚”的抉择。9 月中旬，他把投诚信送到了禄丰，19 日，又派营长毕玉麟到禄丰剿匪指挥部，表明“甘心投诚，永无反侧，并不要求他项条件”。

唐继尧当时正在“废督裁兵”，准备实现“联省自治”的野心。私愿把他无法制服的土匪“招安”过来，为我所用。因而不但同意杨天福的请求，另外还派知情人到滇南，“招安”另一著匪吴学显。

西、南两路土匪，1920 年 10 月初，全部换上官军制服。唐

继尧命令他们集中到昆明，指定南郊干海子营盘为暂住地。同月 17 日和 19 日，吴学显和杨天福先后被唐继尧召见，委派他们担任游击队第一、第二支队长。土匪收编的军队，民间统称为“招安军”。在唐继尧庇护下，依然过州吃州，过县吃县，为害乡里。

1921 年 1 月下旬，原驻川滇军军长顾品珍由滇东北起兵“倒唐”，唐继

尧下野出走。2 月上旬，顾氏进驻昆明，被推为滇军总司令。对于唐部的师旅长和中下级军官，除少数随唐出走或坚决辞职者外，顾氏一律以“ 滇总 ”名义，任命他们担任原职，吴学显和杨天福自不例外。

土匪蹂躏地方多年，民愤极大。为防万一，云南省议会曾作出提案，建议收缴“ 招安军 ”的武器。顾品珍当时正在整饬军风纪，也风闻“ 招安军 ”纪律松弛，因而把这件事交由新任第三卫戍区司令杨蓁去处理。杨蓁奉令后，作出了“ 双管齐下 ”的决定。先由他带领武装，去拘捕吴、杨。得手后，再请第二旅杨池生团协助，到干海子收缴武器。然而，想不到出了内奸，杨团参谋杜宗奇，和吴学显友善，慌忙找到吴学显，把机密泄漏出来。吴学显听到吴总司令要下手，立即到南城外杨宅找到杨天福，邀约杨一起回干海子，把队伍拖到滇南，另谋发展。杨天福迟疑不决，吴学显返身就走，骑马赶回干海子，煽动两个支队一起哗变。在他统率下，连夜逃往滇南。杨蓁没有逮到吴学显，接着出城到杨家，一场枪战过后，杨天福俯首就擒，很快便被枪决了。

吴学显此后继续横行滇南。1922 年 3 月，唐继尧集结驻桂滇军，攻回云南，密令吴学显部里应外合。顾品珍率军阻击唐继尧时，误中匪部埋伏，陷入重围而阵殁。

万揆一

孙中山立遗嘱

孙中山先生逝世前曾立有遗嘱。流行的说法是，《遗嘱》及《家事遗嘱》系孙中山本人口授，由汪精卫笔录。然遗嘱产生经过究竟怎样？即使是当时逐日详细报道孙中山病情及治丧情况的《大公报》，对此亦语焉不详。该报载：“中山病状，近五日内日趋危险，昨晨已不能饮食，惟神思尚清楚，嘱进日前所准备遗嘱，手自签字，嘱咐家人，语至数十分钟……”《申报》报道得更简略：“孙中山病势，至昨夜骤恶，急招国民党干部留下遗言。”

近翻阅1928年上海广益书店出版的《孙中山丛书》第四集，见有黄昌谷（当年曾跟孙中山同赴北京）写的《中山先生北上与逝世后之详情》，文中有孙中山留立遗嘱的详细经过，现介绍于下，以飨读者。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取道日本北上。一路上夜以继日处理公务，加之旅途劳顿，以致12月4日

至天津后，历年积劳之疾一朝并发。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因病久治不愈，进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遂延请各国名医诊治，并采用西方最先进的镭锭疗法，然终不见效。遂于2月18日出院，移住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改以中医施治。

至2月24日，孙中山病情陡恶，随行人员焦急万分。是日下午3时，一位女看护对宋庆龄、孙科、汪精卫等人说：“依我的经验看，恐怕孙先生已到了极危险的时候了，你们诸位有什么话要向孙先生请示，现在恐怕已经是到了时候了。”

早在1月26日确诊孙中山身患不治之症后，随行的家属及国民党要员，均极力主张预备一个遗嘱，万不得已时，请孙中山签一个字，以作全党遵守之信条。今日见孙中山生命垂危，认为此事宜速办，毋容再拖延，便公推汪精卫负责办理。

汪精卫把孙夫人宋庆龄请出病室，征得她同意后，便与孔祥熙等走到病榻前。这时孙中山似睡非睡，听得有人进来，张开眼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呢？”言毕又闭上了眼睛。汪精卫弯下腰，婉转地说：“我们四个人今天是以同志的资格来看总理的病况的，总理的病大概不久就可以好了。不过好了之后，必需长时间的调养。调养期间，本党的事情很多，又是很忙，不能够停滞的，一定要有同志，代总理去执行党务才好。要有同志能够代为执行党务，合乎总理的意思，没有错误，一定要总理先说几句话，让各位同志有所遵守才好呢。”汪精卫讲话时，孙中山听得很认真，他沉静了一会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说啊。”汪精卫再次劝道：“总理的病一定是可以好的，不过在没有完全好之前，恐怕调养的时间太久，不能够理事务，所以还是希望总理早说几句话，让我们能够遵守，照那些话去进行党务才

好呢。”

孙中山沉默了许久，睁开眼，神志极为严肃地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啊！我如果是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是要加害于你们的；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是一定要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汪精卫又用极为诚恳的语调请求说：“我们跟随总理奋斗了几十年，向来都没有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呢？向来没有被敌人软化过，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够软化我们呢？不过总是要总理先告诉我们几句话，令我们有所遵守，方知道怎么样向前去奋斗呢。”

孙中山见汪精卫等恳求再三，缓声问道：“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见有了转机，连忙说：“我们现在已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是赞成，便请总理签个字，当作总理所说的话。总理如果是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孙中山听到这里，便说：“好呀，你们预备了什么话呢？念给我听吧。”汪精卫便拿出一张纸来，低声朗读：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听完后说：“好呀，我很赞成。”这时又有一位家属（孔祥熙）请求说：“先生对于党务，既是赞成说几句话，对于家

属，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也说几句话呢？”孙中山说：“可以呀，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随即又取出一张纸来念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吾志。此嘱！”

汪精卫读完后，孙中山点头说：“好呀，我也很赞成呀。”汪精卫紧接着说：“总理既然是很赞成这两张字，今日可不可以就签一个字，当作总理自己说的话一样呢？”孙中山点头同意：“可以呀！”汪精卫于是开门出病室去拿笔。

这时宋庆龄正坐在客厅里恸哭，见汪精卫开门出来，立时走进病室。孙中山见夫人哭得很伤心，便决定暂不签字，以免去夫人对病人的绝望，所以当汪精卫拿了笔进来时，便说道：“今天不要签字，过几天再看吧。”众人遵命，从病房中鱼贯退出。以后大家因担心引起孙中山及夫人伤感，所以均不再提在遗瞩上签字事。

转眼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孙中山的病已到了百药罔效、群医无策的绝境。3 月 11 日上午 8 时许，何香凝发现他的眼睛已散光，便与汪精卫等商量，准备让孙中山在遗瞩上签字。延至正午以后，孙中山挣扎着对榻前伺候的人说：“现在要分别你们了。”随即示意汪精卫近前，吃力地说：“拿前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呀，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汪精卫便取出上月 24 日所写的《遗嘱》及《家事遗嘱》，由宋庆龄托着孙中山的手腕，用钢笔在上面签上“孙文”字样。签字后又用极安静的态度，向家属一一嘱咐后事。次日（3 月 12 日）上午 9 点 30 分，缔造中华民国之第一伟人孙中山终于与世长辞。

骆盛 茂倩

廖仲恺遇刺轶闻

廖仲恺先生于 1925 年 8 月遇刺于广州国民党中执会门前，事件发生后举世震惊。当时正值黄埔党军成立之初，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北伐之际，骤然失去革命中坚和政府台柱，当然是广东革命政府以及全中国革命派的一个大损失。王懋功当时为广州卫戍总司令、黄埔党军教导第二师师长（第一师师长为何应钦）、第一军及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总队长，是处理这一要案的当事人之一。

40 年代初，王懋功被任为江苏省政府主席，但为顾祝同、韩德勤二人所排挤，无法上任，折腾半年，从皖南回到重庆，闲居渝郊老鹰岩游龙山何应钦公馆前院。当时笔者刚好在陆军大学学习，王懋功为笔者长辈，他自称也是陆军大学学生（王曾于 1926 年春赴苏联，系苏联红军伏龙芝大学即苏联红军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与笔者为黄埔师生关系。他经常召饮笔者，与笔者无所不谈。

据王懋功谈，刺廖案发生前，他们（王及蒋介石）通过眼线人物已有所闻，据说以胡汉民为中心的右派国民党要人，要对廖仲恺先生采取行动，而廖仲恺先生及何香凝先生对此亦有所闻，故已有所戒备。然而，事出仓猝，廖先生不幸遇难。刺廖集团内部可能也不一致，行刺之事，连胡汉民事前也未有所知晓，可能并非计划行动，而是出于少数人偶然钻了空子，遂下此毒手。

案发后，胡汉民首先躲避起来。而广州卫戍总部当夜便逮捕了胡汉民之弟、粤军将领胡毅生以及有关的人员。王说，一举抓到胡毅生，也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王在案发后即亲自秘密派遣了得力人员和少数精锐武装，于入夜后即包围了胡毅生宅第，缴了守卫人员的械，胡毅生束手就擒，连手枪也来不及拔出，便做了阶下之囚！在王氏和笔者谈到胡毅生时，虽已事隔 10 余年，但他仍然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而加仑将军等苏联顾问向

孙中山先生建议成立的党军，便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基干，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掌握的军队。这时，以苏联武器为主装备起来的黄埔党军，已初具眉目，有两个教导师（干部全为黄埔军校教官及学生）以及其他部队，已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番号，蒋以第一军军长进而为北伐军总司令。但是，此时粤军总司令部也并未取消，蒋氏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也并未解职。以许为首的旧粤军将领，面对黄埔党军，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

据王谈，许崇智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而胡毅生等人则属于困兽派，是铤而走险的首领。但是，行刺之事，胡毅生也未必是事先策划了的，而在当时，王蒋均注目于胡毅生。王说，他之所以给胡毅生来了个措手不及，其原因便在于此。胡毅生这个人反应迟钝，不若其兄之精明，事到临头，依然稀里糊涂，强作镇静，其人不谙谋略，真个好笑之至，宜乎其为阶下囚也矣！

胡毅生在被捕后一口咬定他并未参预刺廖之事，但却透露出许崇智曾“暗示”要把廖除去。理由是，廖掌握财政，是黄埔之母；除掉他，黄埔这个幼儿便没有奶可吃了！

然而，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执掌兵符的蒋王二人，当时也无法弄清何人为刺廖凶手，多数人认为是朱卓文，其实也不见得。后来才知道凶手是许部一

中级军官，却在胡毅生被捕之前，早已遁迹大英帝国旗下的香港，始终未能缉获归案，这是对蒋王二人一个绝大的讽刺！许崇智遭蒋面斥，自知无法对抗党军，也便趁此时机得保首领，安作寓公，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于潜之

（第 25 页为廖仲恺遇刺后的遗容）

鲍罗廷夫人历险记

1927 年 3 月 1 日上午，苏联商务舰队的柏米亚列宁号轮船抵达军阀张宗昌军队控制的南京。商轮上高悬的苏联国旗引起了海关关员的注意，几名关员立即登轮检查。船上除了中国水手外，还有 3 名自称外交邮员的俄国男人和 1 名自称格鲁斯堡夫人的俄国中年妇女。关员要求检查他们的行李，俄国邮员以外交行李为由拒绝检查。关员随即报告张宗昌司令部，司令部立即派出一队白俄士兵登船检查。3 名外交邮员坚持说是为政府传递外交文书，拒绝启示行李。白俄兵强行开包检查，没有发现什么违禁品。白俄兵仍不死心，又强行检查了俄国中年妇女所带的行李，在箱底搜出一份写有“ 鲍罗廷夫人 ”字样的文件。白俄兵又惊又喜，问她：“ 这是你的吗？ ”中年妇女冷冷地看着他们，镇静地点了点头。

这位 30 余岁，容貌端秀的妇女正是当时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她刚由苏联到达上海，准备由上海赶赴武汉，

与丈夫团聚。此时，北伐军已先后战胜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使盘踞在江苏、山东的张宗昌和盘踞京津及东北的张作霖也深感不安，他们对鲍罗廷的名字是又恨又怕。白俄士兵查清了鲍夫人的真实身份，不敢擅作主张，便派人飞报张宗昌。张立即下令扣押。随后，鲍夫人被押到张宗昌的公馆，张亲自“ 接见 ”了鲍夫人。夫人向张提出抗议，要求尽快放她去武汉。张回答说，现长江一带战火纷飞，请夫人暂缓赴汉；待局势平静下来，再送夫人去武汉。说完，张即令士兵将鲍夫人押回船上监视起来，并将船上的苏联国旗和商务舰队公司旗帜撤掉，改悬中方军旗。接着，柏米亚列宁号被迫开往浦口，连船带人一并被张宗昌扣留了。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028_1.bmp}

3 月 6 日，张宗昌命令直鲁联军第二方面军稽查处处长孙尧臣将鲍罗廷夫人及 3 名俄国外交邮员押送济南。鲍夫人一行人一下火车，即被送到督署军法课内监禁，由督署参谋长金寿良派出专员“ 伺候 ”。鲍夫人被扣押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国民政府各省市党部、各团体、机关纷纷通电，安慰鲍罗廷，同时斥责张宗昌的暴行，希望北伐军“ 速张挞伐，灭此朝食 ”。苏联驻华大使馆也连续 3 次向北京军阀政

府提出严重抗议。3 月 21 日，苏联驻华使馆代理大使齐尔内夫会晤了北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对张宗昌无理扣押苏联外交邮员和鲍夫人及柏米亚列宁号，再次提出严重抗议并发表宣言，认为此种行为是“ 公然及破天荒的违反国际公法和国际道义 ”。他警告说，北京政府应立即下令张宗昌放人放船，否则苏联政府将“ 采取他样之办法 ”。

张宗昌扣押鲍罗廷夫人，受到了国际国内很大的压力。但张并不甘心轻易放人，他只是电令济南戒严司令袁致和，将夫人由军法课关押改在津浦宾馆软禁。还下令袁设宴“ 款待 ”夫人。席间袁大献殷勤，要鲍夫人乘此机会饱览历史名城济南的风光，并企图引诱鲍夫人写信劝告鲍罗廷，主张南北妥协，遭到鲍夫人的严词拒绝。

张宗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派人秘密赴汉，要挟鲍罗廷，声称鲍若主张南北议和，即可释放夫人。鲍罗廷愤怒已极，斥责来人说：送还夫人是我个人的事，革命是中国民族的事，我绝不因夫人一人，而废弛中国之民众革命。张的代表只得灰溜溜地回去了。

张宗昌原想利用鲍夫人做做文章，但引诱与要挟均告失败，反而势成骑虎，进退维谷。张无计可施，只好派专列将鲍夫人解到北京。当时坐镇北京的是安国军总司令军阀张作霖。张在帝国主义列强怂恿下，正在疯狂反苏反共。4 月 6 日，张作霖派兵搜查了苏联驻北京使馆，捕去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和 10 余名苏联外交人员，并将鲍夫人和这批苏联人囚在一起。4 月 18 日，张作霖绞死了李大钊等 20 余名共产党员，又放出风声说要处死鲍罗廷夫人及苏联外交人员。为了抗议军阀的蛮横，鲍罗廷夫人及苏外交人员曾以绝食进行抗争。5 月 7 日，

张作霖宣布将由北京高检厅对鲍夫人及苏外交人员提起公诉。5 月 23 日，苏联政府外交部交给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一封公函，对这一事件表示关注，并严厉地警告北京政府：“此等人员若与李大钊等同一运命，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当之手段。”

7 月 10 日，北京高检厅开始审判鲍罗廷夫人及苏联使馆捕去之外交人员。被告律师福克斯抗辩说，根据国际公法，外交人员是不可侵犯的，高检厅无权受理此案。审判持续了一星期，未取得任何进展，突然却传来消息：鲍夫人被释放了。

鲍罗廷夫人被军阀政府无理扣押长达数月，费尽周折也未能获释，何以突然之间轻易获得自由呢？原来，7 月 16 日，负责审理此案的高检厅法官贺谦在请示张作霖时，张随口说了句对鲍夫人等“或可开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贺谦即以此为根据，下令立即开释鲍夫人，鲍夫人遂得自由。

那么张作霖又何以会说出“或可开释”的话来呢？这也是事出有因的。原来，7 月 16 日这天，美国参议院议员哈兰·皮汉曾会晤张作霖。会谈期间，张作霖洋洋自得地吹嘘了一番自己维持北中国和平秩序的“功绩”。他说：“我最近杀了 20 多个共产党，明天我要杀鲍罗廷太太了。”张在说这番话时，凝视着皮汉，“意颇欲求其赞美”。哪知皮汉一听此话，大惊失色，连连摇头示意不可。他告诉张作霖，如果不经审判而处死鲍夫人，那么西方人士一定会把他看做野蛮无知的禽兽。因为在西方，对于妇女即使判决有罪，也极少处以死刑，更何况鲍夫人乃一名外国妇女！皮汉说此番话时，语气十分严肃郑重。翻译刚译完，张作霖立即沉下脸来。那时即使是很有身份的外国人，也很少敢于当面顶撞这个无法无天的军阀头子的。一时气氛颇

为紧张，张作霖恨恨地盯着皮汉，大有要将他扣押之势。过了好一阵，张作霖才恢复常态，他没好气地对皮汉说：“好，既然你们洋鬼子对女人这样，我就不处鲍太太死刑罢。”

正巧，皮汉告退不久，贺谦前来向张作霖请示，张即随口答曰“或可开释”。其实，张作霖根本没有立即释放鲍夫人的意思，所以，当鲍夫人获释后两个小时，张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矣”。

鲍夫人对被释放也颇感奇怪，她深恐再有不测，于是迅速地回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张作霖知道后，又派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和公使团交涉，要求公使团允许中国军队再次搜查苏联使馆，逮捕鲍夫人等。公使团讨论后认为，高检厅既已宣布开释，则中国军队不能再次搜查使馆，拘捕人员。张作霖不能抓到鲍夫人，便将最高法院院长关押起来；欲抓贺谦，贺谦早已逃到天津去了。

鲍罗廷夫人脱险后 10 余日，武汉国民政府背叛了国民革命，汪精卫等下令驱逐鲍罗廷。7 月 27 日，鲍罗廷由武汉乘车前往洛阳，取道西北返回苏联

——鲍罗廷夫妇此次终究未能团聚。

巫绍泉

（第 28 页为鲍罗廷夫妇合影）

一幕“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闹剧

1928 年 6 月 20 日，新疆军阀杨增新宣布易帜，归附于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杨增新接受了南京政府的委任，取得了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头衔。

杨增新本是云南蒙自县人，前清进士出身，曾任新疆道尹、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由于新疆都督袁鸿猷被暗杀，杨增新便被推举为新疆都督，自此任期达 17 年之久。杨增新在职期间，对新疆人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压迫政策，而且他平生多疑多虑，就是他手下的重要官员，只要被他猜疑，随时就有掉脑袋之险。有时在大宴宾客之际，只要杨增新以暗语示意，侍卫人员便立即提走他所怀疑的人执行死刑，而杨却依然举杯痛饮，谈笑如故。杨的亲信副官夏鼎、营长李寅就是曾被猜疑而遭杀害的。这种环境迫使杨增新手下的官员一方面向他百般献媚，防犯杨的猜疑；另一方面却又咬牙切齿，对杨刻骨仇恨。这种矛盾一旦激化，杨增新的地位便危在旦夕了。

当时，身为新疆交涉员的樊耀甫是杨增新所宠爱的要员之一。樊耀南是湖北公安县人，前清秀才出身，历任新疆迪化道道尹、新疆交涉员、军务厅厅长、俄文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他与当时的新疆政务厅厅长金树仁（杨增新的干儿子）同为杨增新的心腹爪牙。樊素有个人打算，虽表面顺从，其实早就想推翻杨增新的统治，取而代之。他知道金树仁也对杨不满，有叛杨的意图，便伙同金树仁暗中策划倾覆杨统治的阴谋。杨增新易帜后，自以为当上了新疆省政府主席，便洋洋得意，似乎他将成为新疆终身不倒的统治者。岂料事与愿违，祸从天降，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变发生了。

7 月 7 日，樊耀南邀请杨增新到俄文专科学校为学生颁发毕业文凭，杨欣然承诺，率领文武大员及卫队耀武扬威，前来赴约。樊大张华筵，款待杨增新。就在宴会进行之时，忽然枪声大作，樊指挥伏兵开枪射击，杨及随从军官皆被击毙。随后，樊迅速进入督府，宣布自己继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樊耀南如此神速地取得了省政府主席的地位，便欢喜若狂，得意忘形。谁知自古有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樊宣布继任省政府主席之后不到两个小时，一队人马飞奔杀到，领头的正是金树仁。金趁樊措手不及，将樊与其党徒 20 余人当场捕杀，金树仁即宣布接任省政府主席。这样，金树仁发动的“第二次政变”遂告成功。金树仁本来事先与樊耀南同谋杀杨，但金却暗中另有囹谋，终于演出了这场闹剧。由于当时新疆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且反动当局封锁消息，使外界不能明其真相。这三个剧中人都是科举文人出身，皆做过新疆道尹，而夺权手段之毒辣却是一个胜过一个。

金树仁取得省政府主席职位后，在他统治新疆期间（1928

年—1933 年），不断制造民族仇恨，大兴杀戮，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1929 年他招来东北籍军人盛世才任参谋处长、参谋长。盛世才开始对金也是百般效忠，其内心却是假心假意，诡计多端。1933 年盛世才便驱逐金树仁，取得了新疆省政府主席之职，金树仁落得了一个“引狼入室”的可耻结局。此时的军阀盛世才，同样变成了一个疑神疑鬼、喜怒莫测的嗜血狂人。

李军

北洋军阀政客在天津的寓公生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争权夺利，穷兵黩武。今天你登场我下台，明天我掌权你滚蛋，群魔乱舞，丑态毕现。不少军阀、政客下野以后，遁迹于天津作了“寓公”。一来是因为天津有外国租界，可以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构筑自己的安乐窝；二来是因为天津和北京相距咫尺之间，便于窥测方向，重整旗鼓。当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就是说，某些野心家在北京的袍笏登场，却原来是在天津打扮起来的。

北洋政府前后5任总统中，徐世昌、黎元洪、曹锟3人在被迫下野之后，都息影津沽，颐养天年，后来也都病死在天津私寓；袁世凯、冯国璋与天津也夙有渊源。“东北王”张作霖进关之后，问鼎京师，粉墨登场，组织安国军政府，开场锣鼓也是在天津敲响的。北洋政府的32届内阁，有1/3的总理，如段祺瑞、靳云鹏、唐绍仪、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顾维钧、熊希龄、梁士诒、朱启钤、高凌霨、潘复等，都在天津或久居，或暂住，在这里都设有私人公馆。在这里的内阁部长一级的人物更是大有人在，名声显赫的如王揖唐、王克敏、叶恭绰、曾毓隽、段芝贵、陆锦、朱深、张弧、张志潭、吴毓麟、吴光新、刘冠雄等等。至于下野督军、都统和省长一类的人，信手拈来也有一大串，如倪嗣冲、王占元、陈光远、张勋、齐燮元、卢永祥、李厚基、王承斌、田中玉、王怀庆、汤玉麟、张敬尧、鲍贵卿、孟恩远、万福麟、张作相……还有那位睥睨南北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等而下之，寓于天津的一般军长、师长、厅长、局长等等，为数就更多，夸张一点说，有如过江之鲫了。如此众多的北洋政府要员麇集津门，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风气上，不可能不对天津这个工商业城市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么一大批下野军阀与失意政客，在天津是怎样打发自己的寓公岁月呢？

有的野心不死，仍在窥伺再起

1928年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有些军阀在蒋介石的分化收买下，归顺了国民党政权。尽管后来大多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削去兵权，但终究能够苟安一时，依旧有高官可做，有地皮可刮。舍此而外，要想东山再起，只有依附于外国势力，充当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了。

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早就猎中了这一伙北洋军阀、政客。20年代，在天津冒出来若干日本特务机关，如什么青木公馆、茂川公馆、三野公馆、松井公馆、和知公馆等等，大多以北洋旧军政要人为其工作对象，专事笼络这些寓公。愿者上

钩，不少人逐臭而至，甘心卖身投靠，充当侵略者的傀儡。在天津日租界有个“三同会”，系三个亲日团体即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生同学会和中日同道会结合组成的，几乎把所有亲日、媚日分子都网罗进去了。这个“三同会”的后台，是日本驻屯军参谋部。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之后，把一批前清遗老和北洋旧吏都派上了用场；接着，日本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妄图在伪“满洲国”出笼之后，再如法炮制一个伪“华北国”。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个月，日本驻屯军唆使汉奸在天津制造“便衣队”武装暴乱，图谋推翻天津地方政权，并趁机将溥仪劫

持到东北作傀儡“皇帝”。参与策划这次暴乱事件的头目张璧，就是当年驱逐溥仪出宫时的北京警察总监。段祺瑞下野居津期间，日本人几次怂恿他“出山”，主持东北或未来的华北傀儡政权；此事为蒋介石侦知，急派要员北上，将段祺瑞接到南京，才得以摆脱日本人的困扰。1935 年，原北洋政府湖南督军张敬尧在日本特务机关指使下进行反蒋活动，事机不密，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于北平六国饭店。在日本驻屯军的操纵下，白坚武出头组织“华北正义自治军”，计划攻打北平，夺取政权，也未能得逞。这个白坚武，就是当年吴佩孚的政务处长。

1937 年 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就侵占了北平、天津及华北其他城市，被日本人豢养多年的那些北洋军阀、政客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纷纷沐猴而冠。如江朝宗出任“北平治安维持会”会长，高凌霨出任“天津治安维持会”会长，马良出任“济南治安维持会”会长。1937 年 12 月，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一大批北洋旧吏，如王克敏、王揖唐、汤尔和、齐燮元、朱深、董康、王荫泰、门致中、王水泉等，都充当了汉奸

大头目。这伙民族败类果然如愿以偿，东山再起了，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千载骂名。

有的皈依佛门，并非看破红尘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于杀人如麻的军阀，无疑是一副精神解脱良剂，因而那些混世魔王摇身一变而成“虔诚”的佛教居士。天津本非佛门胜地，又无高僧常住，却由于一时间涌来这么一批“皈依弟子”，佛教突然火炽起来。

曾经狂热地迷信“武力统一”的段执政段祺瑞，在下台后也笃信佛陀了。他在公馆里设有佛堂，广交僧俗弟子。段的皖系部属也纷纷追随其后。不知是什么人调侃他们，封了个“八大金刚”，他们是：董康、朱深、黄郛、王揖唐、张孤、吴光新、王郅隆、倪嗣冲；并把段祺瑜比作释迦牟尼，曹汝霖比作观音菩萨，陆宗舆、章宗祥比作文殊、普贤。可见天上人间，同样都是以权力论座次的。靳云鹏与孙传芳在佛祖面前也不甘示弱，他们接办了一座规模不大的禅院，改名“居士林”，分任正副林长，每逢周日聚众讲经，善男信女济济一堂。不料在 1935 年 11 月 13 日，施剑翘为报杀父之仇，混在礼佛居士行列，一举刺杀了孙传芳。这一场“血溅居士林”的武打戏，使寓居津门的北洋军阀人人自危，原来佛堂也并非清静之地，居士林顿时门可罗雀了。

佛教也是日本人笼络北洋军政要人的一条渠道。30 年代初，日本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寺在天津设立了一个“中日密教研究会”，参加者中日人士参半。在日本人中最活跃的是驻屯军高级参谋石井嘉穗、日本居留民团团长臼井忠三，都是握有实

权的人物；中国人有段祺瑞、孙传芳、曹汝霖、王揖唐、齐燮元、高凌霨、纽传善、孙润宇、张志潭、白坚武等。会长先是段祺瑞，后为王揖唐。在“七·七”事变前，蒋介石曾在庐山接见过王揖唐，授意王以中日密教研究会会长名义访日，接触日本朝野人士，藉此探测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向。由此可见这个佛教组织的政治功能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伙佛门弟子们纷纷沦为大汉奸，他们仍紧紧抓住这

面佛教旗帜，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天津建立了一个“ 中华佛教会 ”，妄图全面控制中国佛教界。这个伪组织的会长是潘对凫（原北洋政府总理潘复的父亲），高级顾问有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董康、朱深，以及日本僧人吉井芳纯，常务委员有江朝宗、靳云鹏、王揖唐、曹汝霖、高凌霨等。仅从这一纸汉奸名单，就不难嗅出其龌龊臭气，所以为正信的佛教徒所不齿，不久也就名存实亡了。

有的弃官经商，生财有道

军阀们这伙纠纠武夫，对赵公元帅的膜拜却也至诚得很。不少人在台上就亦官亦商，一身二任焉，贪婪聚敛，不厌其多。他们在得势之始，便以权牟利，多从封建性盘剥入手，广置田产、办盐务、经营当铺之类。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吉林督军鲍贵卿、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在天津都置有为数可观的房地产，并设有房产公司或经租处专营其事。如李纯的经租处每月所收租金与利息高达 4 万元，而当时的金价不过每两 20 元左右，计合黄金 2000 两。曹锟家族（弟兄 5 人）在天津及其家乡攫取的土地总在 200 顷之谱。办盐务的如吴毓麟、鲍

贵卿、李廷玉、许兰洲、张廷谔；开当铺的如王占元、陈光远，曹锡及其弟兄开设的当铺竟有 9 个之多。当备派军阀扩军备战之际，从事军需工业成为致富捷径。如曹锟当上了直鲁豫巡阅使之后，与其弟兄开设了粮栈、被服厂、饼干厂，产品主要供应军队，并以“ 军运 ”为名强令铁路局专车运送，不出运费，获取暴利。倪嗣冲的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本是粮商出身，利用筹办军粮之机做投机生意，大发横财。真是“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吸引了北洋军阀、政客的投资兴趣。据统计，在 20 年代前后，北洋军政人员对天津工业的投资额至少在 4600 万元以上，约占当时天津民族资本 10 万元以上大厂资本总额的 58%。北洋军政人员对金融业的投资量为数可观，如著名的“ 北四行 ”有三家（盐业、金城、大陆）是北洋系资本开办的，其他如中国、交通、中南、中国实业、新华商业储蓄、北洋保商等各大银行都有他们的大宗股份。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天津的钱业一度发展很快，其中有不少属于北洋系资本；1937 年抗战爆发前夕，天津有银号 122 家，其中北洋军政人员开办的占 10 %，投资额在百万元以上。在天津经济界，北洋系军政人员资本可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洋军阀政客投资经营企业，大多在他们执政掌权时已经开始，这就为他们下台以后弃官经商奠定了经济基础。对天津工业投资最多的是倪嗣冲、曹锟、黎元洪、周学熙、王占元、陈光远，仅倪嗣冲就达 800 多万元。黎元洪下台以后，主要精力转向经营工商业，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有 60 多家，投资

额达 300 多万元，他曾经担任过许多企业的董事长、董事职务。有些弃官从商者，如周学熙、龚心湛、吴鼎昌、徐世章、曹汝霖、颜惠庆等，在天津经济界颇有影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实业家、银行家。

有的恣意寻欢，挥金如土

北洋军阀、政客依仗着搜刮来的孽财，整日沉溺在吃、喝、嫖、赌的放纵生活中，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挥金如土，祸及子孙，大多数人没有好的结局。

军阀、政客们把讨几房小老婆，视若寻常事，其手段不是霸占坤伶，就是为妓女赎身。天津南市妓院区有个天宝班，老鸨子诨号“小李妈”，风流放荡，以善于酬应军阀而名噪一时。小李妈最讨张作霖的欢心，张每次滞津期间，必找小李妈陪着“斗十胡”，许多奉系军阀也就成为天宝班的上宾。张作霖、鲍贵卿、孟恩远、张宗昌等人都从天宝班领出过妓女做姨太太。有些高等妓院，由于军阀、政客的寻花宿柳而大走红运。三房六妾之间，常常引起争风吃醋的丑闻，甚至有的大打出手；外遇私奔之丑闻，当时小报也时有披露。

天津租界里的赌场甚多，五花八门，标新立异。比较著名的如同文俱乐部、泰安俱乐部、德国球房、吉拉枪场、安乐宫、回力球、赛马场，都是北洋军阀、政客及其眷属经常光顾出入之地。北洋财政总长张弧嗜赌若狂，在同文俱乐部曾经一个晚上输掉 6 万元；奉系北京市长周大文，一次在回力球场输掉了两所楼房；曹锟之子曹士嵩“压牌九”，一夜之间把 5 所楼房全部输光。真是各有千秋！天津的赛马赌风很盛，原来有一个英

商赛马场，1920 年张弧、吴光新（原北洋陆军总长）又筹建了一个华商赛马会，与之对抗，更助长了天津的赛马赌风，每次开赛，全城轰动，成为一大社会新闻。热中于狂嫖滥赌，正是某些下野军阀、政客糜烂生活的写照。

有的颐养天年，保全晚节

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华北以后，北洋军阀、政客叛国投敌者固然大有人在，但无视敌人的成逼利诱不出任伪职者，也不乏其人。

徐世昌就是其中一个。他在 1922 年 6 月被直系从总统宝座上赶下来以后，即退隐津门，长年以读书、绘画、赋诗、写字为乐，韬光养晦，不再涉足政坛。1937 年 7 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徐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对外推说有病，从此不再出门，也不会客。日本贵族院议员坂西利八郎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先后通过靳云鹏与曹汝霖，游说徐世昌出任华北伪政权头目，均遭拒绝。1938 年冬徐世昌息患膀胱瘤症，泌尿科专家谢元甫劝其去北平协和医院做手术，徐担心被日本人劫持，不肯定出租界，以致病情延误，转年 6 月死于津寓。曹锟在沦陷期间也受到日伪势力的胁迫，这位当年醉心于权位的贿选总统，一反故态，拒绝“出山”，落得个晚年清白。奉系吉林省长张作相，“九·一八”事变以后避居天津，日本人派伪满财政次长洪维国专程来津，以高官厚禄引诱张作相“下水”，被张严词斥退。此外，还有一些北洋旧吏，如张国淦（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王廷桢（曾任察哈尔都统）、陆锦（曾任陆军总长）、朱启钤（曾任交通总长）等，都抵制了敌人的诱惑，拒绝出任伪职。这些人，当年宦海浮沉，争名逐利，而在民族危难关头，保有一点爱国的良知，洁身自爱，保全晚节，确是难能可贵的。

杨大辛

抗战前华北武装走私奇闻

走私有“理”，缉私有“罪”

1935 年 5 月 17 日，秦皇岛海关派驻山海关的关员，率领巡缉队员数人，身佩短枪，正在山海关西长城段巡逻。当他们走至角楼湾附近，突然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向长城外面掷下一个装得鼓鼓的麻袋。与此同时，从长城下面隐蔽处冒出了两个人影，仓皇地将麻袋扛起向远方逃逸。巡缉员见状立即疾步赶上大声喝道：“站住！”城墙上二人见势不妙，慌了手脚，其中一人不顾一切，纵身跳下长城，一瘸一拐地尾追那二人逃去，另一人未及跳下，即被巡缉员逮住，押回海关，他招认麻袋里装的都是银元。

10 天以后，秦皇岛海关得到举报，称有两个状似日本人的人，向长城东北隅的罗城抛下了一包银元，要赶快派人前去检查。海关当即派员奔向所报地点察看，果见有两个包裹抛在

城外墙脚。又见一人慌慌张张从城墙上跳下，跌入城墙外田氏中学院内，致遭重伤。关员当即将墙外两个包裹用铁钩钩起，果是两包银元。

这是当年华北白银走私的两个小插曲。像这样的走私活动，已非一日。开始时，只是个人随身携带几十、几百元，偷运到关外。后来愈演愈烈，有用汽车上偷运出境，有混入火车上行李包夹带偷运。缉私人员从开往山海关的火车上，有时一天可以截住 200 多走私者，没收银元可达数万元。但尽管如此，银元走私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更加猖獗，估计每天走私出境可达 40 万元。银元先是由各种渠道私运到山海关集中，然后由乔妆成伪满警察的日本人，将银元包运至东罗城上火车，再转运至沈阳、大连发往美国。

日本帝国主义在 1931 年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又于 1933 年和 1935 年先后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非武装区”，遂趁美国政府 1934 年实行大量收购白银之机，由日本人出面，在关东军支持下，在华北勾结大批日本、朝鲜浪人、汉奸走私商贩，无视中国海关主权，在海上、陆上，大搞进出口武装走私，在国际上造成“华北已经独立”，不再属中国管辖的形象。

为此，日本对我海关缉私，早就视为眼中钉。这年 5 月份两次缉私事件发生后，他们由军方出面，气势汹汹地向秦皇岛中国海关提出了蛮横的要求，声称根据塘沽协定，中国已将长城割让给“满洲国”，中国海关不得再在长城执行巡缉，如中国方面不予承认，日方将把海关人员全部逐出山海关，同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赔偿受伤人员损失。

国民党政府为息事宁人，除对日方要求一一照办外，并立

即指令缉私人员，从冷口、喜峰口、马兰峪、古北口一线撤回，并为“防止发生误会肇事”，命令缉私人员此后一律不再佩带武器，收回所有枪支。从此，华北大门完全向日本敞开了。

运输队怪哉，缉私员屈煞

白银像潮水一样流向关外，关外的走私货，则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涌进了关内。

1935 年 9 月，山海关车站外的大马路上，一支谁也未见识过的“运输队”，

耀武扬威地开了过来。这是一支武装走私运输大队，它由上百辆马车，200多人组成，车上满载货物，前后各有武装马队20人开道、护卫。一个日本浪人，手持盒子枪，昂首阔步，怒目而视，率领着这支队伍在中国山海关查验所大门前喧嚣而过。中国缉私人员，个个憋着一腔怒火，却谁也无法过问。

1935年9月7日，山海关车站内。一列西行入关的火车，正在站内待发。徒手的中国缉私人员进入站内、见有朝鲜浪人多人，守护在待发的私货列车房。他们正准备上车查验时，一言未了，突然有50多个朝鲜浪人，个个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木棍、石块等物，蜂拥而出，将中国海关人员团团围住，棍石交加，赤手空拳的海关人员寡不敌众，被迫退出，结果多人受伤，而私货列车却长鸣一声疾驶而去。

山海关车站如此，其他各地的中国缉私人员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秦皇岛缉私队长，因扣留了私货火酒，遭到日人殴打致伤。日本浪人甚至闯入山海关海关的监察长院内，野蛮殴打海

关人员，将被没收的私货劫走。天津小西门卡所的关员和警长，甚至遭到了日本浪人的绑架，卡所办公室被占据，枪支被劫走，已被没收的私货全部被夺回。

海盗成“主人”，主人成“海盗”

走私规模更大的是在海上。

1935年春，在冀东留守营的海滩。距离岸边10几米处的海面，停泊着几艘满载货物的渔船，几十辆马车，正在忙碌地运送着从渔船上卸下的货物。这批货物，又是从停泊在几百米外的海中的机帆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品种繁多，有人造丝、布匹、白糖、火柴、卷烟纸、煤油、润滑油、颜料、车胎、罐头食物，等等。因为全是走私货，机帆船不敢公然停靠码头，只得远远地停泊在吃水较浅的海滩外，搞起“马车、渔船、机帆船”这样的接力运输来，然后再偷偷地发往天津等地转运内地。

在1936年春，走私的规模大大升级了。

在北戴河海湾里，大小船只密密麻麻，往来频繁，全都是走私船只。这些船只，载重有数吨数十吨的，更有数百上千吨的；船主有日本人、朝鲜人、汉奸商人的，更有日本三菱、三井等大财阀系统的；走私货物，应有尽有。可谓无货不私，无私不走。所有船只，都有朝鲜浪人或日本浪人武装护卫着，就是看不到中国缉私船只和人员。

这些走私船只，大都是从大连开来的。除了北戴河，秦皇岛、南大寺、留守营、昌黎等北、东沿海各口岸，无不如此。最多时，各地口岸停靠的走私船，曾达1.2万艘之多，各个码头上，走私货物堆积如山。

日本方面诡称，根据日本法律，向中国走私是正常的“特殊贸易”。为了使这种“特殊贸易”通行无阻，他们自1935年起，即操纵冀东伪政权在唐山设立了“检查所”，在秦皇岛、北戴河等地，设置了“检查分所”，从而完全剥夺了中国在华北的海关行政权。同时叫嚷如果中国海关对走私船只进行检查，日本将视作“海盗”行为。中国缉私船只，不但不能执行缉私，反经常遭到日军炮击，被日军堵截。

“走私”不但合法，而且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公开成立了一个石河转运公司，雇有中国搬运工千余人，专事搬运走私物品。在山海关和秦皇岛

等地，也有走私的专业组织。在天津成立的专营或兼营走私的“公司”或“洋行”，更是多如牛毛，足有二三百家之多。日本还成立了海上运输保险公司，收取高额保险费用，使走私者更有恃无恐。

华北走私活动至1937年抗战爆发，历时长达3年有余，给中国财贸海关、金融工商及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灾难。白银走私数额，最高时曾以每月1500万元的数量被偷运出境，致使不少银行、钱庄倒闭、停业，加深了金融危机。关税收入大幅度下降，走私期间累计减少2亿元。致使中国主要民族工商业如纺织、缫丝、火柴、卷烟、面粉、食糖等都先后因抵挡不住走私突袭而陷入绝境。

走私的恶果，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愈益高涨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1935年底，北平爆发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武装走私”就是当时斗争口号之一。

刘大明

邓演达遇害前后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愤而流亡欧洲，并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强调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遗志。1930 年 5 月，邓演达回到上海进行秘密活动，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了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活动方便，他们彼此往来均在偏僻的马路上用英语交谈，使特务无计可施。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中国国民

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 8 月 9 日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的有 10 个省、区的代表 30 余人。邓演达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他起草的政纲《我们的政治主张》，并推举他为中央领导机构——干部会的总干事。大会结束后，邓演达从上海到东北、华北等地考察，并抓了几项工作：一、举办干部训练班；二、组织黄埔同学会；三、进行军事策划。邓演达的积极活动，在国内迅速产生了广泛影响。南京、北京、广东、四川、福建、江西、江苏、浙江、武汉、山东、河南等地 14 个省市先后迅速成立了“第三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他邀集黄埔军校进步学生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以区别于蒋介石嫡系组织“黄埔同学会”，对蒋介石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蒋介石对邓演达极为忌恨，以 30 万元悬赏捉拿邓演达，伺机对他进行迫害。

1931 年 8 月 17 日，邓演达出席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 20 号举行的干部训练班结业式，宣讲国内外形势。与会者正听得入神时，叛徒陈敬斋带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警探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中西包探突然闯进来，邓演达立即明白了敌人的来意，便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说：“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但敌人还是把邓演达和 10 余名同志脚镣手铐押到英国巡捕房，关在一间只有 1 丈见方的临时囚室里。下午 3 点多被捕，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给吃一点水泡饭。邓演达鼓励难友们：“打起精神来！不要怕，不要急，一切有我负责，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看他们有什么把戏。”在巡捕房受审时，邓演达写下了一篇自述，简略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并表明他的奋斗目标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及独立的国家”。

8 月 18 日上午 9 时，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对邓演达进行了审判。下面摘引一部分审讯记录：

审判长问：你赴愚园坊 20 号做什么？

邓演达答：与朋友聚会。

问：你们不是正开会吗？

答：在谈话。我对经济学是有相当研究的，昨日是在讲中国的经济问题时被捕的。

问：政府方面说你有反动行为，事实怎样？

答：批评现政府则有之，至于积极的反对，目前还没有举动。

问：警备司令部要移提你，有话讲吗？

答：我想站在大多数民众的立场去批评现政府，是好意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大中华民国应体现法治精神。贵院有权裁判，何必到什么司令部。

接着审判长问辩护人意见。律师张志让和蔡六乘先后指出：这是一个为

中外人士所关注的案件。如果将被捕者交警备司令部，将给外人攻击中国司法制度以口实。其次，邓演达是研究经济的，昨天讲的是经济问题，全无“危害民国”之言论，他在公共租界内被捕，管辖权属于江苏高等法院，请勿移送警备司令部。但审判长仍宣布将邓演达移送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为此，辩护人提出抗诉，被审判长驳回。19 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派人到法院将邓演达押走。

8 月 21 日，邓演达被单独押解到南京，关在三元巷军委会内。临行前，他托人转告难友们：要努力学习，一天不死就要战斗。这时，“行动委员会”的同志安排了一个营救计划：邓演达有一个学生叫许沅圃，也是“行动委员会”成员，他有一个排驻防在三元巷，负责监护。每星期日晚轮到他的亲信卫兵值班。他认为这是营救邓演达出狱的良策。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行动委员会”还筹措了 5 万元经费，作为卫兵眷属的转移费用。不料准备工作刚刚就绪，蒋介石又将邓演达移解到紫金山麓的一所空屋内（后来才知道是富贵山炮台废址），这就使营救计划全部落空。邓演达移解后，通过看守传出一张亲笔字条，上面用红铅笔写道：“我已被移住紫金山的茅屋内，以后通信将不可能，愿做白发囚徒，同志们要继续为革命努力。”

蒋介石抓到邓演达之后，起初觉得难以处置，即所谓“杀之可惜，纵之可畏”。但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汪精卫、孙科等人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共赴国难”的条件；同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又联名要求保释他们的教育长——邓演达，受邓演达影响的黄埔各届学生至少有 5000 人以上。于是，下野前夕的蒋介石下了决心：秘密杀害邓演达，以免动摇作为他统治根基的黄埔力量。1931 年 11 月 29 日夜，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地方，诡称要将邓演达转移到汤山。囚车开到南京城东麟麒门外沙子岗时，司机佯装汽车抛锚，王世和要邓演达下车。邓刚走出车门，身后枪声突起，这位忠勇奋发的一代英杰成了蒋介石阴谋的牺牲品，死时年仅 36 岁。牺牲前，他在狱中书写了一幅对联：“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

1931 年底，从何应钦那里传出了邓演达被害的消息。宋庆龄将信将疑，于 12 月 14 日赴南京质问蒋介石，并强烈要求跟邓演达见面。她不住国民党的宫邸，而住在中山陵当年的奉安大典筹备处的简陋房屋里。她也拒绝乘坐国民党当局预备的小轿车，而坐一辆用灵车改成的小交通车。蒋介石原想敷衍一下宋庆龄，但最后实在无法掩盖，才被迫吐出了一句实话：“这个人你见不到了。”宋庆龄悲愤至极，一下子把茶桌掀翻，面斥蒋介石祸国殃民，蒋介石慌忙躲上了楼。

12 月 19 日，刚从南京返沪的宋庆龄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奋笔疾书，用英文撰写了抗议杀害邓演达的著名宣言。然后由“行动委员会”中央直属区的负责人杨杏佛、谢树英译成中文。“宣言”严正指出：“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藏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宣言”深刻揭露：“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的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宁粤合流的实质是：“和平分赃，统一作恶”。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

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之道”。这份“宣言”，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后又登载于12月20日的上海《申报》。在宋庆龄的激励下，北平、天津等地举行了悼念邓演达的活动，不少人表示要响应宋庆龄在“宣言”中提出的“消灭军阀官僚，实现社会主义”的号召，化悲恸为力量，跟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先生在《哭邓演达先生》诗中写道：“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冠带自峨峨。”

陈漱渝

（第49页为邓演达被捕后的照片）

蒋廷黻衔命访苏记

原苏联国家档案局保存有当年蒋廷黻访苏时与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的谈话记录。现本文作者首次将其全文译出，以反映这次会谈的真相。

1934 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蒋廷黻，曾于 1934 年去苏联访问了两个多月，他的这次苏联之行，使恢复邦交不太久的中苏两国关系，获得了改善与发展。蒋廷黻作为一个学者这次赴苏不仅仅是进行一般的学术交流和参观游览，还肩负有中国最高当局蒋介石交付的特殊使命。

蒋廷黻是在中国面临联苏抗日的政治背景下访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辽阔、富饶的东北，也直接威胁着苏联远东的安全。面对共同敌人，中苏两国政府捐弃前嫌，于 1932 年末恢复了中断近五年的外交关系。同时蒋介石

担心改善和加强中苏关系，会妨碍他的“剿共”大业。因此对日本一再妥协退让。1933 年初日军兵不血刃地侵占了热河，并派兵越过长城线，占领了冀东大片土地，直逼平津城下。日本侵略者的贪得无厌、步步进逼，使国内（包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开始觉察到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中日战争一开，东南沿海必将被日本海军封锁，那样中国就无法从海上接受外援。而中国广大的西北地区与苏联接壤。因此国内要求联苏的呼声日益高涨，有的报纸明确指出：联苏就是为了抗日！

面对日益深重的国难和愈来愈高的联苏呼声，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与苏联改善关系。可是这时蒋介石不知道苏联政府对他 1927 年以来一系列反苏行动所持的态度，意识到要改善中苏关系，他本人就可能是一个障碍。于是，他授权计划访苏的学者蒋廷黻去完成这一使命。

蒋廷黻是一位历史学家、自由主义学者，早年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著有《清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和《中国近代史大纲》，1929 年赴北平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九·一八”后，他与胡适、丁文江等共同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并经常在《大公报》和《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阐述对一些内政外交问题的看法，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后经《大公报》吴鼎昌引荐，蒋廷黻于 1933 年夏和 1934 年初，两次受到蒋介石召见，当面向蒋提出不少建议。蒋廷黻计划于 1934 年暑假去欧洲访问，搜集中外关系史的资料。蒋介石得知他的这个出访计划后，7 月 27 日在庐山牯岭再次召见他，让他这次欧洲之行“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以“测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嘱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蒋廷黻向蒋介石表示，作为一名学者，他很难担此重任。蒋介石对蒋

廷黻说：我将使苏联当局明了，你是我所信赖的人。蒋廷黻遂允诺，表示当尽力而为之。

蒋廷黻于 8 月 16 日从北平启程，经山海关进入日本统治下的东北，8 月 20 日从满洲里出境进入苏联远东地区。苏联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在出访前，蒋廷黻虽听到过不少的议论，可毕竟是道听途说，头脑里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看法。他曾说：“近十几年来，关于苏俄的情形，我读了不少，听了也不少，誉之者说苏联是天堂的临世，毁之者说苏联是疯子造的活地狱。”

现在，他可以亲眼目睹、亲身了解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了。

蒋廷黻乘坐的火车经过 6 个昼夜的颠簸，于 8 月 26 日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首都工作和游览了半个月。9 月 10 日去十月革命的爆发地列宁格勒。这座位于芬兰湾畔的历史文化名城，使所到的游人流连忘返。金碧辉煌的冬宫，令人陶醉的涅瓦河夜景，彼得大帝和普希金的高大塑像，使参观者赞叹不已。9 月 16 日，蒋廷黻离开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9 月 24 日，他致电蒋介石，除报告“在俄考察各情”外，提出了他对发展中苏两国关系的看法：“中俄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利害既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条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此时正在江西南昌坐镇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见到蒋廷黻的电报后，10 月 1 日致电南京，指示孔祥熙秘密电告中国驻苏大使馆，说明蒋廷黻是蒋介石信任的人，可与苏联当局接谈，以建立互信；蒋介石在电报中还让孔祥熙告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洛莫夫，说明蒋廷黻与蒋介石有“深密关系”，蒋介石对他“极为信赖”，请鲍格洛莫夫“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开诚洽

谈”。

10 月 8 日，鲍格洛莫夫向莫斯科报告，孔祥熙向他转达了蒋介石的请求，希望苏联政府对蒋廷黻访苏给予通力协助。同时，中国驻苏使馆也向苏联外交当局交涉，希望苏联政府的外交官员与蒋廷黻会见。

苏联政府视蒋廷黻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10 月 16 日派负责中国和远东事务的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与他会见，围绕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两人进行了坦诚的交谈。关于这次谈话，苏联档案里保存了一份详细记录，笔者从俄文译成了中文。为使读者全面了解这次谈话的内容，并评估它对日后两国关系的影响，现全文引述如下：

蒋：阁下是否已获悉鲍格洛莫夫先生关于我担任蒋介石的代表，并受他委托求见的通知。

斯：我们已得知蒋教授的情况。

蒋：7 月 27 日我动身出国前，曾应蒋介石之召至南昌。蒋嘱转达：蒋介石认为中苏两国由许多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什么打击或损害，中国也必将被殃及。他想探问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他关于两国关系的那些想法。

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对中国怀有最真挚、最友好的感情，因苏中两国不仅有共同的边界，而且还因苏联深切同情中国人民为得到平等权力、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怀疑，我们大家都一致愿意发展同中国的最真挚、最友好的关系。

蒋：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迥异，这是否会影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斯：有许多证据可说明苏联政府在对外政策中，从来不以什么社会经济的差异或好恶为准绳。我们从国家利益和苏联政府绝对服从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力求同各国哪怕是与我国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维持最和睦的关系。我们同一系列国家包括某些个人专权的地区保持关系，后者与我国制度的差异远远超过苏中制度的差异。尽管我们同这些国家之间并没有我说过的类似我国对中国人民的那种友情，但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仍在发展。为了说明问题，我可以援举我国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为例子：这些国家实行的是地道的法

西斯统治制度，与我国制度是根本相对立的，但十年来我们仍一直与意大利保持着关系，因为意大利政府也愿意这样做，并且没有任何背弃与苏联之间的和平关系的计划。然而，我们同德国的关系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如果说目前的关系并不好，那仅仅是因为德国对和平、特别是对苏联的和平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蒋：我们知道苏联和许多非共产党执政的邻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譬如和土耳其、意大利和近来同法国的关系。在长期密切合作之后，非常遗憾，中苏关系破裂了，这会不会影响今后的关系呢？此外，大家知道，在中国当政的正是蒋介石，这个事实对苏联政府产生了什么相应的影响呢？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呢？

斯：我不想回顾过去的苏中关系，大家都很清楚，在一段时期的合作之后，是中国政府肇使合作关系破裂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制定政策也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追究往事。在我们确定今天同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现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的关系时，我们当然绝不能从往事和感情出发，而应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

的关系。我们把它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也像尊敬其它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们见都不可能对我们的立场产生不好的影响。这一点我倒可以拿我们对法国的态度为例：大家知道，不久之前法国在组织反苏活动，企图建立各资本主义国家反苏统一战线，在这一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这些事件的发生还在苏中关系发生的那些事件之后，虽然如此，目前我们仍和法国保持着最好的深厚友情。

蒋：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作的解释，请相信，蒋介石并不了解苏联政府的观点，我将马上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他。我坚信，这对未来的中苏关系将有重大的意义。

斯：我希望避免因我们今天的谈话而出现误会，请您了解，我们今天的谈话是非正式的、秘密的，事先我不知道您会向我提这些问题，所以，我自然没有得到苏联政府授予的任何全权向您作正式说明，况且您本人也是蒋介石的非正式代表。

蒋：我明白谈话是秘密的、非正式的，但我能否认为您说的想法和原则反映了苏联的立场？

斯：我对您说的是个人看法，但我认为它反映的也是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态度，您当然可以如实地向蒋介石报告谈话内容。

蒋：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如果蒙您允许，我想再补充几点意见。现阶段中国的对外政策，不能代表也不能反映中国的民族感情，不过，我们应该跨过这一阶段，并且我们大家都坚信它将不会持续太久。在最近两三年里，很多中国活动家向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提出与苏联合作和接近苏联的政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建议没有被我们的政府采纳。但是，至于说蒋介石，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他会努力开始同苏联接近。

请问，据您看，这种接近在什么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还要做些什么方可使之更有成效？

斯：这是一个很重要和繁难的问题，我应该认真考虑考虑才能回答，因此我暂不答复。

蒋：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也并不坚持要您立即回答。我想补充几点，或许会有利于您的回答。南京政府收到了关于中苏接近政策的建议，比如关

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或者以任何形式表明，我们两国友谊的建议带有表面的性质。蒋介石谋求的接近苏联，不是通过形式上的结盟或别的什么公开表示，他希望通过培养相互间的理解与信任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向苏联政府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方与苏联作对，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为做到这一点，要按步就班地认真做好准备，比如可以通过外交合作的途径。毫无疑义，这无论对中国还是苏联都将是有益的。

斯：我赞同您的意见，不要追求形式上的接近和形式上的表态。至于具体的建议，那应该认真地考虑。在讨论这类问题时，我还应该再一次提请您注意我们各自的不同之处，您的谈话是以私人身份；我谈话时虽然也是以私人身份，可我并没有放弃充当我国政府的代表。

蒋：要进行这样的谈话，蒋介石不可能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只能选择非官方的方式。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属外交部管辖，所有的问题都要与它联系，而我们的外交部有自己的政策，它收到的有悖该部现行政策的报告，往往不转给蒋介石。况且，官方途径是不允许涉及像我们今天谈话中这样提及个人问题的。我个人衷心地希望促进我们两国的接近，如果我能

帮助做些有益的事情，我乐于效力。我相信，假如中苏间能重新开始认真的接触，我们今天的会谈在这当中必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蒋廷黻与斯托莫尼亚科夫的这次会谈，是 1932 年末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作用。蒋廷黻认为，这次会谈标志着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初步试探的阶段已经过去”。会谈后，蒋廷黻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由此了解到苏联政府对他的态度，他对蒋廷黻莫斯科之行的结果甚为满意，遂立即复电“甚表嘉许”，并从 1935 年起，加快了联苏的步伐。

1934 年 11 月 7 日，蒋廷黻作为中国驻苏使馆的客人，应邀到红场参观了十月革命节的庆典。 11 月 10 日，蒋廷黻圆满完成莫斯科之行的使命后，乘火车离开苏联首都，途经波兰，前往德国访问。

一年后，即 1935 年 11 月，蒋介石任命蒋廷黻为南京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 年 10 月，又让他接替颜惠庆担任了中国驻苏联大使。

杜华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阎锡山秘密会谈的台前幕后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连发密电，请阎锡山全力支持。14 日，张学良、杨虎城派苗浡然飞抵太原，“请阎来领导”。同日，南京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电请阎锡山“密加运用”，先将蒋介石从西安移居太原。15 日，孔电告阎说：“弟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太原，与阎晤商。16 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谓“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一时间，阎锡山似乎成了扭转时局的关键人物，为各方所瞩目。阎锡山也自感身价倍增，遂踌躇满志地施展其居间斡旋的计谋。可是，素重情义的张学良，却不领阎锡山的这份情，他对部属们说：“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还说：“我决不让老阎作（成）这一票买卖。”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潜赴太原，与阎举行过秘密会谈，阎对张早已有所许诺。

张学良为何要争取阎锡山

1936 年 8 月初，张学良对身边的中共代表刘鼎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联共抗日，即便因此“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9 月中旬，他试图通过从前的部下、当时正在陈诚手下任职的冯庸，去说服既是蒋的心腹又有抗日热诚的陈诚，能与自己一道劝蒋，没想到陈诚向蒋告了他一状，张学良遭到了蒋的电报申斥。他没有灰心，转而去争取阎锡山。

张学良与阎锡山打过多年的交道。早在 1927 年秋，张学良正率领奉军主力在河北与北伐军对峙，阎却背弃诺言，突派晋军东出娘子关，差点把奉军拦腰截断。1930 年，中原大战时，张出兵助蒋，把阎赶下了台。但张认为那都是自家兄弟打架，“事过境迁，恩仇俱了”，在国难时期，则应一致对外。况且，1936 年 8 月，日本已指使伪蒙军侵犯绥东，阎锡山已经增派晋军李服膺等师开赴绥东，协助傅作义抗战。因为阎很清楚，如果绥远沦陷，下一个，就要轮到他的老家山西了。面对日军的凶焰，阎锡山在暗中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对策。他原先是“防共”第一，红军东征，蒋派陈诚率 10 万中央军进入山西之后，阎锡山说，他是在三个鸡蛋（指日本、红军和蒋系）之间跳舞，踩破哪个也不行。日军侵犯绥东之后，他则说：“中国今日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以图存的问题”。1936 年 8 月下旬，阎密派他所最信赖的梁化之（政训处处长，阎的外甥，阎把梁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去北平草岚子监狱，密晤晋籍中共党员薄一波，请他回省“共策保晋大业”。张学良对阎已开始暗中“容共”的

内幕并不知晓，但对阎担心日军侵犯山西以及他以“实力困难”为借口，不愿增派晋军去陕北“剿共”之内情则是了解的。再者，张学良认为，阎锡山虽非蒋之嫡系，但有地盘，有实力，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如果阎锡山肯在蒋面前为自己帮腔，阎的话还是有份量的。但张学良刚刚有了陈诚告状的教训，在不明底细之前，他不敢冒然行事。这时，张学良已不在乎自己获罪，但怕再露破绽，坏了大事。

张先派秘书去试探

当时，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为副司令，总司令名义上是蒋介石）有个秘书叫李金洲，1932 年曾在太原任省会公安局秘书长，颇得阎锡山及其军政亲信们的信赖。1936 年 9 月末，张学良单独召见李金洲，令其纯以“私人身份”（既不以“剿总”秘书身份，也不以张学良代表的身份），前往太原一游，“顺便”拜谒阎氏，试探一下阎氏对“剿共”的真实看法到底如何。

李金洲到太原后，先去探望阎锡山素来倚重的智囊人物晋省主席赵戴文，“闲聊”中，好像完全无意地谈到了绥东抗战，进而“漫不经心”地谈及“剿共”与抗日的关系。没想到，赵戴文非常明快地告诉李金洲：由于“对内”则无以“对外”，“阎主任（阎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时以剿匪非计为念”。这就是说，阎认为打内战就无法抗日，继续“剿共”并不是好政策。随后，在赵氏的陪同下，李金洲又去拜谒了阎锡山，阎氏之所谈果真与赵之所述完全相同，阎并要李金洲转告张学良，“有机会”将与汉卿“联合向委座进言”。阎锡山和赵戴文显然明白，李金洲来晋并非是私人旅游，完全是奉张学良之命而来。因

此，在李金洲离晋时，阎锡山还写了封信，托李带给张学良。李金洲返回西安，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向张学良报告。张以阎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颇有喜色”。

再派参谋长去打前站

为了能与阎锡山联袂劝蒋，张学良必须先亲自与阎深谈一次。可是，李金洲带回来的信息是否完全可靠？李并非东北籍（山西人），在东北军任职时间也不长，地位又不高，又是一个人去的太原，若是晋方否认了，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作证。更让张学良放心不下的，就是阎锡山的老谋深算。但考虑到山西已临抗日前线，事关其自身存亡，这一次，老阎似乎不会有诈。那么，老阎会不会变卦呢？张学良决定改派戢翼翘再去一趟太原。

戢翼翘，字劲成，曾在张学良手下任军长多年，后升为张的参谋长。阎锡山的智囊赵戴文和参谋长朱绶光，都是戢翼翘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的同学。中原大战后，戢奉张学良之命到山西缩编晋军时，对晋军又相当宽容，颇得晋系上层人物的好感。“九·一八”事变后，戢即辞职，此时正在北平闲居。张学良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曾受到过地的栽培，张即让何给戢拍电报，说张戢敢速来西安，有事奉托。

1936 年 10 月初，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太师洞单独接见了戢翼翘。张说，东北军己不像从前那样了，现在官兵都要求打回东北去，“你告诉阎先生，希望将来在蒋先生面前要支持我们”。戢说，山西大同已吃紧，东北军要帮忙，阎定会同意。张说，东北军抗日，要借道山西，“从陕西入山西，乘同浦路经过

太原到前线去，也请他答应”。张最后说：“我要亲赴太原见他，请他不要宣布，不要接我，保守秘密。”

戢同意去见阎，但担心去太原再回西安报告，然后再返回北平，会走露消息。认为不如让他带一个随从，待见阎后，他把交涉结果写成文字，密封好，让随从带回西安，他可径回北平。张考虑了一下，即让李金洲陪戢前去。

临走前，张给阎写了一封亲笔信，让戢带交阎。原文如下：

百公赐鉴：

李金洲返，述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战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兹嘱戢劲成兄进谒，俯乞进而教之。专肃，并颂

勋祺

张学良顿首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

戢到太原的当天，就去见老同学赵戴文和朱绶光。深夜 12 点，阎即接见了戢。阎爽快地表示，在蒋先生面前支持汉卿，没问题，有什么要他说的话他都肯说；借道也没问题，还答应预先把道路修好；汉卿要秘密来太原，很欢迎，保证绝不透露出去。阎还对春天红军“东征”山西时，与红军激战，表示后悔。

戢离开太原之前，阎还给张学良写了封复信，全文如下：

汉卿仁兄勋鉴：

劲成兄莅并，并贲到手翰，并共洽谈，敬悉一一。（日本）对绥远，势在必得，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此后情形，弟随时奉闻。目下状况，统乞劲成兄代达。专此奉复。敬颂

勋绥

愚弟阎锡山上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

戢之使命顺利完成，即直返北平。李金洲则把戢的密信带回西安，报呈张学良。

解开张、阎密谈之谜

这时，蒋介石一方面让曾养甫做出邀请周恩来去广州谈判的姿态，另一方面，又令胡宗南等部在甘肃东部堵“剿”红军，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张学良为减少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一方面将堵“剿”红军的军事部署密告正在西安帮助他整训东北军的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另一方面，又致电蒋介石，表示有要事相商。10 月 20 日，张学良得到通知，蒋介石明后天即来西安。当天下午，张即秘密乘机飞抵太原。当晚，阎退去左右，与张学良彻夜密谈。翌日，张学良飞高太原。22 日，张学良即在西安迎接蒋介石一行。

1936 年 10 月 20 日夜，张学良和阎锡山两人究竟密谈了些什么？由于没有其他人参加，他们两人又都一直讳莫如深，所以，长期以来，会谈内容就成为一个历史之谜。现在，让我们根据原始档案来解开这个谜。原来，阎锡山虽赞同张学良提出的劝说蒋介石联共联苏的抗日主张，但对中共和共产国际不无疑虑，故提出了三个问题要中共答复，因此，张学良回到西安，即将与阎秘谈的内容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叶剑英、刘鼎做了通报。10 月 22 日，叶、刘用密电向中共中央做了简要报

告。从这份电文看，张、阎会议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如下几点：

一、既然蒋介石即将莅陕，阎锡山向张学良明确表示，他决心赴西安晋

谒蒋委员长，请求蒋领导全国军民，联合红军，一致抗日。

二、请中央拨款，加强绥远国防工事，并调 10 个师来加强绥远、宁夏、山西的国防力量。

三、倘若蒋介石不同意，阎锡山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不顾一切牺牲，让晋军与红军、东北军联合起来，全力抗日。

四、阎锡山准备把绥远的固阳、包头、五原、安北和临河五个县让给红军。

五、但阎锡山问张学良：

1.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开赴绥远抗日前线？

2.共产国际能否接济联合抗日的红军、东北军和晋军？

3.联合作战，红军能否服从指挥？

从目前已知的上述内容看，张、阎的这次密谈，不仅十分融洽，而且异常深入。可以肯定，在联共联苏以求增大抗日力量这一重大决策问题上，阎曾信誓旦旦地保证与张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张已把阎当作自己抗日救国的可靠盟友，因而已将东北军秘密联共联苏的大致情况向阎作了如实介绍。这样，在国民党所有的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就成为了解张学良联共内幕最多的一位。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阎已向张许诺，倘若蒋介石不听劝谏，不同意联共联苏抗日，阎决心不顾一切牺牲，与张一道，联共抗日（显然，这就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对阎锡山寄以厚望的主要原因）。不过，阎锡山对共产国际实际主要是苏联对抗日能否提供援助，较为担心。其实，这恐怕也是张学良的忧虑。中共中央在收到叶剑英、刘鼎 10 月 22 日

的电报后，即于 26 日致电共产国际说：“ 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

阎对张有所推动张助阎与中共建立“ 热线 ”

10 月 30 日，阎锡山飞抵西安，与张学良等作竟日长谈，商讨借为蒋庆贺 50 大寿之机如何劝蒋联共之事。当晚，张、阎等人同乘陇海路特备专车一道去洛阳。31 日，寿典结束后，张阎联袂劝蒋。恰在这时，蒋已得到了他最为高兴的“ 寿礼 ”：胡宗甫、关麟征等部，依照蒋之命令，在甘肃东部靖远一带将正欲西渡黄河的红军拦腰截断，于是红军打通“ 国际路线 ”、背靠苏联以求抗日和发展的计划归于失败。无论是河西的 2 万红军（后称西路军）还是河东的 3 万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的“ 围剿 ”之中，处境维艰。蒋介石自认为红军已成“ 强弩之末 ”，可于短期内彻底“ 剿灭 ”。当时，中共已把自存和抗日放到了首位，苏联更是要求中共拥蒋抗日，并已决定向宁夏的定远营运送援助中共的物资。蒋介石此时被“ 胜利 ”冲昏了头脑，无论张学良、阎锡山如何婉劝，他还是怒斥道：“ 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张、阎二人只好唯唯而退。

晚饭后，张、阎二人在洛阳军分校操场里散步，边走边谈，谈了很久，内容无从得知。不过，后来有来自二人亲信的传言，说阎对张说：“ 你要恢复你的家乡，我要保护我的家乡，一切得全靠我们自己，我认为蒋先生永远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今后，我们要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要干就得靠我们自己干了。 ”张表示势单力孤，阎说：“ 你干了天大的事，我也能帮助

你！”目前，已有史料证明，正是在此前后，张学良产生了“苦迭打”（法语：政变）的想法。（当然并没有史料表明张学良会把这惊人的机密告诉了阎锡山）显然，阎的鼓励也是推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因素之一。

张学良和阎锡山在密谈中还商量了晋方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11月初，阎把亲信大员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帮助日本反共呢？或者联合红军抗日呢？”数日后秘密开会表决，“到会38人，以31票对7票形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同时，在张学良的协助下，阎秘密派人到陕北保安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遂派当时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红一军团第四师政委彭雪峰，作为中共驻晋代表。11月12日，彭抵达太原，化名彭雨峰，以上海一个“公司”的“副经理”身份，与阎的亲信梁化之谈判。彭的办事处对外称“彭公馆”。经过谈判，红军答应在抗日作战中服从阎的指挥，阎则答应补助红军给养和弹药。

张的失望与阎的失算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原以为只要他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不料，斥骂他的函电如雪片般地飞向西安。苏联竟把他与汪精卫扯到一起。当时，张学良虽也希望中共全力支持他，但怕舆论会更加责难他“赤化”，因而急需阎锡山公开站出来说话。可是，阎不仅不这样做，反而隐瞒了他暗中曾支持过张学良的事实，还把拍发给张、杨的“五乎”密电（电文中有5个斥责张、杨的“乎”字）抄发给南京，使之公开发表，传诵一时。张学良曾过于激动地对李金洲说：“此事他不要想摆脱干净，必要时我将调华北军队，会师太原。”这自然是一时的气话，但也如实地反映了张对阎的大失所望。

12月25日，张学良毅然陪侍蒋介石自西安飞抵洛阳，阎锡山得讯，尚“疑信参半”。翌日，张、蒋飞抵南京，阎锡山收阅电报，当即呆坐在中和斋（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厅）的皮沙发上，默然无语。不过，早在张学良派戢翼翘到达太原的前夕，即10月10日，阎就曾令其亲信徐永昌向蒋介石报告，他既不“引共以抗日”，也不“藉日以防共”，并要“使张学良不因日本而亲共”。西安事变一爆发，阎即对身边的人说：“现在的事比天大了，我不能帮助”张学良。

毕万闻

张学良沉默五十五年后畅谈民国历史

西安事变的主人公之一、曾经叱咤风云的张学良，自 1936 年年底失去自由以来，过了长达 55 年的幽居生活。1991 年 8 月，日本 NHK 电视台对张学良进行了单独采访，并连续两天播出《张学良现在开口说话——日中战争之路》的专题节目。现将该节目提供的资料整理出来，供民国史研究者参考。标题为整理者所加。张学良的讲话未作删改。

张学良自 1936 年西安事变至今，事实上处于软禁状态，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1991 年 8 月，我们成功地对他进行了单独采访。张学良丝毫看不出 90 岁高龄，以稳重的步调出现在采访会场。西安事变以来断绝了跟外部的一切接触，一

直保持沉默的张学良，接受宣传机构的采访，是时隔半个世纪的第一次。NHK 的矶村尚德说：“张学良先生，尽管你如此高龄，仍很高兴接受我们长时间的采访，我代表日本的观众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

“我有许多话想告诉日本人。我这次接受你们 NHK 电视台的采访，目的是不希望日本的青年再犯过去的错误。我想强调的是，过去日本军人害了国家，发动了一场不幸的战争，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听日本人的话，才发动了战争。另外我也想让你们知道，使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我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使用武力是毫无意义的。我坦率他说，不是对任何人的攻击，是想让年轻人了解真实的历史情况。”张学良神情严肃他说。

张学良的青年时代

中国东北辽阔的大地是张学良的故乡。他生于 1901 年，是当时在东北地区开始显露头角的张作霖的长子。奉系军阀的主帅张作霖，与在东北地区图谋扩大权益的日本相勾结，急剧扩大势力。张学良有“东北王子”之称，热中于网球活动。父亲对他进行“英才教育”，聘请了包括西洋人在内的数名家庭教师。张学良不但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而且接受西方英语教育。张学良说：

“年轻时我是很想学医的。奉天有一所日本人建的南满医科大学，我与那里的一个学生是好朋友，所以常去打球玩。我又想进南满医科大学学习，父亲不允许，我就打消了学医的念头。但我又想去美国念书，父亲仍然不同意，想让我当军人。当

时我做梦也没有想过当军人，因此我经常开玩笑他说，我本来想当一名救人的医生，却做了杀人的军人。”

当时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战事不断。1926 年，控制中国东北地区的张作霖进驻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1928 年春，南方的国民革命军逼近张作霖所在的北京。张作霖反对以蒋介石为领导来统一中国，拒绝了停战谈判。

“我看事实对国民政府是相当有好感的，因为我希望中国统一。当时父亲和国民政府作战，我很苦恼，我是反对内战的。我问父亲：“我们打的内

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中国人直接要作战呢？’我到河南去，看见路上好多人无家可归，很可怜，我流着泪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老百姓受这么大的苦，都是我们这个内战搞出来的。”张学良这样谈起当时他对内战的看法。

皇姑屯炸车事件

张作霖本打算在北京迎战北伐军，最后听取其后台日本的劝告，决定撤出北京，向奉天转移。日本人害怕张作霖跟国民革命军作战彻底失败，国民政府的势力扩展到东北地区。1928 年 6 月 3 日清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通过天津、山海关驶向奉天，6 月 4 日清晨临近奉天站。5 时 20 分，列车行驶至和南满铁路交叉的铁路桥时，突然发生爆炸。爆炸是在专列即将通过铁桥正下方时发生的，因此张作霖的专列被严重损坏的铁桥压住，张作霖生命垂危。策划这一事件的，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河本等放弃了通过张作霖实现对东北的统治，企图以他的死为契机发动军事行动直接控制南满洲。

“开始我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部下瞒住不告诉我，只告诉我父亲已受了伤。我当时的任务是从北京到前线滦州把部队撤回来。这任务完成的时候，部下才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我很悲痛，同时感到沉重的担子落在了我的肩上。那时我身体不好，很不好。”张学良就父亲的去世回忆说。

中国沈阳皇姑屯附近的十字铁桥，张作霖爆炸事件的现场。当时铁桥上铺设的是南满洲铁路也就是所谓的“满铁”。现在和当时一样，是两条铁路交叉处。“满铁”处于日本关东军管理下，一般的中国人是不能靠近的。可是事发当日，在铁路旁发现两个中国人尸体，这就是日本人制造的好像中国人干的假象。

“人们立刻就知道了，这件事是关系军干的。被炸的南满铁路，除了日本军人以外，谁也不能靠近。日本人事先让南满铁路的火车停运了，还有谁能让火车停下来呢？很明显是日本军人干的。我恨日本，恨日本人。中国有句俗话：‘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张学良就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受重伤的张作霖被抬进帅府不久就断了气。张作霖的亲信为防止日军以他的死为契机发动军事行动，隐瞒了他的死讯，一直等张学良悄悄地返回了奉天。可是张学良得知父亲的死讯后突然失踪了。

“穿过了山海关，到处都是日本军队。为了避开日军的耳目，换上便衣乘火车回到了奉天。谁都不知道，连我的部下也没发现。等我回到家里，连我的家人也没有认出来，问我说：‘你是谁也？’我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公布父亲的死讯，谁也不知道我回到奉天。因为我能很好地模仿父亲的字，我也有父亲的

图章在，所以我以父亲的名义下达命令，都是使用父亲的名字。不久就全部解决了黑龙江、奉天等东北地区的悬案问题。以父亲的名义发布命令，谁都不知道，等到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宣布我的父亲死了。”关于张作霖死后的善后，张学良作了如上回忆。

张学良返回奉天是 6 月 15 日。张作霖在两周内生死不明，使关东军丧失了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的时机。关东军以此事件为借口控制南满洲的阴谋破产。

中国辽宁省抚顺市郊外建有张作霖坟墓元帅林，一半沉浸在湖里的是入口门。张学良为埋葬父亲花了 1400 万元巨额资金，历时两年建成规模宏大的坟墓。这件事也向国内外强烈表现张学良已成为奉系军阀继承人。张学良就任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一手掌握强大的奉系军权时，年仅 27 岁。

张学良这样谈起对其父的怀念：

“我同父亲有特殊的关系，父亲很喜欢我。我出生的那一天，父亲头一次打了个胜仗，并且从此以后发展起来。我父亲死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不能高兴地过我的生日了。我的生日被我自己改了，所以我现在的生日不是真的。尽管这样，一过生日就想起我的父亲。父亲很慈祥，很喜欢我，他的死使我很难过。”

东北易帜

1928 年 6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持续几年的北伐战争结束，统一了除东北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代替其父成为

奉系新统帅的张学良的行动引人注目。日本的田中内阁极度害怕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势力扩展至中国东北，因此田中首相派张作霖的旧友、外务省的中国通林权助男爵作为特使，访问张学良。林权助在奉天跟张学良举行会谈，转达日本政府的意图。这个时候，由于蒋介石方面的暗中工作，出现张学良开始接受国民政府统一东北的主张的苗头。林权助的任务，是牵制张学良的行动。外务省外交资料馆保存着当时田中首相给林权助的亲笔信（按：该信收入了一部题为《张作霖炸死事件》的档案），内容有如下记载：

“满洲是日本的外围，绝不允许国民政府的势力扩展到此地，绝不允许张学良高举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张学良说：

“林权助来到我的住处，再三劝告我，不要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我最终也没有明确回答，我回避了。最后他要走的时候，我请他吃了饭。我们一边喝酒，他说：‘我同你父亲是老朋友，我奉政府命令亲自来到这里，但你始终不明确回答我。’当时我说：‘林老先生，你确实替我很好地考虑了我应该走的路。’他很高兴。但我接着对他说：‘你有一件事没有替我想到。’于是他很客气地问我：‘到底是哪件事呢？’我回答他：‘那就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最近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研究人员发现了张作霖爆炸事件中田中内阁如何向天皇报告等重要资料（按：标签上写着“绝密”二字）。这是事件发生后当时任内阁秘书长的鸠山一郎（战后）在东京审判时提供的资料。昭和四年（1929 年）3 月 27 日，白川陆将向昭和天皇报告事件调查结果。这一事件在上奏

文章中指出，这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单独犯下的罪行。可是 3 个月以后，6 月 27 日，对天皇报告书的副本内容完全不同。这里表明的方针是，政府准备向国内外发表日本军部和军人没有参与张作霖爆炸事件。这就是说田中内阁屈于军部的压力，决定不对外公布事件真相。张学良就此点说道：

“你们日本人刺杀我父亲，还想不明不白地掩盖起来。我父亲当时很愿和日本人合作，我本人也这样想。但是，杀死我父亲的是日本人，所以，我

不会再有和日本人合作的事了。父亲和日本人合作都被日本人杀，我如和日本人合作，肯定也和父亲一样，不知哪天被日本人杀。我不会和日本人合作，当卖国贼。”

在张作霖爆炸事件真相未澄清的情况下，关东军接近张学良，企图通过张扩大日本的权益。接受关东军的旨意做张学良说服工作的，是当时担任张军事顾问的土肥原贤二。现在还保留着土肥原劝说张学良的记载。土肥原详细分析了奉系军阀内部争夺领导权，以及各国列强围绕东北的想法，和张学良周围的形势。并论述了与日本联合管理东北，比和国民党合作，对张学良更为有利。进而劝说张学良把东北地区从中国分割出去，以日本为后盾独自统治东北。张学良回忆这一情况说：

“我经常和土肥原发生冲突。当时同土肥原最冲突的地方，是他给我写了《王道论》的小册子。在这本书里，他说要我当‘满洲皇帝’。关于这件事，我就严厉地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让我当满洲皇帝，到底是什么企国？你作为我的顾问，需要我叛国吗？’因此，我请求关东军参谋本部把土肥原给我调走。但是参谋木部说：‘顾问是根据条约规定由日本政府派遣的，你没有更换的权利。’我就说：‘我连换我自己顾问的权利都没有吗？如果没有权利，那也没有办法，但我有这点权利吧，至少我应该有不见顾问的权利。’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一概不见。”

对日本方面的劝说，张学良予以抵制，并决定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承认东北处于国民政府领导下。于是东北全境飘扬的旗，更换成国民政府的旗，即所谓“易帜”。这是在 1928 年 12 月 29 日。张学良回忆易帜一事说：

“当时日本人觉得自己非常优秀，但是对中国的事一点儿也不了解。当时我准备把国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日本人一点也没有发觉。不仅是挂了一面，而且整个东北都做好了换旗的准备。可见日本人的间谍真笨。”

“九·一八”事变

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肃清了奉系军阀内部的亲日势力，显明作出了跟日本决裂的姿态。他继承了其父的 20 万精锐部队，改为东北军，致力于装备现代化武器。还根据独自的理论建设国家。张学良说：

“我不只对东三省，而且想使整个国家都变好。父亲留下很多财产，还留下很多钱。我把这些钱差不多都捐出来了。在东北建设大学、中学，这些费用都是我自己拿的，没有用公家一分钱。我自己高兴这样做，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好要强，必须首先靠造就人才，教育是国家建设的基本。我们建设内陆黑龙江到港口的铁路，是因为南满铁路我们不能使用。当时东北的主要衣产品大豆，由于受到日本的刁难，不能运到自己的港

口，因此我们决定建设一个新的铁路。我想自己的经济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发展。”

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尤其是铁路的建设，其后和日本产生很大摩擦。当时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中心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就是所谓的“满铁”。“满铁”是日俄战争时日本获得的连接长春、旅顺、大连的铁路，是日本统治满洲的要害。张学良铺设了和“满铁”平行、通往吉林、黑龙江的铁路。日方认为，张学良的铁路建设是对“满铁”形成包围网，并且铁路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满铁”的货运量将急剧减少，到 1930 年“满铁”的经营情况可能进

一步恶化。日本军方认为，张学良在父亲死后，就任保安总司令，对民众的剥削超过了他的父亲。张学良忘记了日本的恩情，堕落成为蒋介石的走狗，参加了抗日阵营，损害了日本的正当权益，干扰了满蒙开发计划，迫害在满洲的日本人，并且满洲暴力事件一日数起。对日方的企图，张学良是这么看的：

“当时日本完全是侵略的态度，这件事我们是看得很清楚的。举一个实例，就是日本租借地旅顺、大连的问题。那时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已经到了，我们本来打算要收回的。可是，旅顺、大连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人长期建设起来的城市，日本是不会简单放弃的，这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代表中方去进行交涉，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把这两个港口变成自由港，在那里实行自由选举，由那里的居民选出负责人，负责治理这个地方。选出的人必定是人数居多的日本人，这就是说，主权是中国拥有，治理权由当地居民也就是日本人掌握。可是当时日本方面的反应使我伤心透了。日本人说，城市是我们用弓箭夺来的，你们想收回的话，请你们同样用弓箭夺回去。并且说这是日本的谚语，日本果真有这样的谚语吗？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想要城市的话，就打仗吧，用战争来决定胜负。”

东北连续出现破坏铁路事件。1931 年 9 月 18 日，在这里柳条沟发生“满铁”本线爆炸事件。关东军自己在柳条沟炸毁了“满铁”，却说是中国方面干的，并悍然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所谓的“满洲事变”。这时张学良统率东北军主力开赴北平，只有东北军一部驻守奉天。关东军趁此时机，只用了一天，就占领了张学良的大本营。张学良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那时因为治病正在北平。那天我病刚好，我是请英国大使看梅兰芳唱京剧，听到报告后立刻回到家。当时是怎么个情形，东北是怎么个情形，我完全不清楚，所以我当时没有采取行动。决定看看情况再说，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情。”

满洲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允许东北军和关东军作战。关东军趁着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继续进军，接连占领长春等主要城市。第二年 1 月占领了锦州。2 月占领了哈尔滨。只半年时间基本上占领了东北全境。关于对日不抵抗，张学良有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当时没有预料到日本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的判断是，为了行动，不但给中国带来不幸，日本也会遭到国际舆论谴责的，给日本带来不利的后果，我想日本恐怕不会采取那样的行动。日本想通过军事行动来挑衅，因此（我）对部下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我想让这一事件和平地解决。以后有人骂我为什么不抵抗，如果指责我没有看清日本的阴谋，那也没有办法；但说不抵抗有自己的想法，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发动战争，我当时可能要跟日本人拼的。”

满洲事变发生后 4 天，关东军的领导层制定的《满蒙问题解决案》出笼。这一方案确定了以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新皇帝，建立新的国家的方针，这就完全否定了张学良对东北的统治。这以后，东北军的行动遵照《解决案》展开。现在居住在北京的溥杰是溥仪的胞弟，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溥杰讲：“当时有一个士官学校的教官叫吉冈，他一心想让我的哥哥溥仪为他服务。吉冈在满洲事变爆发前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他缺少仁德，毕竟得被赶走，这样你的哥哥就有希望。’同时他对我说：‘让你的哥哥回到满洲去。’我那时就发觉日本对东北有野心。

哥哥到东北去，也许想以‘满洲国’为基础，进而统一中国。结果我的哥哥在很多方面受日本胁迫，屈服于日方的压力。”

1932 年 3 月 1 日，以溥仪为“皇帝”的“满洲国”建立。关东军在这里建立新国家的设想变为现实。被称为“五族共和，王道乐土”的“满洲国”，实际上由日本完全掌握其外交、国防，甚至控制了交通、通讯等重要部门。“满洲国”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在溥仪去东北前，张学良就跟他有交往。张回忆说：

“我曾经认识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以前在天津的一个饭馆吃早饭时，溥仪一个人进来。我说：‘出门吧，很好。’于是进一步劝他：‘如果你把做皇帝时身边的老臣都辞掉怎么样？他们只是围着沾你的便宜。像今天这样离开他们，一个人出来多好。怎么样，想不想到南开大学读书？如果你不喜欢南开大学，到美国或到外国大学读书怎么样？’并且我还说：‘你本来的身份是皇帝，但必须把这些忘掉，做个平民。这样，如果将来在中国选举大总统时，你就具备了大总统的资格。如果你永远被老臣包围着，将来有一天，他们的存在就要了你的命。’我这样劝告他。”

西欧列强强烈谴责日本悍然发动满洲事变，国际联盟派出了李顿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报告指出：不承认日方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自卫手段。1933 年 2 月 14 日，国际联盟根据李顿调查报告，通过了《满洲国否决案》。日本代表团当即退出国际联盟总会。1933 年 3 月 27 日，日本正式脱离国际联盟，走上了更加一意孤行的道路。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张学良看得越来越清楚。他说：

“后来我明白了日军的行为，知道了当时日军已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因为日军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在日本国内进行残酷镇压。不听我的话就杀，这就是当时日本这个国家的现状。这样下去日本将会灭亡。我想这样不正常的军人的国家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日军的侵略并没有停止于满洲。1932 年 2 月，开始进攻满洲的邻省热河。这时张学良统帅东北军准备顽强抵抗，可是热河省省长汤玉麟不战而逃。3 月中旬，热河境内大部地区为日军占领。对这件事，张学良是这样解释的：

“问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本来是不愿意说出来的呀！当时我的处境很为难，虽然东北军处于我的指挥下，但热河省省长汤玉麟等是我的老前辈，是父亲的同代人，他们拿我当小孩子一样对待，根本就不顾我的命令。我发布了抵抗日军的命令，他根本不听。本来想把他换掉，但这是不可能的。”

由于热河失守，全国议论纷纷。对日军的不抵抗，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可是人们的指责集中在东北、热河的直接军政长官张学良身上。张学良被指责为“不抵抗将军”，这也成了他的绰号。而且国民政府内部追究责任的呼声也很高，张学良陷入极度困境之中。张学良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热河失守，国民政府的两位首脑蒋介石、宋子文来了。蒋介石分析当时中国形势后这样说：‘由于热河失守，中国就好像是在大浪中颠簸的一只小船。如果三人同乘，必然要沉没，必须有一个人下去。’我说：‘如果有一个人下去，那就是我。’因此我辞去了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务，并且作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蒋介石要我出国访问，没有给我处分。当时我的身体处于没有鸦片就不能坚持下去的严重中毒状态，我决定出国旅行，并且利用机会接受治疗。我自己明白了，一个活人被鸦片弄得像死人一样，实在是太悲惨了。我不戒掉鸦片，就什么事不能做。我下定决心开始接受治疗。”

张学良于 1933 年 4 月到欧洲旅行。他访问了法、德、英、瑞士、意大利等国，于 1934 年回国。

西安事变

张学良从欧洲返回时，国内中国共产党作为强大势力迅速成长，全国人心所向。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进一步扩大，蒋介石极力主张对共产党作战，进攻在江西省的共产党基地。共产党离开江西，开始了转移，也就是所说的长征。1935 年转移到陕西北部的延安附近。蒋介石开始向转移到延安附近的共产党总进攻。此时日军侵略目标开始对准河北省，蒋介石主张对共产党作战，容忍了日本的做法。对日本侵略河北省感到痛心，广大学生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于 1935 年 12 月 9 日在北平发动要求抗日的大规模游行。以此事件为开端，抗日战争的气氛在全国迅速高涨。张学良忆及旅欧回国之初的情况说：

“旅行回来后，我不想当军事主帅，我想加深和蒋介石的

理解，跟他一起工作。想当个在蒋介石身边给他出主意的侍从　室主任，蒋介石不答应我的请求。我本来不想和共产党作战，但是蒋介石举出很多工作让我挑选。他这样说：‘因为对你不满的人很多，今后你要好好工作。’我问哪项工作最难，蒋介石回答说和共产党作战最难，我当时不得不选择跟共产党作战。”

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亲自率东北军开赴西安。他接受了蒋介石交给的“跟共产党打最后一仗”的重要任务。当时的西安，跟共产党作战的是国民政府西北军杨虎城。张学良作为杨虎城的上司被派往西安。向共产党根据地进攻，遭到顽强抵抗，作战没有达到预期的进展。由于跟共产党军队作战，张学良丧失了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一一〇师，师长战死，近 4000 人被俘。远离家乡参加内战的东北军，内部将士产生了动摇。张学良就此回忆说：

“士兵们都想回家乡，同日本人作战，不愿意跟共产党作战而损失实力，愿设法保持实力打回家乡去。那时我的处境很难，部下责备我说，你可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可是我们想回家乡怎么办？我非常为难。”

受到部下抵制的张学良，内心想停止与共产党的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日益强烈。　1936 年 4 月，张学良秘密访问延安，与周恩来在教堂会谈，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协议。张学良遵照这一协议，保证做好劝说蒋介石的工作。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起周恩来：

“我和周恩来能够互相理解。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应很快。对情况的判断很准确，说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抓住要点，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我和周恩来虽然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一见如故。”

由于张、周延安会谈，最前线的共产党部队和东北军实际处于停战状态。1936 年 12 月 4 日，由于东北军对共产党进攻没有进展，蒋介石很不满，率领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来到西安。12 月 7 日，张学良前往蒋介石住地华清池，劝说蒋介石放弃和共产党作战，抵抗日本，蒋介石丝毫没有接受，发生激烈争论，争论的内容，据张学良回忆是这样的：

“政见之争就是，蒋介石主张的是安内攘外，但我主张攘外安内。以前我和蒋介石就存在意见分歧，但发生这么激烈的争论还是第一次。”

张学良和蒋介石发生如上争辩的第二天，1936 年 12 月 9 日，西安学生

举行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学生到西安市内的政治机关请愿，要求停止和共产党打内战，跟日本作战，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学生决定从西安出发，到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

李连壁是当时请愿学生的领袖。李回忆当日的请愿活动说：“到了灞桥，机关枪布置好了，国民政府宪兵也准备好了。前面骑自行车的 20 名学生被抓。宪兵声称：‘再往前走，就要开枪了！’游行队伍和宪兵相持不下，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张学良为安慰学生，把车停到了游行队伍前面，张学良劝说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当学生抵达灞桥时，蒋介石已向宪兵队发出可以向学生开枪的命令。学生对张学良说：‘请你率东北军向日本人作战，并且请你把我们的要求转告蒋介石委员长。’张答道：‘我一定把大家的请求转告给蒋介石委员长，因此请大家回西安。’一部分学生还想继续前进，于是张学良继续劝告大家：‘请相信我张学良。如果大家相信我，我一定在一

周内以实际行动给大家答复。’张学良演讲结束，一万多学生队伍中发出热烈掌声。大家都哭了，张学良也热泪盈眶。于是学生高喊‘我们相信张学良副司令一定会和日本作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张学良向学生保证一周年以事实回答之后，用武力劝说蒋介石的意志更强烈了。张学良到新城大楼拜访了西北军指挥官杨虎城，并说明了意图。12 月 12 日，两人在新城大楼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主要将领，下达了监禁蒋介石的命令。从张学良如下一段回忆，可见其当年气概：

“我当军人的时候，父亲就教导我：‘如果做军人，就要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也就是说，要随时准备死。做军人后，我

已是随时准备死。而且我反对内战，厌恶内战。我想即使我牺牲了，也要阻止内战。”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088_1.bmp}

12 月 12 日凌晨，东北军奉张学良命令，突袭华清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扣押蒋介石。那时指挥这个部队的是孙铭九。以下是孙的叙说：“一到华清他，先打倒了卫兵，于是里面的卫兵发现了我们的突袭，进行了激烈的枪战。原订的计划是把卫兵一个个抓住，不进行战斗就解决问题，可是不顺利，终于发展成枪战。我领兵进去，受到了顽强的抵抗，非常焦急。一进蒋介石的房间，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床上还有热气。我断定，刚才蒋介石还在这里。”孙铭九向蒋介石逃跑的后山搜索。“我们一直搜索到山腰，有一个士兵高喊：‘蒋介石委员长在这里！’我迅速赶到，正赶上蒋介石从岩缝中钻出来。他满脸灰尘，手脚上尽是伤痕。他看到我说：‘如果你是我的同志，就在这里把我杀了吧！’说着，坐在地下。他好像认为我们的行动是谋反。我认为这样的误解不好。我告诉他：‘我是奉张学良副司令的命令，请蒋委员长去西安商谈抗日之事，专程而来的。’”

蒋介石被监禁在新城大楼一房间内。被软禁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但这事件具有什么意义呢？各国政府都在紧张、迅速进行判断。同时事件的经过，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也引起人们极大关注。12 月 16 日在西安市内革命公园召开了 10 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张学良在会上叙述了事变的经过，然后说：“我不是出于自私自利之心，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采取的行动。”张学良同时提出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排除国民政府内亲日派等八项主张。同时，张学良向共产党发出邀请，请周恩来

作为代表到西安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共产党接受了邀请。12 月 17 日，周恩来来到西安张学良公馆。但蒋介石态度顽固，坚持不与周恩来会谈。南京方面派宋美龄、宋子文于 22 日从南京乘飞机到西安。蒋介石见到夫人后态度开始软化。次日，国民党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及杨虎城、张学良等五方举行会议。会上关于停止内战一项，各方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围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张、杨发生激烈争论。张学良主张立即释放蒋介石，杨虎城坚持要蒋介石亲自在同意书上签字。当年张、杨争论的情况，据张学良回忆是这样的：

“假如我把蒋总统扣了，岂不是扩大内战吗？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威胁我，不惜以武力与我对抗。我们是为制止内战而发动的事变，如果再发生新的内战，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下定决心，由我个人承担责任，解决事变，立即释放蒋介石。可是杨虎城一直不肯下决心释放蒋介石。这件事后来使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对杨虎城说：“你的做法，违反了我们一开始的思想。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即蒋介石不做出保证就不释放的话，岂不发生新的内战吗？”

蒋介石顽固拒绝签字，事态变得复杂了。当时国民党军队与东北军、西北军发生了一些小摩擦，新的内战危险越来越大。张学良认为，只有让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与蒋介石直接会谈，才能平息事态，除此没有办法。 12 月 24 日晚，终于实现蒋、周会见。NHK 电视台的记者问：“请问当时你是否在场？”张学良回答说：

“这个问题很重要，请不要再问下去了。当时我在场，是我把周恩来带到蒋介石住地。再多的事情我不能说。”

关于蒋、周会谈内容，张学良保持沉默的意志很强烈。

由于蒋、周直接会谈，事态迅速好转。25 日，蒋介石获得释放。蒋介石专机就要离开西安飞机场时，突然发生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张学良提出要陪蒋介石一起飞往南京。张学良回忆当年这一幕时说：

“大家都反对我去南京，设法制止我。周恩来甚至追到飞机场，打算把我带回去。因为大家都担心我到南京后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我是个军人。”

12 月 26 日，午后 12 时 45 分，蒋介石乘坐飞机抵达南京。两小时后，张学良也飞抵南京，立刻进入宋子文公馆。在南京，张学良被指控犯有监禁国家元首罪，并立即决定送往军事法庭。

张学良这样谈到他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目的：

“嘿嘿，我这个人啊！我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对自己所作所为要自己承担责任。我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惩罚。更明白他说，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去的，我认为自己肯定被处决，后事我都预备好了，因为我是军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其它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考虑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去接受惩罚，那么我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将遗留下问题，我决定为了不挑起新的无谓的争斗，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而牺牲自己。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091_1.bmp}”

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罪，监禁 10 年，剥夺公民权 5 年。改判无罪，软禁浙江奉化溪口镇。现在还保留有张学良在溪口

给东北军的信件，内容是制止青年军官为自己的事采取的行动。卢沟桥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张学良盼望日中全面开战后亲率东北军上前线，蒋介石就是不批准。张学良避开日军，在中国各地移动。

1946 年，张学良被送往台湾，从此一直生活在那里。西安事变已经过去 50 多年，张学良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与软禁期间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夫人赵一荻住在台北市郊的住宅里，安静地过着晚年生活。下面是张学良的一段“自论”：

“可以说，我整个一生的毁掉，都是由于日本。父亲的被杀，家庭被毁掉，我的财产被剥夺，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带头反抗日本侵略的，我是有反抗性的人。只要是我认为不合理的，不管对方是谁，都坚决反抗，至于对与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事，即使是我的父亲，也不管他，坚决反抗。现在我 90 岁了，已经离开政治舞台。我可以说这样的话，为什么我反抗过许多事情，因为我认为它是不合理的，权利也好，生命也好，什么都可以不顾。对不合理的事，我可以抛弃财产、生命反抗到底。我就是这样的人。”

从那个不幸的日中战争到现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至今仍存在着对张学良来说不能讲出来的历史回忆。

夏里据日本 NHK 电视台专题节目《张学良现在开口说话——日中战争之路》整理（第 87 页为华清池照片；第 88 页为张学良会见端纳照片；第 91 页为蒋介石夫妇离开西安时合影。）

日军特殊情报机构在中国的活动

一、日本早期对中国的情报活动

1945 年 8 月 11 日，也就是在日本天皇发出乞降照会，表示接受中英美三国政府首脑于 1945 年 7 月 26 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向协约国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在东京附近日本陆军中央特别情报部临时所在地的高井户浴风园内，一群陆军中央情报人员，在部长西村敏雄的指挥下，在院内燃起熊熊大火，将重约数吨的文件资料付之一炬，浓烟弥漫天空，从早晨直到晚间，整整烧了一天。他们焚烧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文件资料，而是极为机密的日本陆军部中央特殊情报部成立以来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档案，以及长期以来搜集的所有情报资料。这是一种毁灭罪证、妄图逃避战争审判的新的犯罪行为。正是由于日本中央情报部门的这一罪恶行径，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的情报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很早以来，日本为图谋我国，不仅公开设立对华的间谍机关，而且派遣大量日人到中国进行特务活动。1931 年 6 月初，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带领井杉延太郎等人，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6 月 26 日在返回途中，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关玉衡第三团逮捕。从他们的行囊和中村震太郎的棉裤中搜出不少调查笔记和军用地图，经检查发现，中村将日本军用地图与现地实际情况进行对照，加以纠正和改绘。中国官兵在确认中村为军事间谍后，予以秘密处死。这本来是中国的正当权利，但日本却借此挑起事端，并诉诸武力。

1935 年 5 月 31 日，驻察哈尔阿巴噶旗（距多伦 40 公里）的日本特务机关的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亲等四名特务，乘汽车自多伦经张北赴张家口，进行绘制地图的间谍活动。6 月 5 日抵张北时，被中国第二十九军张北驻军扣留，带至军法处候审，但经向宋哲元请示后旋予以释放。日本驻张家口领事桥本及特务机关长松井却借口日本军官曾受中国军官恐吓,于 6 月 11 日向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惩办直接负责人，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亲自道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等三项无理要求，限 5 日答复，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迫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老牌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由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手培养起来的。川岛芳子本是晚清肃亲王的第 14 个女儿“东珍”，本名金壁辉，后被川岛浪速收养，改名为川岛芳子。1916 年川岛浪速在东北组织“汗山庄”的间谍组织时，川岛芳子便是骨干之一。她女扮男装，相继在上海、华北及东北各地进行间谍活动。

早在 1936 年日本准备南进，占领东南太平洋地区英美殖民地时，派了很多谍报人员到世界各地搜集情报。如台湾日军司令官烟俊六派山田少佐、林参谋、北岛参谋等人视察华南和南洋，成立台湾拓植会社，作华南和南佯的调查工作等等，可以说，抗战前及抗战期中，凡在中国的日本男女，上自富商、外交官，下及贩夫走卒、浪人、妓女，几乎无不是日本政府或军方的间谍。甚至他们在中国各地推销商品的广告招贴，如“仁丹”、“肥田粉”之类，都暗藏杀机。如“仁丹”二字的排列是可左可有的，然而左右之间就暗藏进军路标了。至于日本和朝鲜浪人，以及日本雇佣的汉奸，伪装成小贩、

香客，甚至是乞丐等等，作各种间谍活动，所作所为罄竹难书！

二、日本陆军密码班的建立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进入利用电波采用密码作为通讯工具的时代，仅靠直接获取的办法，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对情报的要求了。因此，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即必须设法监听对方的电波，破译其内容，获取所需要的机密。日本中央特殊情报部，就是专门负责搜集无线通讯情报的一个极为秘密的机构，包括密码的破译、通讯电波的监听和方位的测定等等。

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当局，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设有极秘密的通讯情报班,但大规模地及有效地利用通讯技术破译对方密码则是在 1921 年以后。1921 年由外务省、陆军

省、海军省以及邮政省共同成立了电讯研究会，专门研究密码破译技术，而且在波兰人的帮助下很快就取得极好的成效。这是由于时任日本驻波兰公使馆副武官山胁正隆（后为大将），曾研究 1919 年至 1920 年波兰进攻苏俄时的谍报工作，获知波兰军队对破译红军的密令非常成功。当苏俄指挥部用密码下达命令，由师一级传达到团一级时，便为波兰方面破译出来，因此波军对于苏俄方面的行动知道得一清二楚。山胁正隆对波兰如此先进的破译技术很感兴趣，因此，1922 年在他离任回国后，便极力向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伊丹松雄推荐，邀请波兰破译专家科瓦列夫斯基到日本传授破译技术。

1923 年 1 月，科瓦列夫斯基应邀到日本东京，向由参谋本部所属各情报部门派人参加的情报讲习所人员，讲解密码技术。讲习班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参加听讲人员还有参谋本部欧美课的 4 名大尉，他们是俄国班的百武晴吉，英国班的井上芳佐（后为中将）、三国直福（后为中将，1939 年 8 月任南京特务机关长），德国班的武田馨（后为中将，1939 年 8 月任关东军高射炮司令官）。讲课的内容有苏俄红军的乱数密码以及周期转置密码破译的研究，还有欧洲各国常用的密码构成和破译技术。这比日本的密码技术先进多了。因为长期以来日本陆军的密码一直是使用电信符号，以及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使用的罗尼式双重语置换机，非常落后，密码极易被人解读。因此，参加学习的人员在听了科瓦列夫斯基讲授的乱数密码后吃惊不已。可以说，这个学习班在日本特别情报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3 年 6 月，日本参谋本部开设了监听所，开始直接监听国外电报，但由于接收信号机落后，使用的是矿石滤波器，

未能如愿。直至后来无线电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真空管发明后，以真空管代替了矿石滤彼器，监听所才重新恢复。

科瓦列夫斯基结束在日本的讲课，回到波兰后，日本参谋本部又将一批年轻的军官送往波兰，继续研究密码技术。这批人在波兰陆军参谋本部与波兰人一起执行任务，接受波兰军人的直接指导。1934 年 9 月，日本参谋本部又继续派遣年轻军官到波兰。当时正值山胁正隆第二次出任日本驻波武官。这些人在波兰陆军参谋本部主要是学习和研究苏联红军通讯的组织系统，苏军密码的种类、特性和倾向等。

1927 年 7 月，第一批派往波兰学习的百武晴吉回到日本之后，陆军参谋本部第三部通讯课便增设了密码班。随着派往波兰学习的人员陆续回国，密码班的组织很快扩大。其中配置有专门负责苏联、中国和英国的不同组织。

密码班的任务除负责编徘自己的密码外，还要负责密码通讯的监听、解读和翻译，以及培养教育密码专家。 1939 年 3 月陆军密码班改称第 18 班，直属参谋总长，班长由第二部部长兼任，在派住中国的各军中，都设有特情科。1940 年出任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土桥勇逸少将，就曾是这个密码班的班长。

三、日军特情班在侵华战争中的活动

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特别情报活动始于 1928 年 5 月。当时，日军为阻止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日本陆军通过监听中国军队的密码通讯，破译了命令内容，因而对蒋军的调动配置行军路线知道得一清二楚。同年 6 月，日本关东军将张作霖炸死后，陆军东京密码班破译了张学

良与各方的密码通信，因而对张学良与各部分的关系了解碍十分清楚。1931 年 9 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情报机关，因此，参谋本部派遣密码班的工藤胜彦大尉到关东军，对关东军监听到的中国军队的密码进行解读与翻译，结果将其中的 70%的密码破译出来。关东军虽然在兵力上与中国军队比较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监听、破译了南京国民政府当局与东北军间的联络，南京政府与驻日公使馆的外交电报，中国政府的动向及外交政策都在其掌握之中，因此，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部能处于主动地位。工藤大尉因此功绩被授予“金主鸟勋章”，这是日本陆军史上第一个获得勋章的情报军官。不过，当时日本特情的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事前已基本熟悉中国使用的密码，而且还窃取到密码本。

1932 年 1 月，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时，驻上海的日本舰队密码班长森川，破译了中国的密码，获知中国空军准备轰炸在上海的日军的极密情报，结果，日军先下手，破坏了汉口的中国空军基地。“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不仅设置了密码班，专门监听中国的密码电信，而且于 1932 年夏，在哈尔滨设置了由在波兰军队中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缨井大尉任机关长的对苏联的情报机关，专门观察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和动向。

1935 年，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继关东军之后，也成立了专门的特情班，由鹤田登实少佐任班长。此人是参谋本部密码班的元老。密码班成立后，配备有三台接收机，监听人员 6 名，破译人员 2 名，翻译 1 名。1936 年 4 月，中国驻屯军改编，地位提高，军司令官改力“亲补”，即由日本参谋本部直接

任命，兵力增至 5000 人，因此特情班也随之扩大，任命工藤胜彦少佐为班氏，人员由 13 人增至 26 人，信号接收器也增至 6 台。其任务是专门监听北平、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商震、高桂滋、傅作义等部的动向。

1937 年 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随即于 8 月末将中国驻屯军扩大，组建成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特情班也随之增强，除增加信号接收机等大量设备外，还补充增加了工作人员 50 余人。除华北方面军在北平设立的特情班外，还在归绥、太原、济南等地设立分室。1939 年 10 月，日本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时，也设置了特情班，由老资格的情报专家鹤田登实大佐任班长，同时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分室；在广东的日本华南方面军也设置了特情班，由田内一郎大佐任班长。

1943 年 7 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特情班与华北方面军特情班合并，组成中国派遣军特情部，组织机构进一步扩大，部氏以下共计 543 人，其中文职人员，包括翻译官、翻译生 116 名。1944 年 2 月，特情部又进一步扩大，军职与文职人员共计 880 人。到了 1945 年 1 月，仅军职人员即达 711 人，文职人员 280 人，共计 991 人。由此可见日本对在华特情活动的重视。

特情班的主要活动便是研究中国的密码，以及掌握相关的各种知识。中国军队的密码称为“明码”，基本上是由 4 位阿拉伯数字构成。这种密码既容易被发现，破译也比较容易。而且，中国军队在拍发电报时，缺乏保密观念，不仅拍电报人姓甚名谁都清清楚楚，就连收报人的姓名、日期都不加任何保密，原文拍出。因此，特情班便很容易掌握中国军队的编制、兵力和行动。据日本方面称，日本在中日战争初期，对中国军队密码的破译率达到 90%。关于外交密码的破译，日军特情班早在战前的 1936 年，就窃得了中国使用的密码书《二六电本》，对中国外交联络情报知道得相当详细。

1937 年 9 月 1 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电报中，便已提出泄密问题，称：我军电报多被敌方译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机要室秘书毛庆祥，也曾就机密泄漏之原因向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及蒋介石报告说：当系部队与部队间（横向）通电时有所泄漏。因为前方通信均用无线电及电话传递，并且大部使用普通密码和密码本。此后不久，中国军队对密码进行了改进，采用了“特种电码本”，即将原来的一字一码的形式改为词组形式。经此改进，密码相对说来要复杂多了。但不久也为日本特情部所识别，破译率仍达到 70—80%。由于中国军队的密码被日本特情部破译，因而日军在对中国军队的各次战役中，给中国军队造成了极大危害，这在中条山战役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1941 年 5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集中其在山东、河北和晋北的第二十一、三十三至三十七各师团及第四十一师团，共计 6 个师团，以及第三、四、九三个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共计 10 万兵力，分布于豫北的沁阳、博爱及晋南的晋城、阳城、沁水、绛县、闻喜、夏县、安邑一线，对以中条山为中心的山西南部的中国军队再次发动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此即“晋南会战”或“中原会战”。

此次会战，中国军队阵亡 4.2 万人，被俘 3.5 万余人。日军只被打死 673 人，受伤者 2292 人，以近 1∶20 的极小代价，打败了所有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

日军在中条山会战中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特情部熟知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课（情报）参谋、特情部主任横山幸雄曾洋洋得意地声称：在会战期间由于充分发挥了特情的作用，对敌情了如指掌，华北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所就像设在演习室的统监部，指挥彼此作战一样，指挥若定。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决定此次作战时，在制定作战目标（是首先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在山西省的第十八集团军所部，还是进攻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时，其第一课（作战）与第二课（情报）之间曾发生过激烈争论。第二课以日军在百团大战中损失惨重，认为中共领导的军队是日本军的最主要威胁，力主首先进攻中共军队；而第一课则以对中共军队兵力分布及兵力等情报知之甚少，情况不明，胜负无把握，国民党军队虽然兵力众多，但情况明，易于进攻取胜为由，竭力反对。结果第一课的意见被参谋长田边盛武中将采

纳，于是决定首先进攻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

日军在发动进攻前，第二课采取了一系列迷惑中国军队和隐秘日军作战行动的措施。首先，让驻内蒙的日军渡过黄河，前往鄂尔多斯方面，佯攻兰州或延安；让日军第一军在黄河上游地区活动，宣传要打西安；让日军第十二军在开封北面的黄河地带实施渡河演习，宣传要打洛阳。甚至在日军内部除极少数人事前得到通知，已知作战意图外，连师团长也蒙在鼓里。而且，在连接作战区域的周围，严禁以飞机进行侦察活动。为探明中国军队的情报，早在作战前的 4 月间，日军便将特情班由北平迁往新乡，通过通信情报，将中国军队的情况探知得异常清楚。

四、日军特情班在百团大战及冀中作战中的失败

与上述相反，日军特情部在对中共的情报活动中，却束手无策。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广大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日夜出没于日军占领地区，袭击敌寇，给日军以极大威胁，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由于日军对中共军队使用的通讯密码的破译一直毫无进展，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虽一再进行“扫荡”，但收效甚微。因此，1940 年当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百团大战时，华北日军遭到重大损失。

1940 年 8 月，八路军总部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连续“扫荡”，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决定在华北地区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原计划出动 20 几个团的兵力，但随着战斗的打响，参加作战的部队扩大到 105 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8 月 20 日晚，战役全面展开。晋察冀军区以 39 个团的兵力，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破击拆毁平定至石家庄的正太铁路、北平至山海关的北宁路、德州以北的津浦路、正定以北的平汉路各线，同时攻占娘子关，破坏了井陉煤矿；第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 46 个团，破击由正定至榆次的正太路、元氏以南至安阳段的平汉路、德石路，太谷至临汾段的同蒲路；第一二〇师及晋西北区所属部队 20 个团，破击同蒲路北段汾离公路全线，并阻止日军向正太路增援，由此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9 月 20 日至 10 月初，各部队以摧毁交通线

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为主要目标。日军遭到八路军的打击后，从 10 月 6 日起，调集 4 万余人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反复“扫荡”，八路军转入反“扫荡”作战，直至 12 月 5 日将其粉碎，战役结束。

从 8 月 20 日百团大战开始，至 12 月 5 日结束，历时 3 个多月，共计大小战斗 1824 次，拔除日伪据点 2993 个，歼灭日伪军 4 万余人，其中日军两万余人，破坏铁路 470 余公里，公路 150 余公里，各铁路、公路沿线的日军通讯设施，也被摧毁。这次作战，使日本华北方面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丧失了作战机能。

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发动的突然袭击深感惊愕。在此之前，日本华北方面军极力想通过特情部查明中共无线电通讯，为此，扩大了特情组织，并且派情报专家横山幸雄少佐出任特情主任参谋。横山上任后，即以查明中共无线通讯为主要任务，但尚未有结果，百团大战即突然爆发。由于特情失去作

用，情报课课长滨田平大佐及下属人员不得不向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请求辞职。由此可见日军狼狈状况之一斑。

横山少佐为使日军特情班起死回生，不仅增加了 10 台接收机，而且调派了一批特情专家充实特情班的组织，其中有所谓中共问题专家山崎重三郎大尉。但是，由于中共使用的是乱数密码，因此，在破译中共密码上遇到严重障碍。于是，横山要求笠原参谋长命令日军各部队千方百计大力搜集八路军的有关文件。参谋本部又增派密码专家井上正规少佐到北平，协助特情班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潜心研究，到 1941 年 2 月，特情班终于破译了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部给下属团级组织的密码电报，进而又弄清了以前毫无所知的中共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与经济动态等情况。

继 1941 年 5 月的中条山会战之后，日军于 1942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20 日，对位于河北省中部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日军调集了第四十一师团主力 6 个营、独立混编第九师团 2 个营、第一一〇师团 4 个营、第二十六师团 2 个营、骑兵第十三师团独立混编第七旅团，共计 5 万余人的兵力，企图将冀中军区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一举歼灭。

日军在发动“扫荡”之前，采取佯攻作战的战术，即以分散“扫荡”的形式，对中共各抗日武装发动进攻，以迷惑中共；与此同时，其特情班集中力量查明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位置。首先破译了军区司令部使用的部分密码，随后又查明了六、八、九三个分区司令部以及中共军主力所处位置。但是，由于冀中军区的密码时常更改，特情班无法破译；司令部位置又变更频繁，且不时实行无线电封锁，停止发送电报，因而特情班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靠派遣间谍，化装潜入中共抗日根据地，刺探军情。

日本中央特殊情报部及侵华日军特情班，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组织机构，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犯下了严重罪行。虽然由于其档案资料被销毁，其详细内幕不为世人所知，但我们相信，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其罪恶活动会大白于天下。

蔡德金　任常毅

日军在华伪造“法币”事件的内幕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华制造了一起严重扰乱国民党金融市场的伪造法币事件。关于这事件的内幕，在冈田酋次（曾任汪伪政府经济、军事顾问）所著的《日中战争内幕记》一书中，有详细披露。其具体过程，整理如下：

早在抗战爆发前的 1936 年，在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佐藤末次大佐，在研究中“对于伪造和使用敌国纸币作为捣乱敌国的办法很有兴趣，曾研究过实行的步骤”。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接替佐藤研究工作的山本宪三主计大尉草拟了一个伪造法币并准备在中国实施的方案。可见，伪造法币是日军蓄谋己久的一个侵华行动。

冈田酋次在书中追忆说，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军占领地区的扩大，“华中金融市场旧法币还在流通，日本派遣军另发行了军票作为支付手段。日军不但要以军票在占领区来满足所需的军需要求，而且还有日本国内工业也要求从华中方面提供中国特产物资。但有些物资必须从军票流通区域以外取得，而这种物资价款支付所需的外币和旧法币却不易得到。于是山本大尉以过去研究为基础，起草了发行伪法币在华中试行的方案，得到了上司的批准”。

这一伪造方案，是以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法币，即中央、中国、交通及农民四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对象，首先对使用的纸币和印刷的技术作了研究，计划以这一伪纸币取得战略物资。山本的这一方案通过参谋本部中国课向陆军省军事课的岩畔豪雄大佐提了出来。陆军省的军事研究所进行了研究，认为山本的方案可行。

岩畔邀山本认真地进行了商谈，要山本专心致志地从事这项工作，山本表示：“我一定要专心地干下去！”1939 年 7 月，山本调任第九陆军科学研究所课长，专心配合这一课题的研究。山本原来是军需部的一个军需官，对于造纸、印刷等技术并不精通。为了实施伪造法币方案，他深入私人造纸公司，进行纸币用纸的研究，又通过军方把国民党四家银行发行的各种面值的法币搜集起来，做了种种分析。但是，在分析研究中，对于在纸币的用纸上进行水印的技术，无法解决，这给伪造法币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众所周知，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是于 1935 年在英国的帮助下进行的，当时批准只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有发行法币之权。鉴于中国印刷技术的落后，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是由英国的伍德罗、托马斯两家印刷公司和美国的钞票印刷公司代为承印的，印刷技术是世界第一流的。日本要伪造这样的货币，在印刷技术上无疑是困难的。

为了研制伪法币，日军只得先秘密进行试制。在大藏省印刷局技术人员的支援下，从私人印刷公司借到机器，试印 5 元和 10 元面值的法币。但伪造的试制品和英、美印刷的正式流通的法币相比较，英国的水印技术难以达到，美国印刷方面的某些特点也望尘莫及。除此之外，纸币的番号和记号也是非常麻烦的，既然是伪造，在流通中当然会产生记号和番号相同的票面。为了防止伪造马迹的破漏，还必须有特殊的技巧手段。后来又从捆包方法、包装用纸、捆扎线带等等细微末节上，按发行银行分别加以研究。此外，对钱庄在货币流通中自然产生的新纸币和半旧纸币的混杂规律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伪造工作还必须在极端秘密中进行，印制工场要设在严密隔离的房子内。

这种伪造试制工作从 1939 年至 1941 年经历了两个多年头，才刚刚有了一些眉目。正当日军为伪造法币煞费苦心的时候，德国潜艇在太平洋上缴获的美国军舰上发现了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面额高达 10 多亿元。这一发现，无疑对日方伪造法币工作是一个鼓舞。它不仅给日方带来了经济上的效益，而且为以后伪造技术提高也带来很大的帮助。后来日方花钱从德国手中买进了这批法币。

1941 年 12 月，日军侵占了香港之后，获得了设在香港印刷法币的工厂设备，没收了大量 10 元面值的法币半成品以及印制原版，还查获了载有纸币记号、番号的记录资料。这些印刷设备和资料的取得，给日方伪造法币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发展，日军在占领了缅甸之时，又在仰光的一家印刷工厂中发现了大量半成品的中国法币。这些由英国代为印制的法币是准备通过滇缅公路运往重庆去的。

当日军南进占领了爪哇之后，接收了当地的造纸厂、又取得了很高明的水印添加技术。这样，从试制到获取半成品法币直至取得水印技术，日本军方才全部掌握了印制法币的资料以及关键技术程序，可以独立地而且很高明地伪造法币了。

印制和发行伪法币都是由日本的专门机构“松机关”掌握的。但实际业务是由以民间身份出现的坂田诚盛主持的。坂田的工作又得到了在华从事特务工作的里见甫以及海军方面从事重庆工作的儿玉誉士夫等人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坂田还和杜月笙的徒弟徐采丞相结合，设立了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方面交流物资的“民生”、“裕生”两家商业公司。后来通过楠木实隆的联系，该公司又拉宁波方面的盐业代表、长崎医科大学出身的黄医师等人参加本公司的工作。他们在各地新设了钱庄，采取诡秘的手段使伪法币得以流通。坂田及其公司从中获得了很大好处。如陆军货物厂保管的未印好的法币，是按票面价格的 70%交给坂田和下属公司的，只要再加盖总裁（蒋介石）印章即可送出去流通，转手之间就可获取伪法币 30%的票面价值。

伪法币的流通是通过物资交易形式进行的。重庆国民党方面为了从日军占领区取得物资，也曾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通济隆”商业机关，孔祥熙、顾祝同、戴笠等国民党首要都参与其事，杜月签被推为董事。这样，在日方机关中有杜月笙的徒弟徐采丞，而在重庆方面的机构中又有徐的“老头子”杜月笙暗中沟通。冈田酋次认为，这是中日交战双方演出的“猴子戏”。

关于伪法币的发行额，没有发现详细的记载，据日方披露，最低时期每月数额在 200 万元左右，而且随着贸易数额的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发行量呈逐步增加的趋势。据冈田酋次估计，1940 年重庆国民党政府法币发行额约为 40 亿元，日方伪造的法币数额约占这一数额的 5%左右。由于伪法币的流通，日方在国民党统治区获取了大量战略物资，加速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引起了战时经济混乱和人民对法币的不信任感。

刘其奎

花园口黄河决堤真相

1938 年，国民党政府以阻挡日军西进的名义在河南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使黄河以南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造成了空前的浩劫。事过 50 年后的今天，当地的人民对这场灾难仍然记忆犹新。

黄河决堤方案，在国民党当局酝酿已久。不少国民党要人很早就提出了决河制敌的计划。还在 1935 年日本侵略军控制了河北、威胁河南时，国民党高级军官内部就有掘黄河堤之议。当时在武汉行营任职的晏勋甫，曾就日军可能侵占郑州一事，拟出两个腹案：一是必要时将郑州付之一炬，使敌人无可利用：二是挖掘黄河大堤，以阻敌西进。1938 年 4 月，陈果夫也致函蒋介石，主张在河南武涉县的沁河附近决黄河北堤。他认为只须将地势低下的沁河附近北堤决开，使全部黄水北趋漳卫，则大局可解，而可致敌于危地。蒋介石批示：将此议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徐州失陷后，姚琮等主张由河南铜瓦箱决堤 ;陈诚建议由黄河南堤黑岗口等处决口。1938 年 6 月 1 日，日军攻占睢县等县，进犯开封，郑州危急，第一战区长官部讨论了晏勋甫（时任战区参谋长）的方案，认定掘堤可以将敌人阻绝在河南以东，保全郑州。这个议案在呈报武汉军委会后，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同年 6 月 20 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山地转移；同时秘密决定决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西进。

第一战区长官部在获悉蒋介石上述决策后，随即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有关河防军政人员开会，研究掘堤地点，最后决定在地势较低、堤防较薄的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决定将长官部迁往洛阳，由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留守郑州督工决堤。执行者是守备赵口河防的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为此，蒋介石特电令刘和鼎部守备担任郑汴间的游击，以掩护决堤。于是，刘和鼎以三十九军军部和主力进驻郑州，担任郑州的守备，并以所属第五十四师公秉藩部步兵两团担任中牟县一带（包括赵口）的游击任务，牵制附近日军，以保证决堤工程的实施。

6 月 4 日上午 6 时，刘和鼎先以商震所派五十三军一个团在赵口掘堤，由于决口宽度过窄，待掘至水面，宽不过 1 米。难以继续开掘。至 6 月 5 日上午，决堤工程还未完成。蒋介石当即在电话中命令商震“严厉督促实行”。商震当即令工兵营营长蒋桂楷携带大量炸药与地雷，准备炸破河堤。刘和鼎也加派一个团协助掘堤，并悬赏千元法币，限于当夜完成并放水。经工程兵用炸药轰炸后，至下午 8 时许，开始放水，但因缺口两岸倾颓，水道阻塞不通。刘和鼎又另派一个团作第二道之决口，亦因沙土阻塞而失败。于是，商震又加派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到赵口协助，蒋在珍建议在花园口掘堤，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刘和鼎派参谋处长黄铎五负责办理决口工程，第一战区长官部程潜也派兵工专家王果夫负责设计和指导。这样，决口工程在赵口和花园口两处同时进行。

6 月 7 日午夜，蒋在珍、黄铎五、王果夫等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勘查，选定于关帝庙西掘堤。这个地点是黄河弯曲部，容易放水；又可以流入贾鲁河，使水东南行，注入淮河，还拟定了施工计划，决定：秘密决口；以花园口为基地，由军部架一电话总机，构成营以上的通信网，以加强联系；黄铎五、王果夫常驻花园口，就近解决问题；决口工事以连为单位，分点掘土，轮流作业；一切准备于 6 月 8 日前做好，概限 6 月 9 日完成任务。

这次黄河决口重点在花园口。蒋在珍在执行挖堤任务时，把当地群众赶到 10 里以外，周围密布岗哨，不许群众围观。他选出 800 名身强体壮的兵士，编成 5 组，每组工作两小时轮换。夜间有卡车上的电灯照明，通宵工作。6 月 9 日上午 9 时许，河堤挖出水，因缺口不宽，又时值黄河涨水初期，河身高于平地，水流从高而下，水势很急，难以扩大口子。于是蒋在珍又请求调来平射炮及一排炮兵，用大炮对准已挖薄的堤岸部分，开炮轰击，一连发射六七十炮，缺口始打开两丈左右，河水汹涌泛滥，堤岸自行崩垮，滔滔黄水向东南奔涌。

在黄河两岸，视界辽阔，那时日军已逼近黄河北岸，在望远镜中可以窥见南岸动态。日军夜间用探照灯向南岸侦察。为保证决堤工程秘密，第三十九军规定担任赵口、花园口决口工事的部队，在堤岸内侧，构筑掩蔽部和交通壕，以及伪装被复等。蒋在珍在花园口派一个团执行警戒，谎称日军即将到来。把周围 10 华里以内的老百姓强令隔离，唯恐泄漏出去。

然而，一般百姓，对决口一无所知，毫无应变准备，而国民党当局又没有迁徙、安置居民的措施。在 6 月 15 日各点口子大开，河水大量流灌。短短几天之中，要迁移、安置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居民谈何容易。实际上，除少数保长、乡长们迁移外，一般平民百姓逃避不及，或被洪水夺去生命，或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改道后的新黄河，主流宽达 70 余里，最宽处达 120 余里，洪水所至，泛滥成灾，吞噬了无数生命财产，淹没了无数肥沃良田。据当事人黄铎五视察所见：“一望无际的浪涛中，只见到稀疏寥落的树梢，汹涌的波涛卷流着木料、用具和大小尸体。孩子的摇篮，随着河水飘浮，还可以断续地听到啼哭声。”全家葬身于洪流者不知凡几，甚至有全村、全族、全乡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者，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这次决河使河南、安徽、江苏 3 省 44 个县市、54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泽国，34.4 万多公顷耕地被淹没，89 万多人死于非命，1250 多万灾民流离失所。损失的财产按当时银币折算，价值达 95280 多万元。三省中，河南受害最为严重，有 21 个县市、900 多万亩耕地被淹，47 万多人死亡，造成了大片无人区。尤其中牟及花园口、赵口两个决口附近水势也特大。余如尉氏、扶沟、通许、西华、商水等县也都遭到严重水灾。至 1947 年，这 6 县（加中牟县）的人口总数只有受灾前的 38%。花园口地区首当其冲，受灾情景更为凄惨，离决口口门只有半里的邵桥、沙家堤、史家堤、南省庄等 4 个村庄全部被洪水冲掉。花园口地区的耕地几乎全被淹没，将近 1/4 的人被淹死。

黄河河水人为改道，河水向东南倾泻，顺着淮河的支流贾鲁河、颍河、涡河，流至淮河干流，再顺着淮河南流注入长江入海。周口镇以北，包括贾鲁河与涡河之间和贾鲁河以西的部分地区，为河水泛滥的北部；周口镇以南，包括从涡河到泉河之间的部分地区，为河水泛滥的南部。这就是人们称之为“黄泛区”的地方。从此以后，“黄泛区”这一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便在地理书和历史书上出现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黄河夺淮汇入长江，这又给淮河地区带来连年水灾。黄河每年把约 100 亿吨的泥沙带到淮河流域，使淮河干流和许多支流淤塞。每到汛期，黄河洪水滚滚南下，淮河洪水漫溢横流，大片地区被水淹没，水潦四集，不能排泄。洪泽湖湖底泥沙淤积 1 米多高，沿湖积水成潦，芦苇丛生，蝗虫繁殖，使附近各县连年发生蝗灾，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后遗症。

这次黄河决口给“黄泛区”造成的灾难持续五六年，有的地方长达 8 年之久。

据国民党政府统计这次决河使陷入泛区的日军 4 个师团损失了 2 个。掘堤时，敌十四师团所派骑兵团的 1 个支队一度截断平汉路郑汉间的交通，决河以后，该支队因后路被截断而被消灭。日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计划亦被阻遏。然而，这些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是无法相比拟的。虽然日军不能再实施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但日军将其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溯长江继续西进。6 月 12 日，第一战区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电告蒋介石，黄河虽已决口，日军仍可自由活动。13 日又来电报告，黄河决口后，日军仍西进，并请求增兵固防郑州，不久，郑州、武汉相继失守，蒋介石决黄拒敌的计划归于破产。

早在掘堤之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曾连续发表日本飞机轰炸河堤的电讯，为其后来编造谎言打下伏笔。决堤后，6 月 11 日，蒋介石给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发了一项密电，要求向民众宣传黄河堤是敌机炸毁的。花园口一决开，蒋在珍即将缺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房屋、大树都用炸药包炸倒，并发出电报，说日军飞机前来轰炸黄河堤岸，炸垮花园口河堤若干丈宽。6 月 11 日、12 日、13 日，国民党中央社在从郑州发出的专电中，编造说：“敌机 30 余架，12 日晨轰炸赵口，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致黄河决口泛滥。”6 月 30 日，国民党政治部长陈诚亲自出马，在汉口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重复中央社的谎言。接着，外国新闻记者要求到花园口实地采访。第一战区司令部急忙转令新八师编套日机轰炸经过材料，伪造一个被轰炸的现场。还调集新八师全体官兵、2000 名左右民工，进行了一场假堵口的表演，以掩盖事实真相。但是，国民党的这种表演，漏洞百出。法国的《共和报》在评论中，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侵犯荷兰、荷兰决堤自卫来相比，并指出：“中国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的死命”。在花园口实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当场提出许多质疑，如黄河堤岸约有 20 米厚，而炸弹的弹痕不过 1 米左右深，这是为什么？等等。可见，不少记者已窥知其中秘密。蒋介石决河拒敌的结果，不仅未能达到阻敌西进的目的，反而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又丧失了大片国土，加重了民族危机。扒河拒敌政策的彻底破产，是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消极抗日政策的又一次失败。

胡臣友

国民党派驻新四军“联络参谋”真相

按语本文从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提及的两名国民党“联络副官”，说到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令部等机关向新四军派遣联络参谋的真实历史。主要依据当年联络参谋 50 年代初所写自述，档案馆藏国民党联络参谋报告及蒋介石、顾祝同等人往来电报，并参酌有关知情人提供的材料写成。所据为第一手资料，内容翔实，史料珍贵。

长篇小说《皖南事变》，写了两个国民党的联络副官。一个叫陈淡如，小说中着墨不多。另一个闻瑗，算得上重要角色。就在新四军军部以及所属皖南部队北移的前夕，他用威逼加利诱的手段，策动新四军参谋处长赵令波叛变，取得了极为机密的北移路线图。

究竟当年有没有这样的联络副官？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在皖南事变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个历来很少被人提及的史实，随着黎汝清小说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笔者曾有机会接触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愿向《民国春秋》的读者作一介绍。

三级机关所派联络参谋都是康泽门徒

抗日战争之初，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分别开赴华北和华中抗日前线。国民党当局对这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是很不放心的。1939 年 6 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草拟《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其中专有一条提出：“中央”对八路军、新四军得指定联络员“监视其整个活动”。这个反共文件在 6 月 26 日送给军令部长徐永昌核签。徐永昌认为“监视”的说法未免过于显眼，将这一条改为：“军委会为求与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密切联系起见，照各军前例，派联络参谋若干员前往联络考察。该参谋等应适时呈出报告，以便指导、考核、纠正。”为了“密切联系”，当然比“监视”堂皇得多；但从选派的人员和他们的活动来看，实质并无丝毫改变。

这些负有特殊任务的联络人员，不分军衔高低，都称联络参谋，不叫联络副官。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共有五人，即：驻军部少将联络参谋卢碧湖，驻第一支队上校联络参谋许建华，驻第二支队上校联络参谋杨凤举，驻第三支队中校联络参谋孟繁伦，驻第四支队中校联络参谋倪志操。他们各有一名尉级的副官和一名传令兵随行。1940 年 8 月，卢碧湖调离军职改任行政督察专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还当过江苏省江宁县县长。接替卢碧湖的，是他在中央军校第四期的同学吕鲲，军衔也是少将。同时更换的还有许建华，由毛光远接任驻第一支队上校联络参谋。其时新四军已建立第五支队、第六支队和豫鄂挺进纵队，但国民党当局采取驼鸟政策，始终不予承认，所以未派联络参谋。

小说《皖南事变》中的陈淡如确有其人，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派驻新四军军部的中校联络参谋。这是因为，当时新四军隶属第三战区。闻瑗则是小说家虚构的人物。实际生活中有个闻援，是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派驻新四军军部的少校联络参谋。为什么有了军令部和第三战区的联络参谋，又有集团军的联络参谋？这里需要多说几句。

1940 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策划消灭新四军。除了原在皖南的 5 个师

兵力以外，又从浙东等地紧急调来 3 个师，形成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重重包围。如此众多的部队，需要有个统一的指挥。当时在皖南的最高指挥官，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让这个川军将领担当如此“重任”，蒋介石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认为不适宜。他们选中了反共坚决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10 月初特地将他从江西抚州调到皖南徽州，接着又移驻紧靠新四军军部的宁国。上官云相完全清楚，他到皖南来并不是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而是对付被称为“友军”的新四军，自然急需了解新四军的实力和动向。10 月 13 日，顾祝同以调整皖南部署为名向蒋介石报告，拟将新四军划归上官云相指挥。17 日，蒋介石立即复电批准。这样，上官云相就既有需要，又有理由，把联络参谋派到新四军去了。

这些联络参谋虽然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但都有特务工作的经历，由军令部任命和派遣的联络参谋，实际上是特务头子、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中将总队长康泽所挑选，而且都与康泽有历史渊源：多的跟随康泽近 10 年，如卢碧湖、毛光远；少的也有五六年，如吕鲲。他们离开重庆前，康泽曾在家中设宴送行，详细交代注意事项。他们到新四军后向军令部呈送的报告，都需同时报告康泽。陈淡如和闻援，原来也在军统控制的情报部门任职。闻援和孟繁伦、倪志操一样，还在中央军校特训班受过训，而康泽就是这个特训班的主任。

出发前蒋介石亲自布置任务

国民党军事当局向新四军派遣联络参谋，写入所谓《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是在 1939 年 6 月，实际决定的时间应当早得多。因为这年 3 月，军令部已经任命五个联络参谋。4 月间，蒋介石曾在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办公楼亲自向他们布置任务。这次召见是由康泽领着联络参谋们去的。在座的有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

蒋介石规定：联络参谋的任务，就是要把新四军的各种情况及时报告，既要报告战斗情况，也要关心实力的发展，内部的关系，等等。还说：“共产党是有一套的，对于游击战的组织和指挥，军队的补充，军事训练，政治教育，都很有办法，大家都要虚心研讨。”

蒋介石强调：“大家去新四军，一定要做到能久住。因为你能久住，那他们的一切，一定都明白了。”“不要幼稚，使别人看

不起，被别人赶走。如果让他们把你赶走，那你的工作就全部失败了。”“要能够久住，而且不要只坐在司令部里，更要随时下团下连联络。”“以后无命令绝对不准回来，严禁自由往返。”

蒋介石的这次训话并不是打官腔，讲得相当具体，甚至说到：“发电报就用新四军他们的电台，不准自带电台去。自带电台，一定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加重大家的工作困难。”还指出应先去上饶，向第三战区报到，听从顾祝同的指挥。

蒋介石讲完以后，即先离去。接着何应钦、徐永昌先后讲了一通，大体按照蒋介石的意思重复一遍。最后军令部总务厅给联络参谋们及其副官、传令兵各发了半年薪饷，还发了出差费、交通费、办公费、手枪、子弹、军用地图等。

联络参谋们 5 月从重庆出发，一路稽延，到上饶已是 9 月。顾祝同一见

面就指责他们行动迟缓，要他们尽快到职，随时向他报告情况。为了便于联系，还结五个联络参谋部委派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的虚职。但是这些联络参谋在大后方松散惯了，并没有按顾祝同的要求办。他们从上饶到了屯溪以后，又去黄山游览多日，10 月半才到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派驻各支队的联络参谋，则是 10 月底才到职的。

联络参谋如何收集情况向上峰报告

共产党、新四军真心诚意地和国民党军合作抗日，对这些联络参谋给予了周到的照顾，工作的便利。在他们到达上饶的第二天，叶挺军长正好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公干，立即接见他们，详细介绍了新四军的改编组成经过和挺进敌后情况。倪志操从军部去江北的第四支队，由新四军参谋处作战科长李志高带领警卫分队护送到长江边，又由江北指挥部派部队到北岸迎接。联络参谋们在新四军期间，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经常和他们交谈，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作战部门每天提供敌我态势和战斗情况，供他们编写发注重庆和上饶的《战斗旬报》，如何编写则不予干涉。他们可以到任何一个营连去考察，可以与驻地各界人士结交。遇有摩擦事件，还请他们去实地调查，参与处理。

应该说，联络参谋们大体如实地报告了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战绩。这既是因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关系还比较好，也是因为军事当局需要了解真实的作战情况。同时，日军入侵，大敌当前，即使是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联络参谋，只要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血性，在前线目睹新四军不避牺牲，英勇抗战，也不能不持肯定的态度。

笔者曾见到由孟繁伦编制的三张新四军游击战绩年度统计表，一张是 1938 年的，一张是 1939 年江南部队的，一张是 1939 年江北部队的。统计表分为作战次数、缴获、爆破、俘虏和敌我双方伤亡人数六大项。其中缴获一项，1938 年的表上详细开列了步马枪、手枪、轻机枪、指挥刀、文件、地图、防毒面具、望远镜、照相机等 39 种，1939 年的表上又增加了重机枪、高射机枪、迫击炮、炸弹、毒气弹、无线电机等。爆破一项，则有汽车、火车、马车、汽船、公路、铁路、桥梁、水塔、煤矿等 14 种。俘、毙、伤敌人的数字，按日军和伪军、军官和士兵分别统计。对上报新四军的战绩，很有点力求详尽的样子。

这位联络参谋还在 1939 年的统计表上写了一段值得一读的附记：“本军系担任游击任务，其部队类多深入敌后，有时因敌情紧张，便于袭扰敌人，履行任务，甚至一营一连在游击区内均须分散行动，因此与后方通讯联络不如其他部队之便捷。同时物质艰苦，交通工具缺乏，联络线往往无形中断。基于此种困难，故历次战斗仅凭电报扼要转达，内容诸多简略，各种数字亦止于概数而已。至月终统计报告，皆赖徒步送达，每递送一次则须通过数道封锁，辗转需时月余。因之每月统计仅能依据电报汇成，而此表则系根据各部队按月详报统计，数字与战况均确实，故与以往月报略有出入。特此说明。”这篇附记本是要说明年度统计比每月统计准确，但也从一个侧面颇为具体的描述了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艰苦情况。

遇有摩擦事件，联络参谋们的调查当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往往倒打一耙。但有时面对事实，也有比较公允的看法。1939 年 11 月 29 日，驻第一支

队的许建华就给军令部发过这样的电报：“该支队所属部队屡次与现镇江县（今江苏丹徒县——引者）县长庄梅芳发生摩擦，均电冷副总指挥就地解决。最近复因庚佳两日该部在延陵九里山与敌激战不支，于灰日转移，有战士王晓和等三人落伍，经高庄时被镇江县县长之士众谋害有据，群情激愤，有即报复势。拟请将该县长更调，以免发生纠纷。”电报中的日期用的是韵目代日，庚日即 8 日，佳日即 9 日，灰日即 10 日；冷副总指挥是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

许建华的这个建议会有什么结果，是不难想象的。12 月 3 日，军令部给他复电说：“所请更调镇江县县长庄梅芳以平息纠纷等情，仰径商冷副总指挥核办可也。”干脆利落地一脚把球踢回去了。蒋介石也在同日装模作样地给冷欣发了一个电报：“查该镇江县县长庄梅芳有无更调必要，希核办具报。”冷欣是庄梅芳挑起反共摩擦的直接后台，岂能打自己板子？他在 16 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先对新四军江南部队诬蔑一通，然后提出：“镇江县县长庄梅芳系本党忠实党员，抗战前在党部工作，设突予更换，不但助长该部气焰，抑且引起误会而影响民众趋向，故拟暂不更换。”这个意见正合蒋介石的心意，21 日立即复电冷欣：“查所报镇江县县长庄梅芳不宜更换等情，准如所拟办理。”一桩残杀新四军战士的公案，就这样下了了之。至于许建华后来被更换是否与此有关，那就不得而知了。

需要再次说明，联络参谋们有时还能比较客观地报告新四军的情况，只是初期的事。上述许建华的电报，就是他到职才一个月时发出的。从 1940 年春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的重点从华北转到华中，对新四军步步进逼，力图“制裁”、“剪除”、“剿灭”、“肃清”，为此发出了一个又一个密令，拟定了一个又一个计划。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联络参谋们的报告调子也不同了。1940 年 5 月，军令部派遣的五个联络参谋奉命返回，7 月到达重庆后，向军令部、参谋总长办公室和康泽分别作过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这次汇报，对新四军就更是信口雌黄，恣意诬蔑。

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军事当局曾有“皓电”和“齐电”大造反共舆论，诬蔑新四军有四项“非法行动”，即：“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联络参谋们的报告，当是这些诬蔑之词的重要依据。

说到联络参谋们颠倒是非的报告，不妨说说他们是怎样从新四军发出这些报告的。虽是细枝末节，倒也相当有趣。

蒋介石不准联络参谋们自带电台，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容易想到的办法是另备密码。所以军令部给他们各发了一本“央密”，康泽另给他们各发了一本“络密”。途经上饶时，第三战区的情报室又给了一本密码。但他们怕引起新四军的警惕，轻易不敢使用这三种密码，大多是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新四军的“通密”。他们临离重庆时，曾与军令部游击科科长乔茂材约定：用“通密”发的电报，凡开头有“钧鉴”两字的，就表示全不可信，是为了迷惑新四军而发的；凡最后有“为祷”两字的，表示有一半可靠；只有直称“部次长徐熊”（即军令部长徐永昌、次长熊斌）的电报，才是可信的。

尽管备有多种密码，玩了这些花招，要用新四军的电台发出关于新四军的情报，联络参谋们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所以他们还要设法另找电台。倪志操曾到驻安徽寿县的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处，调查颜部与新四军的摩

擦事件。他一到那里，就用颜的电台发了一份电报，向军令部和康泽报告新四军在江北的扩编情况。后来，倪志操又到驻合肥的国民党军第一三八师，用那里的电台发过情报。1941 年 1 月 2 日，陈淡如自以为探听到了新四军军部北移的出发时间，那就更加辛苦，是特地从云岭跑到泾县县城，通过电报局向第三战区发出情报的。

从重庆返回正赶上皖南事变

军令部在 1940 年 5 月电令联络参谋们返回重庆，是因 3 月间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提出，要以调整全国军队作战地区为名，把八路军、新四军都调到黄河以北去。这个决定迟至 10 月 19 日才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正式通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叶挺军长，但他们自己早在准备。这就需要向联络参谋们面授机宜。

联络参谋们再次出发之前，又由康泽带领，去军事委员会办公楼听取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交代任务。这时卢碧湖已换吕鲲，许建华已换毛光远。

何应钦强调：“大家的中心任务，是各随派驻部队渡江渡河，到达指定作战地区，不得逗留后方。大家要对派驻部队的长官加强联络，督促他们早些遵命开拔，全部开拔。如有不肯开拔或只开拔一部分的情况，要尽力查明，迅即详细密电报告。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只在司令部里联络，只求人事上的协调。”

这些联络参谋照例在重庆办办私事，会会亲友，少不了还要享受享受，一直拖到 10 月甚至 11 月才分别动身，到达上饶已是 12 月下旬了。顾祝同很生气，见面第一句话就责问为何迟到。也难怪顾祝同着急，这时包围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一场罪恶的血腥屠杀即将开始，急需联络参谋们各就各位。顾祝同说：“大家此次前去，任务重大，必须各随部队，切实工作，不可再逗留后方，致干军法。明天即赶快出发，拿我手令去交通处调拨汽车坐去，到达后即来电报。”

五个联络参谋经屯溪到达太平县境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前进指挥所，得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已于 1 月 4 日出发北移，于是又前进数十里，到达第一四四师师部。五人商量：这时去新四军，等于投入包围圈中，打了起来，子弹可认不得人；但是如果下去，又怕康泽和顾祝同追究。他们决定给叶挺军长发一个电报，探明情况，再定行止。叶挺军长当即复电：“现在本军已遭包围，希暂不来军部。”他们就以这个复电作为不得不滞留第一四四师的理由，向军令部、康泽和顾祝同分别作了报告。

1 月 6 日下午，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相继下令，从 7 日拂晓开始向北移途中的新四军进攻。皖南事变终于发生。正在第一四四师的五个联络参谋，参与出谋划策，提供了新四军的情况。

皖南事变以后，军令部和康泽命令他们留在第三战区工作。或任作战参谋，参与了对新四军分散突围人员的搜捕。或任政训室主任，参与了对新四军被捕人员的迫害。

陈淡如和闻援表演各有不同

在新四军时间最长的联络参谋是陈淡如。他称得上“忠于职守”，曾经

千方百计探听新四军军部北移的路线、时间和准备工作情况，但并未得到多少可靠的情报。直到 1941 年 1 月 4 日，他终于弄清当天夜里就要出发，但已被看守起来。

这个陈淡如跟随新四军军部行军，5 日到茂林，7 日过丕岭，8 日又返回高坦。根据当时形势，留他是个累赘，就把他送到国民党军驻地附近，让他走了。在行军途中，他还有一段精采表演。当年的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在《皖南事变亲历记》中曾有记述，值得摘引介绍：

“ 5 日在茂林，军部派我去招待陈淡如。我仍然很耐心地和他谈话。他身上长着疥疮，我到军医处找人替他治疗，还陪他下象棋。不知何时他写好了一份给三战区的电报稿，内容是主张团结，反对同新四军摩擦。他要求我把这份电报发出去。我知道他这是怕我们杀他，故意写这份电报来讨好的。我实在看不起他这种手腕，但仍然把电报稿交给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他看毕一笑，便搁入衣袋中去了。自然这份电报是不会发出去的。我想即使发出去，到时候陈淡如也不会认帐的，反而会说是新四军假借他的名义发出去的。这种人怕死，此时要他通电反对蒋介石，为了保命，他也会照办的。 ”

“ 8 日上午在纸厂休息，实际是因为军部的方针未定的缘故。但军部却决定先把陈淡如放回去，派几个人把他送到蒋军附近，让他走过去。后来听说他对三战区报告说是逃回去的，并且谎说是花了多少钱收买了新四军的哨兵才逃了回去的。他这样说不但是为了面子，也是为了钱。他报了谎帐，因此可以发一笔小小的洋财。 ”

至于闻援，开头已经讲到，是上官云相为了策划和指挥皖南事变专门派去的。他拿着上官云相致叶挺的亲笔信到达新四军军部，已在 1940 年 12 月初。时间紧迫，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新四军情况，他确实使出了浑身解数。据当年任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处长的武之棻说，闻援在获知新四军的兵力部署以后，于 12 月底跑了回去。这是他们第一次比较具体地知道新四军的实力，并且从中判断新四军在皖南有万余人。

闻援在新四军军部期间，与参谋处长赵凌波必然会有接触。但策动赵叛变，应是小说家创作的情节。这部历史小说中许多人物包括陈淡如都用真名，但将赵凌波改成了赵令波，将闻援改成了闻瑗，大概正是要在虚构的情节和真人真事之间划出界限。

赵凌波的叛变确有其事。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成三个纵队，赵凌波由参谋处长改任第三纵队副司令员，1 月 10 日向裘岭方向退却时，在双家洲以北无名河被俘。此人贪生怕死，当了叛徒，写了供词，画了三个纵队的北移路线图。但这时国民党军对新四军的围攻已经有好几天，这张北移路线图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用处了。只有赵凌波的供词，说新四军“ 不遵令北调早有定谋 ”，对国民党当局还有一点用处。所以 1 月 12 日上官云相将这份供词报告顾祝同，13 日顾祝同转报蒋介石。17 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就引用了赵凌波的供词，作为新四军“ 违抗军令，不遵调遣 ”的一个“ 证据 ”。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但国民党当局既已“ 撤销 ”新四军的番号，自然谈不上再派联络参谋了。

史嘉

汪伪“第一夫人”出巡记

汪曼云受命

1943年清明节前后，江南春暖，陈璧君静极思动，起了游兴。但以汉奸“第一夫人”之尊，带领大批随从游山玩水，未免过于招摇，总得找个借口，才能“师出有名”。这时，汪伪南京政府正配合日本侵略军在江南沦陷区进行“三光政策”的清乡，以“视察清乡”为名，倒也冠冕堂皇。

一天，汪精卫把伪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江曼云叫到颐和路34号官邸，对他说：“夫人要到杭州视察清乡，我想请你陪同前去。不过，这次去杭州，不是以夫人的名义，而是以中监委常委的身份去的。”陈璧君一向好强争胜，喜欢出风头，汪曼云是深知的，于是随口答道：“汪先生的意思我懂了，但不知还有哪几位随员？”

“我想请人鹤（伪内政部长陈群）、孛孛（伪陆军部长叶蓬）、允文（伪外交部次长陈允文）、春圃（伪行政院秘书长、陈璧君之侄陈春圃）、昌祖（伪航空署长、陈璧君之弟陈昌祖）陪同。夫人远行，总还得有几位女眷才好，想请褚夫人（伪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之妻陈舜贞）、林夫人（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之妻徐莹）、曾夫人（曾仲鸣之妻方君璧）、曾委员（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曾醒）也一起去。”汪精卫答道。

这个随员阵容，既有伪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又有陆军、空军“首脑”，再加上一批高级伪官夫人，比之汪精卫本人“出巡”，还要有气派！

陪同陈璧君“视察”，这是件好差事，也是件苦差事。服侍得好，自然是宠信有加，升官在望，但陈璧君是个既骄且悍的女人，不好服侍，弄不好随时都会斥声迎面，甚至带来厄运。于是，汪曼云小心翼翼地“请示”：“从哪里起程？杭州方面是否要我去联络？”汪精卫答道：“从上海起程。筑隐（伪浙江省长傅式说）那里，由我通知。”

汪曼云辞出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李士群，因为他是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又是伪江苏省长，陈璧君要去杭州“视察清乡”，自然得禀告他。汪在电话里还特别要李士群“电饬”沪杭线江苏地界，欢迎标语要用“陈委员”，勿用“汪夫人”字样，以免陈璧君看了不快。接着，汪又去找陈春圃，问明了动身日期与上下车的车站之后，就以伪清乡委员会名义，向“华中铁道公司”定了一节专车，并分派了在车上侍应与警卫的人员。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了，汪曼云才舒了一口气。

车上风波

汪精卫在上海的官邪，是在沪西愚园路136弄，离西火车站近，这天就在西站上车。

陈璧君的专车，是挂在一班开往杭州的列车上。正巧，伪教育部次长樊仲云这天要去杭州“讲学”，也在西站候车。陈璧君一眼瞥见了，就不高兴，对汪曼云说：“汪先生，樊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的！”意思是不让樊仲云上她的专车。这使汪感到左右为难：大家都是熟人，且樊又是个次长，如他要上专车，怎好意思挡驾？陈璧君平时作威作福惯了，心胸又十分狭窄，谁见

到她都怕，樊真的上了专车怎么办？快上车了，汪曼云搜索枯肠，还没有想出办法，这时樊仲云似也知趣，要到前面头等车厢。不料陈允文却拉着他，连声说：“上这里一样的！上这里一样的！”樊便也不客气上了专车。汪曼云无计可施，只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硬着头皮跟着上车。

这节专车，也是汪精卫出门乘坐的。一节车厢分成3个部分：一部分辟作两间半的包房，一部分装成客厅，余下的是一般头等车厢的丝绒软席。

列车刚开动，陈璧君己走出包房坐到客厅里，她那圆圆胖胖的脸上，阴沉沉的，对着站在丝绒席边的汪曼云说：“汪先生，我们专车的包房都给人家占去了，那何必要包一节车厢呢，我们买普通车票不是一样的吗？”汪曼云听了一愣。车厢里除了樊仲云不是随员之外，难道包房里还另有别人？他赶紧到包房前，一间一间的看过去。赫赫！在那半间头的包房里，伪考试院长江亢虎居然安坐在那里。汪曼云急忙叫翻译去把日籍列车长找来，问他：“这节专车是我们包的，你怎么把别的乘客也引到这包房里来？”日籍列车长说：“那是你们国民政府的院长啊！我以为他是和你们一起的，所以他在北站上车，我才引他到这里来。你们是自己人，且一会儿就到了，是不是就这样吧？”汪曼云被他冷嘲热讽地说了一通，觉得如果硬要把江亢虎撵走，只会使自己更丢脸，就自我解嘲地说：“我们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也不是一定要他走。”算是下了台。

汪曼云一转身，便添油加醋地回禀了陈璧君：“夫人，江院长是从北站上车的，列车长以为他是您的随员，且是个院长，所以才把他领进这间小包房，经我责问，列车长知错了，可又不好意思再请他坐到别处去，好在这间小包房我们也不用，就给了他吧？”这时陈璧君气量再小，当着这些男随员的面，也不好说一定要把江亢虎撵走。但她还是表示了内心的不痛快，随对汪说：“可是到了杭州，你对新闻记者必须说明江先生、樊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来的。”汪曼云自是连声应诺。

事情虽说是解决了，汪曼云觉得还应该使江亢虎知道这节专车是谁坐的，让他心里有数，免得再出岔儿。原来敌伪时期，部长以上的伪官，不仅乘火车可长期免票，而且出入车站也不受检查。江亢虎凭这种特权，不时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做高级跑单帮生意。有一次，汪精卫“出巡清乡”，从南京挂了一节专车，日本宪兵为了戒严，对这班列车的头、二、三等车厢的乘客，一律严加检查。恰巧江亢虎也搭这班车去上海，虽以“院长”之尊，这次也不能免于检查。讵知不检查犹可，一检查就当场出了丑。江亢虎带的两只大皮箱，一打开，里面装的都是当时属军用物资、禁止携带的猪鬃。要是这事出在老百姓身上，那就会连人带物一并送进日本宪兵队。因为江亢虎是个伪院长，且汪精卫又乘这列火车，给他难堪，无异撕了汪的脸，所以日本宪兵只叫送江上车的人将猪鬃带回去，但江已丢尽颜面了。

于是，汪曼云走进江亢虎那间小包房，对江说明：这节专　车是“清乡委员会”包给“汪夫人”去杭州“视察清乡”的。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日籍列车长拖了翻译来，对汪曼云说：“有个和尚要找江院长，怎么办？”汪一听是个和尚，心里就恼火，弄个和尚来，太不像样！于是气冲冲地走到江亢虎坐处，以责问的口吻问江：“亢老！怎么会有个和尚来找你？”汪原希望江能从他的语气与态度上，主动把那个找他的和尚回辞掉算了。设想到江亢虎老奸巨猾，若无其事地说：“是的，对不起，叫他来吧！”这一招，汪曼云反而束手无策，只好让那个和尚进来。

和尚自我介绍，他是常州清凉寺的当家，这次是江亢虎约他一起去杭州的。汪曼云沉着脸对和尚说：“这节车厢是专车，过嘉兴之后，你就要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去。”汪怕这个和尚一直跟到杭州，那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汪精卫老婆的车厢里，钻出个和尚，岂不闹成大笑话！

车到嘉兴，已进入浙江省境。伪浙江省长、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主任傅式说，率领了伪浙江封锁管理处副处长陈柏年、太湖东南第二期清乡地区督察专员张鹃声上车，欢迎陈璧君。汪曼云灵机一动，当着陈璧君的面对傅式说说：“筑隐兄，江院长、樊次长不是和陈委员一起来的，生怕杭州记者误会，请您代说明一下，以免弄错。”算是“闭门推出窗前月”，卸掉了责任。车过临平，那个和尚还未从江亢虎那里走开，汪曼云又叫陈柏年去硬将他赶走。

到了杭州站，伪浙江省政府为了逢迎陈璧君，已勒令杭州　学校停课，并派出军警强迫所谓民众团体和附近居民也前来“欢迎”。所以月台上居然也人头攒动，闹做一片。列车一到，月台上已军乐大作。陈璧君起身移步，准备接受车站上那些人群不由衷的“欢迎”时，却又突然止步，退回客厅。随员们也只好却步不前。这时陈璧君气呼呼地对汪曼云说：“汪先生，我不下车了，我要原车回上海。”汪听了吓了一跳，不知又出了什么乱子，向前一看：啊，又是江亢虎！原来他已跑到陈璧君的前头去了。这样一来，陈璧君这次来杭州要出的风头，岂不让江先占了去？汪曼云情急之下，大声把江亢虎叫住，随即把他拉到小包房，往里一推，把住门口，然后对陈璧君说：“夫人，请下车吧！”这时陈璧君才下了车。

如此视察

当天下午，陈璧君到梅花牌伪浙江省政府走了一圈，晚上又到孝女路赴傅式说家的宴会，第二天便开始所谓“视察清乡”了。

上午，傅式说在抚台衙门旧址，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陈璧君到达时，傅已率领伪省政府所有的伪官，恭候在那里了。被迫而来聚集在广场上的老百姓约有 1 千多人。

大会程序很简单。先由身穿少将军服的伪浙江省警务处长徐念劬向陈璧君立正，行劈刀礼，报告出席大会人数。然后陈璧君步上主席台。傅式说把陈璧君吹拍了一通，陈璧君也向台下人群逐一介绍她的随员，以炫耀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可临到请她讲话时，却又推说不习惯，叫伪内政部长陈群代讲。陈群事先毫无准备，奉命之余，也只好不知所云地胡讲了一通。好在地广人稀，既站得老远，又无扩音设备，谁也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

会后是参观佑圣观巷小学。这原是由杭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改名的，过去在杭州算是办得最好的一所小学，但此时已大不如昔，连校舍也陈旧不堪了。陈璧君引不起兴趣，只是履行公事地在学校走了一圈，脚都没有停一步，便草草地结束了。

陈璧君最感兴趣的，是到东街路 100 号伪闽浙赣皖（四省边区）行营与伪特工总部杭州区“视察”。“四省边区行营”是汪伪特工总部为搜罗重庆国民党方面的游杂部队、扩大特工武装而设立的，由伪特工总部机要处长傅也文任指挥兼秘书长。陈璧君亲自召集这两个单位的全体特务讲话，还接见了特务头子傅也文、万里浪（伪特工总部杭州区区长）等，温慰有加。不过，

陈璧君特别关照有一个人不要露面，这就是陈恭澍。陈恭澍原是军统戴笠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1939 年 12 月他奉戴笠之命，在河内指挥暗杀汪精卫。 21 日晚 4 个军统特务逾墙而入汪宅，黑暗之中误中副车，将汪精卫的亲信曾仲鸣打死了，连曾的妻子方君璧也无端受了伤。后来陈恭澍调任军统上海区区长，于 1941 年 11 月底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投降了汪精卫，成为汪伪特务骨干。此时正在杭州为李士群办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训练特务干部。陈璧君怕陈恭澍出场，会勾引起这时随侍在旁的曾仲鸣之姐曾醒和方君璧的杀弟、杀夫之仇恨，当场冲突起来，没法收场。陈璧君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对傅也文、万里浪说：“这又不是为了私仇，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嘛！”

离开东街路 100 号，陈璧君的“视察清乡”算是全部结束了。

老饕饱腹

陈璧君平日养尊处优，是一个享受惯了的吃客。还在去杭州的火车上，她就向汪曼云提出：“汪先生，你是杭州人，这次我们到了杭州，你应该多介绍一点杭州的风味给我们尝尝。”汪回答说杭州著名的吃食店虽有，可是地方不行，太脏。陈说：“只要好吃，管它什么地方。怕脏，是吃不到好东西的。”当晚，在傅式说家的宴会上，陈璧君又当面对傅说：“我这次来杭州，只受省政府今晚一次招待，其他概行谢绝，今后由我们自己来安排。”

宴会散后，陈璧君带了女随员和侄子、女婿回西冷饭店，男随员和傅也文、万里浪，则被伪第一方面军第二军军长徐朴诚拉到了他家里，殷勤招待一番。一时间，女人、鸦片、赌具、糖果、茶点、烟酒，都搬上来了。这些“法宝”，在徐朴诚家里，是四季皆备，随时都可供应的。

徐朴诚把这些人拉去家里，虽有笼络一番之意，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陈璧君侄子陈春圃的关系，宴请一次陈璧君。他说：他是伪中央将校训练团毕业的学员，这个训练团的团长汪精卫也就是他的老师，陈璧君即是他的师娘，岂能不招待一番，而失“弟子之礼”？话虽说的冠冕堂皇，其实他还另有一番用意。陈璧君不是说过只受伪省政府一次招待，其他概行谢绝吗？他偏要在“概行谢绝”中出冷门，以显示自己的能耐，作为政治资本。陈春圃以陈璧君已有言在先，他无法效劳。但徐朴诚缠着不放，说：“无论如何，你得替我想个办法。”陈春圃遂往汪曼云身上一推：“你托曼云想想办法看。”

汪曼云与徐朴诚都是杜月笙的门徒，属“同参兄弟”。汪说：“要预先说请她，我想不出办法；事后告诉她，或者侥幸成功。……”徐朴诚急不可耐地说：“我不管事先事后，只要能请成功就行。”汪曼云成竹在胸，不急不躁地往下说：“明天晚上我准备陪同夫人和大家一起到王顺兴馆子尝尝道地的杭州菜，也请朴诚去做陪客。席间，朴诚不妨去敬敬酒，我替你介绍，说你是汪先生的高足。饭后我也不客气，这上下的账，请你全付了。临走时，我当面告诉夫人：今晚的账，徐军长抢会了。这样，她不接受你的招待，也没办法了。好在夫人也会原谅我，在这里抢会账，我是强不过地头蛇的啊！”在座的这些伪官，都知道陈璧君的矫揉做作样，觉得还是这个办法好。

随后，汪曼云又和傅也文、万里浪商量，要他们明天早上派一批特务去奎元馆，除楼上留出一部分坐位外，其他概由“自己人”坐满，也做吃客。晚上在王顺兴馆也是这样。

翌日清晨，陈璧君一行到了奎元馆。别看陈是个快 60 岁的老太婆了，胃

纳却很强，这顿早点，她一人就尽一只红烧羊头，还吃了一碗半面条，冷盘犹不计在内，连年轻力壮的男随员也望尘莫及，自愧不如。陈璧君食量虽大，却小溲频繁，仅一顿早点时间，就解了两次。她解小溲也别具一格，不上厕所，而是着人拿了痰盂，即在席前叫所有的女眷，围成一堵人屏风，她便安坐其中，一下子解决问题。这虽干脆简便，却实旷古未闻。

这天中午，陈璧君在西悦来吃饭，这也是杭州的一爿老馆子。傅式说闻讯赶来，问晚上准备在哪家馆子吃？汪曼云告以在王顺兴。傅说要叫伪省会警察局去布置一下。陈璧君说：“不必了，我也不爱这一套。就是你们贤夫妇，我也请你们不必劳驾，因为你是地方官，总有不便之处。”表现了一副体恤下情的样子。

饭后，傅式说把汪曼云拉到一旁，轻轻地对汪说：“夫人虽不要这样，我是地方官有责任。”遂又将声音压得更低：“杭州并不是安全的地方。再说，没有这个排场，她也不会高兴的。”傅说的是实话。陈璧君的思想确是矛盾的：她这次出门，原是想炫耀一下自己，出一次风头，不然为什么不以“汪夫人”而要以“陈委员”的身份（表示她有独立“人格”，不是“妻以夫贵”）来，还要带那么一大批高级伪官当随员呢？但她又要沽名钓誉，故作不爱兴师动众，以显示她的“深入民间”。其实，她心里想的，最好还是两样都能得到。傅说的“没有这个排场，她也不会高兴的”，可谓一语道破。

汪曼云说：“我已托特工总部杭州区把王顺兴馆上下全包下，派特工去当食客，不让外人进去。这样既安全又热闹，在外界与夫人看来，岂不是和平常一样？她想要突出的平民化，不也做到了吗？至于警卫排场，在她这种矛盾心理下，有与没有，都很难讨好。要两面讨好，比较难办。”傅说就是这事为难，不警戒万一出了事，他担当不起。汪曼云出了个主意：“这样吧！你还是照你的计划去布置。但要警察局长也守候在王顺兴门口，要他听我的话，和我搭配演好这场戏。只要临时把店门口的警卫撤掉，其他的，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只要她看不见，也就不会怪你，这样你所顾虑的两个困难，就都解决了，而她所要的既要摆威风又要平民化，也都得到了。这不就双方满意，各得其所了吗？”傅式说认为这个办法好，就这样决定了。

当晚，陈璧君来到竹斋街王顺兴饭店。汽车到达时，不仅附近警察密布，即店门口也站了十几个。车子刚停下来，伪警察局长即上前为陈璧君开门。她犹未跨出车门，已听到喊立正、敬礼的口令了。这时，汪曼云急跳出了车子，像煞有介事地板起脸孔对伪警察局长说：“己关照你们不必这样，为什么不听？马上把兄弟们撤掉！”伪警察局长一声“是。”把手一挥，带了站在门口的警察下场去了。汪曼云与伪警察局长搭配的一幕双簧，一分钟就演完了。陈璧君也就在这一霎间，得到了她所要的两套。

上楼之后，徐朴诚早已在这里恭候了。整个楼面，除了留下的席面外，已有人坐得满满的。桌与桌之间，虽都是熟人，互相间也不打招呼，像是素不相识的顾客。陈璧君对随行的女眷说：“清乡地区的市面，毕竟不错。”不知这是她的自我安慰，还是有意骗人，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这晚除鱼翅、甜菜之类的几个大菜，是由徐朴诚叫人送来加工的外，其余的都是王顺兴的本地风味。生炒鳝片，炸响铃儿，醋溜全鱼，虾油卤儿浸鸡，馄饨鸭，东坡肉，乃至最普通的三虾儿豆腐等等，全都搬上席面。这些都是道地的杭州菜，陈璧君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绍兴扫墓

当晚在西冷饭店，陈璧君传话下来：“明天一早去绍兴。”许多人不知此行何为？就去问陈春圃。陈说：“是去扫汪先生祖先的坟茔。”原来，汪精卫虽生在广东，但他的原籍却是浙江绍兴，祖父以上的坟茔都在那里。

第二天清早刚吃完早饭，傅式说夫妇已偕同日军浙江连络部长渡边，带了一大卡车的日本兵、两卡车的伪保安队来了。接着，伪特工总部杭州区也开来了二辆敞篷车，坐满了身着笔挺西装的特务喽罗，每人提一挺快慢机，左臂还缠了一条印有“青天白日”中间有个“特”字的符号，深恐人家不知他们是汪精卫手下的特务妖魔，埋没了他们的身份似的。

这一行人，由傅式说与渡边坐车带头开路。接着是一辆架有机枪的伪保安队的卡车，与伪特工的敞篷车一前一后，护卫着陈璧君的保险汽车。随后是随员们的车子，最后殿以一辆伪保安队的卡车。那辆日军的兵车，算是押阵的。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地向钱塘江大桥方向驶去。

钱塘江大桥，抗战初期国民党军撤离杭州时，已被炸毁了。由于破坏严重，日军无法修复，为沟通南北两岸的交通，只得在原来的桥基上，铺上了一些长木板。陈璧君等人的汽车，便在这些木板上辗过。看着两旁下面滔滔的江水，听到车轮辗过吱吱作响的木板声，汉奸们都不免胆颤心惊，直到汽车过桥后，心才定下来。

经过几小时旅途的劳顿，总算到了绍兴，被安排在伪绍兴商会休息。时已中午，几桌丰盛的筵席已摆上了，自是饱吃了一顿。饭后，陈璧君这一行人，又乘汽车到一个水埠头，弃车登舟，由小火轮将他们乘的小木船，拖到沿河的一处田岸。

舍舟登岸，便看到那儿有一个坟墩，还有许多僧尼专候在那里。陈璧君一到，这些和尚、尼姑便铙钹齐奏，高诵经文，做起佛事来。这就是傅式说着人找到的汪精卫的祖坟。但见坟墩前竖着一块墓碑，上书“先考缦亭公之墓”几个字，下面具名是汪琡。原来这是汪精卫祖父之墓。

这个汪缦亭，名云，是清朝的举人，当过浙江遂昌县学的训导，是个不入品级的小学官。汪精卫的父亲汪琡，字省斋，从小寒窗苦读，可是几次应试，都名落孙山。汪琡眼看功名无望，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他就转而习幕，熟谙刑名钱谷之事。大约在咸丰年间，汪琡带了妻子卢氏，去广东游幕，遂寄籍番禺县，住在广州城。汪精卫是汪琡侍妾广东人吴氏所生，所以原籍绍兴他并没有住过。

陈璧君来祭祖扫墓，那些汉奸随员虽非汪家子孙，也个个跟在陈璧君屁股后，上前行三鞠躬礼，这是逃避不了的礼节与点缀。

当天下午，陈璧君等又乘原来的舟车，回到了杭州。第二天带着傅式说等人“馈赠”的土特产，把偌大的一节专车塞得满满的，满载而归地回到了上海。

仰扬

戴笠香港被扣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连同由他控制的军统组织撤到了重庆，以重庆为基地，继续从事搜捕、刑讯、暗杀等活 动。

戴笠到重庆不久，为处理国民党密码专家温毓庆久留香港，不肯回重庆这一事件，曾专程去了一次香港，演出了连戴笠自己也不能想象的一幕。

温毓庆是国民党的密码专家。抗战开始不久，他即前往香港，不愿返回重庆。尽管他滞留香港，并无显明的投敌意向，但因他在国民党中主持密电破译工作多年，知道的机密极多，因此他的滞港不归，对国民党来说，总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对于温毓庆的异动，戴笠大为光火。但因温身处香港这个国际自由港，戴老板不能采取强硬措施，而只能采用缓和的解决办法。他先急电军统局属下的香港组织，让其设法劝说温从速返回重庆。这一招失灵以后，戴笠便决定，亲自出马，奔赴香港处理此事。

戴笠赴港的消息，很快地为温毓庆所得悉。温深知，戴笠的香港之行，是奔他而来的，便马上采取预为防范的措施。他一方面要求港英政府加以保护，一方面制造戴笠要来香港从事恐怖活动的舆论，借此阻挠戴笠的行动。香港总督葛洪量本来就对戴笠过去一贯派遣特务在香港从事暗杀活动深为不满，现在得到他自己要到香港从事恐怖活动的报告，就立即作出安排，要警务处在戴笠抵港时将他扣押，以此煞一煞他的嚣张气焰。

一天，军统局在香港的特工人员郭斌，按戴笠拍来的电报的要求，赶到机场迎接。在机场，他看到港警如临大敌，就揣测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当他发觉港警手中都持有戴笠的半身照片后，他就明白了一切。

事态严重，郭斌感到，按当时的情形，他要把自己侦察到的情况直接报告戴笠是不可能的，或许能通过内线作出暗示，让戴笠加以防范倒是上策。主意打定以后，郭斌寻机接近由他安插在机场上的特工人员，扼要地向他介绍了事情的缘由，嘱咐他务必寻找机会接近下机的戴笠或其随员徐锦成，向他们透露消息，以便他们有所准备。

飞机抵达香港机场后，戴笠随着旅客的人流走下舷梯。他扫视了一下机场，凭着长期从事特务工作的经验，马上感到机场上的戒备是不同寻常的。在他的判断得到了安插在机场上的内线所作出的暗示的印证以后，便不动声色地同徐锦成交换了手中的小藤皮箱。由于他们两人所提的皮箱完全相同，他们的“调箱计”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徐锦成从戴笠手中接过装有戴氏常用的手枪、密电码本的皮箱以后，悄悄地向内线示意了一下，就把皮箱放在一旁，让他妥善处理。内线得到暗示，心领神会，就很随便地将那个皮箱归并到其他从飞机上取下来的行李之中，装上板车，由机场边门送了出去。

戴笠和徐锦成把足以使他们被羁押的证据藏匿起来以后，便若无其事地走向出口处，应付港警的检查。

港警满以为在戴笠随身携带的皮箱内能得到指控他的证据，可当着他的面打开皮箱一看，里面除了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他平时洗涤鼻子用的药水、器具外，别无他物。这使港警极为尴尬。尽管没能发现戴笠携带的违禁物品，但考虑到他不会无缘无故奔赴香港，而且事先已经得到了举报，香港警务处仍将他囚禁了两天。

戴笠至死也想不到，像他这样一个动辄可以捕人、杀人的混世魔王，竟然会成为阶下囚。因此，当港警查不出戴笠从事恐怖活动的确凿证据，向他说明事出误会，让其自由行动时，他坚决予以拒绝，要求香港总督说明扣押他的理由，以挽回他的面子。

香港政府并不理会戴笠的要求，但顾及到国民政府军令部和外交部分别就此向港英政府提出的严重交涉和抗议，便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由总督葛洪量亲自护送戴笠乘专机返回重庆，并就此事向国民党政府正式道歉，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自从那次在香港丢了面子以后，戴笠一直耿耿于怀，经常大骂英国人，以发泄他曾栽在英国人手下所产生的愤懑。

蒋伟国

日军杉坂少佐座机坠毁事件

1　941 年 12 月 1 日夜，侵华日军指挥部——“ 中国派遣军 ”总司令部向日本大本营报告了一个使人震惊的消息：本日日本设在中国的中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广州附近的中国军队防区坠落，搭乘该机的派遣军司令部的杉坂共之少佐携带了一份送交驻广州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的关于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绝密文件。这一消息使大本营受到极大冲击：如果中国军队得到这份文件，就会立即通知英美，英美得知日本开战意图，可能会抢先向日军大举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政府已决定同英美开战，将对东南亚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同时发起攻击。“ 中国派遣军 ”总司令部根据 11 月 25 日秘密下达的大陆令第 572 号，决定向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秘密下达关于进占香港的命令草案，并交付有关文件。原决定由总司令部的中吉孚参谋携带前往，因他出差误期，就改由去广州的参谋部的杉坂少佐携带，乘中华航空公司的上海——广州班机前往。他乘的“ 上海号 ”12 月 1 日早晨从上海起飞，经中途站台北，在经过汕头上空就失去了通迅联络。下午 5 时，“ 中国派遣军 ”总司令部得悉这一消息后，大为惊恐，参谋人员目瞪口呆，深感忧虑。因为命令中写有“ 开战开始时间定于确认南方军对马来亚方面登陆或空袭之后 ”，不仅暴露了日军要攻占香港，亦可判明对马来亚的奇袭登陆作战。如果文件落到同盟国手中，日军密谋发动先发制人的突袭作战的阴谋将彻底破产。因此日军紧张地搜寻探听文件的下落。

12 月 2 日，第二十三军派出飞机、船舰和地面部队在华南一带大规模搜寻，一无所获，监听中国方面通讯的机构也未获消息，而这时大本营发布了“ 开战日定为 12 月 8 日 ”命令，时间紧迫。

12 月 3 日晨，日军监听到了中国军队发往重庆的电报：大亚湾北方山岳地带发现一架日机坠落，但因天气恶劣，未发现遇难地点。

4 日晨，日军第二十五军已从三亚出发进攻马来亚，甚感紧张的日军义监听到了中国方面电报：已发现坠落日机，机身毁坏，机内 7 人死亡 3 人，击毙 4 人，正搜寻整理飞机散落物。日军据此判断：机身未燃烧，重要文件可能己落入中国军队之手。于是，“ 派遣军 ”致电参谋本部及南方军，指出有必要针对重要文件泄密采取相应措施。

4 日上午，日方监听到的电报内容为：所有收集物品及文件一并送交重庆，日军总司令部对此极为惶恐。晚上监听的电报给日军带来一线希望：“ 昨日深夜发现二人，估计为日本坠机乘客，但两人抵抗后逃遁，正极力搜索中 ”。日军估计可能其中有杉坂，他可能已将文件作了处理。

5 日监听到的中国电报内容为：发现一逃遁者并与之交战，敌挥刀勇猛抵抗已被击毙。日军总司令部推断此人为精通剑术的杉坂，且失事后生存了三天，估计既有时间又有地点处理文件，判明不会泄密，派遣军连夜报告大本营及通知南方军，各方面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有“ 神灵保佑 ”。

“ 上海号 ’失事后身负重伤的第十五航空通讯队的宫原大吉 12 月 5 日逃回淡水，也证实了带有作战重要文件和密码本等的杉坂及据判断持有交付第二十五军的大量密码本的第二十五军司令部久野虎平曹长脱离了现场，并已将密码烧毁。

12 月 7 日夜，饿得精疲力竭的久野曹长穿过中国军队防线，也逃回了淡

水，报告了曾与杉坂一起行动，杉坂已将作战命令作了处理，两人在 3 日夜与中国哨兵发生冲突时失散的情况。3 个小时后，日军对东南亚进攻开始了。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如果那件绝密文件为同盟国军队得到的话，太平洋战争史也许要改观了。

小金

宋子文同邱吉尔的争辩

1943 年，美英等国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召开会议，讨论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作战问题。中国作为二次大战反法西斯斗争的主要参战国也派宋子文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罗斯福、邱吉尔等人并不把中国代表放在眼里，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不通知宋子文。只是他们认为什么时候需要宋子文参加，才把他叫去，譬如“邀请”宋子文共进午餐，利用这个时间向他透露一些问题。对此，宋子文感到屈辱和不满。中国作为盟国，且是主要成员，理应平等地参加会议，然而美英却如此漠视中国的平等权利。宋子文曾为此提出抗议，但美英两国敷衍搪塞。

魁北克会议后，发表了“魁北克宣言”，可宋子文对罗（斯福）、邱（吉尔）在会议期间商谈的全部计划并不了解，他们只告诉宋子文，美英将转入对日作战，并实施对中国的有效援助。此时的蒋介石还在重庆坐等盟国出兵，等待中、美、英三国联合进攻在缅甸的日军，因为这个计划是三国在重庆商定好的。可等来等去，美英除了采取对香港和越南海防的日军基地进行一般性轰炸外，没有其它动静。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49_1.bmp}

1943 年 9 月，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法西斯三国轴心开始瓦解，欧洲战场有了新的进展，此时美英该履行诺言了吧，但他们又借口集中精力于欧洲战场和美国无法同时供给欧亚两个战场军用物资，单方面取消了原来商定的三国共同进攻在缅甸的日军的计划。当宋子文在后来的太平洋作战委员会议上向邱吉尔提出这个问题时，邱却装聋作哑，说什么他这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计划。气得宋子文大发脾气，与邱吉尔唇枪舌剑。除此而外，邱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也使宋子文极为愤慨。邱吉尔让中国人不浪费精力进军“独立”的西藏。宋子文反驳说，中国在西藏边境驻有很多士兵，是守而不是进攻这块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是中国的，而不是什么独立国家。邱吉尔自知理亏，又吞吞吐吐说中国对这个偏僻荒凉“国家”有宗主权，而英国对之不感兴趣。宋子文反驳说，如果西藏不那么偏僻荒凉，说不定英国早就对它感兴趣了。

宋子文在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上与邱吉尔激烈争辩使在场的人吃惊，因为宋子文在外交场合还未发过这么大的火气。会后，宋子文冷静下来，出于礼貌，向邱吉尔进行了解释，说如果自己的讲话有些鲁莽，那是因为事关国家存亡，是他的英语不够纯熟所致。邱吉尔也解释说，他恨自己不能说好中国话，如果他处在宋子文的地位，也会如此争论，当然要为中国说话。

宋子文虽然对邱吉尔进行了解释，但是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时，宋子文又激动起来，他再次提出三国联合进军收复缅甸问题，并且希望美英两国立即对侵入中国的日军发动空中攻势。然而美英，特别是英国除了强调欧洲战事外，还说丛林作战如何困难。澳大利亚外长支持宋子文的意见，说丛林战并非不可进行，在瓜达卡纳尔，日本人比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更为疟疾和痢疾所困扰。可是宋子文和澳外长的意见仍被会议主持者搪塞过去。宋子文在会下气愤地说：“美国人和英国人作为政治家，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搪塞起来八面玲珑，那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否则他们不会有今天。”

宋子文一方面继续说服美英进攻在缅甸的日军，一方面把美英赖帐的事电告蒋介石。蒋气得大骂美英“出尔反尔”、“欺人太甚”，他说邱吉尔是

“狡猾的狐狸”。

美英单方面撤销三国联合反攻驻缅甸日军的计划，激怒了蒋介石和宋子文，但眼下是有求于美英，所以蒋介石心里的火只好向国内僚属们发泄。宋子文因为是在国外直接同美英打交道，得罪他们不得，只好强压怒火，同美英周旋。

当宋子文从罗斯福处了解到中国将被列入四强，蒋介石作为四强之一的领袖将被邀请参加开罗会议的时候，这多少弥补了蒋宋因魁北克会议和美英单方面取消反攻缅甸日军计划引起的不快。

连若雪

（第 149 页为宋子文照片）

周作人的受审

报刊杂志一度对周作人的议论不少，或褒或贬，莫衷一是。笔者对周作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问题并无研究；只是因工作关系，接触了一些周作人的档案史料。觉得有必要就周作人的受审问题，说上几句，以供治文史者的参考。

周作人在“七·七”事变前，曾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联合大学（简称“联大”），一部分南迁昆明，一部分西迁西安。多数教职员随校离平，只有少数或老或病或家累重者除外。北大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冯祖荀、孟森、马裕藻。周作人亦以“系累太多”为由留平，拟以“卖文为生”。北大校长蒋梦麟特别委任他们四人为北大留平教授，负责留守北大，保管校产及图书，由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贴费 50 元。1937 年 9 月 26 日，周作人在给《宇宙凤》主编陶亢德复信中谈到他当时的情形：“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由于没有了薪资收入，周作人只得整天埋入八道湾的苦雨斋（周之书房名）里写他的小品，尝他的“苦茶”，作起“隐士”来。

然而，这位力图超脱社会生活、以“隐士”自居的知堂老人（周作人笔名知堂），却面临着严峻的历史考验。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53_1.bmp}

1937 年 7 月 30 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同年 12 月，日军卵翼下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汤尔和任伪教育部总长。汤尔和与周作人是浙江同乡，为此竭力援引周作人出山。1938 年 5 月，汤尔和请周作人任伪国立北京大学总监督，周作人知道此事干系非小，心内疑虑重重，虽经再三敦劝，未肯往就，无法，由汤尔和自兼。在沦陷后的北平，周作人“生活似颇窘”，为了维持他的排场大的生活，开始转为翻译希腊作品。从当时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找来译希腊神话的任务，“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1938 年 9 月，周作人又执教于私立燕京大学，任客座教授（编译委员会和燕京大学均为美国人办的机构，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人不予干涉），月薪一百元，直至 1938 年底止。

这时，发生了一件引起国人注意的事。1938 年 4 月 9 日，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据《大阪每日新闻》报道，周作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北平《文摘》19 期转译了《大阪每日新闻》的消息，载出了周作人讲话的内容。消息传出，全国震惊。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 18 位作家也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乎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我们觉得先生

此种行为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并对周作人提出忠告：“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消息传到国川，年迈的

陈独秀（陈与周作人有长期交往的历史，感情很深）动怒了，他愤慨地指出：“我还要说到我们的周作人先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尖指挥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中国的汉奸卖国贼领导之下高谈中国文化再生，这不能不是人类文化之奇耻大辱！因此我不能不为周作人先生惋惜，严格他说，应该是斥责而不是惋惜，虽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对此，周作人保持沉默，没有公开答复表明态度。

1939 年元旦，周作人于其苦雨斋中被一个自称是天津中日学院的青年学生开了一枪，枪弹为上衣钮扣所阻，皮肤擦伤，未中要害，但其车夫为救主而亡。该“元旦刺杀案件”一直未能破案，据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在受审时供称：因“行刺者戴了口罩，戴了帽子，认不得是谁”。“大概是日本人主使的”。周作人自遭不测后，大为震惊和恐慌。行刺事件发生后，“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员来住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没有了”。这对周作人是很大的威胁。周作人在后来受审时供认，行刺事件是他失足的一大原因。

终于，在“元旦刺杀案”发生 10 余天后，周作人接受了伪北京大学的任命，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这是周作人在伪组织任职的开始。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在伪政权的泥淖里越陷越深。

我们可以循着周作人下滑的轨迹，来看他是如何书写自己的这段历史的：1939 年 3 月 28 日，接受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职务。8 月，出任伪北大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9 月 3 日，参加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成为“东亚文化协议会”成员。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北平的伪临时政府解散，另设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该伪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总署督办。11 月，汤尔和病死，继任乏人，汤在临死前力荐周作人出任。1941 年 1 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又兼“剿共”委员会委员、新民总会委员。4 月，周作人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同年 10 月，兼任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11 月，去苏北视察治安强化运动，为确立日伪治安效力。1942 年 4 月，出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5 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随同汪精卫赴满访问，在新京（长春），同汪精卫拜会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主席溥仪。同月，往南京，庆祝汪精卫六十大寿。9 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任评议会主席。12 月，出任伪华北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副统监，并以副统监身份，穿着日本式军装，戴着日本式帽子，陪同正统监王揖唐一起主持检阅了在北平天安门的所谓“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1943 年 2 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周作人被排挤，卸去伪常务委员及伪教育总署督办之职，改任普通委员。6 月，被日伪任命为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协助日本侵略者调查研究华北资源和乡村出产。1944 年 5 月，兼任伪《华北新报》理事及伪报道协会理事，发行有利敌伪之宣传报纸。同年 12 月，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实施沟通中日文化。另外，还曾任安清道义总会顾问。周作人所任伪职一直至日本投降，伪组织解体为止。

在敌伪期间，周作人作为各种伪刊的长期撰稿人，写下了大量的散文、

文章，出过不少集子，发表了不少言论。他这时的散文，除少量回忆文章外，大量的是抄录旧书，有些则是美化汉奸政权和侵略者、宣传“东亚共荣”的。他在 1941 年 5 月为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编的《日本的孔子圣朝》一书写序时说：“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严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这同侵略者所要建立的“王道乐土”的谎言完全是一个腔调了。周作人还曾在日华协会成立会上发表谈话，称“此次成立日华协会必能予两国亲善提携有所贡献”。又称“日华协会自将本诸大东亚宣言之旨趣，促进两国文化交流”。1941 年 7 月 17 日，周作人在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以《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为题作了演讲，鼓吹“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为汪伪政权开展“治安强化运动”推波助澜。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称赞周作人：“近常来日，努力于日华文化之沟通，实可称日华文化上不可缺少之大关键。”

周作人虽然干得十分卖力，亦步亦趋，但主子们有时并不满意，对他渐感失望。其间，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943 年秋间，日本为统制亚洲文化，在东京举行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会上，日内阁思想文化统制机关——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提出了“扫荡中国老作家”的议案，攻击一名老作家以“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人之思想表示敌对”，“为大东亚建设思想之敌人”。这个“中国老作家”虽未明白指出是谁，但其后证明即指周作人。周作人感到很委屈，不明所以，曾陆续发表《一封信》、《关于老作家》、《文坛之分化》进行辩解。片冈铁兵在一次复信中挑明了使其触怒的原因：“请您想起在《改造文艺》杂志所登载的大作《中国之思想问题》中之一节。原文云：“他们（中国人）要求生存，他们生存的道德不想损人以利己，可是也不能像圣人那样损己以利人。云云”。“当时鄙人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发表那篇演说，即有此文在鄙人胸中。只以此奉告，该文作者的先生当能立即觉到鄙人以何者为问题，为何种所刺激矣”。《中国的思想问题》是周作人在 1942 年 5 月在南京中央大学的演讲稿，载 1943 年 1 月 1 日《中和月刊》，后收《药堂杂文》。此文是日伪时期周作人集中谈论中国思想政治问题的重要文章。在此文中，周作人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中国国民固有中心思想，乃是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儒家思想。因文章不合于侵略者“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的拍子，故遭到了日本军御用文人片冈铁兵的斥责。此事成为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在受审时反复为自己辩护的一大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肃奸运动”开始，国民党军统局奉命逮捕汉奸。10 月 6 日，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指示军统局长戴笠立即逮捕华北地区高级汉奸。戴当日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并即刻解往炮局监狱。周作人亦在此列。次年 5 月 26 日，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站到了被告席上。6 月 17 日，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对周作人提起公诉。1946 年 11 月 16 日，首都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判决书在认定周作人犯罪事实和判决理由后指出：“被告在各大学执教历有年所，我国人受其熏陶者不知凡几；又有相当学识，过去著作不少，我国人对其景慕

者亦不知凡几。居领导民众之地位，负最高学府教育之重任，宜如何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乃竟意志薄弱，一经遇刺，即变节附逆，觍颜事敌，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综合各种情状，应予减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褫夺公权十年，以维法纪而昭平允。”

周作人在受审时和在亲笔所具的自白书中，对历任本兼各伪职皆供承不讳，但对法官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很不服气，除一再上书法院为自己辩解，希望法院“赐明鉴，宣布无罪”外，还搜集有利于他的证据，以达到免刑或减刑的目的。这与周作人在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中表白他对自己出任伪职主张“不辩解主义”相去甚远。

周作人在法庭上和辩诉状中为自己的辩解，以及别人（诸如前北平诸教授沈兼士、董洗凡、俞平伯、英千里、杨永芳（系周之女婿），还有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后任校长胡适等）替他的辩解和证明，无非是说他与已故冯祖荀、孟森、马裕藻三人是奉前北大蒋校长之命共同留平，保管校产的，初拟卖文为生，后因环境恶劣，在家遇刺，大受威胁，加上汤尔和再三怂恿，才被迫出任伪职。又说他在国家存亡绝续之秋，必须有人冒犯不韪，共为维持；说他参加伪组织的动机完全在于维护教育，抵抗奴化，并不是恋慕做官；说他历任伪职，并非特意钻营而来，都是他人所强迫，即如日满之行，亦为强迫而去，只在观光；说他在任伪职期间，忍辱冒死，虚与委蛇，保全了北大等校的图书仪器，使北大文化机关各种设备有增无减；说他曾发表论文论中国的中心思想问题，是为民族求生存的，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言论，以至被日本一个军国主义文人斥为“特殊之文学敌人”、“反动者作家”；说他曾营救和掩护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及教育方面工作人员许多人；说他在伪职期间因违抗敌寇政策，险遭敌宪兵队逮捕；说他虽在伪组织服务，但自始至终洁身自好，迹无贪污，行元恶据，亦无反抗本国之图谋，合于蒋介石对伪职人员“只问行为，不问职守”的“明训”，故不能认定他有汉奸罪。总而言之，在伪职期间的所作所为，要么有利于抗战，要么话是违心讲的，事是违心干的，通通是不得已而为之。

周作人的选任辩护律师为王龙。王龙是周作人的同学，“因念同学之谊，出为义务辩护，嫌怨不辞”。王龙曾写了《知堂之狱》一文为周作人辩护。他称周作人以汉奸罪嫌解京受鞫后，亲友多不敢顾，文人多讥之，幸赖他不识时宜，披沥肝胆，相濡以沫，力陈其冤。王龙的辩护是赤裸裸的，大意是：有一年大盗来了，老周受命护园，忍辱负重，后强盗退了，“这时左右一般太平者归来，三头六臂，聪明伶俐，趋吉避凶，打落水狗的人们，七嘴八舌的说‘老周不是好人……他是通敌，他是奸细，他应当吃官司’，大家听了，谁也不敢多嘴说不是，恐怕血口喷人，惹祸上身。”这同周作人为秦桧翻案的论调如出一辙。周作人曾在《苦茶随笔·关于英雄崇拜》中说：“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骂秦桧，称翁同龢、刘永福而痛骂李鸿章，皆是也。”一个人为虎作伥，觍颜事敌，而能心安理得，靠的就是给自己的丑行找出“人情法理”上的所谓根据，不但据以保持心理平衡，还能在人前振振有词，一句活，自我感觉良好。这就无怪乎周作人要翻岳飞和秦桧的案了。那种一边明知干的是卑劣的勾当，一边又找出种种理由来粉饰那卑劣，自欺欺人的人，历史上也不乏其人，也就无怪乎有人要为周作人辩护、翻案了。王龙最后恳请法院

看在周作人“生平恬淡无竞，开文艺之先河，明儒者之正统”的份上，“为国惜才，放归山阴故里，俾得从容著作，恭颂天下太平”。

周作人在高等法院判决后曾向最高法院递呈声请状表示：“被告并未负原判决所谓‘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正气’之深期厚望。虽任伪职，并无罪行，既非通谋敌国，亦未反抗本国，在法律上自不应负汉奸罪责。即退一万步言，原判对所举有利抗战之事实，即予采信，适用减刑之规定，而对于六十三岁投老残年之被告，减处徒刑十四年，似与无期徒刑无可差异，量刑未免过重，画饼岂能充饥”，故对法院判决实难甘服。

最高法院受理了周作人汉奸案，认定周作人应负汉奸罪责自无疑义。法庭对周作人为自己辩解的种种理由一一进行了反驳，调查证明，周作人在伪职任内聘用日本人为教授，改编我国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等均有充分表现，有言论、有行动可证。而对于周作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的罪责。法庭认为原审以被告在伪职期内保存校产、图书及营救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经多方证明属实，已作了减轻判处，与《处理汉奸条例》有关规定相当，并无不合。只是被告虽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所以最高法院于 1947 年 12 月 19 日对周作人汉奸一案进行了复判，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一直到 1949 年 1 月，才被交保释放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给他改造自新的机会。他一直住在北京八道湾老家，在这里度过了晚年，于 1967 年 5 月 7 日去世。

周红

（第 153 页照片中手拿礼帽者为周作人）

陈璧君受审记

1959 年 6 月 17 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一个年近 7 旬的女囚在病榻上躺了三个多月后，终于停止了呼吸。守候在旁的护士按照惯例，在她的尸体上蒙上了白布，神色庄重的医生则在死亡报告上填上她的名字：陈璧君。

陈璧君，汪精卫的老婆！一个为中国人民熟悉而又愤恨的名字！这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是怎样被囚进铁窗的？本文将简略地予以介绍。

助汪投敌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加紧与日本政府的勾搭，陈璧君是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得力助手。

1938 年 11 月中旬，汪精卫派梅思平等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军部代表秘密会谈，就汪精卫叛国投敌问题达成协议。当汪精卫召集同党讨论如何下一步行动时，陈璧君力主逃出重庆，建立伪政权。

汪伪国民政府建立后，陈璧君任伪中央监察委员之职。后又以伪“广东政治指导员”的特殊头衔，往来于南京、广东之间，成为广东的太上皇。同时，她对南京伪中央政府的事务也要过问，对人事安排尤感兴趣。伪府中不少人深谙其中奥妙，纷纷投靠她的门下，她对这些人也尽量拉拢利用。于是，以“汪夫人”为核心的“公馆派”或“夫人派”的政治派别就在南京伪政府中出现，其地位与“汪夫人”在南京伪政府中的显赫权势成正比。

1944 年冬，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后，陈璧君因丈夫死亡而失去了原先的地位。世态炎凉，汪公馆门前也车马渐稀。陈璧君于是带着一批亲信返回广东，她想凭藉其妹婿褚民谊伪省长的地位继续称霸广东。

被诱入狱

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广东，陈璧君惊慌失措，她找褚民谊商量后事，褚还故作镇静。次日，陈公博又从南京打电话给褚民谊，告诉他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和平运动”已完成，应自行解散，他才感到大事不妙。15 日，日本天皇正式下诏无条件投降。褚民谊和陈璧君此时已陷入绝望之中。

8 月 20 日，自称是军统局驻粤负责人的郑介民突然出现在褚民谊的住宅，他除表明身份外，还向褚民谊谈了国民党军队开抵广东前的社会治安问题。第二天，郑介民又登门拜访，谈的是关于褚民谊个人的前景问题，称他的问题需要到重庆去才能解决。第三天，郑介民又赴褚宅，取出重庆来电，交褚过目，电文如下：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65_1.bmp}

“重行兄：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

重行是褚民谊的字。电报上附有密码，看不出伪造之迹，褚民谊对此深信不疑。郑介民还说，他得到重庆方面的另一电文，知专机后天即可到达，望他转告陈璧君早日作好准备。此时的陈璧君一直处于焦躁不安之中，她从

褚民谊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如重庆方面能派专机来接，当即首途。他俩还准备刚上市的洋桃两筐，一筐由褚民谊送给吴稚晖，一筐由陈璧君送给蒋夫人宋美龄。过了三天，郑介民才来通知，说飞机业已抵穗，希望立即动身。陈璧君、褚民谊及随员于是日下午 3 时，齐集于原伪省长官邸，准备出发。

郑介民调来十余辆汽车，宣布每辆汽车只能乘坐 2 人，其余座位由军统陪送人员乘坐。陈璧君心中有疑，但设想到坏处去。车行后，陈璧君发现汽车未向白云机场方向驶行，却朝珠江方向疾驶，就问陪送人员何故，陪送人员托词说，来的是水上飞机，所以要至珠江上船过渡。

车行珠江大桥边，有两艘小汽艇在码头停候，一艘已载满军统人员。陈璧君等相继上船后，郑介民向她表示，他有事留穗，不能去重庆，并介绍另一名军统负责人相见。说完，他就乘汽车走了。

汽艇启行后，那个军统负责人就宣布：在飞机上不能携带武器，如有，必须交出。5 分钟后，他又取出一份电报，宣读道：“蒋委员长现因公赴西安，四五日内不能回渝，陈璧君等一行，此时来渝，殊多不便，应先在穗移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褚民谊此时已知中了郑介民设置的圈套，但他沉默无声，而脾气暴烈的陈璧君再也忍不住了。她站起来拍桌大吼道：“既是老蒋不在重庆，我就没有去的必要。若论安全，我自己的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她坚持要船开回原处，送她回家。军统人员见她发怒，也向她解释，说是奉命办理，请她原谅。褚民谊深知再闹也没有用了，婉言劝她，要她暂时忍耐一下，以观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经众人劝说，陈璧君虽不再坚持开回原处，但一路上仍大吵大闹，军统人员对她也毫无办法。

汽艇开到市桥，军统人员又要他们改乘小船。这时，事情已经更明显了。陈璧君怒冲冲他说：“我决不下小船去，再听你们的摆布。除非你们用枪打死我。”军统人员见状提起手枪，从四面环视着她，形势很紧张，但陈璧君毫不畏缩，还像平常一样，瞪着眼睛说：“老蒋都知道我的脾气，你们是什么东西！”

褚民谊知道这样闹下去没有好处，就劝她说，如果重庆方面存心要为难的话，我们只能听天由命。这些人是奉命办事，与他们争吵，也不会有什么用。陈璧君想想他的话也有道理，才勉强上了小船。小船开了一会，到了李辅群住宅。李宅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屋，已被军统接管，作为临时看守所，有十余个士兵手提卡宾枪守卫。

陈璧君一行，被关在二楼，指定 2 人合住一房。陈与女佣住在一处，褚民谊另住两间。看守人员告诉他们：除不准下楼外，可以自由行动，如需饮食用品，可通知他们办理。每人床上蚊帐、毛毯、凉席等也一应齐全。生活安排尚可以，但他们心里都不安，惟以下棋、看书来消磨时光。

10 月 12 日，看守通知他们重回广州。出门后，每一人被送上一辆汽车，两面有武装士兵夹持，己完全是押解的形式。汽车一直开到法政路附近一幢原日本军官的住宅，在那里，每人住一间房，待遇很坏，己远不如市桥，但看守人员的态度尚好。

在广州被幽禁了半个月后，一个姓徐的军统代表告诉她，不日将送往南京解决，陈璧君当即说：“我有受死的勇气，但决无坐监的耐性。”那人一再解释：“将来一定用政治手段解决，不会付司法审判的，请暂时委曲一下，

为时也不会太久了。”

11 月初，军统人员先把各人身边的贵重物品，包括手表、钢笔等全部收缴，再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把陈璧君等押往南京。此时，陈璧君正式开始了她的铁窗生涯。

羁禁南京

沪宁地区的汪伪汉奸，大多被羁禁在南京和上海两地。在上海，先关在军统的楚园与南市看守所，后集中到提篮桥监狱；在南京，则由宁海路 25 号而改送老虎桥监狱。

陈璧君被羁禁在宁海路 25 号。

宁海路 25 号，位于南京城北住宅区，原是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的住宅。汪伪时，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南京站。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军统接收，改为看守所。

宁海路看守所内分前后院，前院较大，后院较小，陈璧君、褚民谊是这里的第一批“客人”。首任看守长是原任汪伪行政院庶务科科长的徐文棋。当陈璧君等被押解到看守所时，徐文棋临场监视，一个与陈璧君同时被关进看守所的汪伪汉奸见到他，以为他也被押解来了，用惋惜的口吻对他说：“老徐，你怎么倒先来了？”徐文棋听了尴尬得无地自容，只得说：“我们不谈这些。”

陈璧君等刚关进宁海路 25 号时，受到看守所的优待。一日三餐，都由外面的酒家负责供应，下午还供有茶点。他们住的房间也不上锁，行动很自由。但一个多月后，在南京陆续被捕的伪内政部长梅恩平、伪蒙藏委员长岑德广、伪南京市长周学昌及李讴一等；在日本被押回的陈公博、陈君慧、林柏生、何炳贤等陆续解到后，待遇就逐渐降低，除陈公博一人独处一个房间外，伪部长级的二三个人住一间房，次长与司长级的七八个住一间房。伙食也变得很差，一度曾用黑面粉制成面疙瘩作囚粮，汉奸们称为“原子弹”。房门也加锁，而且终日不开放。但是，由于陈璧君患心脏病、高血压等症，且体胖，看守所破例同意她的要求，让其子女陪伴，并由她选择二三人与她同禁。陈璧君又提出在她居住的二楼，除将进出的楼梯口大门锁住外，其他各个房间不上锁，也得到看守所的批准。但看守所要她出面约束各人，无事不得走出自己的居室，有事可掀铃叫看守。陈璧君在自己的囚房里，以静坐休息为多，即使每天半小时放风，也不参加。

苏州公审

当陈璧君等汉奸被羁禁在南京宁海路 25 号看守所时，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先后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1 条和《惩治汉奸条例》16 条，对汉奸的量刑作了具体规定，其中犯有下列罪行的汉奸将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一）图谋反抗本国者；（二）图谋扰乱治安者；（三）招募军队或其他军用人工役夫者；（四）供给、贩卖或为购办、运输军用品，或制造军械弹药之原料者；（五）供给、贩卖或为购办、运输谷米、麦、面、杂粮或其他可充食之物品者；（六）供给金钱资产者；（七）泄漏、传递、侦察或盗窃有关军事、政治、经济之消息、文书、图书或物品者；（八）充任向

导或其他有关军事之职役者；（九）阻碍公务员执行职务者；（十）扰乱金融者；（十一）破坏交通、通讯或军事上之工事或封锁者；（十二）于饮食水品中投放毒物者；（十二）煽惑军人、公务员或人民逃叛通敌者。关于汉奸财产，《条例》规定，对图谋反抗本国的汉奸，没收其财产，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

1946 年 2 月的一个午夜，根据国民党政府关于被拘汉奸一律移送各地高等法院审判的决定，陈璧君等人从南京被移解到苏州看守所。

3 月 28 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起诉陈璧君，内容为：

“……被告陈璧君，系已故汪逆兆铭之妻，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日战争发生后，随同汪逆前往重庆。民国 27 年秋间，汪逆勾结日酋近卫文磨秘密言和，被告参与谋议。是年 12 月，被告与汪逆潜离重庆，先至河内，派陈逆公博至香港发表艳电，响应近卫主张之和平三原则，旋与汪逆由河内至香港转往上海，至 29 年一月间，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公然反抗中央。其时汪逆任主席，被告任伪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终汪逆之身，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之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观于其但用‘明’（指汪逆兆铭）‘崖’（指被告）密电字样，为与各方面通信暗号，是其与汪逆并肩主政，把握实权，声势煊赫，至为明显。即至汪逆已死，陈逆公博继任伪主席时，被告以一未亡人之身，尤复往来京、沪、粤、汉等地，谬倡全面和平之说，以欺骗民众，献媚敌人，更密布特工机构，惨害地下工作同志，使我数千年文化之古国，沦于倭夷而不知耻，卖国求荣，至死不悟，其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实属无可宥恕。……”

4 月 16 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陈璧君。因她平素做岸，人们都想看她被审讯时的狼狈状，因此未等开庭，庭内已座无虚席。陈璧君此时虽说是个阶下囚，但她总以为自己资格老，是国民党内的有功之臣，因此出庭时身穿一件黑色旗袍，架着一副细边的眼镜，态度仍很骄蹇。在法庭上，她时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一些所作所为，时而讥嘲法官，甚至大闹法庭，破口大骂蒋介石。说也奇怪，当她骂完这些话后，旁听席上竟发出一片笑声，响起一阵掌声，这笑声和掌声，反映了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然而陈璧君还以为这是人们对她的同情，因此她在接下去的发言中，不但不承认自己的卖国行径，而且还厚颜无耻地为汪精卫辩护：“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汪政权统治下的地区是中国的沦陷区，也是日本的占领区，并无一寸之上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日本攻粤，广州高级长官闻风先逃，几曾尽过守土之责，我们赤手把沦陷区收回，而又以赤手治理之，试问我们收回后怎样能交还重庆，重庆又怎样能来接受？”对此，听众嗤之以鼻，报以嘘声。

4 月 22 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对此，陈璧君表示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提出上诉，因为她明白“上诉的结果，必然还是与初审一样”。此外她还强硬地表示没有坐牢的耐性，而有受死的勇气。

陈璧君虽不想上诉，但她的女儿汪文恂认为法院判得太重，仍聘请律师向最高法院声请复判。5 月 21 日，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刑事二庭作出两份判决：第一，核准江苏高等法院 4 月 22 日所作的判决。第二，驳回汪文恂的声请，理由是“违背法律上之程式”，“从程序上予以驳回”。

陈璧君被判决后，关在狮子口监狱内执行。在她被判决后不久，陈公博、褚民谊等大汉奸先后在狱中刑场被执行死刑，不免使她有免死狐悲之伤感。6

月 3 日，陈公博首先被枪决。临刑前，他换了身干净衣服，取了一把小茶壶，双手捧着，面容严肃地向陈壁君的囚房走去。他对陈壁君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做纪念吧！”当陈公博伸手向她握别时，陈壁君纵声痛哭！两个多月后，褚民谊也在狱中被枪决，刑前，陈壁君也向他哭别。至此，陈壁君才真切地体会到末日降临的滋味。这时，她心脏病发作，一夜中曾昏绝三次。

被囚终身

1949 年初春，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狼狈南逃，它对关在狱中的汪伪汉奸作出一项特殊的决定：除已执行死刑者外，凡被处无期徒刑以下者一律释放！判处无期徒刑的，则继续羁禁。

4 月 27 日，苏州解放，陈壁君从狮子口监狱移禁公安局看守所。上海解放后，陈壁君又从苏州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

陈壁君刚入提篮桥监狱时，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很深的抵触情绪，对过去的罪行根本就不予承认，认为仅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已。监狱中的管教干部对她进行热情的挽救和教育，使她这个以做岸出名的人，认识上有了些变化。她在狱中用半通不通的句子写道：

“我初到此处监禁之时，自己一些都不认识自己的错误，非常不平，以为是政治上的成败。及后，我看了些书后，渐渐认识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便心中气和，后来竟大彻大悟，知道一切的道理。及得读《解放日报》后，加以深深的学习，不但气平，而且羞愧。其后另一朋友，更送我许多进步的书籍、小说、杂志、活叶文选，更学习了《列宁主义问题》后，便如盲目者忽得光明。不但对于以错误见解所做成之点，明若掌上现文，他日幸而改造成功时，重复工作之道路、途径，亦得深刻认识，及努力的去了解，往往思想斗争，至深夜不能睡。加之接受监中之教育之后，更加了然。”

1955 年 7 月，她在一份自白中又说：“我少子来接见我，给了数本书，女监也每早九时送报纸给我，后来便求得自己订一份《解放日报》，我很用心的从它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我便渐渐信服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正确理论和用心了。尤其是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下来。日日的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完全了解了。有一个姓龙的朋友送了现在这一大批书给我，我便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

陈壁君入提篮桥监狱后，身体很虚弱，心脏病、高血压严重，头痛、头晕、腰痛、失眠等症加剧，监狱及时对她进行医治，病重时送入监狱医院治疗，1959 年 3 月，陈璧君病情十分严重，再次送入医院，但因病魔缠身多年，心力衰竭，缠绵三个月后，死于监狱医院。由于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一远房亲戚收殓火化，骨灰送抵广州。次年，由其在港的子女派人到广州认领。

晓菲

（第 165 页为陈壁君照片）

巨奸陈公博伏法记

1946 年 6 月 3 日，星期一，黎明之前的零点 12 分。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在官邸里，一面与属员商谈公事，一面在等待着上面的指示。正在这时，机要处送来了刚刚收到的蒋介石侍从室的通知：

“京特复第一二九号秘密迅速执行！”

谢冠生阅罢通知，立即从座椅上霍然而起，拨通电话，通知在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于当日上午将关押在苏州监狱中的“第一二九号”迅速、秘密执行处决。接着，他又派其机要秘书携带司法行政部的执行令、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书以及谢冠生的一封亲笔信，连夜赶往苏州，面呈江苏高院院长。

位处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接讯后，立即紧张地忙碌开了。

这天要被执行处决的，就是汪伪降日叛国集团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

陈公博，1892 年 10 月 19 日生于广州城中一个官绅家庭。青年时在其父陈志美影响下，走上反清革命道路。1917 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1 年 7 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不久就脱党，去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25 年回到广州，加入中国国民党，投入汪精卫门下，很快飞黄腾达，成为汪派的核心成员。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陈公博先随汪精卫反蒋，组织“改组派”；后随着蒋、汪合作，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陈公博出任实业部长。抗战军兴，陈调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938 年 12 月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随之下水，在汪伪汉奸政府中先后充任立法院长、上海市长等重要伪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1944 年 11 月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任伪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头号汉奸。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75_1.bmp}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南京伪政府乱成一团。为逃避国家惩罚,陈公博于 8 月 25 日携妻子李励庄、秘书莫国康及大汉奸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库、何炳贤共 7 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乘飞机从南京逃到日本亡命，历时一个多月。终因国内掀起严惩汉好的热潮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再要求，10 月 3 日陈公博一行被送回南京，立即被捕。

陈公博先被关押在南京城南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旋又转移至宁海路 25 号的军统局临时看守所，开始过他的“楚囚”生活：每日下午倒便桶，陈公博与众囚犯挤在一道，感到有失面子，就向卫兵司令请求，说他曾任国府代主席，希望给他一点面子，准许他每日提前或延后单独倒便桶。此项要求获得批准。陈公博又感到看守所饭菜太差，难以下咽，要求改善，他说：“到绑赴刑场枪毙时，肥肥胖胖像个样子。”此项要求却没有获准。在看守所的几个月中，陈公博没有被提审过，只是每日伏案书写《八年来的回忆》，长达 30000 字，竭力为自己与汪伪集团辩护。在这期间，军统局长戴笠曾亲来探视，与陈公博密谈了两小时之久。戴笠许诺将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他的问题，使陈公博一度似乎看到了生机页喜形于色。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国要求严惩汉奸的怒潮不断高涨，戴笠又于 1946 年 3 月坠机身亡，陈公博的幻想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1946 年 3 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三人被押送到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4 月 5 日下午，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判陈公博。首席检察官韩焘宣读了起诉书，洋洋

万言，列出了陈公博的十大罪状，主要是：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在检察官读完起诉书后，陈公博当庭逐条进行了辩护。他竟然指责起诉书“不是割裂事实，就是摭拾谣言。并且文字间很多是徒快口舌的文章，而不是根据事实的起诉。”然后他宣读自己的《八年来的回忆》，历时 2 小时之久。

不管陈公博怎样巧言诡辩，最终逃不脱历史惩罚。1946 年 4 月 26 日下午 4 点，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审判长孙鸿霖宣读判决书：“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没收。”陈公博知道这是蒋介石定了的事，申请复判无济于事，表示不再上诉。但陈妻李励庄还不死心，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果然，到了 5 月 14 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法庭驳回了李励庄的上诉，核准了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到 6 月 1 日，司法行政部也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6 月 2 日，陈公博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

6 月 3 日上午 6 点 30 分左右，谢冠生的机要秘书风尘仆仆地从南京赶到了苏州，踏进了江苏高等法院院长室，送来了对陈公博立即执行死刑的各种文书。院长立即通知监狱典狱长迅速安排临时法庭，布置刑场、警备等等事宜。

几名法警来到牢房提人，陈公博一见这阵势立即就明白：死神已经降临。他整了整衣冠，取了一把自己用的茶壶，来到陈壁君的羁囚之处，送给她留作纪念，并向陈壁君鞠躬告别说：“我先随汪先生去了。”陈壁君失声大哭。

陈公博来到刑场前，先写遗书。一封给家属，一封给蒋介石。但给蒋信只写了一半，陈公博突然决定不写了。于是，历史上便留下了一封陈公博未完成的致蒋书。

约在上午 8 点半钟，陈公博来到监狱刑场旁刚设的临时法庭上。法官循例问了问陈公博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接着宣读死刑执行书：

“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三十五年度京特复第一二九号，……爰依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宣读完毕，法官问：“陈公博，你有什么话要说？”

陈答：“我给蒋主席的一封信，只写了三分之一。”

“可否在一小时内续成？”

“现在嘛，不必了！”

“你有多少动产不动产？”

“你们可以调查。”

“你有什么要求？”

“茶杯一只，系兆铭兄（指汪精卫）所赠；一等旭日大缓章一枚，系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均在我床上，要求随葬……”询问完毕，陈公博起身向刑场正中走去。他回头对执行枪决的法警央求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陈走到指定的位置上，面东而立，双手整了一下士林布长衫，然后向左转，朝北立正，说：“好，请吧！”法警举起盒子枪，对准陈的后脑打去。枪声响过，陈公博立时俯倒在地，混身痉挛，一股脏血从右眼流出，几

分钟后，气绝身亡。

这时是上午 8 时 40 分。时当 6 月，天气炎热，陈公博毙命后仅一天，尸体即已发臭。当即由陈在苏州的一位亲戚将陈尸体送往苏州殡仪馆匆匆入殓。后移葬上海公墓，连墓碑也未敢树立。这就是大汉奸陈公博的下场。

经盛鸿

（第 175 页为陈公博照片）

蒋介石为什么不杀周佛海

作为国民党中央主管宣传的副部长周佛海，于 1938 年 12 月公然叛逃投敌。他在成为汉奸以后，同蒋介石的重庆政权仍藕断丝连，甚至帮蒋介石作了许多别人无法代替的重要工作。曾任军统局南京站站长的周镐，1942 年底，曾奉命携电台至上海，为建立蒋介石和周佛海的联系，架设一部秘密电台。在此之前，周佛海在其住宅西流湾 8 号，就设有一架与重庆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只是由于日本人有所察觉，周遂连住宅一起，付之一炬。周的此举不仅消除了日本人的怀疑，且颇得重庆方面的赞赏。以后周镐建立电台，只是恢复蒋介石与周佛海的联系而已。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周佛海和重庆国民党方面的关系。李士群是汪伪上海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一号人物，戴笠多次想拉拢他，都未成功。于是，在 1943 年夏，重庆方面动了杀机，决心除掉李。戴笠选中了周佛海作为执行人。周佛海平时虽与李士群有矛盾，本人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物，但是，接到重庆方面的这一指示时，也吓得手脚发软。周佛海经过权衡，还是不敢不顺从蒋介石的意旨。周巧妙地利用了日本人与李士群之间的矛盾，借刀杀人，终于达到了目的。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在各主要交通线和战略经济要地，国共之间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此时，被戴笠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长的周佛海，死心塌地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利用手中掌握的武装，抵抗新四军对失地的收复。在上海外围，一度发生了不少战斗。这些抵抗，为蒋介石赢得了时间和主动，使蒋完整地接管了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80_1.bmp}

周佛海为蒋介石立下的功劳，蒋介石是心中有数的。但是，周佛海当年追随汪精卫出逃，蒋记忆犹新，余恨未解。蒋介石对于周佛海这样一个于己有仇有恩的复杂特殊的汪伪头目，就必须有一个跟惩处其他大汉奸不同的特殊处理办法了。周佛海的移交工作一结束，戴笠马上把他弄到重庆藏了起来。尽管与外界隔绝，但礼遇有加，不仅吃喝玩乐不成问题，还允许带副官、护士、保姆、家属；读报（包括《新华日报》在内的所有报纸）、听广播也不受限制；生了病则被送入当时西南设备最好的军统“四一”医院治疗。一年以后，也就是陈公博、褚民谊等大汉奸被公审枪决以后，审判汉奸的风潮过去得差不多了，周佛海才被送回南京，走过场式地进行了审理。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81_1.bmp}

1946 年 11 月 7 日，首都高等法院以周佛海“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周佛海及其妻杨淑慧不服，要求再审，最高法院于 1947 年 1 月 20 日作出“原判决核准”的裁定，人人皆以为周佛海必死。谁知 2 月 23 日蒋介石突然致电司法行政部：“关于汉奸犯周佛海判处死刑一案。查该犯早经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戴故局长笠呈请前来时，曾令其奉谕转告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该犯似可免予一死，可否改判，即希由司法院核办可也”（据审判周佛海档案）。国民政府遂于 3 月 27 日明令改判为无期徒刑。收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这时，周佛海已身患重病，没几天活了。杨淑慧多方为他奔走求情，想保周佛海狱外就医，但没有蒋介石的首肯，谁也不敢松

口。

为什么蒋介石对周佛海的处理，前后会如此不同呢？其中是有奥妙的。一年前周佛海在秘密软禁的情况下，蒋介石给他的优待，这是对周为自己效劳的报偿。如今在公开的情况下，众目睽睽，蒋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包庇一个汉奸呢？况且，使周佛海处于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不失为蒋介石对于周当年背叛自己行为的一种惩罚。

1948 年 2 月，52 岁的周佛海病死狱中。

敖瑜徐豫

（第 180 页为周佛海被押送法庭受审照片；
第 181 页为司法行政部转蒋介石关于周
佛海可免死刑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外

法庭终于开庭

一次大战结束不久的东京，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在废墟——的包围中，名叫市谷高地的一座小山上，一幢侥幸躲过了美军燃烧弹的庞大建筑孑然孤立，尤为醒目。这里原属陆军士官学校，二次大战中，被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用作礼堂。经几个月按美国建筑样式修整，已焕然一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持续两年半，开庭 818 次的东京审判，即将在此处举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昔日策划侵略战争的所在，如今成了清算战争罪犯的场所。

这幢建筑的大门前，有一座假山。假山上一株业已枯萎的松树上，钉着一块褐色木牌，两行黑色的英文告诉世人：“ 这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

1946 年 5 月 3 日上午 8 点 42 分，一辆深土黄色的大型军用客车，和一前一后两辆白色吉普车停在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门前。20 多名美、英、澳、中、日等国的记者已在此等待多时。前面一辆吉普车的门开了，走出一位美军中校，他是法庭宪兵队长 A · S · 坎沃奇，这位中校对记者们交待了几句。8 点 50 分，中间大客车的门开启。第一个走下车的人穿着一身战时日本“ 国服 ”——“ 国民服 ”，胡须全白，他是南次郎大将。第二人眼眶深陷，他是曾任外相、首相的广田弘毅。日本特务头子、穿一身西装的土肥原贤二第四个走下车来。第八人瘦小、干瘪，他即是南京大屠杀时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很大将。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人拄拐棍，着西装，他名叫重光葵，担任过外相。隔了两个人，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脸上露出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的矮老头，此人便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眼睛不停地巴眨巴眨的贺屋兴宣（前藏相）走在最后。他们走得很慢，相互间保持 1 米左右的距离。坎沃奇中校要求他们以这样的速度和队形走进法庭，以便于记者们摄下这 26 人各自的“ 尊容 ”（开庭第一天上午，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大郎尚未押到，下午才坐上被告席）。当走在末尾的贺屋兴宣走进法庭大门后，厚厚的玻璃门随即关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期两年半的审判，从此拉开帷幕。被作为甲级战犯审判的，有东条英机等 28 人。

法庭内，高高的审判席上，坐着苏联、美国、中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等国的 11 位法官。中国的法官梅汝璈博士（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理主席），坐在庭长、澳大利亚人韦伯的左侧。美国的法官坐在韦伯的右侧。各位法官的身后分别悬挂着各自国家的国旗。法官席的前面，是稍低的公诉方代表席、辩护方代表席。大厅另一面，跟法官席相对，是两排长椅。前排坐着东条、土肥原等被告，后排坐着松井石根、重光葵等被告。他们身后站着戴白头盔的美国宪兵。法庭还设有 200 个记者席位，以及数百个来宾席、旁听席。

预定上午 10 点开幕，可能因讨论辩护团的抗辩书，延至 11 点 17 分法庭执行官庞米塔才宣布开庭。11 名法官，除苏联的扎里亚诺夫穿军服外，其余一律穿法官长袍。

“ 这次在本法庭上受到起诉的各个被告，都是过去十几年日本国运极盛之时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原首相、外相、藏相、参谋总长及其他日本政府内地位极高的人。起诉的罪状，是对世界和平、对战争法规和对人道的犯罪，

或导致这些犯罪的阴谋策划。”庭长韦伯致开庭辞说。

法庭开幕之日下午，开始宣读长长的起诉书。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部（即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国际检察局费时 5 个月起草的起诉书，列出 3 类共 55 条诉因。3 类诉因是：第一类，破坏和平罪；第二类，杀人；第三类，普通战争犯罪及违反人道的犯罪。首席检察官、美国人基南花了两天时间，才把这份厚达 42 页的起诉书读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时，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已过去 8 个月。东京审判迟迟才开始，缘由何在呢？

还在 1945 年 7 月 26 日，《波茨坦公告》就宣布，一切战争罪犯应受严正之审判。同年 12 月 26 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会议，并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后决定，“同盟国最高统帅为补充投降条款，得发布一切命令”。次年 1 月 19 日，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即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依据上述授权，命令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同日发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对法庭的组成、审判程序和适用法规等作了规定。根据该宪章，麦克阿瑟任命了英、美、法、荷、苏、中、印、澳、新西兰、比、加等国的 11 名法官，并以澳大利亚人韦伯为庭长。法庭的法定人数为法官的半数以上；法庭的判决根据超过半数的出庭法官的意见作出。具体他说，11 名法官中有 6 名法官（过半数）出庭，即可开庭；6 名出庭法官中有 4 名法官（过半数）赞成，便可作出判决。

东京审判中的检察工作，由盟军最高统帅部月下的国际检察局负责。检察官分首席检察官和陪席检察官。美国人基南任首席检察官兼国际检察局局长，中、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印、菲等国的 10 名检察官任陪席检察官。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为上海第一特区地方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86_1.bmp}

在讨论起诉书时，曾发生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主张，为了向世人表明日本本国人民也要求审判那些将他们引入歧途的人，有必要起用日本的法官和检察官。会议记录没有记下提出这种主张的人的名字，据推测，“可能是英联邦方面的发言”。这一意见没有被采纳。日本政府并没有选派法官和检察官参加国际审判的意思，它想用所谓“自主审判”代替国际审判。

由于东京审判为美国所操纵，审判的准备由美国单方面进行，澳大利亚和苏联表示不满。澳大利亚认为，东京审判不应由美国主导，而应由同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和各同盟国政府共同负责。但在美国的反对和英国的劝说下，澳大利亚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苏联认为，根据美国起草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东京审判跟纽伦堡审判有重大差异：没有像纽伦堡审判那样设置预审官，陪席检察官也不能像纽伦堡审判那样可以独立行动。因而它没有立即派出代表参加东京审判。经美苏间多次交涉，及美国方面的一再敦请，苏联检察官 C·A·戈伦斯基才于 1946 年 4 月 13 日到达东京。姗姗来迟的检察官还有：荷兰检察官鲍格尔霍夫·马尔泰，1946 年 3 月 19 日抵达。法国 R·L·欧涅特检察官和菲律宾 P·罗佩斯检察官均于 4 月 2 日抵达。而印度检察官 G·梅农赶到日本时，法庭已经开庭。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87_1.bmp}

在苏联等国的检察官来到之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选定工作已接近尾声。由于苏联的拖延，它几乎未能参与“构成检察活动核心的被告选定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失策。

逮捕战犯嫌疑者

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后 10 多天，就开始一批批逮捕日本战犯嫌疑者。

1945 年 8 月 28 日，一支由 258 艘各种类型军舰组成的美军特混舰队浩浩荡荡驶入日本东京湾。隔了一天，麦克阿瑟飞抵横滨厚木机场。9 月 8 日，麦克阿瑟驱车前往东京，下榻于原美国大使馆。至 10 月，进驻日本的美国军队已有 50 余万。

美军开始占领日本时，距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两周。这段时间内，东京尚未被炸毁的政府大厦顶上浓烟滚滚，这是在销毁各种绝密文件。1939—1945 年裕仁在宫中主持帝国大本营的记录，全部焚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秘密警察的档案绝大部分付之一炬。这项有计划的销毁策划和进行侵略战争罪证的活动，是在日本政府授意下进行的。日本政府有足够的时间，为对付即将到来的国际审判预作布置。

迄 1945 年 12 月 6 日，麦克阿瑟公布了六批战犯嫌疑者名单，根据这些名单，逮捕的甲级战犯嫌疑者超过 100 人。1945 年 9 月 11 日的名单包括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 39 人。11 月 3 日的名单包括前首相小矶国昭及前外相松冈洋右等。12 月 3 日的名单包括皇族梨木守正亲王等。前首相近卫文麿和前内大臣木户幸一的名字列入了 12 月 6 日的名单。

东条英机在逮捕令下达之前就作好了自杀的准备。1945 年 9 月 11 日下午，美军来逮捕他时，他要求略等片刻。然后到洗澡间洗了个澡，穿上崭新军服，走进书房，将门反锁好，用 32 毫米口径柯尔特自动手枪，对着医生用炭笔画了圆圈的心脏部位开了一枪。也许因为年岁大了，画了圆圈的地方皮肤下垂，也许因为适逢心脏收缩，子弹从他那颗畸形的细长心脏下方穿过，只差一点便打着心脏。他倒在血泊中，被送进医院抢救。美军医生不想让他死得太便宜，要让他活着受审。于是，东条活了下来。

次日下午 5 点，日本第一军司令杉山元元帅在牛込军司令部自杀。其妻子启子在世田谷家中获悉丈夫自杀的消息后，走进佛堂，穿上一身白衣，用短刀往心脏部位猛刺一刀，遂即倒地身亡。

前首相近卫文麿在日本投降后曾活跃了一阵。他进入战后成立的东久选亲王内阁，任国务相。还曾以“内大臣府御用挂”的身份从事改定宪法的工作。他自以为可以一显身手，再展宏图。那知 12 月 6 日黄昏，传来了将要逮捕他的消息。入狱的前一天（15 日）晚上，他和妻子千代子等谈话至凌晨 1 点左右，又和次子通隆谈了 1 个多小时，3 点左右进入自己的卧室。早晨 6 时，妻子走进去一看，他裹着一身白布，横卧在雪白的被褥上，已断了气，枕边放着一只褐色小瓶子，里面还残存几滴毒药。近卫留下遗书一封，内称：

自日中战争以来，我犯了许多政治上的错误，对此，我感到责任重大。但是，作为所谓战犯，在美国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这使我难以忍受。

在自杀的战犯嫌疑者中，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代表性，即宁可自杀也不愿受逮捕和审判之辱。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在日本军政界，一时自杀成风。陆海军将领自杀的，计 34 人。

曾经推荐东条英机任首相的前内大臣木户幸一，于 1945 年 12 月 6 日下午 7 时从广播里听到麦克阿瑟统帅部向他发出逮捕令的消息。8 时半，他接受了《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他对记者说：“那么多的人都传去了，我也

因此有所准备，知道一定会来找我。至于自己究竟在哪一点上被追究战争责任，那要看对方的看法，我无从知道”。10 日晚，裕仁天皇为木户饯行。天皇对藤田尚德侍从长说：“从美国来看是有罪的人，从我国来看则是有功的人”。晚宴上，天皇对木户说：“这回你真是不幸，要多注意身体。我们事先谈一谈。我的心境你完全了解，所以想让你为我充分说明。”木户听得出来，天皇是要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洗刷。回家的路上，木户见到了都留重人，都留劝他说，要充分做好辩护准备，因为美国的想法，内大臣有罪则天皇亦有罪，内大臣无罪则天皇亦无罪。于是木户打定主意要进行辩护，以便为自己开脱，同时也为天皇开脱。

国际检察局执行委员会选定被告的工作从 1946 年 3 月 11 日开始，其时苏联等五个国家的检察官尚未到达。至 4 月 1 日，共开会 9 次，确定了一份 27 人的被告初选名单，加上悬而未决的土肥原贤二和石原莞尔，共 29 人。4 月 8 日，陪席检察官会议就这份名单进行表决，通过了一份 26 人的名单。初选名单中有 3 人被排除，他们是石原莞尔、田村浩、真崎甚三郎。首席检察官基南指示将土肥原贤二从被告名单中划去，未获陪席检察官会议通过。苏联检察官于 4 月 13 日到达后，要求追加 5 名被告。陪席检察官会议表决的结果，将其中二人，即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追加为被告。加上先前选定的 26 人，共 28 名被告。其中陆军军人 15 名，海军军人 3 名。经麦克阿瑟批准，这 28 人成为东京审判的被告。

这 28 人是：东条英机、东乡茂德、铃本贞一、松冈洋右、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大岛浩、星野直树、桥本欣五郎、永野修身、嶋田繁太郎、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武藤章、小矶国昭、大川周明、白鸟敏夫、贺屋兴宣、木户幸一、畑俊六、木村兵太郎、佐藤贤了、冈敬纯、南次郎、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重光葵。

中国两次提出的战犯名单，共列有 33 名战犯，其中有 15 人成为东京审判的被告。

要不要追究天皇的责任

在选定东京审判的被告时，国际舆论强烈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发出了要求将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呼声。

裕仁天皇是一个极富神秘色彩的人物，表面看来，他似乎只是日本名义上的元首，实权操于内阁之手，而内阁又为军事首脑所左右。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美国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说：“美国的情报分析家倾向于认为，日本是一个受东条之类狂热顽固的将军们控制的警察国家。分析家们不知道，东条不过是天皇陛下唯命是从的奴仆。”日本粟屋宪太郎著《东京审判秘史》写道：“在战前的日本，在公务上执行宣战、讲和、缔结条约权限的唯有天皇一人”。东条英机在法庭上曾这样谈到天皇的权威：“没有任何一个日本臣民能违迕天皇陛下的旨意，日本政府或日本国的高级官员尤其如此。”每一届日本内阁都按天皇旨意组成。各届内阁首相及内阁成员，无不对天皇奉命唯谨。在罗斯福任美国总统期间，日本内阁换了 12 届，天皇就用频频更迭内阁的办法，保持他的绝对权威，而防止内阁权势过重，威胁皇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写道：“在审讯开始前，我认为天皇作为一个绝对极权的君主，因批准开战应负足以构成起诉的责任，……

在审讯中提出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我先前的看法，证据表明，天皇确实批准了开战，因而对战争负有责任。”内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和杉山元元帅的日记，都表明天皇参与了战争。例如据杉山元日记记载，早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 11 个月，裕仁就曾亲自命令对突然袭击珍珠港的可能性作出评估。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数月，裕仁还详细询问了军事和经济计划。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无论是文件证据，还是证人证言、被告口供，都涉及到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天皇亲自指导日军在淞沪战场的作战；对于日军攻占南京，天皇向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表示“异常满意”；这类事例甚多。

正因为裕仁天皇在侵略战争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故澳大利亚提出的战犯名单，将裕仁排在第七位。澳大利亚政府关于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备忘录写道：天皇“正式批准 1937 年侵略中国（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因天皇下了开战诏书而开始的。……仅仅由于他批准了战争，他便要承担责任”。

但是，首席检察官兼国际检察局局长基南，根据麦克阿瑟的意图，将裕仁天皇的名字从被告名单上划去了。基南并指示：绝对不得将天皇当作被告或证人。

麦克阿瑟何以回护天皇？他的理由是，战后日本国民对天皇仍奉若神明，重建日本，就要利用天皇在日本国民中的这种影响；而把天皇作为战犯交付审判，就会出现动乱，为了对付日本举国上下有组织的抵抗，美国必须投入远比目前进驻日本的军队巨大的兵力。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193_1.bmp}

还在 1945 年 10 月 22 日，美国国务院、陆军、海军三方调整委员会就通过一项议案，决定让麦克阿瑟在日本秘密调查天皇是否负有战争责任，并就是否将天皇作为战犯提交审判提出建议。 1946 年 1 月 22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寄去了一份由澳大利亚提出的日本战犯名单，上面列有包括天皇在内的 62 名战犯名字，并命令他着手对战犯起诉。1 月 25 日，麦克阿瑟急切地向美国陆军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发出一份电报，说是没有发现天皇犯罪行为的明确证据，不应将其作为战犯控诉。电报还说：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那么就有必要对占领计划进行重要的修改；为了对付日本方面的游击活动，起码需要 100 万军队和几十万行政官员，云云。美国总统杜鲁门等人彼麦克阿瑟所说服，美国政府同意按麦克阿瑟意见办。如何处置日本天皇这个棘手问题，就交由麦克阿瑟去处理了。

麦克阿瑟采取这样的保护天皇的策略：“从速审判东条和他的 1941 年的年阁成员，借此避免扩大调查范围，以免牵连天皇”。

在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中，法庭都小心翼翼地绕开天皇的责任问题，就像避开雷区一样。裕仁终于被保护下来，他仍然留在神圣的天皇位置上。

对这样一个使人大惑不解的问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是这样理解的：

“民主国家结成同盟，不惜牺牲大量的生命和物质力量，向一个专制政府开战，而最终却把这个政府的专制君主留置原来的领袖位置，看来这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但是，裕仁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他也是一个象征。作为个人，不管他多么罪大恶极，但他仍是整个国家的精神化身。在 1945 年，多数日本人以一种宗教信仰的态度，深信日本与天皇是不可分的，必须生死与共。”

细菌战、奏气战问题被搁置一边

日军进行细菌战、毒气战的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意回避，未予清算。

关于细菌战问题，国际检察局已经搜集了一些资料。其中就有关东军防疫供水部（七三一部队）对 3000 多名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俘虏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感染试验、活体解剖，和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的罪证。还有七三一部队的分支，驻南京的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即多摩部队）在中国浙江金华等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证。但是，国际检察局并未将这些资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国际检察局内，美国人托马斯·H·莫罗对细菌战、毒气战问题最为关切。他在交给基南的题为《日中战争》的备忘录中，写到了日军进行毒气战、细菌战问题。他请求盟军最高统帅部第二参谋部，准许国际检察局审问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重要罪犯，七三一部队的两任部队长石井四郎陆军中将军医和北野政次陆军少将军医，遭到拒绝。

不准审问石井、北野二人，到底是谁作出的决定？直到 1983 年才揭出谜底。这年 8 月 14 日《朝日新闻》刊载了一篇题为《麦克阿瑟保证：免究细菌部队的战争责任》的报道。文章说，1945 年秋，盟军最高统帅部第二参谋部部长 C·A·威洛比少将和桑得斯去见麦克阿瑟。威洛比提出：要查清七三一部队内幕，只有作出这样一项保证，即不把七三一部队的人作为战犯追究，调查才能顺利进行。麦克阿瑟表示同意。桑得斯把麦克阿瑟关于“不作为战犯追究”的许诺告诉了七三一部队有关人员。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故第二参谋部拒绝把石井交给国际检察局审问。

莫罗审问石井的请求不被允准，便专程来中国，先后到了上海、北平、重庆、南京等地，搜集有关日军实施细菌战、毒气战的证据。他从日军俘虏处得到了日军使用毒气的证词，从中国的外科医生处得到了他们为很多受日军毒气伤害的中国士兵进行治疗的证词，还见到了被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毒气武器。莫罗访问了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从档案中读到了这样的资料，日军使用毒气伤害了 36968 人（内 2086 人死亡），并见到了被日军芥子气毒害致死者的照片。防毒处处长杨昌凯少将和派到中国军队中的美军联络官 J·H·斯多塔上校向莫罗证实，日军在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使用过毒气。

莫罗回到东京后，根据中国国民政府的检举材料，写成了题为《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一般说明，1937—1945》的报告书。这份报告指出，日军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次数是：1937 年 9 次，1938 年 105 次，1939 年 455 次，1940 年 259 次，1941 年 231 次，1942 年 76 次，1943 年 137 次，1944 年 38 次，1945 年 2 次，总计 1312 次（1945 年的次数据不完全统计）。

但是在开庭后不久，莫罗就被调回美国了。在毒气战、细菌战问题上，他的主张跟法庭的方针相牴牾，或许他是被作为“免究细菌战和化学战责任的障碍”排除的。

除了莫罗提供的资料外，国际检察局还得到了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于 1942 年 11 月 3 日编成的《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这是一份由负责毒气战指导和教育工作的日军中枢机关编撰的重要资料，因而对审判工作特别有用。有人认为，“倘若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把检察局搞到的《例证集》等有关毒气的资料提出来，再由有关证人出庭做证，那么，日军的毒气战便会

被清楚地揭露、证实，法庭将受到非同寻常的冲击。从国际检察局搞到日本军方核心资料的情况来看，要证实日军的毒气战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大概要比证实南京大屠杀事件更容易。”

在东京审判中，对日军进行毒气战、细菌战犯下的罪行竟免予追究责任。检察官提到这个问题，庭长韦伯就要打断他的话：“这件事对我们审判官来说可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好吗？”

国际检察局在开庭前就这个问题作了调查，但在起诉书中将这部分内容删除了。

下面是美国检察官Ｊ·Ｗ·费利在选定被告阶段讯问东条的一段记录：

问：“在日中战争期间，（日军）是否对杀伤性气体和刺激性气体加以区别？”

答：“我想后者——促使咳嗽和流泪的气体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过。”

问：“难道使用这种‘刺激性气体’不是国际法所禁止的吗？”

答：“催泪气体以及促使打喷嚏的气体，世界上所有警察都在使用，您的国家也在使用。”

问：“使用这种刺激性气体，在国际法上没有被禁止吗？”

答：“实际上全世界的警察都在使用，原子弹怎么样？”

东条坚不承认日军实施毒气战的罪行，不但如此，还借美国使用原子弹一事来反唇相讥。意思是说，原子弹比起毒气弹来如何，美国不是使用了吗？你怎么不去追究美国的责任？

法庭在毒气战、细菌战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了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为何要免予追究日军实施毒气战、细菌战的责任呢？据云“除了独吞‘科学和武器’的情报外，这也许还和投掷原子弹的责任有些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就已开始研究细菌战和毒气战，也得到了日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情报。战后它怀着特殊的兴趣想把日本的研究资料由它一家秘密接收过来，而不愿让其他国家得到这些资料，更不愿在法庭上加以揭露。二是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它害怕倘若在法庭上追究日军毒气战、细菌战的责任，辩护方会以提出美国投掷原子弹的责任问题相回击。美国正是怀着这种深深的担忧和恐惧，小心地避开了毒气战、细菌战问题。

对 25 名战犯的判决

东京审判从 1946 年 6 月进入检察方面起诉阶段。1947 年 1 月转入辩护方辩护。此后由检察、辩护两方往复辩论，检察方面进行最后论罪求刑，辩护方面进行最后申述。延至 1948 年 4 月 16 日，旷日持久的东京审判，在开庭将近两年之际，终于走完了漫长的审理途程。这期间，法庭提到了 1602 份书证，传唤了 524 个证人。辩护方最后发言持续 31 天，速记记录长达 6033 页（打字纸）。公诉方发言持续 14 天，速记记录长达 3126 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原拟在这次审判结束后，再进行一轮国际审判，把第一次审判中夫予起诉的战犯嫌疑者，作为第二次审判甲级战犯的被告。由于国际形势的急遽变化，美苏冷战之风一日紧似一日，新的国际审判不再具备条件。

在审理结束前夕，4 月 13 日，《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产生了轰动效应，

并在法庭内外引起不小的风波。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载了美联社记者莫里斯·哈里斯对 25 名被告量刑的预测消息。这篇报道说，25 名被告（永野修身、松冈洋右二人死亡，大川周明因发疯免予起诉，28 名被告剩下 25 名）中，被判处死刑的预计有 13 人，他们是东条英机、武藤章、铃木贞一、嶋田繁太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畑俊六等。有的辩护人曾就此事向检察官提出交涉，认为这会使人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干扰法庭审判。

1948 年 11 月 4 日上午 9 点半，法庭再次开庭。庭长韦伯在说完“现在开始，本官宣布判决”后，流利地宣读起判决书来。判决书共 10 章，加上附属书，总计达 1212 页（英文）。第七天下午（11 月 12 日）读到第十章证明 25 名被告有罪的判定。25 名被告均被宣判有罪。3 点 55 分，庭长韦伯开始宣布量刑：

荒木贞夫，无期徒刑；
土肥原贤二，绞首刑；
桥本欣五郎，终身监禁刑；
畑俊六，终身刑；
平沼骐一郎，无期徒刑；
广田弘毅，绞首刑；
星野直树，无期徒刑；
板垣征四郎，绞首刑；
木户幸一，无期徒刑；
木村兵太郎，绞首刑；
小矶国昭，无期徒刑；
松井石根，绞首刑；
南次郎，无期徒刑；
武藤章，绞首刑；
冈敬纯，无期徒刑；
大岛浩，无期徒刑；
佐藤贤了，无期徒刑；
重光葵，监禁 7 年；
嶋田繁太郎，无期徒刑；
铃木贞一，无期徒刑；
东乡茂德，有期徒刑 20 年；
东条英机，绞首刑。

另有 3 名被告因病未到，由 3 位辩护人在自己席位上起立接受宣判。3 名缺席被告，贺屋兴宣，处无期徒刑；白鸟敏夫，处无期徒刑；梅津美治郎，处无期徒刑。

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土肥原脸色死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由于双手颤抖厉害，意译风怎么也戴不好。松井石根衣履不整，头部不停抖动，活像只瘟鸡。东条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一身军服，两手背在身后，慢悠悠地走来。30 几架相机的镜头一齐对着他，他微微向左边歪着脖子，仰视着天棚。“绞首刑！”他嘴角朝左边一咧，笑了。然后拿下意译风，朝旁听席上扫了一眼，那里有他的家属。

判决宣布了，但 11 名法官并不全都同意判决。庭长韦伯曾主张，对所有被告均不处以极刑，而把他们交给各同盟国，放逐到人迹不到的遥远的荒岛。

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菲律宾法官贸纳尼拉和荷兰法官博林要求加重对大多数被告的量刑。印度法官佩尔可能出于佛教徒的“仁慈为怀”，全然不同意判决。法国法官伯纳德也对判决持否定态度，他的理由是，不该放过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发动者”（天皇），而惩处这些只能被认为是他的“帮凶”的被告。首席检察官基南口头上同意判决，私下里说“这些判决太愚蠢”。他反对把松井石根处死。

尽管有这些异议，庄严的判决仍然作出了。在这过程中，中国法官梅汝璈曾怀着不判处土肥原、松井石根等人死刑，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理，极力请求法庭处土肥原等人以极刑。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判决后，辩护方面曾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对判决重新审查的要求。11 月 24 日，麦克阿瑟驳回重审要求。

25 名战犯中有 7 名战犯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演出了一场闹剧。他们是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嶋田繁太郎、冈敬纯、佐藤贤了、东乡茂德、木户幸一。麦克阿瑟居然宣布，被处绞刑之 7 人及其他各犯暂缓处刑。美国最高法院竟然宣布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消息传开，国际舆论哗然。美国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反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司法部副部长柏尔曼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行文美国最高法院，要求该法院不要干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出于无奈，驳回了 7 名日本战犯的上诉。

1948 年 12 月 22 日深夜，盟军最高统帅部涉外局宣布，对 7 名判处绞刑的战犯，处刑于 23 日凌晨零点到零点 35 分之间进行。23 日 4 点 10 分，涉外局特别紧急宣布：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判处死刑的 7 名战犯，他们的绞首刑于 23 日早晨在巢鸭监狱执行，执行从凌晨零点 1 分开始，33 分钟后结束。

应麦克阿瑟之邀，作为临刑人到场监刑的，有美国代表威廉姆·J·西波尔德公使，中国代表商震上将，英联邦代表巴特里克·肖，苏联代表库茨曼·迪利比扬格中将。

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的 18 名被告，其中梅津美治郎、白鸟敏夫病死于 1949 年，小矶国昭、东乡茂德病故于 1950 年，平沼骐一郎于 1952 年病亡。重光葵于 1951 年 11 月刑满出狱。其余被告荒木贞夫、南次郎、畑俊六等均陆续被假释或提前释放。

至于未被作为被告审判的数十名战犯嫌疑者，在东京审判开始后，就一批批悄悄地从巢鸭监狱获释。1948 年 12 月 24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将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剩下的 17 名甲级战犯嫌疑者全部释放。

东京审判至此画上了句号。

这次审判可指摘处很多，但它是一次严正的历史审判，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它对铲除侵略势力，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无疑有巨大作用。东京审判定下的铁案是不容推翻的。

夏里

（第 186 页为东条英机照片，
第 187 页为板垣征四郎照片，
第 193 页为土肥原贤二照片）

西安偷运黄金案见闻录

1944 年，我在西安西北文化日报任采访主任。某日，西安西关外飞机站殷站长下大红帖招待记者，还专派吉普卡来接。会上大办筵席，对记者们大吹一顿，又领着记者参观飞机场，要求记者报道飞机场地勤工作人员在抗战军兴时刻所作的努力，以振奋士气。

可是不到一个月后，听说殷站长因偷运黄金案被枪决了。社长李贻燕特来编辑部打招呼，不准发关于殷站长被正法的消息。李贻燕，当时人们称之为翼老，年已 60 开外，留日学生，同盟会老会员，其居室内挂有同孙中山先生合照的褪了色的照片。抗战军兴以来，他身兼 10 余职，诸如陕西省党部副主委兼宣传处长、新闻检查所主任、省参议会副议长、市参议会议长、抗敌后援会副会长，力行中学校长，西北文化日报及西安晚报社长，西安市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西北师范学院党史讲师。等等写不完的要职，似乎是名作家张天翼笔下的华葳先生的化身。他打招呼之后，任何报纸都不敢刊载这一消息。只有民主同盟办的工商秦风联合报用 4 号字标题：“ 殷站长伏法 ”，全文不过 20 字，已是“ 胆大包天 ”了，终于受到新闻检查所的警告。

事隔几天，李贻燕特来找我：“ 你拿我名片去德泰祥钱庄找毛老板，就说有什么消息，尽管交下，一定发表。 ”毛老板叫毛虞岑，西安的大财神，有“ 西安的黄金荣 ”之称，他有一个“ 一毛不拔 ”的“ 美名儿 ”。凡属与“ 德 ”字联在一起的店号如德记银楼、德华金店……都是他经营的，其网络远至洛阳、成都、宝鸡、兰州、渭南。他和蒋纬国的丈人石凤翔有八拜之交，两人合办大华面粉厂、大华纱厂，名盛一时。据说他理财得法，用人得力，特别善于应酬省主席祝绍周，对祝则是万毛也拔，慷慨得很；对石凤翔更是有求必应，因此他就能在西安工商界、政界翻云覆雨，捧他的人就应接不暇。他的架子很大，不买新闻记者的帐，从来不接待记者。

这时毛虞岑托石凤翔、祝绍周的福，也当上了省参议员，李贻燕又是副议长。有了李的名片，毛虞岑破例接见了我，寒暄几句，立即从口袋取出一个信封，双手恭恭敬敬地交给我：“ 这消息请主任呈交翼老。 ”

我辞出后，看看信封是封口的，感到奇怪，但也不便私拆，由于一肚子狐疑：既是交给记者的报道材料，为何要封口。因此我先找总编刘毅商量。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来的，处事精干，我视之如师。

刘说：“ 此中秘密，你还蒙在鼓里，殷站长为什么招待记者？从来不接见记者的毛虞岑为什么突然接见记者？你真是个糊涂记者！殷站长偷运黄金，传说这些黄金都是毛虞岑的，这信可能是托翼老‘ 辟谣 ’，企图推卸罪责，既是托我报发表，我总编有权拆信。 ”

不拆则已，一拆愕然！我和刘总都呆了，竟是两张支票，一张 50 万，一张 30 万。（当时金价约 5 万元左右一两，约值 15 两黄金。）

总编呵了一声而又笑着说：“ 毛虞岑手段真辣，50 万是给翼老的，30 万是给你的，你成了敲竹杠记者了！ ”

我大吃一惊，在一分钟内，总编给我连扣了两顶帽子，糊涂加竹杠记者。我真莫名其妙，就追问根由。

总编说：“ 我也是道听途说，讲不清楚，等晚上发完稿，我俩去翼者家中，他会和盘托出的。 ”

翼老是麻将迷，经常通宵夜战。见到我俩不速之客，心中有数，由他儿

子接力战，起身接待。

翼老问我：“去德泰样怎么样，消息拿来了吗？”

总编风趣地说：“拿来消息两条，一条 50 万，一条 30 万！”

翼老失望地说：“怎么这一点，不行，明天你俩再去，叫姓毛的加码，没有 500 万不行，偷运黄金 100 条，就拿出这么一点儿能混过我李某人！”

总编正色问道：“请您老摊摊牌，到底怎么一回事，不说清楚，叫我俩怎么下手，难道连我俩也不相信？！”

下面是翼老的谈话：

“毛虞岑发了一辈子横财，‘人无横财不富’，在他身上百分之百的应验。他是河南人，年轻时在绿林出身的将领任应岐部下做过副官，掌管军需后勤，任应岐失败后，他卷走大批军粮军款，在郑州开烟膏店起家，西安事变前又和杨虎城某部下挂上钧，代运黄金、烟土，从西安、洛阳来回倒卖，杨虎城失败后，他又将大批黄金、烟土私吞，腰缠万贯。抗战军兴后，洛阳沦陷，他到西安坐庄开银号钱庄，又和石凤翔打得火热，拉上省主席祝绍周和蒋介石的关系，从金融界一步登天钻进政界。特别是近一年来勾上西安空军站殷站长（一说姓尹），利用空运从西安到成都偷运黄金，来回倒卖，盈利二五分成，殷站长买通地勤人员，坐收渔利。起初每次只带 10 根左右，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从 10 条到 20 条、50 条，上月竟一次带 100 条，也就是 1000 两。飞机起飞时，驾驶员发现载重负荷指针超载，唯恐出事，停飞检查，于是破获了这桩大案，这真是空军史上最大奇闻。有人传说是利用美军空中堡垒 B26，实际上这次利用的仍是中国空军军用飞机。

毛虞岑办事精得很，他的成都德泰样金店负责人，早已买通成都空军站地勤人员，发觉飞机停飞检查，立即电告毛虞岑，可毛虞岑早已与殷站长私订攻守同盟，约定如一旦东窗事发，毛许诺从优抚恤其家属，殷许诺有罪一肩挑，决不咬出毛来。正当毛托石凤翔、祝绍周设法为殷解危时，胡宗南立即下令从速处决，说什么这是执行‘五权宪法’。”

总编插问：“这与‘五权宪法’何干？”

翼老讽笑说：“这是胡长官定出的军法新招，凡国民党高级党员犯军法，执行‘三民主义’，即枪决时打三枪，前两枪打在身上，第三枪打在后脑；凡国民党员高级将领犯军法，执行‘五权宪法’，即枪决时打五枪，前四枪打在身上，第五枪打中后脑，这样叫犯罪者多承受几分钟痛苦，以示严惩。这不去谈它，殷站长被枪决后，成都军法处虽没收全部黄金，但仍在追查这黄金究竟出自谁手，因每根条子上的印记，均烙有德泰祥银楼字号。事发后毛虞岑仍托石凤翔去重庆设法营救，愿再向

国家捐献 500 根条子，表示赎罪，反正抗战需要钱，可以不了了之。因此毛虞岑、祝主席都向我打招呼，要求新闻界不发消息。我是做到了，可是他仍只拔这一点点毛，叫我怎么分给各报。”

我插上说：“我从德泰祥出来时，门口碰上西京日报和西安晚报的采访主任进去，可能也是奉他们社长之命去敲竹杠的。”

翼老八字胡一翘气愤地说：“这怎么叫敲竹杠？这是毛虞岑应该出的买命钱，他发了那么多横财，何止千根条，万根条，现在叫他拿出 100 根条捐助西安报界，也是合情合理的，在他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总编站起来，向翼老告别：“我们就是饿死，也是不去的，我看毛虞岑的神通比您老广大得多，加码是不可能的。毛虞岑一毛不拔是有名的，今天

已拔出黄金 15 两，真是拔得他心痛肉痛的了。”讲完将两张支票交给翼老，辞了出来。后来听说毛虞岑为抗战捐了 500 根大条，又给河南灾民捐了 5000 袋面粉，遂化险为夷，为河南灾民所称道。

彭古丁

冯玉祥珍藏的毛泽东名片的来历

冯玉祥生前一直珍藏着毛泽东给他的一张名片。现这张名片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冯玉祥是怎样得到毛泽东的这张名片的呢？这就得从冯玉祥和毛泽东重庆相逢谈起。

1945 年 8 月，蒋介石接受政学系的献计，三次电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家大计。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建国及民主进步，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

冯玉祥对中共代表团的到来由衷地表示欢迎。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与中共党员频繁接触。1926 年，他访问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留下了美好印象。从 30 年代初开始，冯研读了许多马列著作，深深赞同共产党的救国救民纲领。1933 年，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组织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八年抗战期间，冯玉祥始终不渝地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他翘首企盼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共建民主统一的新中国。

8 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冯玉祥鉴于环境，抱疚不便前往，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机场迎接。毛泽东等到重庆后风尘未洗，立即会看望这位为抗日奔走呼号、为民主劳碌奔波的老将军。冯玉祥对毛、周、王仰慕已久，对于他们的登门拜望尤为感动，决定去回拜他们。30 日下午，他带着女儿颖达去毛泽东等的临时住所——重庆桂园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公馆，不意毛、周、王三人因事外出，但特地给冯玉祥留下各自的名片。毛泽东的名片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的。冯玉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名片背后分别写上“卅日下午四时住张部长（在毛的名片上写的是‘治部长’）公馆”，并把这三张名片贴在当天的日记页中，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纪念。

9 月 1 日，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在中苏文化协会集会，庆祝《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八周年。宋庆龄、冯玉样、邵力子、孙科、覃理鸣、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夫妇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出席，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等也与会。宋庆龄身穿一身洁白的衣服，满面春色，当场致词。冯玉祥受大家的欢迎讲了话。回顾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同共产党的友谊。会议气氛十分友好亲切，许多旧友重逢，感慨万千。

当晚，冯玉样又陪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吴铁城家赴宴。宴席由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三人作东，宴请毛、周、王等，由冯玉祥和甘乃光作陪。席间，大家畅谈起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形。后来，周恩来又说到汉奸问题，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溥仪他已经被苏联拿住了，将来送回来归谁审判？”毛泽东提出了这个讨论题目后，大家都说，请冯先生审判。冯玉祥笑着点头：“那好极了，这三十四年的文章就算定了，民六为他，民十三也是为他（指 1917 年讨伐张勋和 1924 年驱逐溥仪出宫）。”接着大家无拘无束地谈笑着，把应该审判的大汉奸都列了出来。冯心情舒畅地说：“若真能这样办，也是一件痛快事！”

散席后，冯随毛、周、王一起回寓所。天黑路滑，不想毛泽东他们坐的那辆车掉到道边沟里卡住了，冯玉祥及随员、司机都帮着去推，却怎么也推不出来。看着毛泽东他们着急的样子，冯笑着说：“好了，既然推不上来，

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说着，不由分说，把毛泽东等拉到了自己的车上，一直把毛泽东他们送到桂园门口，才驱车回自己的住处康庄。这时已是深夜 11 点多钟了。

那一天冯玉祥夜不能眠。几天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使他深切感到了中共对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的诚意。于是，他乘兴连夜吟诗一首：

今天真快乐，
今天真欢欣。
楼上楼下人满座，
“干杯”、“干杯”不断声。
邵力子、孙哲生、郭沫若、覃理鸣，
彼得罗夫也来到，
还有天上飞来的毛先生。
我指中苏大旗开口道：
“这是总理三大政策之实行”。
覃理鸣不禁落下泪，
我的心中欢快苦乐一起临。
难道我们罪还没有受个够？
难道我们不能团结象一个人？
向着光明世界迈大步，
为着人类永久的幸福与和平。
几十年来不喝酒，
今天破戒喝几巡。
愿中苏永远友好，
愿人类永不要再有战争。
陈晓清

（第 210 页右面为毛泽东名片照片，
左面为冯玉祥在名片背面写下的字）

一场“抽签”从军的闹剧

1944 年底到 1945 年初，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国民党发动了一场大后方十万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早在 1944 年 8 月间就接到蒋介石手谕，要利用美援装备，组建 12 个师的青年军，发动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踊跃报名。

然而。这场颇有声势的“从军运动”，却事与愿违，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部演出了一场“抽签”从军的闹剧。

当时，作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吴铁城，奉命发动报名，他首先要求中央党部各部会青年党务工作人员积极报名，以资号召，但是搞了几个月，几乎没有一个人报名。吴铁城很难堪，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报名抽签”，中者从军。规定了凡是年在 36 岁以下的，都要报名。这样，引起了各部会青年党务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笔者当时在中央党史会工作，刚好 36 岁，党史会及龄者 16 人。主任委员张继召集会议，会上并没有一个人报名。会后在主管人事的周永成策划下，把一张开会签到纸作为“志愿”报名名单呈报了上去，当时的《中央日报》对此作了宣传报道。于是，会议参加者一致否认，在中央党史会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发动大家联名向“总裁”申明没有志愿报名，开会签名单不能作报名依据。不仅中央党史会，其他各单位青年党务工作人员也群起反对，中央组织部闹得也很凶。吴铁城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又想出了要蒋介石亲自到会训话，以达到动员青年党务工作人员报名的目的。

1945 年 3 月 19 日，我接到通知参加中央纪念周，我是搞速记工作的，参加中央纪念周记录是常事，并不在意。奇怪的是，这无纪念周和往常大不一样，中央纪念周参加者原是党政军高级官员，而这一次排队依次入场的都是青年，更出乎意料的是不让我担任记录，还通知我和其他的 9 人（党史会、组织部各 5 人）站在第一排的位置上，这是不寻常的。

蒋介石亲自主持这次纪念周，在行礼如仪，读“总理遗嘱”后，蒋开始训话。他脸色严肃，讲了 1 小时之久，讲到最后，声色俱厉地要大家回去报名从军。

纪念周结束，蒋介石站着不动，没有离开。重庆国民政府礼堂本来很小，后面的人不知道蒋没有退席，一哄而散，争相离开会场。蒋介石见此情景厉声斥责：不许乱跑。我们 10 人被指定站在原地不动，有一些元老如吴铁城、张继、陈果夫等也都在场。蒋介石开始对我们 10 人训话，讲了 5 分钟，最后说：“你们自己不去从军，还煽动别人，这是破坏从军运动，今天我以总裁名义对你们军法从事。”会场上肃静无声，显得十分紧张。突然，有人高喊：“总裁，我有话要说……”蒋介石一听火冒三丈，脸涨得通红，大叫：“宪兵带下去。”原来，党史会同人中有两人只因反对抽签做法讲了公道话，也叫来“听训”。其中一位是年已 40 的许处长，另一位则是年过花甲，曾跟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姜老先生，就是刚才高叫有话要说的那一位。于是他也被列入“破坏从军”罪的名单。陈果夫、吴铁城看到这情况，扶着蒋介石出去上车，我们被带到了国民政府一间屋子里。

吴铁城原意是想对青年党务工作人员训一顿，杀鸡儆猴，把 10 个人拎出来做做样子，想不到弄得假戏真做，蒋介石竟然要“军法从事”。消息传出，整个中央党部人心惶惶。同情我们的，不断把消息传到小屋子里来，一会说，形势紧张，你们要被送去陆军监狱；一会又说问题不大。还有人来告诉我们

看见吴铁城请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濬到中央党部，吴铁城送何出门，连声说“拜托拜托”，何成濬说“交给我办好了”。我们听后心情仍然忐忑不安，因为“破坏从军”这顶帽子，毕竟不是儿戏啊！

天快黑时，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两路口桂花园，车停后只见许多人围了上来，他们都是中央党部所属各单位的青年，出于对我们的关心和同情，特地赶来慰问我们。桂花园是军法执行总监部的总监办公室，在两路口北面山坡下，古老的两进厅房，显得阴森森的。我们被带进去时，昏暗中看见何成濬立在办公室门口，望着我们。我们被安置在一间很大的好像是办公室的屋子里。尚未坐定，就叫我们到楼下吃饭，5 个人一桌倒有 4 个菜，我们奇怪了，难道这像牢房的囚饭吗？事情也许不是那么严重。

第二天下午，10 人被带去见总监，大家又忧又喜，忧的是可能要提审了，喜的是总监亲自传见，也许问题要解决了。出 去时，大家有意要我走在前面，大家都知道何成濬认识我。以前党史会要何成濬写辛亥革命回忆录，是他口述我记录整理的。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我分明记得他家里办公桌上有一尊金光灿灿的佛像，还有一个小香炉，这怕是他“执行军法”的忏悔吧！

我们被带到办公室，见室内布置很简单，一张办公桌和几张凳子，何成濬坐在办公桌边，要我坐在他旁边。一开始就对大家说：总裁总是这样的，你们是党员，不曾从军，既不是军人，怎么送到我这里来呢？既然来了就当住旅馆吧。又说：从军也没有什么不好，多点经历嘛。那次谈得很多，将近一个小时，还提到有位师长叫余程万，在长沙战役打了败仗，委员长几次下令枪毙他，我没有杀他。现在，委员长不是又叫他上前线戴罪立功吗？他笑笑伸一个小指头，你们这点点真是小事。听到这里，我们才如释重负。临走时，他交代副官说，允许别人前来探望。他还吩咐副官把秘书办公室腾出给我们住，安排好伙食等等。这倒有点真像住旅馆了。

第五天，副官进来点了 3 个人的名，说是总监叫去他那里，3 个人都是党史会的，除姜、许两人外，我也在内。一到办公室，见张继正坐在那里，后来知道张继是来领回姜、许两人的。我也在被领人员之列，恐怕这与我曾与何相识不无关系。

事情至此还没有了结，还得向蒋介石交差，接着，中央党部呈报蒋介石说：8 个人已“志愿”要求从军，案子已经结束。于是，我们 8 人被指定于 4 月 12 日到了驻江津的青年军 202 师 606 团,象征性地过了 20 天的军旅生活。

居正修

扬子公司怎样化险为夷

1948 年 9 月 29 日。上海，南京路四川路口“ 迦陵大楼 ”。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孔氏“ 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 ”所在地。往常，一跨入迦陵大楼，见电梯不断上上下下，办公室内职员忙忙碌碌，公司规模和气派简直堪与中央银行媲美。可是今日情况异常，人们神色严峻，一向镇静自若的董事长孔令侃也颇显不安。原来，就在这天午后，扬子公司囤积于利喊汽车公司二楼仓库的大批物资被查封。旋而大连路 277 号仓库及虹桥路仓库亦告急。事起仓淬，险情陡生，向来有恃无恐的孔公子也出了一身冷汗。

扬子公司自 1946 年 4 月创办以来，依仗孔祥熙的权力、财力，依恃“ 第一夫人 ”宋美龄的庇护，可说是路路通顺，发展极速。当初，为疏通进出口贸易渠道，孔令侃曾不借利用特权窃取经济情报，获得汽车进口“ 合法 ”权益；不惜献媚邀宠于各国工商财团，以垄断货源。孔走私、逃税、套取官价外汇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短短两年便赚取了无数的黄金美钞。据《工商天地》杂志 1947 年 8 月第 1 卷第 9 期刊载的《扬子孚中案全貌》一文云，扬子公司“ 官僚资本的庞大，挟其政治特权，经济实力，已威胁到美商利益 ”，因而美商亦起而攻击。1947 年美国合众社最先揭发扬子公司。继而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由国民党政府内对孔宋极端不满的一部分人发难，“ 选择在魏德迈来华，美商群起指摘之际，来一个总攻击，企图整个拔除孔宋官僚资本 ”。国民政府监察院乃至蒋介石都直接过问扬子案。但孔令侃飞了越南京，风波便很快平息。孔少爷显有“ 回天之力 ”。然而，眼前发生的扬子公司仓库被封的事却颇为棘手，不好对付。他脑海中甚至闪过了要不要去香港避避风的念头。这一次风波何以不同往常，还得从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说起。

1948 年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于 8 月 19 日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四项挽救方法，指派俞鸿钧、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企图整顿与管制上海的财政金融与市场物价。至 9 月底，惩治豪门巨商进入高潮。陶启明、张亚尼、戚再玉、王春哲相继被枪决，64 名工商巨头被逮捕。蒋经国踌躇满志，公开演讲道：“ 在上海应当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 ”形势于孔令侃极为不利。

10 月 3 日，有关“ 扬子案 ”的消息不胫而走，迅即传开。上海、南京、北平各家报刊争相报道。《申报》以《抄获扬子建业物资呈候经管当局核示》为题，《大众新闻》以《首席豪门一大杰作孔令侃惊人囤积案真相》为题，作了详细报道。也有的报刊称扬子公司为“ 某大企业公司 ”而称孔令侃为“ 某大豪门少爷 ”，语焉不详地作了报道。据报刊披露，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有新型汽车近百辆，呢绒、西药、钢铁、颜料、玻璃等三四千箱，种类不下三四百，把占地七八亩的仓库堆得没有一丝空隙。社会震惊了，市民震惊了！舆论界哗然，人们或拥向经济督导办公室，或投书报刊，或寄语蒋经国，要求“ 清算豪门！ ”《大众新闻》杂志说，大老虎不打，则“ 小老虎死得太冤枉，中老虎牢得（牢里）要叫屈 ”。

10 月 8 日，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委能在谓、金越光抵沪。监察院诸公这一次不甘“ 痴聋 ”了，“ 扬子案 ”发后即在南京公开宣称要彻查。一年前监察院曾过问“ 扬子案 ”终因豪门权贵干政而受挫，因而对扬子公司早就有气，想借彻查之机刹一刹孔令侃的威风，且舆论的压力也使监察院不得不作出反

应。孔令侃和扬子公司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

但孔令侃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此人精明能干且心狠手辣，为达攫取巨额利润，哪怕是嫡亲娘舅宋子文。也要狠杀一记，1946 年那一幕甥舅夺标的丑剧便是明证。此次囤积居奇，本想发一笔横财，如何甘心束手就擒？

就在扬子公司囤积物资被查封的当晚，有关查封的消息就通过电话传到了南京。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在其旅华回忆中所记：“ 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市。翌晨（10 月 1 日）飞沪。 ”至于孔令侃如何求援于姨母，外人无从知悉，总之宋美龄飞沪是事实。据《大众新闻》杂志云：此案一经破获，南京便飞来一位“ 太上人物 ”，此人与孔家有极深渊源。“ 太上人物 ”即指宋美龄。孔令侃不仅求援于宋美龄，而且还亲自登门拜访上海市长吴国桢，请其为扬子公司转圜。还通过各种关系、各种渠道放出流言：查封之新小汽车非扬子公司所有。10 月 2 日，上海警察局发言人“ 正式发布 ”扬子案时，有意回护扬子公司，说道：“ ……所抄查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 ”。又特别说明：“ 所囤大批汽车并非孔令侃所有 ”。10 月 3 日，《申报》亦发消息云：“ 至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及呢绒等，则并非事实。 ”孔系的《时新晚报》还写了社评，将扬子公司的问题洗刷得干干净净。

孔令侃深知蒋经国那一关不好过，硬顶只会把事情搞糟，迂回周旋方可拖延时间。于是，他写了一封称兄道弟的信给蒋经国，为自己百般辩解，说扬子公司所有物资都已“ 合法登记 ”，措辞之中似认为倒是查封他的仓库违反了法律。10 月 9 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抵沪。有关方面曾把“ 扬子案 ”提出陈诉。孔令侃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直接请宋美龄出马。据《大众夜报》1948 年 10 月 9 日报道，当天上午 10 时，宋美龄亲自驾车“ ‘ 携 ’孔令侃晋谒总统，孔氏御灰西装，神态怡然 ”。另据曹聚仁的记载，“ 当宋美龄带着大公子（孔令侃）去看蒋先生的时候，经国已经束手无策了 ”。宋美龄请来蒋介石，将蒋经国训斥了一顿，指责蒋经国“ 太露！过火！ ”蒋经国无奈，只好偃旗息鼓，对外界则称“ 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 ”。故丁依《蒋经国传》称，“ 第一夫人 ”直接干预扬子案，使该案追查不下去，这正是“ 不争的事实 ”。嗣后，《大众夜报》、《正言报》因热衷报道扬子案消息，被迫停刊。

孔令侃又恢复了往日的威风，悠悠然安居若素。他还畏惧什么呢？孔令侃不禁得意起来，从此更加有恃无恐。 12 月 21 日，国民政府监察院发表了对扬子建业公司囤积案之纠举书，全文长达 12000 字。书中道：“ 公司总经理孔令侃有仗势逃税，囤积居奇，非法牟利之嫌，扬子建业公司应受停业处分，其涉及司法部分应移送法院办理。 ”（原档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这一纸空文，孔令侃根本不予理睬。此后，法院又多次传讯孔令侃，他拒不到庭，舆论界虽议论纷纷，却也奈何他不得。

轰动一时的“ 扬子案 ”不了了之，孔令侃依靠家族权势，终于“ 化险为夷 ”。

冯敏

蒋桂上海鸦片争风案

军警双方相互攻讦

侦查队拿获大批烟土：警备司令部侦查队于 13 日得密报，招商局江安轮将由汉口私运大批烟上，于 21 日晚上到沪。即派侦探往查，共查获烟土二万两许，即移载小轮运至大达码头，再用搬场汽车运回队部。现已将此项情形呈报警备司令部，再由部电报中央核办。

这是 1928 年 11 月 23 日上海《申报》曝出的特大新闻。同时，该报又刊登了淞沪警备总司令熊式辉致全国禁烟委员会的电文：

南京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张主席勋鉴：顷接敝部侦查队报告，昨晚在招商局码头，抄获江安轮夹带之烟土二万两，已饬封存，定期焚毁。除令侦查人员严密缉拿，以期净绝根源外，特电奉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鉴于朝野同声一致，吁请禁绝鸦片之害，设置了“禁烟委员会”，以厉行禁烟大政。 11 月 6 日全国第三次禁烟会议上，蒋介石亲临训词云：“禁烟一事，事关国家社会及民族生存，禁烟委员会务须雷厉风行，破除情面，实地去做。应先从中央着手，如在政府内有任何人敢于以身试法、吃烟运烟者，中央必铁面无私，严厉处置，绝无宽贷！”离蒋介石的讲话不过半月，就发生了数量巨大的鸦片走私，是谁有如此胆量？

11 月 24 日，上海市公安局通过《申报》曝出的消息更为惊人而费人猜疑，其文云：

鸦片流毒，举国共愤。据属一区报称，22 日凌晨一时许，有身着武装者三十余人，在大达码头起卸烟土。巡官李存正率警查拿，当以人少，反被掳劫，迄今仍拘禁白云观譬备司令部侦查队队部。所有烟土，被武警运往租界，无法阻止。武装运烟，国法何在？应请迅赐查究严办，以严军纪。

当日《申报》还登有市公安局长戴石浮致南京的“十万火急电”：

南京分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军政部长冯（玉祥）、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钧鉴：武装运烟，掳劫官警，计邀垂察。刻悉是项烟土，运至白云观后，立即武装向租界运去。当此厉行禁烟之日，发生此种行为，深堪骇异，应迅赐查究严惩，以申法纪。

由上面看来，警备司令部所发的消息，缉拿烟土似极为顺利，而公安局的消息中，称遇武装运烟，掳劫官警。武装运烟掳动官警者，显然系指警备司令部方面。

这次鸦片走私案的后台，是为财政部长宋子文。此君利用招商局的船只，贩运烟土至上海，由蒋介石的亲信、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保护经销。时蒋桂、蒋冯交恶日甚一日，上海市长张定璠属桂系人物，他从冯玉祥的老部下、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处，得悉江安轮运烟土到沪的密报后，通知公安局长戴石浮缉拿。戴石浮即布置警士昼夜监视水陆码头，21 日深夜，当警备司令部侦查队起卸烟土时，公安局巡官李存正带着 6 名警士上前盘查。侦查队依仗人多势众，将李存正等掳去。

警备司令部因天机泄漏，索兴先发制人，抢先播发了查获烟土的消息。同时由市新闻检查处主任、警备司令部方面代表李德钊，扣发公安局的新闻。张定璠怎甘就此罢休？便利用掌握宣传工具的优势，在沪上各报大登警备司

令部武装包运鸦片的丑闻。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社会局长潘公展又公开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揭露并指责警备司令部扣押公安局的新闻稿，及禁登戴石浮局长致南京的电报。

为了给中央施加压力，张定璠又特电蒋介石，大意谓：江安轮运土案发生以来，上海乃至全国各界群起瞩目，议论鼎沸，若非迅予追究，易启民众怀疑，万恳迅派大员来沪彻查，公诸于众，以利禁烟而慰众望。

警备司令部自恃靠山硬，公然称公安局“妨碍公务，拦路劫夺烟土”，一时之间，军警唇枪舌战，互相攻讦，异口同声，请求中央彻底查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众闹不清真假，如堕入九天云雾之中。

国府大员赴沪查究

近百年来，鸦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江安轮运土案发后，立即成了众矢之的。上海各公团纷纷集会或登报声明，同声谴责，又致电中央，请求迅速派员来上海，查明真相，严办作案者。

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国府电上海市长张定璠：“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即日派员到沪，会同沏查，依法严惩。”不日，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司法行政部部长魏道明、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王淮琛带领干员抵达上海。下车伊始，张之江即向新闻界表示说：“此案若不加严查，则不仅有丧中央威信，亦且贻笑国际，禁烟委员会亦大可撤消。”有记者问：“中央对此案有严办之决心否？”张之江不假思索答道：“有决心者有之，也有不一致的，但本人决心履行职责，彻查到底。”

张之江的本意，确实欲使此案水落石出，公布于众，以明法纪。故而他一到上海，便夜以继日调查核实，逐一审问了军警双方当事人及证人。

正当案情微露端倪时，国民政府文官处致电市政府：“奉主席谕，上海市公安局长戴石浮令停职来京，听候审讯。”这是宋子文作贼心虚，担心真相大白，向蒋介石求援。时蒋宋新近联姻，新夫人的面子总要给的；又国民政府草创，蒋氏要确保自己的地位，自然离不开宋家这根支柱。所以对宋子文有求必应，下令罢免了戴石浮，对张之江也是一个警告。

戴石浮停职候审令一出，桂系立即作出反应，张定璠致电蒋介石：“此案起因，实由职府遵国府禁烟会密令，转令公安局严缉，戴局长奉行职责，职府似宜联带负责，应请一并停职，以明责任而昭法治。”上海各公团似已揣摩得几分案中奥秘，上海律师公会、商民协会、拒毒会、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寰球中国学生会等举行联席会议，联名致电蒋介石，对戴石浮停职候审深表不满，内中有语云：“钧府令戴局长停职候审，或系运土案查讯中不可少之程序，但与戴同样当事之人，是否须经同样或较重之程序？切盼昭示大众，否则厉王监谤、秦诛偶语，恐非国府所以自处也。”

张之江依然我行我素，12 月 3 日，返回南京，对记者说：“运土案调查已告一段落，回京后，即将调查内容呈报国府，由中央处置。此案虽不能最后定论，但从调查结果看来，本人感到公安局方面理由似占上风。”他回南京后，得悉江安轮正由汉口来宁，遂去同招商局、江宁地方法院截扣了该轮，将 15 名涉嫌船员拘捕审讯。同时敦促上海警备司令部，把侦查队长傅肖先等有关人员押解来京待审。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及市地方法院也联合组成了“运土案调查委员会”，继续审理此案，并急电行政院，请求即刻查办各方涉案

人员。

12 月 11 日，报载张之江列席行政院会议，报告了江安轮运土案调查结果，并提出处理意见。然一周已过，杳无音讯，记者迭访禁烟委员会，张之江均避而不见，得到的答复是：“张主席已将具体意见呈报国府，因事关机密，在未奉国府指令之前，不能发表。”记者们忖度情况有变，事实正是这样。

惊人大案不了了之

延至 12 月 20 日，张之江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其要点为四：一、禁烟委员会接到密报，云有大宗烟土由外洋至沪，因分函上海市政府及警备司令部密拿，故此次军警双方均系奉命办理公务。二、军方侦查队先得眼线报告而往搜查，警方保安队见起卸烟土而上前盘诘，由此发生争执，实属误会。三、此次运土案，为在逃之江安轮火仓头目王道余、厨师金大生等四人所为，已着缉拿。四、侦查队抄烟土时，即不查拿烟贩，又不追究船员，处理已有未合，该队队长傅肖先复又扣留警方李巡官，应负违法之责。公安局长戴石浮未察究竟，以军方武装运土等语登报，有损革命军人之声誉，交由警察总署论处。

紧张的幕后活动，迫使张之江改变初衷，发表这一通违心的谈话后，自感愧对国人，便以“近有沪土案及明年国际禁烟大会之准备，劳苦过度，故拟稍事休息”为托词，请求辞职。蒋介石当时的主要政敌是桂系，不希望再结怨于冯系，故而慰留张之江：“该主席办理禁烟渐著成绩，肃清毒害悉心规划，努力进行，盼勿以微疴遽萌退志，所请辞去禁烟职务之事，应毋庸议。”

随之而来的是，江安轮运土案降格处理，使大事化小。此案原拟由国民政府司法院直接审理，司法院长王宠惠称：“因案发沪上，为管辖及调查证据便利起见，应归上海地方法院受理。”

1929 年 1 月 7 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江安轮运土案，各人所供大同小异，均称烟土由在逃的火仓头目王道余等 4 人装载船上。至于货从何处来，运往何处，属何人等等，一概不知。1 月 16 日，审判长堵福曜宣判云：“据各被告及证人供认证实，私运烟土主犯为王道余、徐阿大、金大生、李元子，案发时业已外逃，应予缉捕归案，所有烟土予以没收。王建美、王

建实、吴秋生、王德文帮助贩运烟土，触犯刑律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各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其余王忠明等，尚未构成犯罪，当庭释放……”

一个半月后，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节节胜利，上海市长张定璠“因病乞退”，自请辞职。4 月中旬，桂系被彻底击败，李宗仁、白崇禧败回广西，国民政府下令对张定璠严缉究办，至此，蒋介石取桂系而代之，掌握了上海党、政、军、警全部大权。轰动一时的江安轮运土案就此销声无闻，运土案的后台宋子文未伤一根毫毛，武装包运烟土的主犯熊式辉也照样当他的淞沪警备总司令。

陆茂清

断送宋子文政治生命的黄金风潮案

1942 年 1 月，当美、英、荷军队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的时候，中国军队取得了歼敌 10 万余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美国政府看到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巨大作用，在 1942 年向重庆国民政府主动提供了 5 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以支持中国战时财政。国民政府用其中的 2 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约合市两 568.7 万两。加上孔祥熙早先购存美国的价值 2000 万美元的黄金，中国政府在美国存放了约 600 刀两的黄金。

1944 年，盟军在抗日战场上取得了制空权，原存放美国又转运印度加尔各答的黄金开始空运回国。行政院、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随即于当年 9 月开始举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即储蓄人按当日牌价在银行存款，到期取得黄金。这项存款因每日牌价不同，导致投机之风猖獗。

1945 年 3 月 28 日，财政部长俞鸿钧召集中央银行等各重要行、局的负责人，宣布从 3 月 29 日起，黄金储蓄价格从原来的每两 20000 元提为 35000 元。这时，各银行已过下班时间，第二天又是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照例各单位停止办公，所以财政部并不担心出什么漏子。但是，座中有人泄漏了消息，于是，当晚，各银行、公司、企业、机关互相串通，连夜办理黄金储蓄业务，因时间短促，筹不到现金，竟用空头支票、银行间互相流通用的本票订货，一夜之间，售出黄金万余两。

此事被新闻界揭露，轰动全重庆，当局被迫宣布核查，揪出了几个小角色：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琨因泄漏消息被判刑三年半，中央信托局业务处经理王华因为局中女同事哭闹，大家合伙舞弊购买黄金，亦被判刑。另外一个被审判的主角是中央信托局经办黄金储蓄的主任戴仁文，他用公家存款购入黄金 50 两。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也被揪出判刑。

但是，上述被判刑的只是小鱼，大鱼们纷纷脱网而出。大业公司经理李祖永在宣布加价的当天购入黄金 3300 两，可他身为杜月笙的徒弟，俞鸿钧的亲信秘书，不予追究。钟谔是中央信托局局长，该局舞弊最严重，他自己也捞了不少好处，可当局认为，把他揪出来，有损政府形象，结果“从缓处理”。时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杜月笙购入的黄金更多，事发后舆论攻击激烈，他就把总经理杨管北留下顶罪，自己乘军用飞机避往安徽屯溪。当时，屯溪属第三战区顾祝同管辖，因受日军包围，早就与重庆断绝了交通，杜月笙乘坐的飞机竟有战斗机护航，可谓神通广大。

由于此次黄金风潮，担任行政院长十几年的孔祥熙被迫辞职，原先在 1933 年 10 月被孔排挤下去的宋子文复出。宋以此次黄金风潮中投机严重，下令凡购买黄金存款的储户，一律“捐献”四成给国库。当时，“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共 2195553 两，国库得捐献 820468.8 两。当时大户得到消息，早将黄金取走，被迫捐献者多是中小储户，很多人连本钱都没有收回，纷纷破产。对于这种巧取豪夺、不守信用的行径，舆论给予强烈的抨击。为挽回民心，国民政府于 1945 年 6 月停止黄金储蓄，并禁止黄金自由买卖。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举国欢庆的气氛中，黄金储蓄和期货买卖的骗局被淡忘了，这一骗局的主角宋子文，在上海举行的民意测验中，竟当选“国内十大政治明星”第一名，远远领先于居第八、九名的毛泽东、周恩来。此时的宋子文，握有黄金 900 余万两，外汇 10 亿多美金，并且有望与美国达成 20 亿美元的贷款协定，人望之重，在国民党内一时难有几

人与之相比。

但是，蒋介石在《孔庸之先生事略》中却写道：“ 然当其（指孔祥熙）辞职以后，国家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 ”这是怎么回事？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和美军剩余物资，价值达 100 亿美元以上；又将实际为 1：25 的法币对伪中储券比价改为 1：250，捞取了不少于 100 亿美元的不义之财。大量回笼了货币，遏制了抗战后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并进而使物价骤跌，以至信用紧缩，工商业生产萎缩。宋子文于是组织黄金价格评定委员会，逐日公布买卖价格，指定中国银行在重庆买卖黄金。到 1946 年 2 月 28 日止，共买入 68.5 万余两，卖出 22 万余两。这一政策实施得非常成功，制止了物价下跌的趋势，工商业生产逐步得以恢复。然而，物价调动以后，又呈现了急速上涨的势头。社会游资因投资环境恶劣，纷纷转入流通领域，大肆抢购物资，囤积居奇，逐渐形成了投机风潮。美国顾问杨格向宋子文建议，向社会大量抛售黄金现货，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宋子文看到上次黄金政策很成功，欣然同意再次实施。1946 年 3 月 4 日，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出售黄金。

中行总裁贝祖诒、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是抛售黄金的实际主持者。他们选择了三家金号同丰余、大康润、大丰恒和两家银楼方九霞昌记和杨庆和发记作为抛售黄金的代理人，以两种方式向市面抛售黄金：一是明配，每天上午 10 点，由业务局公布牌价，上述五家金号、银楼申请当日购进的黄金数量，由央行配给，下午收市后，各配售金号、银楼将价款上交国库；二是暗售，当时市场抢购黄金之风甚炽，明配的黄金总是不敷需求，于是有黑市的产生，中行就按最高黑市价格委托上述几家金号、银楼向市场抛出大量金条，以压制黑市。当时五家金号、银楼的总资本为 6770 万元，从 1946 年 3 月到 1947 年 2 月黄金停售为止，共售出黄金 850 万两，以 1946 年 3 月每两平均价 156 万计算，值 132600 亿元，以如此之小的本钱，做如此之大的生意，简直是骇人听闻。

詹莲生是上海金业同业公会主席，同丰余经理，他是抛售黄金的主办者，其余四家的配售、暗售额均由他决定，并由他经领。每天中行决定牌价后，林凤苞、杨安仁就用专线电话通知詹，詹就这样操纵了市价，上下其手，不知赚进了多少。詹莲生还捞到另一项大油水，即改铸金条，当时中行库存金条都是 400 两一块，市面上出售的是 10 两一条，贝祖诒就以每条 3 分的火耗委托詹莲生改铸。据詹自己后来承认，每天可得 240

两火耗，总共得了 8.6 万两之多。不过他又说，赚头大，应酬也大，所以并没有得多少金子，想必是分给有关当权者不少好处。詹在 1946 年 3 月到 1947 年 2 月的一年中，总共经销 450 万两黄金，除了火耗，还有 3 分的利润，又得了 13.5 万两左右，有人说他总共得了 10 万条，即 100 万两黄金，未免失之夸张，不过赚进巨额黑钱是可以想见的。为何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能有如此神通呢？

原来，同丰余的后台老板是徐补苏，徐是上海金业中的真正老大，杜月笙是他师傅，为避人耳目，由詹莲生出面主持。詹莲生和贝祖诒是苏州同乡，又是亲戚，贝祖诒家原先做颜料生意，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财，詹莲生就是当时贝家的经纪人。贝祖诒哥哥贝润孙是宋子文老朋友，早就引见贝祖诒与宋相识。贝祖诒后来留学美国，与宋子文是同学。贝祖诒精通国际汇兑，

当时美国人说中国只有半个国际汇兑专家，指的就是他。宋子文对他很信任，做中国银行董事长时，任命他为纽约、香港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当了行政院长后，又任命他为中央银行总裁。林凤苞、杨安仁则是贝任职中国银行时的亲信，贝升了官，他们也把持了中央银行的要害部门业务局。就这样，徐、杜、詹、宋、贝、林、杨结成了一张网，在黄金抛售中翻云覆雨，直接引发了黄金风潮。

本来，自 1946 年 3 月开始抛售黄金后，直到 10 月，价格波动颇小，自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只好靠滥发纸币来支撑，通货膨胀，人们纷纷抢购黄金以自保，以致黄金销售价格迅速上涨，黄金售价上升，诱使五家金号、银楼售出更多的黄金，于是黄金库存日渐减少，外间听说消息，赶紧抢购，黄金价格于是又升，形成了恶性循环。

到了 1 月中，上海中央银行国库库存金块终于售罄，宋子文命令用运输机将重庆库存的厂条也运来抛售，市面见渝条出现，知道国库黄金已临枯竭，更加疯狂地抢购，价格攀升到 533 万元，宋、贝见形势不妙，于 2 月 8 日下令停止暗售。暗售一停止，黑市无人压制，直窜而上，竟达 1000 万元之巨，即使如此之高的价格，仍比物价涨幅小，所以，黄金市场出现只有买方，没有卖方的局面。

当时，黄金抛售只在上海一处进行，其它各地只有牌价，买金人在当地中央银行交款登记，随时到上海领货。本来，各地牌价比上海只略高，宣布停止暗售后，各地牌价比上海高出 200 万元左右，于是，各地投机者纷纷赴沪，加入抢购的洪流。广州、重庆、武汉、南京、北平等大城市到上海的飞机常常被包占，以致机票价格也同黄金一起飞升。

各大公司、大企业不光停止生产，把所有的资金拿出来搞黄金投机，而且还向四行大量贷款，从 1946 年 3 月到 1947 年 2 月，四行贷出此类“生产贷款”650 亿元，其中 1946 年 12 月一个月中就贷出 560 亿元，各行对这些贷款的用途未作核查，以致无论抛出多少黄金，市场购买力仍保持旺盛势头。

军队也加入了抢购狂潮。各部队长官纷纷将军饷运往上海，抢购黄金，甚至已到徐州的运钞专列也掉头南下。各部为争取交通工具，暗贿明争，竟至交火，更有将所部士兵派往上海参加抢购的。各抛售点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殴斗吵骂之声不绝于耳，简直成了疯狂世界。

在抢购黄金的带动下，市面上又兴起抢购美钞外汇狂潮，仅 1947 年 2 月初的十一二天里，美元价格就涨了一倍半。美元抢购与黄金抢购交相促进，使美元、黄金库存急速减少，到

1947 年 2 月中，黄金只剩下 230 余万两了，美元则濒于枯竭。蒋介石闻讯大怒，中央银行被迫于 2 月 15 日正式公告停止抛售黄金。

抛售黄金导致如此结局，在国民党内部引发了倒宋运动：张群为首的政学系因其成员张嘉璈曾被宋子文从中央银行中排挤出去，要报一箭之仇，更想借此机会占据久已向往的行政院长宝座；C·C 系在财政金融上，先遭孔祥熙打击，又被宋子文排斥，急欲利用此机改变局面；孔祥熙一派被宋子文赶下台，想卷土重来，自然不遗余力；连一向以“养老院”闻名的监察院，也想乘宋已成众矢之的之机，踏上一脚，显示自己并非无所事事，以便把一些原先只停留在纸面上的监察权拿过来。

1947 年 2 月 16 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禁止黄金及黄金制品在市场买卖，禁止黄金作为货币在市面流通，冻结黄

金价格。并决定由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等组织调查团，调查军人在风潮中挪用军费抢购黄金情形；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织“经济监察团”，调查商民投机倒把，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由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监委调查公务人员贪污渎职的情形。

郑介民主持的调查很快有了结果，但蒋介石对军人向来袒护，在前线激战的时刻更不愿触动他们，以免激起变故，结果，军人无一人受处罚。

宣铁吾发动军警，在上海挨家挨户搜查，大户当然没事，并多中小户本来是想避免通货膨胀损失的，结果却被没收充公，有些人还被抓去坐牢。短短 10 余天中，“经济监察团”就收获黄金 20 多万两，美金 120 多万元，还有价值 30Q 多亿元的棉纱。

何汉文等四监委对詹莲生和同丰余进行调查，发现同丰余做如此大的买卖，连帐本都没有，平常到中央银行领收黄金，并不按规定用现金缴款，而用支票；到国库领金，没有填写有关票据；董事会名单中还有两个假名不知何人；2 月 8 日最后一次抛售黄金时，同丰余承购 540 条之多，上交价款中有一张 25 亿元的票据，并未兑现，又没有换成转帐声请书以便日后兑取。四监委再向上海社会局查核，发现同丰余居然未经注册，询问该局为何不加查封，该局表示，贝祖诒已打过招呼，要他们不要管。于是四监委又问贝祖诒，为何选择一个未经立案的非法金号抛售黄金，贝表示，詹是金业公会主席，熟悉情况，信用好，其它的金号背景复杂，不可靠。

四监委决定把突破口选择在詹莲生身上。开始，詹大谈其与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对高达 20 余万两的火耗和销售利润直言不讳，对黄金交易的内幕也当趣事来讲，直到何汉文把笔录交给他要他签字，他才有些慌张，对何说，他讲的话都是私人谈话，随便讲的，不当之处，还请何委员多包涵。

当天晚上，杜月笙即派他的徒弟、立法委员王新衡请何吃饭。王是立法委员，又是军统少将特务，他对何汉文说，詹莲生太可恶，当然要办一办，但是官场的事，不必太认真，反正今天讯问的只有你一个，不妨把笔录改改，叫詹莲生拿出 200 根条子来打点打点，大家都很方便，并说他的话就是杜月笙的意思。何婉言推诿。以杜月笙往日的威风，随便示意一下，何汉文就会照办。可这时社的势力大不如前了，四监委看透了杜月笙的虚弱本质，决定对詹莲生等人继续调查，不久，将黄金风潮案中的舞弊情形送交上海地方法院。在全国舆论的压迫下，法院判詹莲生 12 年徒刑、判林凤苞、杨安仁 7 年徒刑。

监察院将詹莲生、林凤苞、杨安仁三人绳之以法，博得了舆论界齐声喝彩，人们称何汉文等人为“铁面御史”。不久，监察院数十名监委，由何汉文领衔，又提出了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案，并将宋、贝玩忽职守，收受贿赂，勾结商界人士以牟取暴利的调查报告全文公布。立法院院长孙科看到这份报告，大为兴奋，因为他觊觎行政院长宝座已久。于是，他召集了立法院临时会，召来宋子文、贝祖诒进行质询，立法委员根据监委们的调查报告，展开了尖锐抨击。宋本来中文就不如英文流畅，此时理亏，更加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恼羞成怒，中途就退席。贝祖诒见形势不妙，就把责任往宋子文、林凤苞、杨安仁身上推，说自己上承宋的裁决，下由林、杨执行，对于舞弊情形并不知情，并抖出了许多内幕。

监察院、立法院虽然掌握了宋子文失职的材料，又有舆论支持，可是并不知道如何处置，只好去问蒋介石。蒋批示道：“事到如今，有何办法！”

众监委、立委见蒋有意保护宋过关，只得悻悻而退。

宋子文有老蒋保护，如果此时能立上一功，也许还能保住院长宝座，可是，祸不单行，他手上的王牌即美国 20 亿美元贷款又出现了问题。这笔贷款是抗战末期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向时任中国驻美采购团团长的宋子文承诺的。当时，美军正在西太平洋逐岛逐岛地艰难推进，伤亡很大，美国防部预计，对日战争必将持续一长段时间，这样，中国战场就具有牵制 200 万日军的重大战略价值。没想到，原子弹和苏军出兵东北使日本迅速投降，中国战场的价值一落千丈。同时，美国国内对蒋介石政府的印象从“民主廉洁”变成了腐败专制，形成一股强大的要求国民党变革的舆论潮流，孔祥熙、宋子文这种以裙带关系取得要职的人尤其被视为变革的对象。中美 20 亿美元贷款谈判就此陷入了僵局。本来，蒋以宋代孔，重要原因就是宋的形象颇得美国人的好感，有望取得此笔贷款，现在宋在美国人眼里也失去了光彩，索性罢免宋子文，也好对舆论有个交代。

1947 年 3 月，蒋介石批准了宋子文的辞呈。在早春料峭的寒风中，神形憔悴的宋子文裹着大衣，缩着脖子，登上了前往广州的飞机。蒋介石没有忘记这位内兄过去对“党国”的贡献，特别是西安事变中的救命之恩，派他去当广东省主席。可是，死老虎人人要打，监察院又调查了他贪污外汇和侵吞美军剩余物资的事实，再次提出弹劾。宋子文虽然不甘示弱地撑了一段时间，终究觉得无趣，不久，黯然赴美。

蒋介石在台湾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时，把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列为一个主要原因，以致孔祥熙死时，亲撰哀思录，而宋子文死时，不提一字。

张生

活财神绑架交警轰动石头城

马路一新闻

1947 年盛夏的一天，晚 10 时许，我在《南京人报》发稿完毕，偕友人手扶自行车漫步街头。此时白天酷热已渐散去，凉风习习，令人心旷神怡。

当我们一行来至太平路白下路十字路口，突见岗亭红灯亮处，一辆黑色轿车闯过红灯从斜刺里直朝太平路方向疾驶。说时迟，那时快，仁立岗亭下的一名交警，纵身一跳，跃至大路中央，双手平举，拦住轿车去路，厉声喝道：“ 这样开车要出人命的！ ”

交警这一正当指责，未使肇事司机认错，他却跳下车来。气势汹汹指着交警鼻子吼道：“ 你眼睛啦，敢拦我们的车。 ”

司机的蛮横行径，当然引起交警不满，于是交警跳上汽车踏板，严令司机将车开往分局去……

讵料交警话音未落，车中又窜出一年约五十左右的中年绅士，一身毕挺洋服，气宇轩昂，他二话不说，便将手一挥，命令身后一名壮汉，前推后揉地硬将交警扭进轿车，一溜烟掉转车头朝中正路来的方向驶去。

斛斗巷一号之谜

这突发的马路新闻，引起街头围观群众的哗然，也激起我强烈不平。我不及向友人告别，即飞身上车，拚力猛踩，尾随轿车之后，跟踪而去。

老南京众所周知，当年中正路是条阔不及数丈的马路，靠太平路一段，虽有一段路面已铺设柏油，朝东多数路面，仍是未经整修的碎石路。汽车车速在这里受到限制，我跟踪得以从容。

汽车开了约 10 分钟，车子折进一条深巷，朝一幢一抹红墙花园巨宅径直开进。

我凭藉巨宅廊前门灯的余辉，看到大门一块铜牌上写着：斛斗巷一号王宅。

我屈指将国民党军政各界知名显贵历数一遍，未发现在这些达官贵人中，有位王姓头面人物。那么斛斗巷一号王宅，住的是何等角色？有此斗胆敢在堂堂首都，公然绑架值勤交警！为此，我骑车来到斛斗巷管区的首都警察厅中区警察局。

他——是谁

未进警局大门，便听得警局里一片嘈杂之声，进得局门，

只见众警士围集前厅中，七嘴八舌，群情愤激。有的说，耳闻失踪交警是被一辆黑色轿车绑架而去，但此车开往何处，车主是谁？却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就在此时，我悄然走进局长室。局长老李和我因新闻采访打过多年交道，也算是老朋友了。因此未等老李发问，我便问道，你局管区斛斗巷一号住的是何样人物，现在何处担任要职？

李局长善于察颜观色，对我所问十分敏感，他便向我反问道，难道绑架

我局交警弟兄的就是他！

他是谁——？李局长对此作了一番介绍。

他说，斛斗巷一号这幢花园巨宅，原是何应钦部长建造，后不知什么原因，何部长将此巨宅赠给了我国著名财神孔祥熙，后又不知啥原因，孔祥熙将此宅赠给他一位至亲，这就是，现任中央银行常务董事、专管全国金融业巨擘、财政界新贵的王一规。

王一规其人，虽在当年国民党首都显要中，名不见经传，在军政两界中，也数不上是一流人物，但他在财政金融界，却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贵。平时财大气粗，骄横跋扈，财界称之为财界大亨，孔府娇客……。

李局长先斩后奏

听罢李局长一番介绍，我义不容辞将刚才于太平路所见一幕，原原本本和盘托出，并将自己骑车跟踪的事实作了说明。

李局长不听也罢，听后拍桌而起，愤然言道，“好一个王一规，你竟敢欺到老子头上来了，我拼了这顶乌纱帽不要，也非碰碰你这活财神。”

事实上，老李也非寻常之辈，他不仅身居首都中区警察局长要职，据闻他的连襟此人来头大，系当年中国政府驻法大使魏道明。

也许正由于此，李局长才有此斗胆，事前不向上级首都警察厅汇报，便当机立断，来个先斩后奏。以“违反公务绑架交警”罪，当即下令拘捕中央银行常务董事王一规。

命令下达，全局振奋，认为局长为弟兄们撑了腰，出了气。但经过一番密商，认为就此带领武警前往，势必酿成更严重冲突，因王一规府中有保镖卫士护院，警方若强行进入拘捕王一规，很可能造成流血事件。因此一致决定捉拿王一规，只可智取，不可强捕。

首先由一名警官带数名便衣，潜伏斛斗巷王宅左右，又各派武警二名守候该巷南北两端，深巷周围加派武警巡逻，其余值勤警士被派往沿途监视联络，多数集中分局待命。只要王一规不论何时乘车外出，警方以鸣笛为号，即对其施行拘捕。

也许活该要出事，当晚已是 12 时许，一辆黑色轿车从斛斗巷一号开出，王一规正端坐其中。于是随着一声笛响，南北两端武警迅速进入斛斗巷一号警戒，封锁了王宅的出入。当车刚驶离巷口，守候街口的众多武警蜂拥而上，一面厉声喝令停车，一面持枪迫使车中二名保镖下车，然后逼使司机将车开往分局。

此时警察局里另有一番布署，李局长已退居幕后，拒绝会见一切人等，其中也包括局长的顶头上司、首都警察厅长韩文唤。而捕后的王一规已成瓮中之鳖，该局警官早在看守所做了手脚，暗中告知在押人犯。一旦有位穿着考究、50 开外年纪的绅士关押进来，众犯可“各尽所能”，对他好好“招待”一番，但警官严格晓谕，切不可伤及他的皮肉……

众犯当然唯命是从，按计而行。因此当王一规被强行推进拘留所后，这伙盗窃犯、吸毒犯、流氓地痞，就将王团团围住，有的揪王的头发，有的扭王的两耳，有的将他扳倒在地，有的朝王脸上吐痰，有的甚至将一桶小便泼在王身上……。

顿时间，活财神成了癞皮狗，狼狈不堪。这场恶作剧上演近 10 分钟，警

官怕众犯有所闪失，造成伤势，使工作被动。于是警宫装模作样大喝一声：不准纠众肇事，如敢违命，严惩不贷。

但此时此刻的中央银行常务董事、孔部长府上娇客、财界大亨、活财神王一规，昔日威风一扫而空，跌坐狱中一角，哼哼哈哈，叫苦不迭，呼痛不止。

警方财界各显神通

与此同时，警官已率领武警进入王宅，一方面向王家亲属宣布王一规因违反公务被拘捕；一方面从王家救出被绑架的交警。但当这名交警返回警局时，众警发现他不仅警服被撕破，且头脸上都有血痕，胸腿部还淌着鲜血。因此兔死狐悲，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为此有部分岗哨已主动撤岗回局。

但是由于王一规被捕消息的不胫而走，王家又不断向各界亲友呼援，在国民党部分大员中引起震动，自当晚深夜至翌日上午，警局电话声响个不停，来警局说情的不断，其中有南京市参议会议长、参议员，银行首脑、市商会会长，也不乏军、

政、财各界的头面人物，可是他们都吃了闭门羹，因这时警局门前已设置两架铁丝网挡道。他们被告知：“局长因公外出，如有公事请来日到局办理。”

这时，首都警察厅长韩文唤终于由后台走到前台，他作出警局立即放人的指令，不料也被警方“公事公办”顶了回去。事态在不断发展，王一规一方正通过各种渠道力救，并以种种藉口向警方施加压力，甚至散布谣言，声称警方已混入“奸党分子”，从中煽动，企图以此打击李局长及支持正义的各界人士。

警局一方为得道多助，也向各方求援。李局长也向其连襟魏大使求助，并于案发的当晚，以电话要求首都报界支持。惜乎，各报因为时太晚，多数日报已截稿拼版付印，唯有《南京人报》以头版头条一整版篇幅，独家报道了《活财神绑架交警风波》轰动了石头城，尔后，首都、上海、北平各大小报刊也纷纷转载，一时间，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活财神、财政金融巨头王一规，成了南京百万市民茶酒饭后闲话的新闻人物。

活财神超解

财神起解，是王一规绑架交警风波又一个高潮。据有关条例规定，警局拘押人犯不得超过 24 小时，不然，警方必须于 24 小时内，将被拘人犯或释放，或对人犯犯罪事实，取得有关罪证、连同人犯口供笔录，移送有关检察院提起公诉。警局对此岂敢怠慢，乃于拘押王一规 10 几个小时后，即对王正式进行预审，受害交警、广东籍罗某出庭作了控告，并将血衣、血裤及经医生签证伤单当庭验证。王一规对此均供认

不讳，警局一一皆做了笔录，然后警方依法于次日午后，将王一规起解首都地方检察院提起公诉。

本来从坐落太平路中段的中区警察局，前往白下路首都地方检察院，仅一箭之地，步行只需 20 分钟，可是警方为一打财神大员的专横官气，为受伤弟兄出气，竟将王一规押解绕道杨公并、火瓦巷等地而行，好像游街示众一

般。是日正是酷暑高温天气，烈日临空，王一规衣冠不整，一件灰色派力司西服好像挂在身上的麻袋片，头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狼狈之状，无异舞台上的小丑。警方又毫不留情为王带了手铐。4 名干警各持短枪在后，威风凛凛，一路呼么喝六，马路两旁行人和商店职工，睹此情状，又得知押解人犯乃是平时作威作福的财神，无不拍手称快，有的甚至借骂王一规，大泄对国民党贪官污吏之愤。少数记者也抓住难得机会，在王一规起解沿途，抢拍镜头，王一规那缩头缩脑躲躲闪闪之丑态，都被一一摄入。

法庭内外

王一规绑架交警案，警局提起公诉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开去。因此当日下午首都地方检察院法庭内外，早已人满为患。人们庭前纷纷议论推测。有人认为，众怒难犯，检察院不敢明目张胆循情庇护王一规，当庭必将王关押；有人却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检察院决非干净衙门，尤其对活财神准会网开一面，当庭释放。

检察院开庭结果，作出了“交保释放，随传随到”的决定，当庭保释了王一规。这时法庭虽出现了一片嘘声，但又奈何不得。实际上，这无异是纵虎归山。

活财神造谣惑众

王一规经保外释放之后，他如鱼得水，因此就在王释放的次日，由王的法律顾问、南京著名律师傅况麟出面，在首都各大小报，刊登一则“重要启事”。内容共三点：

一说，王一规是受害者；二说，此次“风波”的掀起，系因某报记者敲诈未遂，勾结个别警官兴风作浪；三说，为维护王一规合法权益，傅况麟大律师已被授权向首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记者侵犯人权……

启事一经刊出，谣言纷纷扬扬，不明真象群众，难免不受“启事”的蛊惑。因此某报记者受到各方指责，尤其首先刊发此一新闻的《南京人报》首当其冲。

于此同时，王一规还通过他的法律顾问傅况麟大律师，对与此案有关人员，进行软硬兼施。一方面向首先跟踪此案采访的记者，进行收买，妄图封住记者的嘴巴！（傅律师在南京创办过京华中学，该记者原系该校学生）交警小罗，已被重金收买逃回广东原籍去了。因此警局控告王一规绑架交警伤害罪无法成立，警局也因受到强大压力被迫撤回了公诉，李局长也为此明升暗降调回警厅任职。至于某报记者被诬敲诈未遂案，因罪证不足不予起诉。

如此这般，这件轰动当年石头城、延续近一月的活财神绑架交警风波，终因钱能通神而风消云散，违法者照旧逍遥法外，作威作福……

罗浮

南京政府覆亡前蒋李的“窝里斗”

一蒋系、桂系宿怨萌发

国民党内蒋系、桂系之间的龃龉由来已久。权力之争、地盘之争，进而数次兵戎相见。八年对日抗战，在民族利益第一的前提下，勉强结合在一起，抗战一结束，在权力分配上，双方矛盾又突出出来。白崇禧虽当上了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但军事大权完全操在总参谋长陈诚手上。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是一个有职无权的空头官职。这位一级上将，抗战中曾喧赫一时，此时蛰居故都，百无聊赖。

迨至 1948 年底前后，国民党政府濒临总崩溃，蒋系、桂系之间夙隙萌发、龃龉重现。他们之间由暗斗转为明争，矛盾趋向白热化。

白崇禧由国防部长转任“华中剿匪总司令”，拥兵数十万自重。李宗仁当上副总统后，由北平移居南京，活动频繁。一个雄踞华中，一个坐镇都门，遥成犄角。蒋系中所谓精锐部队，已在几个大战役中，损失殆尽。蒋介石此时对桂系已无可奈何。

二寄希望于异邦总统选举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事上已呈一蹶不振势态。美国对华态度也随着中国国内局势变化而急转直下。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撤退驻青岛全部海军，紧接着所有驻华美国顾问也陆续撤退回国。

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这时正趋于白热化（1948 年 10 月—11 月间）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在竞选演说中，扬言当选后要大力援华，甚至出兵等等。蒋介石此时正处在一筹莫展的危境中，美国“二杜”竞选总统，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杜威的当选上。“重要军话台”值班人员告知我：“委员长非常关注美国总统的选举，命令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随时把选举情况用电话告之委员长。”1948 年 11 月的一天，就是美国总统选举揭晓的一天，董显光、王世杰二人不时地把选举情况向蒋报告。

深夜，董显光叫接委员长电话，他向蒋报告说：“……杜鲁门得票最多，蝉联下届总统。”只听蒋在电话中“哼哼”了两声，挂断电话，立即改叫外交部长王世杰电话：“雪艇兄，马上发电报，祝贺杜鲁门蝉联总统……”

蒋接着派夫人宋美龄，以总统特使名义飞美，名为祝贺，实为求援。此行结果，宋在美遭到冷遇，一无所获，黯然回国。

三 总统小休　面授机宜

1949 年元旦，蒋介石、宋美龄联名发表一篇《元旦告全国国民书》。文告中最后有这么一句：“只要我俩一息尚存，决与共党周旋到底。”

讵料不出半月，元月十五日，蒋正式宣布“小休”。这一新鲜名词，既非总统辞职，也非解甲归田，把国人弄得都有些恍惚莫解。

总统新闻秘书曹圣芬随即在新闻发布会上释称：“……以总统宵旰勤劳，身心疲惫，小休三月，藉资将息……”这一解释，是补充强调了总统不是辞职下野。所以副总统李宗仁，在总统小休期间，按宪法规定，只能代行总统

职权。

同年元月十七日晚，交通部电信局人事室主任马××约我在杨将军巷他家吃饭。在座的有电信总局及二区管理局几位局长和处长们。饭后大家正在玩牌，约近 10 点钟，“ 重要军话台 ”值班邱桐阶打来电话给我：“ 军务局俞局长在宁海路公馆等你，马上去。 ”

我借乘二区管理局姜局长汽车，直趋俞公馆。我到时，俞济时一人独坐会客室等候。勤务兵把我引入后，随手关门出去。一见面，他先让我坐下，寒暄了几句，就用一种深沉语气说：“ 我们日内就要离开南京了…… ”我听后“ 哦 ”了两声。接着他慢吞吞，一字一句地说：“ 我们走后…… ”说至此，他顿了一会，接着说：“ 有件重要的事要你办……你跟我们很久了…… ”说至此，他又顿了一会，用眼注视着我数十秒钟。

我此时心情紧张，陡地站起，立了个正，郑重地说：“ 请侍卫长吩咐好了。 ”（我一直习惯对他用老称呼。）他摆摆手，示意我坐下。他和我并坐在双人沙发上。他亲切地并带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说：“ 委员长是很器重你的，这次还特别提到过你……不过，委员长这几天是很忙的，不打算接见你了…… ”我回答说：“ 是的…… ”他紧接着又用郑重的语气说：“ 嗣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三人，经由电话中的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 ”俞济时紧接着说：“ 我现在和你约定一下，把他们规定一种代号，即：李宗仁代号‘ 甲先生 ’，白崇禧代号‘ 乙先生 ’，黄绍竑代号‘ 丙先生 ’。 ”俞济时又规定“ 我们两人在电话中（指俞本人和我），不必称呼什么了，互报自己名字就行，姓都不必带。如你呼正元，我呼济时后，即可通报内容…… ”我听后，唯唯称是。并当面详记在日记本上。

俞济时呷了一口茶，关切地问：“ 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答：“ 家属还在南京没有走。 ”他说：“ 最近有一艘兵舰专送侍从室人员的眷属去福州，你如愿意，眷属即可随往。 ”我想我的家属是农村人，随侍从室眷属赴闽，有诸多不便，立即回答：“ 现在就走一切没有准备，恐不能…… ”他说：“ 也好，以后再想办法。 ”我又说：“ 如果一旦紧急，那就…… ”他遂爽快而又坚定地对我说：“ 那你不必顾虑，必要时我自会把你和你的眷属接走。 ”俞济时所说的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不论兵舰、飞机，他都可以随时调遣指挥。我随即站起，说：“ 谢谢侍卫长。 ”临行，他又把我叫住，让我坐下，一再叮嘱：“ 你一切要当心啊！特别是布置下面的人，要更加慎重、慎重啊。 ”我连连称：“ 是。 ”他送我到会客室走廊台阶，握手告别。

我在归途中，从汽车窗看到那些高级官员住宅，多半是漆黑一片。说不定这些花园住宅里，已是楼空人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家召集“ 重要军话台 ”人员邱桐阶、李再兴二人，把俞济时所交代的任务作了详细交代。并加重语气对他们说：“ 这是侍卫长的指示，是一项‘ 特密 ’任务，除你们三人（还有一个车××）外，绝不许泄漏给其他任何人。每天用电话向我禀报。 ”又用命令口吻吩咐：“ 你们在打电话给我时，要特别注意周围的人，例如同室的‘ 次要军话台 ’，等等。 ”还特别强调，“ 这是一个关系非浅的问题。 ”最后，并命他二人把所有情况，转知今天没有到场的另一个“ 重要军话台 ”人员车××。

四溪口遥控南京

1949 年元月二十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等人，晋谒中山陵。记得 12 年前（1937 年 12 月 7 日）那次谒陵时，虽黯然神伤，但时隔八年还是归来了。而这次的谒陵，是在兵败如山倒，内挤外压无可奈何情况下进行，此时确有说不尽离情别绪。从步上台阶，到离开灵堂，蒋一言未发，忧容满面，似乎预感这是“别时容易见时难”的一次谒陵。

蒋、宋谒陵后，偕同军务局长俞济时，新闻秘书曹圣芬，随从秘书俞国华、周宏涛，英文秘书沈昌焕，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张廷桢，陆、海、空三军武官蒋祥庆、皮宗敢、夏××，总务局长陈希曾，以及副官、武装侍卫等人，分乘两架大飞机，离京径飞奉化溪口。

我派“重要军话台”李再兴随机同往。

蒋介石虽正式宣布“小休”，离开首都南京，然而中枢凡涉及他的权力方面，丝毫没有放松。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下面略举数例：增加敷设直达溪口长途电话一对，径衔接在“重要军话台”。军事上，蒋介石每天直接跟总参谋长顾祝同通话，询问战况并作指示，或电话参谋次长林蔚。蒋并直接跟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通话，指挥调度空军。京沪机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遇事径向蒋氏请示，蒋也随时给予指示。

政治上，大至组阁问题，小至地方官员更换，蒋都不放手。行政院长一职，李宗仁原先拟请居正担任，蒋介石一再表示不同意。李宗仁无奈，改请何应钦，经蒋同意后，才正式公布，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请辞，李宗仁即准备派他自己的特工人员刘诚之接替。蒋介石获悉后进行干预，拟派一个军统方面人员接替。但刘诚之是李宗仁的亲信，担任李的保卫特工多年，派刘任首都警察厅长，早为李宗仁内定。刘诚之与南京电信局局长计舜廷是莫逆之交，刘在未接任前，即借南京电信局局长室作为他的临时办公处所。刘在局长室筹划 10 多天，专等走马上任。所以李宗仁在这个地方官更动上，不理睬蒋的干预，迅而明令发表：刘诚之为首都警察厅厅长。此时蒋虽深表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蒋嘱咐前国民政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毛曾任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是计舜廷的老上司，而且计得任南京电信局长，是毛推荐的）径函计舜廷，嘱其不要接近刘诚之，不要为其提供方便，信中有“新交不忘旧遇”等句。此事是溪口李再兴告知我的。便中我问计舜廷有否此事，计笑说：“老毛还跟我来这一套，什么‘新交不忘旧遇’……真有点……”

经济上，蒋仍加紧控制。典型的例子是，蒋要把国库存放的黄金和美钞运往台湾，遭到李宗仁和桂系权势人物的竭力反对，蒋不顾一切，饬令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速用兵舰运走。

蒋介石虽然离职，然而他的权力并未放下，事事干预，理所当然引起桂系中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在蒋氏离京一周中，李宗仁两次长途电话汉口白崇禧，召其来京商讨对策。白崇禧到京后，连日在李宗仁公馆开会，并作频繁活动。白崇禧到京的三天中，两次长途电话给隐居在湖南乡里的刘为章（斐），劝其出山辅助代总统。电话中有“德公急盼为章兄襄辅国事……”等话。但都遭到刘为章的婉言谢绝。

五矛盾升级，暗斗变明争

白崇禧返汉后，黄绍竑连续长途电话白崇禧，冀其迅速策划两湖（湖南、

湖北）一市（汉口）所有“国大代表”和两省一市参议员联名通电：一致要求蒋介石下野，正式辞职，以利和谈。

黄绍竑、白崇禧在另一次通话中，有这样的对话，白说：“已经分头对他们（国大代表和参议员）联络好了，是不成问题的。连日他们都齐集在汉口开会，最后就是发通电了……”黄说：“健生兄（白崇禧），已和德公（李宗仁）商定准备把一些重要问题的经过先在报纸上发表。”白说：“好的，季宽兄（黄绍竑），主要把他（蒋介石）不放权一事，予以揭露。这一点，最好抢在我们这里发通电之前办好见报……”黄绍竑说：“是的……我是先和你商量一下，至于在报纸发表一事，已和通讯社商定了……”

1949 年 2 月下旬，经由“美国合众社”发表了一则消息，内容有：“……对于蒋介石虽然离职，一直对于中央军政、经济……等等，握权不放，形成幕后操纵……云云。”紧接着，湖南、湖北两省和汉口市所有“国大代表”及参议员联名通电，一致要求蒋介石辞职下野，交出一切权力。

桂系所策划的一系列对策，带有激烈的攻击性，并公然在国内各主要报纸上发表。所有这些，使蒋介石颇感狼狈。正式通电下野？当然不肯。缄默下去，更为不甘。

桂系内部高层之间来往电讯（主要长途电话），统统被我们（重要军话台）所掌握，又由我提供给溪口方面。因而，蒋方对桂系一切活动，是了如指掌的。

蒋极为震怒，立派新闻秘书曹圣芬，驰赴上海活动，并选择在国内资格最老、销路最广的《申报》，发表针对桂系的如下新闻：

利用外国新闻机构阴谋者散布流言

某负责人发表谈话予以指斥

昨日报载：合众社记者张国兴 2 月 19 日南京电谓：“暂时引退的蒋总统，仍在发布命令，仍保有总统的足够权力，使渠能在未来的对中共和谈中，施用否决权。同时，渠正每日行使此等权力，俾洞开复职之门。”并谓：“蒋总统经常对国防部及中央银行总裁，发出各种指示。”该记者甚至谓：“蒋氏在引退中，仍行使总统权力，似为李宗仁的对中共谋和，以及推行激烈的政治改革，受到一定的阻碍。反动分子在蒋氏荫蔽之下，在全国施展其影响及权力，以图阻挠或破坏李宗仁所作的和平努力。并准备迎蒋复职……云云”。中央社记者顷就合众社记者张国兴所发此项电讯，叩讯此间某负责人之意见，据称：“此显然系阴谋分子利用外国新闻机构及滥用政府区域之新闻自由权利，故意散布恶毒流言，企图诬蔑蒋总统赤诚为国之纯洁与伟大，破坏其信誉，离间蒋总统及李代总统之感情，制造险恶政潮，而加深中国之危机。所幸此类分子之手法，殊为笨拙幼稚，明眼人一见，即知其用意所在，而决不致为其所欺弄也……”

在报纸上互发新闻攻讦是蒋系、桂系互相倾轧的一个新的高潮。

桂系中高层包括所有拥李派在内，非要蒋全部让出权力而后快。而蒋又死死抓住这个权力不放。在和谈代表的提名上，李有李的看法，蒋有蒋的打算。是几经往返磋商才决定下来的。蒋介石自离京赴溪口后，没有和李宗仁通过一次长途电话。而李似乎也无须再向老蒋请示。所以双方的意见，都是通过张文伯先生沟通的。

六国人瞩目之地——溪口

溪口一时成为国人瞩目的军事、政治重心。显赫权贵，军政高层，其中有述职的、请示的，京、沪、杭、甬道上，冠盖如云。

这一地区的电信，特别是溪口的电信业务，跟着繁忙起来。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张廷桢电南京电信局局长计舜廷：“嘱王正元克日赴溪口。”我当时以南京事务也相当重要，不克分身，立加派“重要军话台”邱桐阶乘飞机前往。

由于我所搜集和提供的李、白、黄的情况，在溪口方面是殊多价值的，深得蒋介石和俞济时的赞许。3 月上旬，由俞济时出面汇我交通银行即期支票一张，并附俞的亲笔信，信中多系嘉许勉励之词。

我和俞济时每次通话，完全按既定方法进行。双方拿起电话听筒，无须寒暄客套，随即各自通报名字后，我即报内容。话

毕，互通一声“再见”挂上听筒。当时揣度，这样做丝毫间隙和漏洞都没有。其实，非但有漏洞，而且一直瞒着我有一个“大缺口”存在。另文再述。

蒋介石离京后，南京出现一段不算短的“升平景象”。商店复业，外逃部分人归来。主要是受报纸的影响，什么隔江分治哪，长江天堑哪……在此期间，蒋系、桂系之间互相倾力排斥，攻讦闹剧从未稍戢，从而愈演愈烈。

桂系实力派人物白崇禧，雄踞华中，拒不配合中央军事行动，对中央军令不予理睬。1949 年 3 月间，有一艘满载军火的大轮驶往四川。装备和补充中央军驻川部队。事为白崇禧获悉，船经汉口，被其截留。这批军火，全部装备了桂系部队。

白崇禧截留军火一事，在国防部震动颇大。顾祝同电话向蒋报告。蒋听罢，未置一言，电话就挂断了。可见蒋氏气愤已极。

此时双方虽接近图穷匕首见，但究竟未达正式破裂程度，蒋只好忍气吞声。

王正元

陈布雷家人为陈求签问佛

大厦将倾　何处是旧程

1948 年，金陵秋早。栖霞山的枫叶正红，可通往中山陵国道两旁的梧桐却已叶落纷纷了。风卷残叶，一忽儿东，一忽儿西，不知何处是归程。

昔日歌舞升平的南京，如今混乱一片。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惨败后，战局急转直下，政府中枢动摇，翁文灏坚辞行政院长职。蒋介石连日在官邸召开党政军汇报会议，云集文武百官，“仍无具体挽救时局之策”，心情十分“激越”。军事上的失败，加上行政院新阁未定，又牵动财政经济，宁沪两地市场缺乏粮食供应，人心慌乱不安。11 月 9 日下午，南京爆发了抢米风潮，“有聚集至千人以上者，警察无可弹压”。内外动荡，国民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已深深意识到大厦将倾了。

这一天，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在湖南路寓所踯躅着，终日未出门。他自 10 月 28 日被推举参加李文范、孙科、程天放、贺衷寒、刘健群等人向蒋介石“进言”后，日夜“怀念时局，百感交集”。他奉令与吴铁城、孙科、张群、吴鼎昌、陈立夫、洪兰友、何应钦诸人共同商讨研拟的“战时体制”，尽管蒋介石一再催询，还是迟迟未能成稿，心中着急万分。尤其使他忧愤的是，政府间“各单位互不接洽”，高级干部中“未能集中力量以纾危艰”，各有各的打算，有的准备跟蒋介石逃亡台湾，有的打算弃官经商，朋辈见面，甚至“竟有以“你有没有准备’相询者”。可见人心涣散，不可收拾，“危舟不能共济”。时代留给陈布雷的只有一杯苦汁了！

古寺问佛　签诗证因果

陈布雷体质素弱，原秉家训，“自甘于田野”，但自遇蒋介石后，一时感其知遇之恩，即以身许蒋，表示愿“以笔札文字效力”。然而，这毕竟还是违背自己的职业旨趣的，于是“中因疾病，常思引退”。后来，因抗日战争爆发，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决心以笔征战，乃又扶病工作，不分昼夜，遂使积弱之躯，健康情况日益恶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想“急流勇返”，可是又“牵动了种种感情关系而不忍言退”，结果铸成了终生“绝大的错误”。

谁知陈布雷的心理矛盾和痛苦？只有他自己的亲属。好心的家人，是多么希望陈布雷早日脱离风浪险恶的“宦海”，是多么希望他早日恢复原来的自由自在之身，重新驰骋早年大显身手的报坛啊！然而，她们也知道进不容易退更难，何况陈布雷又是旧一代的文人典范，追随蒋介石 20 年，前既“不忍言退”，后更不会“临难苟免”的。因而好心的亲属，为了得到一点安慰，就只有到观音菩萨面前述说自己的心事了。她们为了祈问陈布雷何时能够退出官场，脱离“宦海”，曾经到“济祖塔院”求得“氏宿第三灵签”；也曾经几次到××古寺祈问菩萨，先后求得“观音灵签”数签。其一，“观音灵签”第九签，诗云：

劳君问我心中事，
此意偏宜说向公：
一片灵台明似镜，

实如明月在当中。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258_1.bmp}

这是个“上上”签，她们连续两次都是求得的这个签。事情真是巧合，陈布雷何曾不是“一片灵台明似镜”，他对官场的怪事、政治局势的变化，了如指掌，只是不愿把那满腹心事、内心痛苦公开说出来罢了。他的家属自然也不会满足于这个“上上”签的答复，于是又一次再上古寺进香，祈求观音菩萨指明因果。这次求得的是个“下下”签，即“观音灵签”第三签。（据云，陈布雷手录此签及上签签文，现藏历史档案馆——编者）签诗云：

冲风冒雨去还归，
役役劳心似燕儿。
衔得泥来成垒后，
到头垒坏复成泥。

这又是一次巧合。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别号畏垒，别号中的“垒”字，跟签诗中的两个“垒”字正好相合。而签诗描述的燕儿与陈布雷的情景又何其相似。他何曾不像那“役役劳心”的燕儿，顶风冒雨，不分昼夜地为蒋家王朝衔泥筑垒。覆巢之下无完卵。蒋家王朝行将覆亡，忠诚、勤谨为蒋效力的陈布雷，出路何在？陈的家人不由得不信“垒坏复成泥”的签言。

此树婆娑　生意尽矣

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强烈地震撼着蒋介石的“总统府”。而经济动荡，人心浮动，又使陈布雷的心绪更加“沉郁而繁乱”。近来他不但怕见蒋介石，甚至怕开会。11 月 11 日，陈布雷起床后，头晕心跳，目光昏暗，自叹病躯如此，对“非常时期”决难有所贡献。10 时许，他勉强出席了蒋介石主持的“中政会临时会议”，讨论行政院提出的“修正金元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散会后回寓，精神恍惚，自朔平生，觉得临此“国运严重时期”，“乃真觉‘百无一用’为对书生之确评也”。狂郁忧思，不能自制，他怎能不饮下此时代之苦汁呢！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当天，陈布雷写下了一篇充满内心矛盾和痛苦的“杂记”，觉得心力体力不支，决定作二三天的休息。谁知道这一休息，蒋介石官邸再也听不到陈布雷招呼同僚的声音了！

以上这篇千字文，因手头上没有文字根据，只凭几年前阅读的资料记忆来写，大致意思不差，个别词句或跟原文不尽相合。就暂充王春南先生的《陈布雷遗书之疑》（载 1992 年第一期《民国春秋》）的一个不太确切的注脚吧！

秋颖

（第 258 页为陈布雷照片）

陈布雷遗书之疑

陈布雷遗书在陈氏亡故后数日已经全部公诸于世，国民党中央社当年是这么宣称的。多年来人们对此罕有疑问。

陈布雷遗书应当说至今仍是一个谜。

这些遗书有一部分没有发表，这长期不为人们所知的一部分，是什么内容？为什么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将陈布置遗书和盘托出？它当时又是怎样神鬼不知地将陈布雷遗书的一部分秘而不宣？

让我们先从陈布雷之死说起。

中央社发布消息前后牴牾

1948 年 11 月 13 日上午 10 点 20 分左右，蒋介石总统府官邸秘书周宏涛，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行政院秘书处秘书长李惟果，先后接到了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从湖南路陈布雷寓所打来的电话。陈布雷的这位秘书用哭腔向他们分别报告了同一个令人“非常惊讶和悲痛”的消息：“请你快来！市雷先生完了。”

“啊！……”接到电话的每一个人，第一个反应，都是这么“啊”了一声。

蒋君章把本市必须立即通知到的人一一通知到以后，又好不容易叫通了上海的电话，将陈布雷的死讯，报告了陈的夫人，数日前赴沪喝外甥女喜酒的王允默。

陈布雷弃世被发现，是在 10 点 10 几分。他平素 8 时左右必起床。有时起身以后再休息一会出来也是有的，但不会关门。他的秘书蒋君章因事在 10 点零 5 分去找他，见其卧室的门紧闭着，立即要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站在茶几上开气窗，蒋也站了上去。两人从窗口向里张望，没有看见什么。里面对开窗声没有任何反应。站在茶几上的两人慌了。陶伸手进去弄开了弹簧锁，两人夺门而入。只见陈布雷脸蜡黄，眼睁开，嘴张大，一动不动地直挺挺躺着。掀开被子，摸摸手，冰冷的了；摸摸脚，僵硬的了；摸摸胸口，余温尚存。陈枕边放着一封给蒋君章的信。床头有两只安眠药瓶子，一只已空，一只尚剩 1/3，地上还洒落几颗安眠药。

送医院抢救？蒋君章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看样子已经无救，一送医院便是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出去，搞得满城风雨，这干系实在太大，蒋君章一人不敢担当这个重大责任。于是决定请医生上门。遂命陶永标驱车去找陈广煜医生，顺路接陈布雷四弟叔谅（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八弟叔同（供职中央社）。

不一会，陈叔谅及周宏涛、李惟果、陶希圣先后赶到。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也来了。除了陈广煜医生，周宏涛、李惟果还各带来一位医生。

三位医生商量后，给陈布雷打了几针强心针，结果是：抢救无效。绝望之余，在场者开始商议善后事宜。头一个问题便是个棘手的问题：怎样公布消息？直说吧，怕被共产党方面“利用”，不直说吧，又如何遮盖、掩饰？商讨了一会，都主张不说清楚。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报告蒋介石，而又不过于惊动他？这事好办一些。恰好 11 时许，蒋要召见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可趁这机会由陈方及总统府官邸秘书周宏涛将陈布

雷亡故消息及陈的遗书报告上去。

次日，陈布雷谢世的消息由国民党中央社向外界披露：

> 陈布雷于昨（十三）日上午八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 59 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从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中央日报》刊载这条消息对，用了这样一条长长的、醒目的标题：《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死，也会在他故去之前的生活圈子里引起或大或小的震动，更不要说陈布雷这位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十分宠信视之如心腹、倚之如股肱的幕僚长了。陈之死，适值国民党所称的“国步艰难之时”。他去世的那天，是辽沈战役结束的第五天，也是淮海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向黄伯韬兵团发起总攻击的第二天。此前四天，蒋介石写信给刚刚连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要求美国政府发表“一篇坚决的宣言”，以鼓舞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加强中国政府（南京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蒋的这一要求，遭杜鲁门总统断然拒绝。杜鲁门复信时间为 11 月 12 日，即陈布雷去世的前一天。国民党政权在政治、军事上都已走上穷途末路，外交上也陷于孤立。在国民党上层风声鹤唳之时，一个小小的事件都会引起一阵惊惶，何况是陈布雷的死。

陈布雷死得突然，死得蹊跷。随着中央社消息的传播，传言、议论越来越多。在国民党方面看来，“颇有离奇不经之谈”。它原以为发布一纸消息，杜撰个“心脏病突发”的死亡缘由，便可将这事轻轻掩饰过去。谁知适得其反，越想瞒住，越是瞒不住。当此国民党内人心浮动，丝日惶惶之际，对陈布雷之死议论纷纷，实在是一件于国民党政权大不利的事情，将会动摇国民党的人心、军心，影响政局的稳定。国民党政权要赶紧把陈布雷之死在社会上、在国民党内引起的风波平息下去。其办法就是：对社会舆论稍稍作点让步，把陈布雷死于服毒这一真相巧妙地透露一点；同时借机大作文章，把陈布雷的“自弃自了”（这四字是陈布雷自己在遗书中所写），说成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力图把对死者的悼念引向对蒋介石的效忠。这一来，更叫人摸不着头脑：哪有“感激”蒋介石，“激动”得去自寻短见的？若要矢志“报效”国民党政权，又何必要在自己的寓所里自杀？

中央社按照南京政府的新的基调，于 11 月 18 日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

> 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十七日下午八时临时中常会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日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可略睡，晨起总在上午七时左右。本月十三日上午十时，尚未见起，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丸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其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

遗书发交治丧委员去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缴还亲存。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汇集各项文件，交中央社发表。

中央社的这一消息，承认陈布雷的死因“系服安眠药过量”，而且说，这是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丸两人所下死亡结论。四天前，同一家中央社称，陈布雷死于“心脏病突发”，这又是哪位“医官”所作判断呢？中央社两次所发消息，前后牴牾，凿枘不合。人们读后难免不疑窦丛生。

人们要问：中央社 11 月 18 日的消息既已征引两医官的结论，为何又要扯上蒋秘书关于陈布雷死因的说法？难道该通讯社不知蒋秘书的话跟两位医官的结论是不相吻合的吗？原来中央社有其苦衷。它也知道，它所发 18 日和 14 日消息出入过大。为了在互相矛盾的两条新闻之间弥缝一下，它故意加上”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

世……”这么一段不伦不类的话。其实，蒋秘书所云，跟陈布雷遗言的原意，相差甚远。陈布雷有“先见之明”，他在服毒之前已经预料到，如何公布他的死讯，这是他身后一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问题。他替即将为之办丧事的人考虑得很周到，在留交蒋、金两秘书的信中写道：

> 第一件事，乃为如何发表消息，此事可请芷町（陈方）、（陶）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

陈布雷遗言云，他的死因是：“服药过量”。蒋秘书改成“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扯上一个“心脏衰弱（好跟“心脏病突发”接上茬），还说这是陈布雷“遗言”！蒋秘书所云，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不过是说出了国民党当局要他讲的话。

蒋秘书在陈布雷周年忌日所写纪念文章，已承认一年前他关于陈布雷死因的说法是编造的。他写道：

> 每个客人都急切地询问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记得当时我是这样说的：布雷先生原来有失眠症和心脏病，他经常非服安眠药不能入睡，有时服了觉得不够，再服一些，有时候半夜醒来再服一些，平常服至六片之多，也是常有的。这几天精神特别不佳，可能一次再次的加服，因而中毒。……天哪，布雷先生怎样死的，我完全明白，而他所以这样死法，我也不能说全无所知。我这样说了又说，等于自欺欺人，……

既然蒋秘书承认，他关于陈布雷死因所谈，是“自欺欺人”，那么，知道陈自杀真相的南京国民政府，偏要授意中央社在 11 月 18 日消息中写进‘蒋秘书即遵守先生遗言，发表……”一段话，又作何解释呢？

据前述中央社 18 日讯，蒋介石已令陈布雷治丧委员会将陈的遗书照相制版发表，该治丧会随即汇集陈的“各项”遗书，交中央社发表。

陈布雷遗书并非如中央社所称“全部发表”，一无保留。

治丧会公开遗书暗做手脚

自 1948 年 11 月 19 日起，陈布雷的遗书陆续揭载于京沪各地报纸。这些遗书是：

十一月十一日杂记

上总统书

留文蒋、金两秘书函及处理身后事务十则

致张道藩先生函
致洪兰友先生函
致潘公展、程沧波先生函
留交陈方、李惟果、陶希圣先生并嘱向中央诸友致敬之函遗陈夫人书
遗训慈、训悆、叔同诸弟书
予陶副官永标之手教

上述 10 件遗书均撰于 11 月 11 日下午至 12 日午夜。其中《十一月十一日杂记》大有文章。

报纸上公布的这篇遗书的起首写道：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子泰山，有轻子鸿毛。

这篇遗书的开头是不是就是这样，迄未有人在报刊上、书籍中表示过疑问。不久前北京有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发行量较大的陈布雷传记，也以为这篇遗书就是从这几句话开始写起的。这也难怪，该书作者没有见到陈布雷作为“绝笔”的一篇日记（1948 年 11 月 11 日日记）的真迹。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见这件墨迹及其复印件。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看到了在极小范围流传的复印件。据笔者所见，在“人生总有一死”之前，有整整一页 400 多字，在国民党公布陈布雷遗书时被抽去。国民党讳莫如深，没有勇气公开的这一页是什么内容呢？现摘抄如下：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四晴五十四度（华氏）

> 六时卅分醒，旋又朦胧入睡，至八时十分始起。以昨晚睡眠不佳故频患头晕心跳之症，而目光之昏黯亦有加无已。病躯至此，对非常时期，决难有所贡献。俯仰人世，自溯平生，临此国运严重时期，乃真觉“百无一用”为对书生之确评也。牟宗山教授函徐佛观谓，我辈不能不饮此时代之苦汁，……知虑枯拙已竭，如此虚生蹉跎……又无请献策画之用，洵不知此后岁月将如何度过矣。

读了前引一大篇文字，便不难弄清，南京国民政府何以不让世人了解陈布雷遗书的这部分内容。

陈布雷在其遗书的这部分，谈到了对时局的看法。他用了“非常时期”、“国运严重时期”这样的词语。而且他认为，不但他这个书生无补危时，而且像他这一类从政书生都已“百无一用”。蒋介石曾网罗了一批学者，授以高位，以为巩固统治所用。如胡适、翁文灏、王云五、蒋廷黻、蒋梦麟等便是。陈布雷说，书生们都不中用了，任何人都开不出良方，言下之意，这南京国民政府，恐怕是没有救了。他哀叹自己生非其时，借用他人的话说：“我辈不能不饮此时代之苦汁”。陈布雷其他遗书在

谈到局势问题时，虽然也用了“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党国艰危至此”这类语句，但只是说他陈布雷一介书生：“脑筋已油尽灯枯”，不能工作，不能思虑，“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并没有说国民党政权内一批从政学者心劳日拙，“决难有所贡献”。在南京国民政府看来，陈布雷的各项遗书，比较而言，以这一部分的论调最有问题。在 1948 年年底那种政治气候下，国民党政权担心这部分遗书的公布，会“涣散军心，动摇斗志”。陈布雷的遗书，它要扣下一部分，不予刊布，就是很自然的了。

陈布雷留下遗书死因已明

陈布雷的死，并不复杂，他死于服毒自尽。

至于他为什么要选择以及如何选择这条道路，从陈布雷遗书中可以找到答案。

据陈布雷自己讲，他产生自杀之念，不自 1948 年 11 月始。陈《上总统书》云：“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十一月十一日杂记》说：“我这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稍稍好转而免”。陈说的这些，可能都是实情。他在 1942 年至 1945 年之间，数度想到自杀，每次都没有实际去做，原因就在于，他当时的痛苦还仅仅是严重神经衰弱和失眠症的苦痛，及由此引起的精神苦恼。抗战期间，他的精神是振作的。他在《陈布雷回忆录》一书中忆及 1939 年经历时写道：

> 二三月在渝照常治事，为蒋公撰拟文字，以此时期为最多：《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及《三民主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皆此时期所属稿者也。而各种纪念文字如《新运周年纪念》等文，写来亦觉顺利，此二三月中，为近年工作最愉快时期。

这种精神状态，在抗战后期并不会因病痛加剧而有所改变。相反，抗战胜利的前景越是看得清楚，精神越是振奋。同时，他对自己追随的领袖和服务的政权，还抱有希望，怀有信心。精神不死，信念不灭，他怎么会自弃呢？

如果说，他抗战后期平安地度过去了，那么，由于抗战结束内战重开，国民党军队在前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他越来越觉得该是“结束我的生命吧”的时候了。

像陈布雷这样的旧知识分子，他有一种信念，一种寄托。他始终认为，蒋介石是他的“恩公”。蒋识拔他于布衣之间。1926 年春（或 1925 年下半年），邵力子自广州赴沪宣传革命，携蒋介石亲笔签名小照赠陈。并谓蒋对陈“极慕重”。这年阴历年底，陈布雷前往南昌见蒋。此后，陈布雷即为蒋所赏识和信用。在陈看来：知我者蒋也。“士为知已者死”，这种旧观念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特别是，1939 年 12 月 26 日，陈五十初度之日，蒋为之手书“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联语。这八个字套用诸葛亮《戒子书》中两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蒋对诸葛亮的原话可能记忆不清，把“澹泊明志”和“宁静致远”位置颠倒，以致逻辑上发生问题。尽管如此，陈布雷仍感激莫名。他在《陈布雷回忆录》中写道：蒋手书八字以为赠，“勖勉期许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陈布雷的这段话，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意思，蒋以诸葛亮相“勖勉期许”，要他尽心一意辅佐自己。陈布雷正是怀着报“知遇之恩”的想法，二十年如一日心甘情愿供蒋驱策的。

被“愚忠”二字支配的陈布雷，以为他个人生命的意义在于孜孜矻矻为蒋工作，在于尽心竭力报效蒋。越是政务繁剧，他越是觉得活着有意义。正是因为有追随的目标和效忠的对象，他才有安身立命的基础。

历史在 1946 年来了个急转弯。国民党军队在内战战场上节节失利，南京国民政府在短短时间内已走到崩溃的边缘。头脑清醒的陈布雷看到国民党败局已定。他为之效力达 20 年之久的南京国民政府行将覆灭，他多年来不离左右的领袖即将从中华民国总统的位置上跌落下来。他的精神支柱没有了，信念崩溃了。他在致张道藩函中写道：

弟生机已绝，生命之意义已尽，……

在《十一月十一日杂记》中写道：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象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

上述遗书又云：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思虑，则生命便失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陈布雷服毒前，不是没有犹豫，不是没有动摇。他想得很多。首先想到，像他这样 59 岁的老人，选择自杀的道路，是极不明智、极不光彩的事情。数十年辛劳，一辈子的“功名”，付与流水不说，还要给人议论，被人鄙弃。身后被人指指点点是什么滋味，九泉之下固然无从体会，但对声名看得很重的人，就怕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有人对他闲言碎语。陈布雷便是如此。他在遗书中说：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

“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

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他又想到，他的夫人很可怜，实在不忍把她丢下。他在致潘公展、程沧波函中说：“拙荆衰年孤苦可悯，……”在留文陈方等人函中说：“拙荆今后孤苦可怜，……”

他给训慈等弟弟的信，以及留交陈方等函，都用了“临书依恋”这四个字。他要尽可能多地与“情如手足”的朋友“留书为别”，没有留函道别的，也托人为他们“转致最后之敬意”。本来张道藩、洪兰友、程沧波、潘公展四人前不拟略函作别，后陈布雷还是给四人留下三封信。想到亲友们平日情谊，陈布雷低回夷犹，没有勇气去拿安眠药瓶。

陈布雷依恋这个世界，依恋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但是他终于去了。

因为他说过，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无用。

陈布雷为何“自弃而自了”，看了他的遗书便基本清楚。

但陈布雷的遗书中还有一些谜一样的语言。如陈《上总统书》云：

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落，……

《遗训慈、训念、叔同诸弟书》云：

今年春夏之间，虽工作积极，而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我不欲责人，只有责己，七月下旬以后，神经已陷于极度衰弱，……

“今春以来”因何事“饱受刺激”？“今年春秋之间”，所接触到的多为“可悲愤之事实”，是哪些事实？“我不欲责人”之“人”何所指？陈布雷似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只写了这么几句就打住了。陈在这里提到的人和事，跟他的决心自杀直接有关。可惜他讲的就只有那么几句，刚露了个头。这几句话的具体含意是什么，笔者就不好臆测了。起码目前还没有找到充分的史料根据，来“破译”这些话。

王春南

汤恩伯与“京沪之战”

自从 1949 年 4 月，蒋家王朝的最后一缕残阳从金陵城头消失，40 年过去了。当年人民解放军挥戈江南的雄壮脚步声，至今仍如动地鼙鼓，在人们耳畔回响，而昔日的败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如今安在？

台北一家杂志曾透露汤恩伯病死日本的凄惨情景：1954 年，汤恩伯去日本施行腹部手术。目击者说，他虽已上了麻药，但不知何故依然极端痛苦而不断挣扎，日本医官用力揿住他的身体，使他不能动弹，直至力竭而逝。台湾一名高级官员怀疑汤恩伯是被害死的。这位知名度颇高的官员说，汤恩伯是抗日名将，他的死很可能是被报复的结果。

真相究若如何，未见下文，而蒋介石却在汤恩伯死后第七天，对他施行“暴尸鞭骨”。蒋在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说：“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在上海保卫战中牺牲殉职，将是何等光耀；他在日本最后弥留之际，一定非常难过，回忆前尘，定会无限懊悔，抱恨终天。所以也值得我们检讨、痛惜与警惕。”

这一番话，说得国民党官员如一股凉气袭上心头。这意味着忠于蒋介石，只能死于丘谷，而下许善终床第，否则他便要“检讨”，便会让人“痛惜”并引起“警惕”！

在南京、上海的最后之战中为蒋介石尽忠效力的汤恩怕，绝想不到自己竟落个如此结局！

他拒绝光明

本来，汤恩伯除了战死上海或惨死异邦以外，还可以有另一个结局，一个光明的结局。

在 1949 年初，南京政府已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中国共产党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曾通过多种渠道，争取汤恩伯起义。汤恩伯观望过，犹豫过，但最终被愚忠思想所征服，以致失去良机。

第一个试图对汤恩伯施加影响的，是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陈仪。陈仪与汤恩伯，有着特殊的情谊。早年，汤恩伯在患难中，曾得到陈仪的关怀，从此两人情同父子。陈仪毕生无子嗣，视汤恩伯如己出。以后，汤恩伯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迅速发迹，地位甚至在陈仪之上，但两人关系不变。在蒋介石政权将要崩溃的前夕，陈仪受到在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的影响，想为人民做好事，便想与汤恩伯共同起事。 1949 年 1 月底，陈仪派他的外甥、地下革命者丁名楠去上海见汤恩伯，带去陈仪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全文如下：

> 恩伯弟台如握：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与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顺颂刻安。仪手启 1 月 30 日夜再为办事顺利计，请由弟处于丁名楠以秘书名义。

信中所说的胡邦宪，即共产党人胡允恭，长期为陈的僚属，陈亦清楚地知道胡的政治身份，只是彼此都没有明说。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是便于丁有一个公开身份进行汤、陈间的联络。

汤恩伯与丁名楠见面后，当即表示同意委任丁为秘书，并说胡邦宪先生

要来，随时都欢迎。汤还说，过不几天他将去杭州面见陈仪。

由于不见汤恩伯来杭，陈仪便又一次派丁名楠至上海，带去一份嘱汤恩伯起义的条款，分甲、乙两款，甲款是汤应当做到的，乙款是解放军方面将要做到的，全文如下：

甲：一、尽先释放政治犯。

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

乙：一、约定○地区，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

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 X 月内改编原有部队。

三、取消○○○（按：即取消汤恩伯战犯名义之意），给予相当职位。

此外，还提出了八条准备事项，此处略。

汤恩伯依然没有拒绝的意思，只说他左右蒋介石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不料，汤恩伯一边在作敷衍，一边却告诉了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头目毛森。据 1987 年毛森在美国写的一篇文章证实，上述事件是在保密局并未察觉情况下，汤恩伯主动告诉他的。在这同时，汤恩伯又亲自向蒋介石告发，以致陈仪的计划败露，被撤去浙江省主席职务，并由汤恩伯予以关押。在这以前，胡邦宪在上海已发觉汤恩伯态度有变，两次紧急建议陈仪速作安全打算，陈仪却说：“我同汤恩伯的关系你是了解的，他不会出卖我。”

陈仪失去自由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另一渠道对汤恩伯再次进行策反。承担这一艰险任务的要角之一是传奇性人物陆久之。陆久之的夫人是蒋介石第三个妻子陈洁如的养女，所以他被视作蒋介石的“驸马”，其实陆久之早在 30 年代便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自己的才干，活跃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并与汤恩伯结成至交。

陆久之接受了策反汤恩伯的任务后，与汤恩伯作了几次试探性的谈话，发觉汤对在北平起义后的傅作义将军的处境极为注意，便详尽介绍了傅作义目前处境良好，有充分自由，劝汤恩伯以傅作义为榜样，早下决心。正当汤恩伯情绪动荡时，忽然，蒋介石亲自从奉化跑到上海来布置作战，汤恩伯情绪突然一震，便借口蒋纬国要住到他家来，阻止陆久之再来他私宅走动。策反又未成功。

汤恩伯两次拒绝选择光明之路，剩下的便只有战争一途了。由此，六朝繁华之地，被投入战火；无数士兵的生命，被汤恩伯用作绝望的一搏。那些被遗忘在江南原野上的亡灵们，鸣声啾啾，控诉着对于没落王朝的无限怨愤。

在两“君”相争中

南京、上海之战开始之前，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尖锐矛盾，并由此出现了两种作战方针。

受到美国支持的桂系领袖李宗仁，逼蒋介石交出权力。蒋介石由于在 1948 年 11 月美国总统大选中“押”错了“宝”，支持了杜威，以致引起连选连任的杜鲁门总统的怨恨。蒋介石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援助，只得于 1949 年 1 月宣布下野，黯然离京，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

蒋介石下台后，表面上徜徉于溪口山水之间，似闲云野鹤，实际上依然牢牢控制着南京。他在下台前夕，已将汤恩伯从衢州绥靖主任（主管闽浙军务）调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回溪口不久，即于 25 日召见汤恩伯，同时去溪

口的还有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等；指示关于长江布防问题，决定划江防为两大战区，以江西湖口为界，湖口以西至宜昌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兵力 40 个师，25 万人；以东直到长江口由汤恩伯负责，兵力 75 个师，45 万人。白崇禧没有被召来开会，只在会后把上述决定通知了他。

蒋介石关于京沪杭战区作战的方针大致力：以长江防线为外围，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淞沪为核心，台湾为最后基地，依靠台湾优势海空军的支援，坚守淞沪六个月以上，等待国际形势大的变化。显然，在这一方针中，并不作坚守南京的打算。

李宗仁、白崇禧对这一方针并不知悉。李宗仁另有一套方略，其基本内容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南北分治；如果和谈破裂，作战重点应放在南京及其以西地区；万一江防被突破，军队应及时向皖南转移，与白崇禧靠拢，以湖南、广西为广大后方，海南岛为最后基地。显然在这一方针中，并不打算固守上海。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作战方针。汤恩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毫无疑问坚决执行前一条方针。汤恩伯是从担任蒋介石的参谋起家的，在新军阀混战时，他多次参与戎机，极为蒋介石赏识。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高兴得在汤恩伯这个下级军官面前唱起了宁波滩簧，这种“荣幸”不是其他下级所能得到的。旧中国流传着两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财团浙江军”，所谓“浙江军”就是指蒋介石最宠信浙江籍的三将领，一些阿谀的人称之为“军中三杰”，即浙江青田县的陈诚、浙江镇海县的胡宗南与浙江武义县的汤恩伯。

四月中旬，顾祝同主持江防作战会议，亲桂系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认为解放军最有可能从南京以西地段渡江，直下浙赣线，将京沪杭地区的国民党军孤立于东海之隅，而华南腹地则大门洞开。这一结果十分危险，因而他主张应根据这一形势，将兵力配置的重点放在南京以西地段。汤恩伯对这一主张根本不加理睬，会上他一言不发，会后却根据蒋介石的方针，作固守上海的准备，在上海外围构筑了大量钢筋混凝土的永久工事，甚至秘密将江阴要塞的大炮拆运至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也由南京移沪。

就在蒋桂两方各敲各的锣的情形下，江防之战开始了。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谈判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强大的渡江战役。

上海“三剑客”

4 月 20 日晚，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在芜湖、铜陵间发起强渡，次日晨一举占领南岸的萩港。汤恩伯急忙飞到芜湖坐镇指挥，命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堵住缺口，并当面许杨为兵团司令，同时急令驻龙潭的九十九军（欠第九十九师）驰援。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援军尚未赶到，萩港等地守军已望风溃逃。当天下午，解放军东路军也在江阴、扬中渡江成功，江阴要塞在地下共产党员领导下举行起义，大口径的要塞炮掉转炮口猛轰国民党军脊背，宁沪铁路随即被解放军切断。与此同时，解放军西路军亦突破国民党江防，占领马当、贵池，汤恩伯的长江防线仅一天便全线崩溃，沿江各守军展开了一次逃跑比赛，但由于解放军进展神速，国民党第四军、二十军、二十八军、四十五军、六十六军、八十八军、九十九军（欠一个师）及其他杂牌部队共约 30 万人被歼灭于逃跑途中。23 日，南京解放，延续 22 年的国民党南京政

府的统治，至此覆灭。

惊魂未定的汤恩伯，又急忙部署固守上海。上海的巨大财富、方便的海上通道以及有力的海空军支援，都使汤恩伯以为是用来守上海的有利条件，此外他还有“上海三剑客”的支持。这“三剑客”，便是谷正纲，方治与潘发展。

谷正纲原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社会部长，坚定的拥蒋反共派。当蒋介石宣布下野时，他当场痛哭流涕，自命“孤臣孽子”，当即辞去行政院一切职务，跑到上海，以在野身份协助汤恩伯的反共军事与政务。汤恩伯亦视谷正纲为患难至交。谷正纲自己就说过：“汤恩伯警备京沪，坚决反共，与我志趣相投，于是我便只身离京到沪，与他朝夕相处，代他主持政务，甚至参预军事机密。”

方治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从党务、民众、劳军等方面竭力支持汤恩伯固守上海待援。当上海战局紧张时，方治几乎天天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大喊大叫“保卫大上海”，吹嘘“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坐镇上海，国军必胜”。

潘公展，CC 老牌骨干，这时为申报馆董事长兼社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他操纵参议会，助汤恩伯控制舆论。

也有人说，汤恩伯的“三剑客”另有其人，即陈大庆、石觉和毛森。

陈大庆，淞沪警备司令。他是汤恩伯嫡系将领中的“江西帮”首领，长期作汤恩伯的副手。抗战时期，汤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荐陈为副司令。战后，汤曾先后担任首都卫戍司令、第一绥靖主任及衢州绥靖主任，陈为副司令或副主任。汤调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后，陈又为副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两人一直如影随形。

石觉，上海防卫司令，长期追随汤恩伯，深得汤的宠信。1942 年，汤把自己赖以起家的第十三军交给他，就表明两人关系的不同一般，人称他为汤的“干儿子”。辽沈战役中，十三军被打光后，汤又荐石觉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上海防卫司令，负责上海四郊作战指挥。

毛森，上海警察局长。此人虽属国防部保密局（其前身为“军统”）系统，但与汤关系密切。汤为衢州绥靖区主任时，他为汤属下的情报处长；汤调上海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后，他亦调沪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长兼上海市警察局长。两人过从甚密，毛森本人曾说：“我们两人间已无任何隐私”。

以上一文一武的“三驾马车”，构成了汤恩伯的主要班底，使他能独自控制上海的一切。加上参谋总长顾祝同、陆军总司令关麟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装甲兵正副司令徐庭徭与蒋纬国，这衮衮诸公、赫赫列将，坐镇上海，确有血战一场的架势。

但事情并不能使汤恩伯愉快。在顾祝同召集的军事会议上，作战厅长蔡文治第一个起立发言，他指责汤恩伯指挥无能，不采纳他在南京会议上的主张，致使江防失守，浙赣线被切断，失去了与白崇禧之间的联系，弄到现在几十万大军困居上海，大家只有集体跳海一条路。汤恩伯立即气呼呼地站起，怒斥蔡文治：孩子之见，懂个屁！（蔡年纪较轻）两人都失去控制，大吵起来。为了震慑住蔡文治，汤恩伯把蒋介石关于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取了出来，说：“我执行的是总裁的指示，他要我固守上海，抢运金银、物资去台湾，完成后准许撤至舟山，如不能完成，唯我汤恩伯是问。诸位愿守上海就守，

不愿守的悉听尊便！”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

他们就这样迎接了上海之战的开始。

逃出吴淞口

当时上海守军，除原先部署在上海的三个军、一个师及六个交通警察总队外，还有从长江沿线溃逃下来的八个军、两个师与新近从浙东调来的一个军，共约 20 万人。

在溪口的蒋介石，十分担心失去上海。4 月 25 日，他突然命令太康号军舰准备起航。蒋介石上舰后，舰长请示航行目标。当蒋介石说出“上海”两个字时，舰上的人大惊失色。26 日，军舰进入吴淞口，下午停泊于复兴岛江面，当天即召汤恩伯至舰上谈话，先后召见的还有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谷正纲等。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虽已被代总统李宗仁免职，但实际仍操纵着特务机器，这次他亦被召晋见。蒋介石在沪 11 天，对上海军务、党务、特务等均作了精心策划，5 月 7 日乘江静轮离沪赴定海。

5 月 12 日，上海外围战打响了。解放军以第九、十两个兵团共八个军兵力，对上海采取钳形攻势，至 14 日，便占领松江、奉贤、南汇、嘉定、昆山、太仓等县城，完成了对上海的三面包围。次日，蒋介石急忙派蒋经国飞抵上海，问汤恩伯守住上海有无把握，汤恩伯回答说：“浦东方面没有把握，社会秩序是否将变得紊乱，亦未可预料，只有尽力而为之。”反映了对战局前途的悲观。

战场上的形势果真越来越严重，国民党军队的防区迅速被压缩，至 16 日，守浦东外围据点的第五十一军和守浦西外围据点的第一二三军，均遭歼灭性打击。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被俘，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躲进他的堂兄顾祝同的公馆里伺机溜走。

蒋介石得知战局危急，又一次坐飞机进入上海，直接插手指挥，但局面已烂到不可收拾，何况蒋介石本来就不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东北就是在他亲临指挥的情况下丢失的，山东也是由他坐在飞机里指挥而打了大败仗，现在他又来到了上海，他能创造奇迹么？19 日，解放军第九兵团攻占川沙，逼向高桥；第十兵团肃清了月浦、刘行残敌，向吴淞推进，两支大军如一把钳子，将要卡住黄浦江入海的咽喉。蒋介石见状，急忙于 20 日坐兵舰逃出黄浦江，返回马公岛，从此永别了他发迹之地。

汤恩伯还想作最后挣扎。他下令征用全市机关、商家的大、小汽车，司机一律自带铺盖，将车辆开到指定地点集合。随后又下令全市三轮车、黄包车亦全部投入军运，违者严惩。汤恩伯又命令在市区边缘防御阵地之前三——五华里以内的建筑物全部拆毁，仅这项命令，就使得近 80 万人成为难民涌入市区。为给连打败仗的军人打气，汤恩伯下令集中全市娼妓，供军官和士兵消受（后未实行），又在国际饭店设立“英雄馆”，让所谓“英雄”轮流来此娱乐和休息。尽管如此，战败的消息依然雪片般飞来：

20 日，守高桥的第十二军大部被歼；

21 日，机场进入解放军炮火射程，空运瘫痪；

22 日，浦东第三十七军仓皇抢船，渡回杨树浦；

23 日，上海已面临最后决战的前夜，这一天也就更显得紧张而富有传奇性。

这天，汤恩伯开始准备逃走，将指挥部移到了吴淞口外一艘兵舰上，却又让方治到广播电台向全市大叫“共匪进攻上海失败了”；

这天，汤恩伯驱使非嫡系部队上第一线，要他们“与上海共存亡”，却在同时把嫡系部队从前线后撤，准备悄悄上船；

这天，代理市长陈良竟然向全市市民号召“消灭细菌”，“扩大清洁运动”，制造和平安逸气氛，而在同时，各监狱却开始杀害政治犯，仅南市区就杀死 130 余人；

也是在这一天，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总部发出了总攻上海的命令，第九、第十兵团当夜全线出击，仅一天时间，便于 25 日攻入市区，进行巷战。汤恩伯慌忙率残部逃往舟山等地。27 日，全市解放，国民党军被歼者共约 15 万余人。

汤恩伯逃到台湾后，又遇上了新的麻烦。

不尽的烦恼

上海解放后不多天，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搭乘一艘外国轮船前往香港并转赴台湾，这人便是被汤恩伯遗弃在上海的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三十七军奉命在江湾待命，等待很久无人理睬，派人联络才知道汤恩伯等早已逃之夭夭。罗泽闿上天无路，入海无船，便换上便衣，躲到了四川路一友人家，找到了机会后逃出上海。

罗泽闿一到台北，便向汤恩伯发起猛烈进攻，而石觉、陈大庆等则对罗反唇相讥，双方越闹越凶，迫使蒋介石下令召开上海作战检讨会以求解决。

会议由陈诚主持。罗泽闿指责汤恩伯身为战场最高指挥官，却率先逃跑，弃部队于不顾，此种行为，何以对党国，应自杀以谢天下。几句话骂得汤恩伯暴怒起来，指责罗泽闿作战不力，失去阵地，也应自杀。两人激烈对骂，别人无法插嘴。最后，会议决定交给军事法院去解决。后来通过疏解，这桩官司不了了之。

但汤恩伯耳边的责骂声，仍未间断。而更使他难堪的，还是陈仪之死。起初，在蒋介石下令逮捕陈仪时，汤恩伯曾向蒋介石提出，保陈仪一条命，据说老头子是同意的。但 1950 年，蒋介石却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年 6 月，陈仪被处死。汤恩伯自知陈仪是死于自己的告密，不免良心发现，深深自责，在家中设了灵堂，晨昏祭奠。这事又被蒋介石知道了，下令撤去灵堂。据说自此以后，汤恩伯常绕室彷徨，不知所以，不久退休住到三峡乡间，终致重疾。因无钱去美国治病，便选择了日本。在日本住院期间。曾写信向陈诚告贷。1954 年 6 月 29 日，汤恩伯死于术中，时年 54 岁。

台湾军界旧人黄杰在挽诗中有“最怜墓草青还在，风雨年年怆客魂”之句，可以看作是对汤恩伯末路凄清的叹息。

徐矛

柳亚子“非常可骇”的建议

恽代英逝世后，柳亚子作诗五首哀悼，并在其中一首诗下自注云：“余在广州，曾建议为非常可骇之事，君不能用。”这首诗全文为：

百粤重逢日，轩然起大波。我谋嗟不用，君意定如何？矢日盟犹在，回天事已讹。苍茫挥手别，生死两蹉跎。

1926年4月，柳亚子在上海第一次认识恽代英。5月，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与恽代英重逢。本诗回忆的即是这次重逢的情景。从诗和注可以看出，当时柳亚子曾向恽代英提出了一项“非常可骇”的建议，而恽代英不能采纳，柳亚子失望地离开了广州。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柳亚子1950年12月16日在民革中央的讲话，事情是这样的：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候，距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还不到两个月。为了夺取和控制党权，蒋介石便以“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为名，提出“整理党务案”，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在高级党部中任职提出了种种限制。柳亚子是个政治上很敏感的人，他迅速识破了蒋介石的意图。为了维护孙中山制订的三大政策，他和国民党左派朱季恂、共产党员侯绍裘二人一起找到了蒋介石，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柳亚子质问蒋介石：“你到底是总理的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切实地执行三大政策。”蒋介石答道：“政策和主义不同。主义亘古不变，政策不妨变通一下。”柳亚子驳斥道：“你不懂得政策和政略的分别。政略是可以随时变换的，政策就不应该轻易放弃。就以政略而论，必须环境变化才有变通的必要。总理生前，为了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所以定下了伟大的三大政策。现在帝国主义鸱张犹昔，北洋军阀虎负如前，而买办资产阶级，以广州而论，就曾挑起了商团之变。这些事实，难道你身负党国重任，还能瞠目不睹吗？”柳亚子的这一席话把蒋介石说得面红耳赤，默不作声。说完，柳亚子等便拂袖而去。

和蒋介石交锋之后，柳亚子断定蒋介石一定要做陈炯明第二，闹出更大的乱子来，必须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他和朱季恂、侯绍裘等四出活动，都不得要领。最后，柳亚子找到了正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向他建议，用张良对付秦始皇的办法，找一个刺客去结果了蒋介石。恽代英不同意，说：“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要留着他打仗呢！”柳亚子一听就急了，争辩说：“北伐为的是什么？不是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吗？倘然让这种总理的叛徒去统一中国，结果一定比北洋军阀还要糟糕。在杨希闵、刘震寰割据的时代，总理说过，他们戴了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是非常痛心的事情。照我的意见，与其让蒋介石戴着中国国民党的帽子，来做出卖民族的勾当，还不如让北洋军阀打进来，连广州都不要。因为后者还不过是军事上的损失，随时可以卷土重来。而前者呢？把中国国民党的金字招牌，丢到粪坑里去，将来就是有人把它捞出来，三熏而三沐之，恐怕臭气熏蒸，还是叫人家不容易忍就吧！所以，照我的主张，就非立刻出重赏，求勇夫，把蒋介石打死了再讲。不然，将来的后果，我就不忍说了。”恽代英不相信事情有那样严重，开玩笑地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作过激党，认为洪水猛兽。你老哥的看法，却比我们共产党还要深刻到几十倍。那末，应该在过激党上面，再加一个过字，称你老哥为‘过过激党’吧！”谈到这里，柳亚子站起

来拉住恽代英的手严肃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好同志，玩笑是玩笑，正经是正经，你今天不赞成杀蒋介石，怕蒋介石将来会杀你呢！”说着说着，便掉下泪来。这时，恽代英也感动了，安慰柳亚子说：“我们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柳亚子和恽代英谈话之后十多天，接到老母病重的电报，不得不离开广州。行前，他去黄花冈祭扫廖仲恺墓，有诗云：

> 乱草斜阳哭墓门，从知人世有烦冤。风云已尽年时气，涕泪难干袖底痕。何止成名嗤阮籍，最怜作贼是王敦。匹夫横议谁能谅？地下应招未死魂。

王敦，东晋初大臣，曾起兵进攻建康（今南京），图谋夺取司马氏政权，这里借指蒋介石。“匹夫横议”，仍指“非常可骇”的建议。柳亚子慨叹失去了廖仲恺这样一个优秀的同志，无人能够理解他的思想。

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的，收买刺客去暗杀蒋介石，这样的事共产党人是不会干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领导人当时确实对蒋介石图谋叛变革命、排斥共产党人缺乏足够的警惕。恽代英所说：“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要留着他打仗呢！”这两句话反映出共产党某些领导人的麻痹情绪。柳亚子提醒恽代英：“怕将来蒋介石会杀你呢！”果然，1930 年，恽代英在上海被捕，次年 4 月 29 日牺牲于南京狱中。柳亚子不幸而言中了。

杨天石

（第 287 页为柳亚子照片）

截阅蒋家父子家信的一段亲历

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当年，我曾有过一次“小偷”行为，如果当时被人发现，肯定人头落地，活不到今天。

现在我已年逾古稀，为了使读者在读史中博得一笑，今天为文“坦白交代”出来。在台的蒋纬国先生如能看到，可能一笑了之曰：“坦白从宽，免予追究。”

1941 年，我考入西安邮局，分配负责邮袋拆分工作。凡各地来的邮袋，拆开后，平信分送平信组，挂号分送挂号组投递或转口。当时，国民党特务机构派有专门检查员，不时来邮局检查信件，他们站在旁边监视，虎视眈眈地盯着邮件。凡转口去东路上海及去北路延安的平信，不分青红皂白，一把一把的拿走，带回检查，第二天有的送还，有的不还；对于挂号信，拿走时必须履行登记，第二天原件送还，如不送还，则必须办理扣押手续。

在这些信件中，我发现每三、五天总有“华县第一军蒋纬国收 重庆军事委员会蒋缄”的大牛皮信封的信件。那时蒋纬国从德国学习军事，归国不久，蒋介石把他安排在第一军实习。检查员每每拿起看看，后又放下，他们相顾一笑，但最后还是拿走了。第二天送还时，我和同事何修注意到密封口（封口上另贴一白纸条）留有拆痕，就提出：“收信人看出马脚，追查下来谁负责！”他们说：“我们为了蒋公子的安全，奉命拆的，不会追查。”这个底一漏，我就和何修商定了偷看蒋纬国家信的“密谋”。为一时的好奇心所驱使，我们才做出这种不足为训的事来。

几天以后，拆袋时又发现有蒋纬国的信，我和何修会心一笑，趁检查员未到之际，很快塞进衣袋，下班回宿舍，闭紧门窗，用刀片轻轻启开，看完后小心封上。何修是集邮迷，对撕取外国邮票有独到技巧，拆后还原不留痕迹。前后共看了三封蒋介石给蒋纬国的信。老实说，以当时一颗好奇而纯真的青年人的心，对蒋介石训子的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三封信大意是：

一封是教育蒋纬国不要藉老子的声名，流露出任何骄傲和盛气凌人情绪。在实习中，要虚心向长官学习，不要自认为曾在德国留过学，就看不起别人。

一封是教育蒋纬国不要藉老子的名义，过问上级的任何事情，也不要向老子禀告部队的情况，否则是违背总理精诚团结的教导的。

一封是教育蒋纬国在实习中，抽空读些论语、唐诗，要经常写日记，要每周写一封家信，禀告生活学习情况。

可惜我不能背诵其原文，也未能拍照留影。我没想到今天能写这史料啊！

蒋介石的这三封信，有时写“纬国儿见字”，落款写“父字”，这是曾国藩手法，蒋介石是最爱《曾国藩家书》的。有时落款“蒋中正”。都是较恭正的毛笔楷书，用直八行贡纸信笺，一页成书，可谓精致。

那时，国民党军委会曾设有军邮袋，军事重要文件专封军邮包，仍无专线运输，附在民邮邮袋内，由邮局代运代送。以后设军邮局，才专线运输，但不久又撤销了。这段邮运史，我未专门研究。但一般军队私人信件，仍以民邮寄发，蒋介石的私人家信，也都夹在民邮中寄发的。我当时亦感到不可思议。我在邮局只工作一年，以后就转入报界去了。

彭古丁

蒋介石宜兴认祖祭扫

关于蒋介石的身世，自唐人的《金陵春梦》问世后，始终存在两种说法。一说他是河南许昌灵沟镇人。其代表人物当然是唐人。另一说他是浙江奉化人氏。比较一致和流行的是此说。

至于蒋介石本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公开的、私下的，抑或在日记、文稿和讲话中，对自己的籍贯均持后说。在现在能见到的材料中，蒋介石皆自称“武岭蒋氏”或“浙江奉化武岭”。蒋氏家族修的族谱，题签也是《武岭蒋氏宗谱》。武岭，亦称武山，在奉化溪口镇东首，屏障全镇，为溪口的门户。蒋介石虽未说自己与河南许昌郑氏有无瓜葛，但河南郑绍发前来南京认弟，尽管未能见到“胞弟”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并没有为难他，在把郑绍发“资送”回原籍河南后，给了他一个“步兵少校”的军衔，嘱咐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不要忘记给郑绍发开薪一事，却又让人疑窦顿生。由是，对蒋介石的身世籍贯的两种说法，是家喻户晓，历经几十年而不衰，而且随着海峡两岸形势的趋向缓和，又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成为社会性的“长久话题”。可是蒋介石曾到江苏宜兴寻根、认祖、扫墓、修祠一事，却几乎无人知晓；蒋介石的先祖乃是江苏宜兴人，更是“黑匣子”。

笔者因课题研究的需要，曾去宜兴市调查，承该市几个有关部门的热情协助与支持，在调查中发掘到一件已被人们遗忘的事——1948 年蒋介石偕宋美龄前来宜兴寻根、认祖、祭祀先人，嗣后又拨专款修茸当地蒋氏宗祠。

蒋介石、宋美龄为什么会到宜兴去认祖祭祀呢？难道这里真有他的先祖坟陵吗？

回答的答案是肯定的，蒋介石的先祖的确是江苏宜兴人氏。而蒋氏伉俪去祭祀的缘由则是因宜兴县县长蒋如镜的一封信所引起的。

抗日战争时期，宜兴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成立了“维持会”和伪县政府。宜兴沦陷后，当地的国民党县政权就成了流亡政府。抗战期间，国民党宜兴县长井换了 6 届。这第六任县长叫蒋如镜，是本地徐舍下滩村人，1943 年 11 月至 1946 年 6 月任职宜兴县长。为了躲避日本侵略军与汪伪军的追剿，他经常背着背包在宜兴各处办公从事抗日斗争。这位县长是文化人出身。1938 年他与潘韵笙共同创办了《宜兴报》，1941 年 6 月 1 日，他又创办了《民锋报》。其此编《民锋报》曾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办的《新江苏报》合出“中外电讯”，隔日刊出一期，报道世界各地抗击法西斯以及国内各地抗日斗争的新消息。正是因为这位县太爷是文化人出身，无论有事无事，总是喜欢涉猎古籍。他从宜兴《蒋氏族谱》中发现了宜兴蒋氏与奉化蒋氏是同祖、同宗。于是就有了给蒋介石的上书。

那么，宜兴蒋氏是怎样的一个家族呢？蒋如镜为什么能把宜兴蒋氏同奉化蒋氏拉扯到一起，是同祖同宗呢？难道他有什么确凿的史料根据吗？否则，蒋介石为何会轻而易举地相信了呢？

据宜兴同志介绍，宜兴蒋氏在民国时期以及之前一直是当地的大族。笔者为了取证这一点，曾在南京，还有江苏的其它几个城市，向一些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老先生做过访谈，无不知晓宜兴蒋氏乃是当地大族。

宜兴蒋氏始祖乃是东汉初的函亭乡侯。其家族史，据南宋咸湾年间（1265—1274）的《毘陵志》记载：函亭乡侯蒋澄，字少明。其父蒋横，东汉初官拜将军之职。蒋横共生 9 子，蒋澄乃其少子。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蒋横随刘秀征讨赤眉军有功，被封为浚道侯，其后遭中央监察官、号称“三独座”的司隶校尉匡路的诬陷而罹死刑。他的 9 个儿子通通被迁徙。蒋澄与兄蒋默，遂迁徙到阳羡（即今江苏省宜兴市）。后来蒋横的冤案平反昭雪，匡路也因此受到族诛的处治。而蒋横诸子皆受封拜官。蒋默封云阳侯，官拜谏议大夫。蒋澄封 亭乡侯，任婺州刺史。蒋澄性格豪爽，任上颇有政绩，受到过朝廷嘉奖。蒋澄 60 多岁时致仕回到阳羡。他赋闲居乡，热心公益，多次捐资修路、筑桥、扩建修缮祠堂，对本族与毗邻之贫困人家亦不时有所周济，在当地甚有声誉。71 岁时无疾而终。当地乡人为纪念这位德被乡泽、为官清廉的老人，争相为其立庙祀之。这就是宜兴城内东庙巷及官林镇上各有一座 亭侯祠的来历。蒋默、蒋澄之子、孙以后分别任过前将军、丹阳太守、荆州刺史、兖州刺史，有的封侯，有的袭爵，成为宜兴的名门望族。坐落在官林镇上的 亭侯祠（原与今天的官林小学毗邻），是一座有三进院落，有门厅、正厅、后楼的青砖瓦木结构建筑。抗日战争时期，毁于兵火。庭院中仅残一碑，碑额篆刻“九侯世家”四字尚清晰可辨。

蒋如镜在卸任前夕，给蒋介石上书，在介绍完了蒋氏的这段家史后，又把宜兴蒋氏挂到了周公姬旦的身上，说蒋澄先祖是助西周武王灭商的周公的第三子伯龄。接着笔锋一转，又非常巧妙地把宜兴蒋氏与奉化蒋氏嫁接上。在一段分析之后，蒋如镜在给蒋介石的上书中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奉化蒋氏与宜兴蒋氏是同宗、同祖、同根生。”蒋如镜把宜兴蒋氏宗谱用红锦缎包裹好，封上信，派专人送到南京。

平心而论，蒋如镜所述一切，不是他个人的信口开河，杜撰出来的，根据史料记载，蒋澄的后人，在东晋时从江苏宜兴迁到浙江台州。蒋介石在未发迹以前，也认为奉化蒋氏是大世家。他在民国九年（1920）12 月 4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吾蒋氏在唐代由台州迁奉，楼隘或即俗呼楼岙者便是之蒋浚明公，官至金紫大夫，即此派也。其墓在三岭山……摩珂蒋宗霸公，世传为吾祖，谱中所称必大公者是也。当王季之周，其居三岭，与岳林寺之弥勒相友善，亦近情理……”

可见蒋介石是认为自己是由台州迁到奉化的“官至紫金大夫”的蒋浚明的后裔。再往前，蒋浚明的先祖又是谁，中间缺了一段，蒋介石自己也弄不清楚。如今见到蒋如镜的信和宜兴蒋氏宗谱，如获至宝，正好弥补了蒋氏世系溯源中断的缺憾。由此看来，蒋介石更早的祖籍当是江苏宜兴无疑。再说蒋介石看完了信立即瞩咐侍从室派人到宜兴调查，并交待下来：不要走漏消息，惊动中央各部委与要员们，以免贻笑于人。来人在蒋如镜陪同下实地查看了都山的 亭侯冢等几处遗迹,还看了宜兴城里已毁于兵燹的 亭侯祠的残迹。蒋如镜又让当地士绅蒋耀坤详细介绍了宜兴蒋氏家族的世系情况。来人问得很仔细，做了认真的记录。不过蒋介石在听取了侍从室调查人员的报告后，并没有表示要来宜兴，只是不置可否地“嗯……嗯”，以表示知道了。因为这时他有更重要的事——急于消灭共产党，正积极部署对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的进攻。另一方面，在还没有仔细研究这一事情的可信程度之前，也不便于立即明确表态。此后，随着战事的吃紧，蒋介石始终没有能来宜兴。蒋如镜原以为蒋介石会即刻来宜兴认祖祭扫，自己也可风光一下，说不定能够再弄它一任县长干干。可是直到 1946 年 6 月底他卸任回乡，蒋介石都没有来宜兴。（1950 年蒋如镜被宜兴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镇压。）

到了 1948 年 5 月初，宜兴县政府突然接到南京方面的通知：蒋介石要来宜兴扫墓。当时的国民党县长是李乙飞，见函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闹不清蒋介石要来宜兴扫的哪门子的墓。因为当年蒋如镜考证宜兴蒋氏与奉化蒋氏乃“同宗、同祖、同根生”只有参与其事者知晓，也未有公案留存，也就难怪李乙飞莫名其妙了。后来几经辗转，在宜兴徐舍下滩村找到了闲居在家的蒋如镜，才算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回到县里，李乙飞就忙开了，先带人去勘查都山 [illegible] 亭侯墓。这 [illegible] 亭侯墓坐落在都山荡边的都山上，依山傍水，景色优美。不过这座千年古墓，到这时已是荒冢，墓前残留着石台、石凳和一块字迹不清的墓碑。墓地面积约 3 亩，据说原来的面积有 5 亩，由此也可想到当年的气派。李乙飞交待县政府派人立即清除杂草，把通至墓地的小道修整，并在蒋介石要经过的几个主要地方和桥镇、徐舍和宜兴县城都布置了欢迎队伍。

5 月 17 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及侍从警卫一行，分乘 5 辆小车，没有前呼后拥的大队车马，轻车简从，沿当时的京杭国道（即后来我们说的宁杭公路）于上午 10 时许抵达宜兴徐舍镇。县长李乙飞率宜城缙绅蒋湘叔、徐舍的许楚箴和都山的蒋耀坤等在此迎候。这批人被蒋介石邀请同乘预先备好的专用汽艇直驶都山墓地，之后，从人弃舟登山，步行约两华里到了 [illegible] 亭侯墓。蒋介石在都侯墓村（今蒋家村）问有无同族年长者，蒋耀坤推荐了年逾古稀的朴实老农蒋田福，蒋介石接见了他，并客气地邀请他一同参加扫墓仪式。

在稍事休息后，举行了扫墓仪式，首先由蒋介石献上从南京带来的大花圈，蒋氏夫妇继而向侯墓鞠躬示敬，接着按年龄长幼分批向侯墓鞠躬。仪式很简单，没有上供品，也没有燃香烛。

蒋介石一行祭扫完毕，仍坐汽艇于下午 2 对回到徐舍，随即坐车沿京杭国道转锡（无锡）宜公路去了无锡，未在宜兴城内停留。

以后，蒋湘叔、蒋耀坤两次上南京谒蒋，请示修理宜兴城内 [illegible] 亭侯祠事宜。蒋介石拨了专款把祠堂修缮一新，并亲题“世德清芬”匾额。此匾制好后高悬于祠堂正厅中央。匾额上沿正中有一朱红大方印：“中华民国总统印”，下款为“蒋中正”三字。

祠堂正厅，新塑蒋澄坐像一尊，后厅悬挂蒋澄画像一帧。画像是蒋氏家族历代祖传，确系古画。“文革”中尽被毁去，使调查者无以得见。

附记：在调查中，承蒙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及有

关人士的热情接待与协助，更感谢当年在宜兴办报如今均已是耄耋之年的几位老先生，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才得有了此文的材料。

赵映林

蒋介石三次“引退”

以退为进，初次“引退”

1927 年 8 月 14 日，南京和上海等地的报纸赫然刊出蒋介石“下野”的消息。这位权倾沪宁、煊赫一时的“总司令”，刚遨游上海回到南京不久，为什么在戎马倥偬之际，突然“卸甲”呢？正当人们议论纷纷时，8 月 16 日上海《申报》刊出《蒋中正下野之经过》一一，系记者采访“总参议”张岳军的谈话，说“此次最近战事，一方对北，一方虑及武汉。奉之对冯，宁之对鲁，汉之对宁，适成犄角之势。故蒋自前线归来，默察大势，内省诸躬，为党之团结及政府前途计，决心下野”。张的一席之谈，无非想为蒋介石的下野作一番辩解。但也难免道出了一些真情。

1927 年七八月间的形势确实对蒋介石有些不利：这年 4 月 14 日，蒋介石另立中国国民党中央，18 日在南京又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5 月，蒋介

石调集军队过江北伐，与冯玉祥会盟徐州。就在这时，汪精卫在武汉通电表示要蒋介石“下野”，否则将予军事讨伐。6 月 23 日，唐生智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举兵东下进窥南京。27 日，蒋介石急忙下令从徐州前线抽调主力分别到皖赣一线和浙江一线防堵武汉的“东征军”，致使徐州前线兵力空虚。直系军阀孙传芳和山东张宗昌联合，率直鲁联军组织反攻，夺回徐州。蒋介石亲到徐州前线督战，仍频频失利，大军沿津浦线往南溃退，旬日之间两淮尽失。而唐生智又以“东征军总指挥”名义，连续通电要蒋介石“下野”。政局就如张岳军所说“适成犄角之势”，对蒋介石很是不利。

8 月 6 日，蒋介石从津浦路前线回到南京，随即搬到东郊汤山别墅，和何应钦、陈布雷等一班人商量对策。蒋介石的客厅里整日气氛沉闷，在一次又一次分析北、西两线形势后，何应钦和陈布雷等都认为，要摆脱困境，关键要看掌握百里江防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态度。如果李、白态度暧昧，则“总司令”别无他路，唯有“下野”。蒋介石经数天的优虑后，沮丧地说：速电在芜湖的李宗仁到汤山来，同时嘱陈布雷赶紧拟就一张“引退”文告。

8 月 11 日，李宗仁从芜湖回到南京，“就掉转车头，向汤山疾驰而去”。据《李宗仁回忆录》说：一见面，蒋就对李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李闻言，吃惊他说：“胜败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仍摇头说：“你不知道内幕，情形复杂得很。”

蒋介石叫李宗仁到南京的目的不是商讨军事，是摸李的底；李知道蒋在摸底，所以一面劝蒋不可下野，一面说：“现在津浦线上，我军已溃不成军，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已逼近蚌埠，旦夕之间即可到达浦口，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蒋介石一听李的言下之意，确是有点“暧昧”，随即拿出一张拟好的文告交给李宗仁。李宗仁拿了文告后即下楼和何应钦等一班人见面。这时何应钦、李宗仁、陈布雷、戴传贤、陈铭枢等许多文臣武将又紧张地议论开了，议题逐渐从蒋的去留问题转到对文告内容的推敲。12 日，蒋介石在汤山召集党、政、军要员会议，嘱把文告电达武汉汪精卫，上海胡汉民等，并把军、政大权交何应钦、李宗仁等负责。蒋即于当晚 7 时乘火车去上海，次日转去奉化，身边仅带 12 个卫士。

蒋介石的“下野”文告洋洋千余言，一面表露其北伐和清党之“大功”，一面把武汉政权与之对立之责任推在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身上。文告最后说：“中正复有何求，今既疚戾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因文告预先拟就，所署日期是 8 月 8 日。

蒋介石一下野，武汉方面就失去了“东征”之口舌。当“下野”文告电达武汉后，汪精卫于 15 日“有十万火急电，由九江拍至南京，请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速到九江会议”。8 月 22 日，李宗仁等代表南京方面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在九江庐山会议，双方取得妥协，缓住了唐生智的“东征军”。李宗仁回到南京后，与何应钦、白崇禧等于 8 月 26 日至 30 日的五天时间内，在龙潭全歼孙传芳渡江的 11 个师，扭转了危局。9 月间，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开会，联合组成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南京“国民政府”。接着，桂系又联合西山会议派迫汪精卫“下野”。10 月，李宗仁挥师西进，将唐生智部击溃，唐部 10 多万军队尽为桂系收编。

正当桂系势力在南京、武汉日益膨胀之际，蒋介石从溪口到了日本，与日本政界人士广泛接触，尤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长时间“恳谈”，取得“谅解”“11 月 10 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恰逢汪精卫从广州到上海联络组织力量，遂抓住时机串通一气，互相支持，相约同时复职。12 月 3 日，蒋介石支持汪精卫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汪精卫力推蒋介石复职。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想对张作霖作战，也主张蒋复职。何应钦则要蒋出来“主持军事”。这样，预备会议顺利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议题，并决定由蒋来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当即解体，胡汉民、孙科等一班人被迫“出洋”。12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桂系借机攻击汪精卫等对广州起义负有责任，蒋介石鉴于复职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参与劾汪。汪精卫也被逐“出洋”。蒋介石于 1 月 4 日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计”，9 日正式通电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拥有实权的职务。

内外交迫，再次“引退”

1930 年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长，蒋介石未经立法院通过，与日本签订了《关税协定》，因而胡对蒋不满。蒋又擅自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胡更不满。1931 年初，蒋介石坚持要召开“国民会议”，另制《训政约法》，胡汉民认为“总理之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中之对内政纲，较任何约法都完备，无需再作出钦定式之约法”。蒋听此言甚为恼火。2 月 26 日，他派人给胡汉民送去一个请柬，约 28 日于总司令部晚餐。28 日晚胡开完会到达司令部，不见有宴，只见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一人坐在那里。不久蒋介石出来相见，两人发生争执，蒋即下令将胡汉民软禁，后送去汤山。

胡案发生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起来，粤派要人纷纷离开南京去广州，有孙科、古应芬、王宠惠、刘纪文等。汪精卫和邹鲁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4 月 30 日，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囚监委正式提出“弹劾”案，要蒋介石“下野”。蒋被迫向中央监委“自请查办”。在两广方面，陈济棠、陈策、李宗仁、张发奎等相继通电响应，要蒋介石在 48 小时内“下野”。而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发出“忠告陈济棠”之通电，进行对抗。5 月 27 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于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

发表宣言，指责南京之“党部为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晚又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28 日，在广东省政府二楼举行“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又在燕塘阅兵，分别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第四两个集团军，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双方剑拔弩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以及各中等学校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9 月 28 日，学生冒雨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被迫出来“接见”。 11 月 24 日，全国各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 5 千多人到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对他们说：“如三个月内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学生们不信他的话次日在国民政府的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时敲打，以示警告。蒋介石被迫“手书”答应学生“抗日”。

在学生要求抗日的同时，各省响应东北马占山的抗日运动，纷纷指责蒋介石，要求出兵抗日。蒋介石内外交困，终于“软”了下来。蒋先派陈铭枢携亲笔信去上海说项，又派蔡元培、张继陪陈去香港与粤方会晤。9 月 28 日和 29 日，粤方之汪精卫、孙科等与陈铭枢等会谈于香港，议定由蒋介石先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机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即行下野”。接着双方在广州退思园开会，粤方坚持“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蒋方代表向南京请示，蒋复电表示只要粤方要人到南京，当即“通电下野”。10 月初陈铭枢返沪，由陈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调十九路军进驻沪宁卫戍，保证粤方要人安全。10 月 24 日，粤方要人与蒋介石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宅举行会议，前后开了七次，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于 11 月 7 日达成协议，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南京国民政府，俟改组后，广州国民政府当即取消。12 月 15 日，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宣布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26 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蒋介石虽然下野，仍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蒋在下野前已布置亲信，控制了军队等要害部门。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权攘利并未停止下来，在广州出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构。陈济棠倡议“西南五省大团结”，何成濬又发起“九省联防”，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等也在筹划“北方六省大联合”。国民党四分五裂。1932 年 1 月 4 日，孙科迫于形势，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南京政权出现危机，亲蒋派乘机提出“请蒋介石到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之动议，当即得到通过。2 月 21 日，蒋介石回到南京。3 月 6 日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三次“引退”，全盘失败

1948 年底，东北、华北全境解放，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占领，蒋家玉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唾弃，连美国政府也对他不满。

早在 1948 年 10 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有前途的其他国民党领袖人物上台执政。11 月 16

日孙科接任行政院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遣其亲信傅径波去见孙科，表示美国之态度，“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美国的态度使蒋介石非常着急，他立即派夫人宋美龄飞往美国访晤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支持”。但未得结果。12 月 24 日，拥兵 50 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提出“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蒋介石“下野”等要求；紧接着李宗仁与甘乃光等又提出五项和议主张：1.蒋介石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后撤 30 里；5.划上海为特别市，作为和谈地点。接着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四省相继通电主和，并要蒋介石下野。除夕日，蒋介石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征询意见，除谷正纲等少数几人外，其余一致认为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当去职。蒋介石深知这不仅是同僚们的意见，就是美国政府也对他打问号了。遂于 1949 年 1 月 1 日发表《元旦文告》，说“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1949 年 1 月 8 日，

蒋介石嘱外交部长吴铁城以《和谈决议》通知美、英、苏、法四国驻华大使，请其协助完成和谈，均遭拒绝。9 日，蒋介石一面派张群、黄绍竑去武汉和长沙，听取白崇禧和程潜的意见，一面调整南方各省之党政军要员，安排后路。18 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彭孟缉为副总司令。19 日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蒋介石既不能打下去，又没有“和谈”之可能，只得于 1 月 21 日“引退”。1 月 21 日下午 4 时，蒋介石乘飞机到杭州，次日到溪口。蒋经国在他写的回忆录《风雨中的宁静》一书中说：“父亲引退，离开南京，临行时候，曾到紫金山国父陵寝谒别。当天晚上到达杭州，就住在览桥空军军官学校，那时父亲的心情当然显得十分沉重。”

陆仰渊

蒋家王朝的“内廷”——侍从室

军机处与侍从室

史学家常说，历史往往会重演。公元 1703 年，清雍正皇帝乘着对准噶尔用兵之机，借口军情紧急，需迅速缜密处理，便降下御旨，命于宫内隆宗门附近建板屋数间，办理机密事务，这就是军机处。所谓军机处，不过是他私人的权力班子而已。军机处的人员由皇帝从亲王、重臣中挑选亲信担任，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总汇全国大事的机要，送呈御览，再经“圣裁”后，承旨出政。于是，军机处俨然成了凌驾于全国政府机关之上的政治总枢纽，如《清史稿》所说：“军国大计，罔不总览。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

公元 1932 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置日军人侵于不顾，继续进行“围剿”江西红军的内战。当时，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侍从人员如秘书、副官以外，还需临时抽调一两个参谋人员，随蒋到各地工作。善于察颜观色的政学系政客杨永泰向蒋建议：何不将随行的参谋人员以及侍从人员组成一个侍从室？此言一出，正中下怀。于是，蒋介石上承清帝遗泽，乘着对江西红军用兵之机，搭建了自己的军机处——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

4 年之后，即 1936 年 1 月，蒋介石对侍从室作了正式改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第一、第二两个处，此后又扩充了一个第三处，每处各设 3 个小组，其分工大致如下：

侍一处掌军机，下设第一、第二、第三 3 个组，分别掌管总务、军事参谋和警卫。侍二处掌政治、党务，下设第四、五、六 3 个组，分别掌管党政秘书、外交和情报综核工作。侍三处掌管人事，下设第七、八、九 3 个组，分别掌管人事调查考核、人事登记和“中训团”学员的通讯、调查。此外，蒋的安全保卫由一警卫大队担任，另设一侍卫长来统一调动指挥其行动。

于是，改组后的侍从室，成了一个掌管军机、党政、人事大权的统治机构。其规模虽不算大，但地位却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凡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党、政、军各界要人，都无不与之发生联系。其风光恐不逊于清帝的军机处。侍从室在 1937 年 1 月，得到军委会《组织大纲》的确认：“侍从室在驻留时与办公厅密切联系，掌机要之承启转达，委员长行动时随侍行动。”

据当了蒋介石 20 年监印官的姜辅成回忆，侍从室改组前，“除蒋介石亲笔手令外，一般机密性的公文均须盖上军委会官印”；而在侍从室改组之后，“重要的机密性文件多由侍从室直接发出。我们这个组织（监印室）形同虚设”。显然，侍从室已成为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内廷”了。

侍一处与军事幕僚长

侍一处是名副其实的军机处，侍一处主任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蒋介石的军事幕僚长。从 1936 年侍从室改组，到 1945 年侍从室撤销，10 年间，侍一处主任七易其人，依次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商震。其间，钱大钧和林蔚都是两度以高级军事幕僚长的身份，随侍蒋的左右，为蒋所信任。

钱大钧，江苏吴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是蒋介石黄埔嫡系的“八大金刚”之一。他在任侍一处主任时，在蒋身边处理文书，安排蒋的生活行动，精细敏捷，颇称蒋意。1936年西南两广事变时，钱大钧奉蒋之命，密赴大庾活动粤军将领余汉谋叛变陈济棠，获得成功，为蒋赏识。他又兼任蒋的侍卫长，周游于国民党军政要贝之间，显得颇为得意。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痛定思痛，曾一度怀疑钱大钧是否受了张学良的暗示，把停靠在临潼车站、备蒋专用的一列法制客车调开，向钱严词诘问。但事实是钱已事先向蒋请示并得到蒋的批准才调开的。钱提出蒋的批示加以申辩，蒋无话可说。念及钱在临潼华清池也被枪弹射伤，依然恢复了对他的信任。钱后来虽一度受挫，但毕竟与蒋的关系根柢甚深，故能东山再起，于抗战胜利前夕再度出任侍一处主任。离任后又被蒋任命力上海市市长。

林蔚，浙江黄岩人，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原任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掌国民党政府陆、海、空三军人事管理多年，每遇职务调动，他的原职位是从来不动的。林到侍一处任职，偏重于对战区的作战规划。他谨慎稳重，长于谋划，实乃蒋家王朝中高级幕僚人物的典型。

侍一处所处地位及主管业务大致如下：

综缩机要。侍一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本应由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其它行政部门掌管的工作。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侍一处无所不管。凡是蒋的参谋总长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经过侍一处的第二组（侍一处下设3个组中的一个，掌军事参谋业务），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请示报告的文电，须由蒋亲自处理的，也要经侍二组初步审阅后再行“呈阅”或“呈核”。

参赞军机。包括参与制订重大决策，提出重要建议等。若逢蒋有重要军事行动，侍一处主任常常要随侍左右，出谋画策。钱大钧就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

传布命令。主要是向各战区高级指挥官正确无误地传达蒋的重要手令。蒋在外指挥作战期间，常常深夜打电话找侍一处主任，对白天打的电报、命令加以修改、补充；或是叫侍一处主任立刻打长途电话，传布命令到前方。战事紧张时，蒋一天要找侍一处主任多次。遇有紧急军情，还得代蒋亲拟电稿发出。

协调关系。侍一处主任站在最高统帅的立场，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协调，尤其要与军令部、军政部保持协调。蒋也正是依赖侍从室的“协调”来对军队各部实行控制的。有一次，四川方面出了一点问题，蒋要何应钦到成都去料理，何不愿去。蒋对张治中说：“你告诉何部长，一个军政部长为什么这样胆小？他不敢去，我去！”张说：“委员长不必生气，我一定劝何总长去。”出来以后，张就去见何应钦，说：“你如果不去，谁能够去料理呢？假使你不去，委员长要自己去，你也不好意思。”何只得应允了。此日，蒋向张询问了说服何应钦的情形，连连点头：“好，好。”

从这几个方面，已可大略窥见侍一处作为军机要地的性质了。

侍二处与陈布雷

侍二处下设第四、第五、第六3个组，核心是第四组，它主管政治、党

务和秘书业务，管辖范围包括行政院所属各院、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统”特务组织等单位。各省、市地方政府行政首脑向蒋请示汇报的文电，也统由侍四组负责处理。蒋通过这一核心幕僚机构，把党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包揽一切，巨细靡遗。而具体主持人则是蒋身边的亲信幕僚人物陈布雷。他从侍从室改组之日起，就被蒋任命为侍二处主任。与侍一处主任频繁更替的情况相反，陈布雷担任此职务，直到1945年侍从室撤销，达10年之久。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约陈布雷单独密谈，密谋策划直至深夜。陈还为蒋写了不少文章，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十之八九皆出其手，故有蒋的“文胆”之称。

陈布雷在大革命前，在上海任《商报》主笔，写过一些反军阀的文章，受到蒋的注意。陈初识蒋，是在1928年的春节，被召见处是南昌。经几次长谈后，蒋即动员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并与陈果夫一起做了陈布雷的介绍人。此后，蒋曾问陈：“愿意做什么事？”陈答：“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从此，蒋便以陈为心腹，陈亦视蒋为“知己”了。此后，陈曾在杭州当过短期的浙江省教育厅长。蒋要发表文告，一个电话或电报，陈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个用的文房四宝到南京来了，写好文章，再悄然回杭州。

入主侍二处以后，据陈布雷自己回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仍是为蒋撰拟文稿。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记得，1936年10月，蒋50岁诞辰之前，报上曾发表过一篇以蒋署名的大作《报国与思亲》，南京政府通令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作为必读的国文教材，学生且须背诵。报纸的宣传说，这是委员长在自己诞辰之前，念国难，念母恩，含着眼泪写出来的至诚至情之文。可是陈布雷在其《回忆录》中，却披露了此事的真相：蒋的寿辰将届，“旋闻京中将有盛大之祝寿会，乃决意离京作华山游”，“……命撰《报国与思亲》一文，备于生日前发表，此文余携往沪上，于福康里寓中撰成之，寄往华山，经蒋公命力子、楚伧酌加一段而后发表”。原来，此文是蒋在华山悠哉游哉之时，陈布雷在上海替他绞尽脑汁炮制出来的。

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还记载，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张、杨释放。26日傍晚，蒋由张学良陪同抵南京。在机场下机后，“蒋公授予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据当时宣传，蒋是在西安机场等候专机时对张杨训了话，所谓草稿就是“蒋夫人笔记”的训话要点。其实，“训话”既非蒋的原话，亦非 宋的原稿，而是陈布雷的大作。

陈为蒋捉刀，虽然是心甘情愿的，但有时也有牢骚。西安事变后，蒋要陈到杭州为他社撰一篇《西安半月记》。陈虽对事变经过是了解的，但要凭空伪造一篇文章，则既非易事，亦非乐事。据说，陈在社撰这篇奇文时，心中有苦难言，愤懑无从发泄，就拿笔来出气。他手握狼毫，久久未写出一字，却在墨盆中狠戳，笔头一连被他戳断了几支。他的夫人王允默看了着急，就让陈的胞妹劝他不必动火，陈暴怒地挥手让她们全都出去，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叫我全部编造谎话，怎能不动火！”当然，动火归动火，谎话还是编造出来了。

蒋介石每次对他的文武官吏发表重要讲话时，事先常同陈布雷商量，斟酌拟订提纲，由陈拟成文稿。但蒋在讲话时，不习惯照念讲稿，还是由他信口开河，速记人员照原话一字不易地记录下来，送给陈审阅。经过陈的一番

文字加工，最后送给蒋亲自核定发表。蒋对陈的文字虽说是满意的，但仍十分挑剔，修改两三次是常事，最多的有 18 次易稿之事，常常使文章越改越长，连宋美龄也批评陈布雷文章太长。有一次，陈布雷听到别人对他的这种批评后，苦笑着说：“我和你有同感，但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每次我把文章作好送呈总裁，总裁总要一改再改，还加许多意思进去，所以文章就越作越长了。你说一般人不喜欢看长文章，我这写的人也是一样，一篇文章交了卷要我再多看一次，我也不大愿意。”

陈布雷在国民党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为蒋代拟文稿，且表现在逐渐成为国民党宣传方面的主持者和决策人。侍从室设有宣传小组，由陈一人负责。国民党中宣部的工作方针、计划，大都要向陈请示报告。

侍三处与人事情报网

蒋历来重视对人事权的控制。按照蒋的规定，凡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和行政院所属机关、部队，以及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单位的高级军政主管人员的任免，必须经过蒋亲自核定，然后交主管部门发布命令。关于高级行政人员的储备、考核、挑选、任用，蒋曾命侍二处第五组主管，但因涉及范围太广，实在管不了，大约在 1939 年底或 1940 年初，陈果夫秉承蒋的意旨，提出了“由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向蒋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经蒋批准，就在侍从室系统下成立了第三处，陈果夫任主任。

侍三处的内部业务，大体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整理原有的人事资料，作为建立其整个业务的基础；其次，通过各种组织，主要是“中央训练团”的组织，进行联络、吸收和甄选各方面的人才；最后，他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按照他们当时吹嘘的说法是：“一面为集纳人事资料的尾闾（古代传说中海水流归之处），一面为供应人事资料的源泉。”

在侍三处的工作中，是把组织工作摆在首位的。他们以国民党 CC 特务组织为核心，采取各种方式，对各方人士进行联络、拉拢、甄选和控制。其活动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成立所谓“实业计划学会”。该会负责人陈立夫，原系北洋大学毕业。他利用“学会”组织，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拉拢当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如大学教授、工程师及科研工作者，通过侍三处向蒋推荐。

二是成立“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隶属第三处。派 CC 系的小头子吴铸人为主任。规定“中训团”受训结业的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按时和“通讯处”联系。并规定学员报告的内容：除个人读书、工作和所在机关单位的活动情况以外，还要汇报周围人的思想情况。侍三处根据汇报，对受训结业学员进行考核、登记，择优予以升迁。

三是在中央训练团成立高级班。抽调国民党厅、司、局长和专员级官吏来团受训，期限半年，结业后，由侍三处登记，直接掌握，作为培养使用对象。

四是控制考铨处。考铨处是国民党考试院铨叙部派在各地方的分支机关。陈果夫首先把 CC 系的人塞进各地考铨处当处长，从而直接指挥各地考铨处，对地方人事进行染指。

此外，侍三处还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把经过调查和从各方面搜集到的人事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制成各种登记卡片，同各种原始资料一起构成人事登记卷。然后按照指定姓名和指定范围，制成各类索引卡，依照运用程序一索即得。

这样，通过侍三处几年的经营，在全国各地都撒布了“人事情报网”，从而使蒋介石得以把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侍从室与特务情报活动

蒋介石为了巩固其独裁统治，一向重视情报业务和发展特工组织。早在内战期间，蒋就苦心经营了 CC 和复兴社两大特务组织。侍从室改组以后，蒋又通过侍从室把这两个特务组织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两个特务组织送给蒋的密报文件，按其内容性质，由侍一、侍二两处分别处理。即：关于“中统局”的情报，直接封送给侍二处第四组处理；关于“军统局”的一般情报，如对蒋军军官的贪污腐化和私生活等项的密报，均用戴笠的名义分类列表，封送给侍一处第二组处理。其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则由戴笠先送侍二处，经陈布雷以及第四组组长陈方阅后，会同侍一处研究处理。如国民党政府于 1937 年 12 月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后，蒋介石就安排去四川的退路，当时四川各派军阀勾心斗角，政局动荡不定。蒋介石就通过戴笠的特务组织搜集四川军阀内部的情报，以便采取措施控制川局。1938 年 3 月中旬，侍从室一、二两处根据戴笠的汇报情况，整理了一份四川军阀活动情况的调查材料，其内容包括各派军阀之分析及其动向，各军政首领对蒋的态度与企图等，成了蒋制订对策的重要依据。

侍从室特务情报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政治动向进行监视。国民党的上层，是一个尔虞我诈、争权守利的角逐场所。蒋介石与他的部属，即使是对他的嫡党嫡系，也无绝对信任可言，常常要通过侍从室的情报活动进行监视和控制。 1940 年初，陈布雷即在侍二处第四组秘密设立“经济情报组”，利用经济情报人员，对那些被认为不甚可靠的高级官员或封疆大吏进行监视。例如，陈布雷和张治中虽同属蒋的嫡党，但由于张治中政治态度比较进步，曾数次访问延安，同中共领导人较为接近，因此被陈布雷视为“不放心的人物”，加以提防。1943 年 6 月，被陈设法安插在三青团中央团部任财务组长的魏锡熙，奉陈的秘密指示，对当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的张治中进行监视。陈要求把张在三青团的政治性经费开支，以及各项专款和私人机密费等情报，及时报送经济情报组。魏锡熙接受任务后，曾积极活动，多方搜集材料。密将发展三青团组织，建立各地青年馆，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等经费预算、工作计划、开支情况及张的特支费等情报，及时报送经济情报组，以供陈布雷了解张治中在三青团的政治动向。抗战胜利后不久，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爆发了民族武装革命，蒋任命张治中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并授其处理新疆问题全权。此时，陈又密瞩随张赴新疆担任省政府会计长的魏锡熙一如既往，随时报送有关张的政治性的经济情报。魏先后将统一新疆全省币制、三区民族军粮饷、张治中视察伊犁和南疆的开支、张治中赠送各民族头目的犒赏以及他的机密费等情报，详细报送经济情报组，直到 1947 年 9 月张治中离开新疆时止。陈布雷虽然是张治中在侍从室期间“最好的一位朋友”，但他作为侍从室二处主任，

还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任用亲信与恩威并施

侍从室既然是蒋家王朝的内廷，那么，蒋介石对内廷臣僚的任用，当然要极端注重了。特别是侍二组和侍四组这样的核心幕僚机构，其工作人员都是蒋亲自挑选。他首先考虑的是，此人是否为黄埔军校出身，或是否在统治集团中服务年限深久；更重要的是还要看什么人保荐。然后，还要凭他自己的经验，召见来人，亲自观察，特别注意来人的仪表精神，他认为满意，才做最后决定。用蒋自己的话来说：“确信万无一失者方可任用！”所谓“万无一失”，就是对蒋忠心耿耿，绝对可靠，此外都是次要的。即使道德败坏，声名狼藉，蒋也在所不计。两次担任侍一处主任的钱大钧便是一例。此人一贯好色贪财，多次贪污渎职。在担任蒋的保定行营主任以后，更是一味荒淫享乐，在北平、保定两处均置有最豪华的私宅。他特别贪爱钱财，常以馈送河北各将领为由，开支特别费，仅此一项即贪污 10 余万元。保定行营的一些人将“钱大钧”三字颠倒，将“钧”改为“钩”，讽之为“钩大钱”。蒋介石对钱的为人并非不知，但侍从室改组时，还是任命钱为侍一处主任。原因就在于他是蒋的嫡系，善于投蒋所好，俯首听命。

蒋介石对其侍从室人员不但严格挑选，而且精心驾驭。对比侍一处和侍二处骨干人员的任免情况，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显著差别：侍一处人员更替频繁，一般任期 1 至 2 年，最短的只有 3 个月。而侍二处人员比较稳定，特别是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十年一贯制”，从未更换。个中秘密，不难猜测：在那狼烟四起的年代，侍一处主管军事，对内联系军委会内各部会，对外联系各战区发布蒋的军令，因此，一处的主管不但必须是亲信，而且不能有常员，否则，就会有人籍此培植自己的势力，而蒋就有被越殂代庖、给人架空的危险。所以，一处主任之职经常变动，就是必然的了。

蒋介石驾驭侍从室的另一手是恩威并施。恩，就是不但在侍从室任职期间给以优厚的待遇，而且离开侍从室的时候，凭蒋的一句话，就可以提升一、两级任用，表示蒋对其内廷臣仆的特殊恩宠，使他们对蒋感恩图报。威，就是对其部下严加督责，使其尽职尽忠，不使稍有懈怠。有一次，工兵学校请蒋颁示训词，钱大钧命人拟就，呈蒋审阅，蒋见文字草率幼稚，大为不满，援笔批曰：“此等文字，尚不够中学生程度，何得率为转呈！”另一次，某战区送上一大厚本作战计划，当时任侍一处主任的张治中马上签了字，呈了上去。蒋却在后面批了一大段话，大意说：“这样一厚本给我看，究竟你们是我的参谋，还是我是你们的参谋？”对张治中的“疏忽”将了一军。蒋是经常以“威”的一手督责下属为他勤勉服务的。

揣摩迎合——侍从室办事之要诀

幕僚们谁不知道，蒋介石肚子里对人、对事是有一本细帐的，总是把嫡系视作亲信，杂牌目为异己。幕僚们处理请托之前，总是首先要弄清请托者与蒋的亲疏关系，然后分别处置。遇有弄不清某些人与蒋的关系，或蒋喜怒不定、难以捉摸时，就干脆不拟初步意见，用“呈核”二字，听蒋自行裁决。蒋自会独出心裁，凭自己的意志处理一切。

蒋审阅文件有一个习惯，经常批一“阅”字。有时用红蓝铅笔，有时用毛笔，字迹潦草时，竟把“阅”字画成弯弯曲曲，恰似蠕动着的蚯蚓一般，后面向来是不签名的，看惯了的人，一望而知是蒋的亲笔。然而同是蒋的亲笔，幕僚们却能揣摩出不同的涵义。最普通的情况是一“阅”字了之，归档存查；一种情况是蒋从中采取部分意见，另外下达“手令”或“指示”，这样的“阅”字，意味着把文件暂时撂过一边。另一种情况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还在思考，但蒋又故弄玄虚，使人高深莫测，也批一“阅”字。有时蒋想起来，还向侍从室管档案的人索取重阅，又在上面画上一个爬虫符号。这许多不同涵义的“阅”字，蒋的幕僚们是善于鉴别的，并能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不同处置。如，蒋最不喜欢听人家对他批评的意见，即使是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逆耳忠言，蒋也是不爱听的。1941 年 6 月，冯玉祥在重庆给蒋写过一封信，向蒋痛陈当前军政积弊，言颇直切，一共用了 35 张八行信纸，当时侍二组参谋人员为蒋作了详细提要，并附原信，送蒋核阅，蒋看毕，只批一“阅”字。于是幕僚们明白，这封信的命运只是“留中”了。

蒋有时嘴上这样讲，其实心里对于究竟应当怎样办，并未拿定主意。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国统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学潮风起云涌，西南联大学生走在前面，其它地区学生纷纷响应。蒋曾下令解散西南联大，遣返学生回籍，由昆明驻军办理。并命陈布雷召集一个小组，主持处理各项问题。深察蒋介石之心的陈布雷揣度：“蒋是否真的要解散联大，值得进一步研究。”陈布雷认为，学潮是受共产党鼓动的，若解散联大，则将授共产党鼓动各地学潮的借口，不是处理问题的上策。于是电告蒋介石，西南联大问题正设法疏导，请暂缓解散。鉴于联大问题症结，“是在少数职业学生与亲共教授的煽动与裹胁，而其扩大则由于多数正派教授之冷漠不理”，他们订出下列“疏导办法”：暗示各教授，最高当局有解散学校及军事接管的筹划，为学校前途计，大家都要挺身而出疏导学生；通知驻昆明部队，作接管学校的准备；……如此软硬兼施，多方配合，陈布雷果然瓦解了这次学潮。

有时蒋嘴上是这样讲，心里想的却是那样办。有一次，侍从室的一个股长慌忙来见张治中说：“委员长觉得黄山的防空洞太开大了，问是何人办的，有人说是我叫军政部办的。委员长说，这还了得！谁叫他开这样大的防空洞？太浪费，非办他不可！——请主任代我在委员长面前求求情。”精明如张治中者，岂不知蒋对其部下的这番忠心是很赏识的，处分云云，不过是蒋故作姿态，沽名钓誉而已。于是，张治中就写了一张条子送给蒋，大意是说：委员长爱惜人力、物力，是应该的，不过侍从人员对于领袖的安全负有责任，在这点上，似可予以原谅，免予处分。蒋果然批了一个“阅”字了事。

侍从室的幕僚们都熟悉，蒋是个爱发脾气的人。在他动怒时说的话，不必过于认真。他们奉行的对策是：气头上不要硬顶，事过后我行我素。蒋曾指着他的文武官吏们厉声说：“你们不要当着‘委员长，是一个字纸篓，什么事都拿给我看，你们一点责任都不肯负担，那不是对待长官及对待自己的办法，有失政府设官分职的本意！”然而他的下级懂得规律，等待蒋的脾气发泄完了，还是按老章程办事。有一次蒋出去，看到 4 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内有一人是穿便服的，蒋勃然大怒，即命“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去办了，回来报告经过。蒋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把那张批示送张治中看，张在原批后面，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若问张治中何以竟敢如此大胆，原来也是因

他摸透了蒋的脾气，他给军法总监的电话就透露了其中奥秘：“ 这不过委员长认为一辆三轮车不能坐 4 个人，搭车的又是普通人，一时动了气，并非了不得的事，顶多问问，关几天也就够了。 ”后来事情果然如此了结。

1945 年 11 月底以前，侍从室 3 个处全部撤销了。侍从室原先的一套业务，按其性质分别编入国民政府（以后改称“ 总统府 ”）参军、文官两处的机构之内，成立了军务、政务两局。

吴雨

雪窦寺与蒋介石一家的“佛缘”

在蒋介石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西北的雪窦山上有一座著名古刹，名曰雪窦资圣禅寺，简称雪窦寺。因宋代仁宗皇帝梦游雪窦山，理宗皇帝御书“应梦名山”而声名大噪，南宋时被定为“天下禅宗十刹之一”。民国时期，蒋介石一家信佛，与雪窦寺结下了不解之缘，更使雪窦寺扬名海内外。近年来，大批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台湾同胞前来游览、拜佛，常有人探问蒋介石一家与佛教的关系，特别是与雪窦寺的关系。台湾有人称雪窦寺为“蒋氏家庙”，对雪窦寺的修复给予很大关注，捐资数额居各地之首，四座佛殿有两座为台湾僧尼所捐造。蒋介石一家与佛教，主要是雪窦寺究竟有哪些关系，现据奉化志书记载和知情者口述，作如下介绍。

禅宗名刹

雪窦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寺志记载：“晋时有尼结庐山顶，名瀑布院。”唐会昌元年改建山麓。咸通年间毁于兵火，重建后改名瀑布观音院。景福年间，寺院扩建，成为十方禅院。宋淳化三年（993），建藏经阁，四年赐御书石刻两部。咸平二年（1000），宋真宗御赐资圣寺额，始称雪窦资圣禅寺。绍兴二十七年（1158），又毁再建。至道元年（995），宋孝宗敕铸大钟，“以警晨昏”。元至元二十五年（1289）复毁，越两年修复。明崇祯十六年（1644），再毁于兵火，清顺治年间重建。“文革”期间又遭毁坏，仅剩东厢房，1986 年重建，现已基本完成，规模空前，扩建了山门，新添了弥勒殿，还造了宾馆，成为海内外佛事交

{ewc MVIMAGE,MVIMAGE, !09800140_0324_1.bmp}

往的一个热点。雪窦寺高僧辈出，自唐至清，住持禅师凡 48 人，其中法眼宗 5 人，云门宗 9 人，曹洞宗 8 人，临济宗 19 人，未明宗派者 7 人。后周广顺年间，智觉禅师来寺说法 9 载，著《宗镜录》百卷，宋乾兴年间的明觉禅师，住持雪窦 31 年，所著《颂古集》、《洞庭语录》、《雪窦开堂录》等，在禅学中声誉昭卓。绍兴年间的智鉴禅师，其法嗣天童寺如净禅师，为日本曹洞宗祖师道元禅师的受业师，是以日本曹洞宗也尊雪窦寺为祖庭。淳祐年间的师范禅师，曾应宋理宗之召，升座说法，帝垂帘而听，赐号佛鉴禅师。元至元年间的炳同禅师、大德年间的无印禅师、明末清初的石奇禅师都多有著述。民国年间的太虚大师曾应蒋介石之邀，在 30 年代主持寺事 5 年余。现任方丈月照法师，是全国佛教协会理事。

果如弟子

清光绪年间，舟山金塘岛人果如和尚（1854—1917）来雪窦寺担任住持。光绪三十二年（1906），御赐玉印、玉佛、龙袍、袈裟、龙钵及经书数百函、半副銮驾，果如专程往京城接受。返回溪口之日，寺里备办全副仪仗，下山迎回，轰动一时。为了保管好这些御赐之物，果如重建了法堂藏楼，一时来雪窦寺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大增。

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奉化西乡葛竹村人。该村远离县城 50 公里，原属嵊县，民国 20 年划归奉化。她年轻时命运坎坷，初嫁奉化跸驻乡曹家地村，

婚后不久，接连亡夫丧父，夫家娘家均无恒产可守，生活窘困，没奈何在葛竹村口的金竹庵带发修行，以茹素念经排遣孤寂岁月。正当她心灰意懒、前程无望之际，有一相面之士路过庵堂，说她可生贵子，燃起了她一线希望，于是经其堂兄说合，再嫁于溪口玉泰盐铺老板蒋肇聪（肃庵），果然否极泰来，夫妻恩爱，次年即生下蒋介石。从此，她更加相信命运，全心皈依佛门，经常到离家 10 公里的雪窦寺顶礼膜拜，最后拜方丈果如为师，在雪窦寺厢房设有佛堂。蒋介石 9 岁丧父，少年时，受母亲薰陶，佛教在其脑子里烙印很深，从小相信冥冥之中有佛在主宰一切，往往在遇到困难之时，企求借助佛力摆脱窘境，求得光明。

果如既然成了蒋母王采玉的师父，蒋介石当然尊之为师祖，上雪窦山都要大礼参拜。果如早年在舟山金塘岛普济寺出家，在那时当过知客。1949 年 5 月，蒋介石乘军舰在金塘岛洋面停泊 10 余天，曾 4 次带着蒋经国、俞济时等人登岛，走访普济寺，每次都焚香礼拜果如和尚塑像，并与该寺 80 余岁老住持长谈，间果如生平事迹，索阅果如生前照片及遗墨梅桩等作品，嘱老住持好好保藏，最后命俞济时给几元银元作茶资。事后，驻扎该岛的国民党部队一〇二师政工组长张盛吉出于好奇，查询老住持：“ 总统何以对果如佛像如此虔诚崇拜？ ”老住持答曰：“ 蒋母皈依佛教，即拜果如为师，总统幼年也在果如前常聆教益。 ”

下野求签

蒋介石信佛，既是由于其母耳濡目染的影响，也由于他求佛曾经有过“ 应验 ”，即偶然巧合。

1926 年 11 月，北代军围攻南昌，总司令部设在离南昌约

10 公里的牛行车站附近。一天傍晚，蒋介石和参谋长白崇禧到附近的一座灵帝庙求签。他抽出一支竹签请老和尚破解，询问战事胜败。和尚看后随机应变解道：“ 阿弥陀佛，大吉大利，但要预防剪刀差，被切断后路。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命副官江志航给老和尚 200 元纸币作为酬谢，回司令部后立即调两个团，靠近司令部设防。第二天深夜，敌人果然从后面突袭司令部，幸而事先有备，才避免了危险，还歼敌千余人。这一意外的胜利，使蒋介石越加相信菩萨了。北伐军攻下南昌以后，又命军需处长俞飞鹏给和尚送去许多钞票，以修缮关帝庙。

1927 年，蒋介石继续率兵北伐，徐州战役失利，引起朝野反对，只好被迫下野。8 月 14 日，他回到家乡溪口，第二天就往雪窦寺求签问卜。当时雪窦寺的住持叫朗清，知道来意后，就回身入室，取出一本线装书，又捧出一个圆木盘，盘子里摆着一叠纸卷子，叫蒋介石抽出一个小纸卷交给他。和尚展开纸卷一看，见是“ 飞龙返渊，腾骧在望 ”八个字，笑咪咪地向蒋介石行了一个合掌礼，开口说：“ 恭喜总司令，从此逢凶化吉了。今年流年丁卯，犯天狗星，略有灾难，目前已将过去，后福无量，长则两年，短则一年，必然祸消福来，那时总司令的地位要比现在更高，贵不可言。明年流年戊辰，大顺。 ”朗清一席解签，把蒋介石说得心花怒放，高兴地说：“ 但愿如法师所说，以后我当重修寺院，再塑金身。 ”抽签问卜之后，蒋介石决定搬到寺里居住。不久，卫兵从家里取来了行李，还挑来一担炊具，跟来一名厨师。蒋介石在寺里整整住了 11 天，领略禅机，期盼好运，还应方丈之邀，为雪窦

寺山门题了“四明第一山”五个大字，制匾挂于门首。

捐资修路

从溪口入山亭到雪窦寺，原来只有山径小路，曲折崎岖。这条小路不仅是上山朝圣的必经之道，而且也是山区四方村民出入溪口的一条热线。当地山民和香客来往颇感不便，但又无力拓建。蒋介石的发妻毛福梅，命运虽然比她的婆婆略胜一筹，无衣食之虞，但她嫁到蒋家以后，不久即夫妻失和，待经国生下，蒋介石接连纳妾，把她冷落一旁。这对年轻少妇打击之大可想而知。怎样排遣这寂寥岁月？在当时的条件下，毛福梅与其他不少失宠的妇女一样，投入了佛门的怀抱，也成了雪窦寺的常客。

1913 年，蒋家接连出事。一是蒋介石参加癸丑讨袁失败，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二是刚及 4 岁的小经国出了天花，在那时的医疗条件下，此病十分可怕。经国日夜吵闹，婆媳六神不安。无奈中，他们只好求助菩萨，到处拜佛许愿。不久，终于化险为夷，蒋介石平安归来，小经国天花痊愈，虽然面部留了几颗麻点，但毕竟保住了性命。事过境迁，否极泰来，婆媳商议，如何还愿？最后议定，婆婆为溪口通向娘家葛竹村途中的“休休亭”翻修加固，便行人歇脚喝茶，亭脚石柱上镌刻“民国两年蒋门王氏喜助”以作纪念，媳妇则出资拓宽溪口入山亭至雪窦寺的山路，以方便去雪窦寺朝山进香的信徒和经常往来的四乡山民。

太虚讲经

据太虚《自传·二十二》记载：“1927 年 9 月 9 日，住溪口文昌阁（蒋介石在镇上的别墅——笔者注）。翌日，中秋节晚上，在文昌阁为蒋氏夫妇及张、吴略说心经大意，相与赏月。”这里的蒋氏夫妇是指蒋介石和毛福梅，张是张治中、吴是吴忠信，均为蒋介石重要幕僚。

太虚，俗姓吕，本名祜淦森，浙江桐乡人，民国时期著名佛学大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他钻研过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曾到过日、美、法、德、荷、比等国讲学。太虚在宁波天重、舟山普陀讲经时，蒋介石曾陪同其母前去聆听，相互早已熟悉。1927 年 8 月 14 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回乡，心烦意乱，想借佛经来安神定性。另外，他当时正在筹划去日本向来美龄的母亲倪桂珍恳求将其女嫁于他，力争在赴日前办好与原配毛福梅的离婚手续，但毛氏坚决不同意，为了排除毛氏心理上的阻力，想借助太虚一臂之力，用佛经说服毛福梅。于是，发电恭请太虚来溪口一行。太虚到达溪口后，蒋介石先陪他游览了溪口雪窦山风光，单独和他在雪窦寺细谈了一整天，使太虚心领神会，了解意图，然后选择中秋之夜赏月讲经。

那天晚上，太虚讲的是《心经》，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唐三藏奉诏翻译的本子。《心经》虽然只有短短 260 个字，但却是佛学中极深奥的经典，毛福梅虽然会背，但难解其意，听说高僧为她讲解，欣然前往。太虚从“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相行识，亦复如是”讲起，讲到“是故空中无色，无受相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天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

得故”，这么多的“空”和“无”，把毛福梅讲得如堕五里雾中。太虚讲心经，在毛福梅的心灵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经过多方面工作，毛氏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太虚对此十分得意，曾赋诗云：“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难忘是中秋。”还赠蒋介石一首诗：“国家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当遗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豨。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违。”劝蒋介石勇“出”莫“退”，奋力“缚海豨”，争取东山再起。

太虚走后，蒋介石把《离婚协议书》送奉化县长徐之圭备案，算是办了法律手续。接着，于 9 月 23 日离开溪口，28 日在《申报》发表《蒋中正启事》，宣布“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氏，本无契约”。当日，在宋子文、张群陪同下，乘日轮“上海丸”赴日，到神户有马温泉向宋母求婚去了。

增寿道场

1936 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的 50 虚岁生日，毛福梅与丈夫名虽离婚，但旧情不忘，准备为他庆贺一番。姚冶诚也不甘落后，特地从苏州赶到奉化，与大娘商讨祝寿事宜。当时，社会上正在搞“献机祝寿”，蒋介石已到洛阳避寿去了。溪口怎样表示，两位夫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最后商定去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天台国清寺做一场水陆道场，为寿星消灾弭祸。

毛、姚两夫人为酬谢僧人念经之劳，给寺内每个和尚斋僧衣一件，命外甥宋泓生（蒋介石胞姐瑞春之子、蒋家丰镐房帐房）经管此事。和尚们鱼贯而入，依次向佛像下面的蒋介石像下拜，口念“消灾延寿药师佛”，拜一个，发一件，待按人头准备好的 400 件僧衣发完，还有一名小和尚说未领到。宋泓生说他已领过一回，小和尚则赌咒发誓，声言未领。争执间，方丈闻声过来，觉得有失寺院面子，便斥责小和尚。小和尚一气之下，竟投河自尽。

毛福梅为祈福寿斋僧，结果反而丧了一条人命，心里很不好受。回家后，时时提心吊胆，深怕祸事降临。事出偶然，不出三个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这一巧合，毛福梅认为是天台国清寺小和尚阴魂不散的缘故，她天天在佛堂里祈祷：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只要经国阿爸能够平安归来，福梅愿以身代……

兴建祖庵

1930 年，就在蒋介石接受江长川牧师洗礼，皈依基督教的那一年，蒋介石在家乡兴建了一所祖庵，名曰“摩诃殿”。摩诃是蒋家“始迁四明”的第二代祖先。他本名宗霸，字必大，五代后梁时人。他慈善温谨，笃信佛教，经常口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故乡人称之为蒋摩诃。据延祐《四明志》等书记载，当时布袋和尚（传说为弥勒佛化身）居于奉化岳林寺，蒋摩诃拜他为师，跟他云游三年，晚年结庵鄞县小盘山，为小盘山弥陀寺的开山祖，现弥陀寺和蒋摩诃的墓塔仍在。

蒋氏宗族信佛，去小盘山祭扫蒋摩诃的世代不绝，至蒋介石则更为虔诚。在他当上民国元首后还曾三临墓地祭拜。据弥陀寺的慈舟和尚说：“1949 年 4 月，蒋介石离开家乡前，曾专程到弥陀寺拜佛，并祭奠蒋摩诃。当时的方丈果澄和尚接待了他。陪蒋同来的有张群、俞济时、蒋经国。蒋介石命俞济时送 2000 斤谷钱，10 丈白布，托果澄看管祖坟，按时供祭。蒋介石一行当

晚还在附近的天童寺住宿一夜。”

蒋介石得志后，为便于就近拜祭，曾选择其故居附近的养松园原址造了一所摩诃殿，殿内立了一尊摩诃塑像。现该殿已按原样恢复，对中外游客开放。

王舜祁

（第 324 页为蒋介石一家照片）

杜月笙的一次堂会

1931 年 6 月，上海闻人杜月笙为其宗祠落成，举行了一连 3 天的盛大庆祝活动，轰动全国。

当时正是社月笙“飞黄腾达”、锋芒毕露之际，尤其爱讲排场出出风头。他为了荣宗耀祖，特地在自己的家乡浦东高桥建造了一座建筑十分讲究的杜氏祠堂。据当时报纸的介绍，杜氏祠堂是五开间三进，第二进为正厅，第三进则为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之所。1931 年 6 月举行祠堂落成典礼，它不仅成为当时的“党国”大事，而且“惊动”了在野名流和租界里的外国官商。蒋介石除以总司令的名义，送了一方“孝思不匮”的大匾额外，还以“主席”的名义送了一幅祝词，并派“国民政府参军”杨虎为代表，到场宣读颂词，行礼如仪。此外，“党国要人”和在野巨头敬送匾额的也不少。于右任兼是有名的书法家，亲题了“源远流长”四字匾。张学良送的是“见义勇为”四字。吴佩孚送的是“武威世承”。段祺瑞和当时的班禅喇嘛，也都送了匾额。南京、上海的党、政、军、绅、商要人，不少人参加了这个典礼，恭送神主入祠。远在边陲的新疆主席金树仁也赶来参加。外国人中，则有法租界的总领事、领事、法捕房总巡、日本总领事，还有驻在上海的日军司令坂西将军。据 1931 年 6 月 10 日的上海报载：9 日上午 7 时起，法租界嵩山路、华格臬路一带，到处是各种仪仗，大旗飘扬，金牌林立。9 时，大队从杜公馆出发，南行经李梅路转至恺自逊路东行，折至公馆马路向南行至老西门，由小东门大街直至金利源码头。然后登特备汽轮，直驶高桥。一路汽车相接，爆竹声轰鸣不绝，码头搭有高大的牌楼。参加的仪仗队伍，长达数里，其中有法租界政治部全体人员，公共租界有英籍马队巡捕，法租界的法捕、华捕、越捕及工部局军乐队。此外，还有上海警备司令部、公安局乐队、各慈善团体、驻沪海军乐队。杜氏祠堂门前，高搭着五层的彩色牌楼，祠堂四周，搭盖起高大的席棚，可摆设席面 200 余桌。9 日那天，到的来宾逾万人，分 3 次开席，尚有多人未能入席云。一共是庆祝了 3 天，据一家小型报纸记载：“每日所开酒席，恒在于桌以上，然仍有多数来宾无法插足。车轮不敷分配，致宾客多徒步来往于浦东及高桥间，贵宾眷属，亦多尝此况味。”又据 14 日报载：“此次杜祠落成典礼，设办事处，由虞洽卿督率办事人员数百人，该办事处昨日已结束，大部渡浦返沪。”另据报载在那 3 天之中共耗费了 60 万银元。

最轰动全国的，是 3 天庆祝活动中日夜开演的六台堂会戏，演的全是京剧。当时，正是京剧的黄金时代，“四大名旦”正在壮年，“四大坤旦”成名不久，老生各个流派的创始人如余叔岩、马连良、谭富英、言菊朋等，有的还在青年，有的还未入颓唐。这些名震南北的名角，除余叔岩外，全部被邀请来了，加上上海的著名演员，还有闻名的票友。这 3 天六台的戏，几乎全是珠联璧合，“人间难得几回闻”的好戏。当时杜月笙认为余叔岩不到是美中不足，别人不到犹可，此人万不可缺，曾一再派人去向余叔岩晓以利害，诱以重金。但余叔岩有他的特别脾气，他说过不来就无论如何也不肯来了，权势和财货并不能吓倒或打动他，他甚至表示这次得罪了杜月笙，以后不到上海这个码头上来演出也就罢了。于是杜月笙虽然非常恼火，却也无可奈何。而后来余叔岩也果如其言，直至他在 1943 年病逝于北平为止，12 年间其足迹从未跨出平津两地，再也没有南下之行了。这次堂会戏于 6 月 9 日、10 日、11 日演出 3 天。当时上海《申报》曾发表 9 日堂会戏目：全班合演《天官赐

福》；徐碧云、言菊明《金榜题名》；荀慧生、姜妙香、芙蓉草《鸿鸾禧》；雪艳琴《百花亭》；王又宸、尚小云《汾河湾》；华慧麟、萧长华、马富禄《打花鼓》；李吉瑞《落马湖》；程砚秋、王少楼《芦花河》；梅兰芳、杨小楼、马连良、高庆奎、谭小培、龚云甫、金少山、萧长华、姜妙香、曹毛包《龙凤呈祥》。6 月 10 日戏目是：全班合演《富贵长春》；袁履登、王得天的《八百八年》；孙化成的《群臣宴》；王庾生、小杨月楼的《庆顶珠》；刘宗扬的《状元印》；王又宸、小桂元、金仲仁的《状元谱》；郑永泉的《智取北湖州》；兰瑛夫人、高庆奎、张春彦、姜妙香《玉堂春》；李万春、蓝月春的《两将军》；程砚秋、黄大元的《烛影记》；李吉瑞、小桂元、苗胜春的《独木关》；王少楼、金少山、张春彦的《捉放曹》；杨小楼、雪艳琴、高庆奎、雪艳舫、刘奎官、刘砚亭、蒋宝印的《长坂坡》；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马连良、雪艳琴、龚云甫、徐碧云、芙蓉草、王芸芳、谭小培、谭富英、言菊朋、麒麟童、黄大元《红鬃烈马》。6 月 11 日戏目：杨鼐侬、金碧玉、彭春珊的《满堂全红》；小杨月楼、小奎官的《岳家庄》；言菊朋的《琼林宴》；荀慧生、麒麟童、刘奎官、曹毛包、金仲仁的《战宛城》；马连良、金少山的《战荥阳》；高庆奎的《取帅印》；徐碧云的《花木兰》；尚小云、龚云甫、黄大元的《马蹄金》；刘宗扬的《挑华车》；梅兰芳、谭小培、金少山的《二进宫》；李万春、蓝月春的《夜奔》；雪艳琴、姜妙香、雪艳舫的《弓砚缘》；李吉瑞的《卧虎沟》；程砚秋、谭富英、王少楼的《忠义节》；杨小楼，马连良、刘砚亭的《八大锤》；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雪艳琴、高庆奎、金少山的《五花洞》；麟麟童、王英武、赵如泉、刘汉臣、金素琴、刘奎官的《庆赏黄马褂》。戏目精采纷呈，演员群英荟萃。

在堂会戏的演出场中，还发生了上海大亨张啸林白吃耳光的插曲。每次演出，前排座位中总是保留了部分贵宾席，这是供来宾中的少数军政要人、豪绅巨贾、社会名流和外国领事、洋行大班等中外头面人物的专座。不料有一个身穿国民党军装、卖相并不神气活现的来宾，大模大样地也去坐在贵宾席上，这被担任总招待的张啸林看到了，认为一个普通官兵哪配占此佳座，便走过去叫他滚开。张啸林态度凶狠，开口伤人，使对方不能容忍，顿时冒火，便抬起手来给张啸林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平时谁也不敢碰“张老板”的一根毫毛，如今他竟然在大庭广众之间吃了亏，岂肯罢休，正等他挥手使手下人大打出手时，杜月笙闻讯赶来，他不看犹可，一看之后，向面红耳赤、满脸怒气的张啸林打招呼，打发他走开，然后又连连向对方赔礼道歉，请他就座看戏。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原来这个貌不惊人的来宾，是张学良的代表。当时，张学良的权威仅次于蒋介石。因而张学良的代表当然有资格坐贵宾席看戏，所以张啸林这记耳光是完全白吃了。虽然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杜月笙再三通知此事不许张扬出去，但是来宾既有万余人之多，如何封得住嘴巴，很快就轰传开来了。而且平民百姓听了好像有人代他们出了口气似的，还暗暗拍手叫好称快呢。

姜斌

（第 334 页为杜月笙一家照片）

马鸿认子案

1936 年，天津发生了一桩马鸿认子案，牵涉到抗日将领马占山，一时轰动全国。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他不顾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率领部队在黑龙江嫩江桥，把日本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之后，他又组织东北救国抗日军。失败后，便定居天津英租界 37 号路。就在这个时候，马占山的儿子马奎（又名子之）有一天去日租界中原公司参加舞会，在舞场上狂欢之际，突然被人绑架了。第二天，通知马占山付 100 万元赎票。马占山得到消息后，立即登报声明，“脱离父子关系”。他说只当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就连一滴眼泪都不会掉，更甭说出钱了。这次绑架，原来是日本特务所为。

日本关东军为报复江桥战役一箭之仇，必欲除去马占山。一天马占山正在室内看书，突然从后楼外飞进一枚炸弹，不难猜知是日本人在捣鬼。这就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又有一天，马宅门外有位年迈的老人自称名叫马鸿，说：“马占山是我丢失了几十年的儿子。我是从河北丰润县投奔马占山的。他遗弃我多年不赡养我……”说完声泪俱下。门卫一听，是“老太爷”来了，忙去禀报马将军。马占山一听，说：“俺爹早已入土了，怎么又出来一个老子？简直是活见鬼，虽然我家早年从丰润迁到东北，但我从未去过河北老家。我父母的坟墓，现今还在东北怀德县。”马将军心地善良，对秘书杜荀若说：“送那老头 100 块钱，告诉他说，我的老子早已去世了。”可马鸿在门外还是哭着不走。如此纠缠了两三天。

马鸿在幕后的支持下，跟马占山打起了官司。天津检察院按刑法遗弃尊亲罪，对马占山提起公诉。天津律师认为这是非同小可的案子，故向马占山要两万元公费。马占山好友对马说：“有位从东北去北平的女律师名叫纪清漪，号称‘女侠客’，何不请她来？”马占山说：“听说过东北齐齐哈尔有个抗日巾帼英雄，是不是她？那就把她请来！”

马占山的秘书奉命乘坐一辆防弹车，两个小时的工夫，就到了北平小沙果胡同纪清漪律师事务所。杜秘书说明来意，纪清漪说：“我有保护抗日英雄的责任，责无旁贷，愿意为马将军义务辩护。”纪清漪当机立断，随同杜秘书乘上汽车直奔津门而去。

纪清漪与马占山相见，各道仰慕之情，嗣后每当纪清漪出庭，都是由杜秘书陪同乘防弹车，而车子不经过日租界，绕道去法院。纪向法院提出：如果叫马占山出庭，法院能否保证马占山的人身安全？如果能保证，则马占山当准时出庭；且原告须指出马占山是马鸿的儿子，有何根据，马占山的生理上有何特征？

后来，那马鸿不知是自己编造的，还是听幕后操纵人信口开河，说马占山耳后有个“栓马桩”。他如此这般地对法院说了。

纪清漪在开庭时强调马占山不能出庭时的理由说：“马占山来天津后，曾两次遭到袭击，险遭不测，他的处境，请法庭考虑。”然后，她补充说：“我相信，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一颗鲜红的爱国之心。”

审判长对这一案破例审理，一周后，法院通知被告马占山，就到马宅开庭审理——对马占山予以检验，并通知纪清漪律师，但未通知马鸿和他的律

师。出庭有法院刑庭庭长、书记官、检察院长、法医、天津医院大夫、新闻记者等。当检验马占山的耳后时，并未发现有什么“栓马桩”。

再次开庭时，宣判马鸿败诉。大家离开法院向外边走的时候，马鸿垂头丧气地自言自语说，我上当了，真倒楣，谁说马占山耳后有“栓马桩”？

颜仪民

旧上海的集团结婚

清末上海，五方杂处，男女婚嫁，都各依乡俗，甚为繁琐。民国以后，各种旧式礼俗逐渐受到新思想、新潮流的冲击。30 年代中期，与现今集体婚礼相类似的集团结婚在上海发端。

1935 年 2 月 7 日，市社会局在各大报纸公布了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的集团结婚办法。其中规定，凡本市市民举行婚礼，得申请参加集团结婚礼；集团结婚每月第一个星期三在市府大礼堂举行，由市长、社会局长证婚；参加者应向社会局申请核准，并缴费 20 元；市府印发结婚证书；婚礼不用嫔相……。因是初次举办。4 月 2 日进行了新人演习仪式，吴铁城市长亲临并作了报告，他指出：“ 中国旧有的礼节太繁琐。……往往因此婚丧喜庆，花费了不少的金钱与时间，甚至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将毕生省俭积蓄所得的钱，尽花于这些婚丧喜庆的人生大事上面，所以不但礼节繁琐，且又太不经济，本市政府有鉴于此，特提倡集团结婚。 ”

4 月 3 日，首届集团结婚按时在江湾市府大礼堂举行。下午 3 时，在军乐队进行曲伴奏下，57 对身穿蓝袍黑褂的新郎和衣着粉色软缎旗袍、头披白纱、手持鲜花的新娘，随着引导步入礼堂，分列两行。紧接着，由司仪报告双方姓名，以每两对一次，依序登台，向孙中山先生遗像三鞠躬，双方对立二鞠躬，向征婚人一鞠躬。然后，由征婚人授赠结婚证书和纪念品，并致证婚辞。纪念品为纯银之团月式嵌花太极图，中题“ 新生活集团结婚 ”字样，直径 10 寸许，可以分合，装于红色绒盒之中，有团结好合之意。礼毕，新郎新娘在音乐声中步出礼堂，来到广场摄影留念。

到举行第二届集团结婚时，办法有所修改，规定参加者不得再行铺张，必须按规定样式分发普通喜帖，违者取消参加资格，结婚礼也由每两对登台改为全体一同举行。从第三届起，又因次数频繁人数分散、登记调查手续纷繁、夏季结婚者少而改为每年举办五次，即 2、4、6、10、12 月各一次。及至是年终了，计举行五届，参加者达 399 对。

1937 年“ 八 · 一三 ”淞沪抗战爆发，未几，上海沦陷，此项活动也随之中断。在汪伪统治期间，上海曾出现过一些商办的集团结婚，主办者往往邀请“ 三老 ”——林康侯、袁履登、闻兰亭作征婚人。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指令内政部于 1942 年 11 月 1 日公布通行《集团结婚办法》，饬属各省市政府遵办。当时因上海为日本侵略者所占，直到 1947 年 3 月才函达上海市府，《集团结婚办法》中规定，“ 申请登记之男女双方应缴验合格医师出之健康证明书 ”。为了“ 提高民族健康水准，以期减少
各种疾病之遗传，藉使民族趋于优生之途 ”，凡患有花柳病、肺结核、精神病、麻疯病及性器官尚未发育完全或有畸形而不能矫正者，暂不发健康证明书。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市社会局第一届集团结婚，被定名为“ 胜利纪念集团结婚 ”，于 1945 年 12 月 25 日举行。

这种集团结婚典礼，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后经市政府社会局研究，决定以后每年举行 4 次，固定为春天 3 月 3 日，夏天 5 月 5 日，秋天 10 月 10 日，冬天 12 月 12 日。第二至第五届，分别于 1946 年 3 月 3 日、10 月 10 日、12 月 12 日和 1947 年 4 月 4 日在威海卫路同孚路（现威海路石门二路——作

者）新生活运动俱乐部举行。在第二届典礼上，主办者进一步的阐明集团结婚的意义：经济方面，“可以节省金钱，破除过去种种奢靡浪费的恶习”；社会方面，“启导新精神新生活”；生活方面，“可从散漫的变为纪律的，骄奢的变为节约的，自私的变为互助互爱的。”

当时，华山路上的上海市青年馆定期主办此项婚礼，就是市郊较为偏僻的浦东高桥的二十一区，也遂订定集团结婚简则，呈报市府以为进行。1947年11月，由朱彪等发起，吴国桢、吴开先、王晓籁、徐寄庼、潘公展、颜惠庆、杨虎等头面人物赞助，成立了上海市国民联合节约婚礼社，订立章程，其宗旨谓：“本社以最新型姿态为国民服务，每月举办联合婚礼若干次，以节省结婚之时间费用，并得在最高尚之礼堂举行最隆重之结婚仪式。”

1947 年下半年，上海市民政处升为民政局，集团结婚于是改由该局主办，筹备中的市社会局第六届集团结婚更名为市民政局首届集团结婚，于1948年1月1日在华山路青年馆，与市青年馆第51届集团结婚联合举行，参加者共计55对。此后，各种官办、商办的集团结婚就更趋广泛。

从1935年和1946年市社会局主办的各届集团结婚来看，新郎新娘的平均年龄分别的为25岁和20岁；江浙籍及上海本地人约占了80%；新郎中从事商业者居多，新娘则大多为从事家务者，同时也有从事农、工、学、军、公务及其他职业的人；文化程度一般都读过中小学，也有少量大学、私塾出身或失学的。

政府倡议推行的集团结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确实曾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荡涤了旧式封建婚姻的繁琐礼俗，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下层人民毋须倾家财或借债就能完婚；《集团结婚办法》中有关出具健康证明书的规定，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健康水平是颇有益处的。这些都说明了集团结婚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毋庸置疑的是，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集团结婚在推行过程中，也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出现了种种弊端。布厂工人王阿福、金大根、严寿生、杜青毛等，由于工资甚微，经济困难，为节约计，拟参加集团结婚。他们在给市长的来信中诉说：“因阅报载，国民节约结婚社慕请市长证婚，所以当即至该社登记，不料该社婚费浩大，比民政局、青年馆竟大一二倍。……在此民主时代，竟敢用大帽子，又美其名节约，以骗小市民矣。”其中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虞建新

（第343页为上海市首届集团结婚照片）

猖獗一时的南澳海盗

广省的最东部韩江口外有个海岛名叫南澳岛，岛上有县城也叫南澳。该岛位于海上交通要道，地形险要，历来为海盗的巢穴。民国以来，海盗们趁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广东省府对南澳统治力量薄弱之机，出没于南澳，这里几为海盗的天下。

到了 20 年代，广东省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但政府对粤东海岛始终鞭长莫及。这时，出现三位“大王”盘踞南澳岛，横行于粤东、闽南沿海，杀人越货，无法无天。

这三位“大王”中，为首的一位名叫吴品三，此人本来姓张，农家出身，因被城里的一户吴姓人家收为养子，改姓吴。这吴品三是一位浓眉大眼、体格魁梧的汉子。少年时期也读过几年书，粗通文墨，练就一身武功，力大如牛。

第二位“大王”名叫陈顺，又名陈孝、陈阿客，其父是清末秀才。陈生得五短身材，体格健壮。练就了一身轻功，飞檐走壁，身轻如燕。能够像猫一般敏捷地攀高，由船的桅杆顶端纵身空中腾跃，轻功跳到 30 米之外的另一艘船的甲板上。此人杀人成性，残忍狠毒。

第三位“大王”名叫曾伯崇，又名曾汉明，原姓杨，后被曾氏收为养子改姓曾，后又做了吴氏的入赘女婿，被人称为杨曾吴司令。此人年轻时读过书，粗通文墨，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为人奸险。

1912 年前后，吴品三、陈顺、曾伯崇结盟，纠集一伙青年人，以练拳习武为名，成立民间秘密会社，号称“青年会”。拜潮音寺的和尚友然法师为师。这位友然和尚精通武术，青年会门徒很快发展到数百人之众，横行乡里，仗武术欺人，为害地方，官府派兵征剿，捕杀了为首的友然和尚、洪二爷、曾昭荣等。吴品三、陈顺、曾伯崇等潜逃出海，长期亡命海上，沦为海盗。这三人为首的海盗，盘踞深澳海岛，由数十人发展到二三百人，拥有贼船 10 多艘，并公开以“三合公司”为名，向过往船只勒收往来“买路钱”。每艘经过闽南、粤东沿海海面的船只，每年被迫要缴钱领取“护照”即“买”上一面盖有“三合公司”图章印记的小红旗，挂于船头作为照徽。这三位海盗头目，时常派贼船在海面上巡逻，一旦发现没有挂“三合公司”照徽的船只，即行抢劫。如对方抗拒，即将全船人员悉数残杀。常有远海货轮被劫持至南澳岛一带，杀人越货。在 20 年代前后的 10 余年间，南澳海盗劫持的远洋巨轮即达四五十艘之多。而闽粤沿海一般商船遭劫者，更难以胜数。

他们有时还勾结粤东、闽南的其他海盗，将抢劫范围扩大到上海一带。例如：1928 年 10 月 13 日所发生的汉阳号货轮被劫事件，就是在上海附近发生的。汉阳号是一艘载重约 2000 吨的英国货轮，行驶于伦敦、香港、上海、厦门之间。当该轮离开上海港之前，粤东饶平县虎头山海盗头目杨狄一伙，已事先与南澳海盗联络，杨等一伙由上海化装为乘客，凭票登轮。船出吴淞口后行不多时，杨等一伙海盗，即按预谋分头出动，突然袭击警卫班，控制无线电台、驾驶室等，将旅客们的金、银、钱财尽行搜劫。然后持枪迫使该轮开向粤东南澳岛青澳湾竹栖肚海面。南澳三大盗早已备船等候，及时“接货”。南澳大盗吴品三等派遣“营长”谢圆，驾船 30 余艘，前来“接货”。连续干 3 昼夜，所搬走的货物才仅有全轮的半数。货物搬向白沙湾、营盘头、吴平寨及青澳坡的沙坡、山洞。但仍来不及搬运，于是又在近海山坡上堆砌

成 3 大堆，上盖柴草，伪装为草垛。为了迅速运藏赃物，吴品三令青澳岛保长强迫全乡男女 200 多人，于夜间群集于鸡笼山，把布匹等货物肩挑、手提，又抬又扛，搬到了五六公里之外的青澳，藏于乡头坑仔尾旧厝内及山洞内。一直干到第 4 天黎明时，才将被洗劫一空的货轮放行。

三大盗不仅抢劫过往船只和在岛上欺压民众摧残进步力量，并以多种手段向百姓搜刮钱财，例如：三大盗在南澳以及附近其他岛上经营钱庄，发行货币，从经济上控制了南澳等海岛。

1926 年秋冬，南澳海盗最为猖獗，竟然夺取了县城，委派了县长。当年 11 月间，吴品三为首的海盗匪众，攻陷了县署，打败了县府武装，攻占了警察区署，收缴了枪支，夺取了铜质的县长大印，俘获了县长。海盗们自封匪首曾伯崇的堂弟曾三为县长，统治县城达两三个月之久。广东省政府虽委任曾伯垣（广州人）为南澳县长，县政府原在南澳岛的深澳，但因海盗盘踞，长期未能到任，只得在别处暂设行署。

1927 年至 1928 年间，官府曾多次派兵清剿南澳海盗。其间，林先立任潮（州）、澄（海）、饶（平）沿海保安局局长时，曾率兵来岛，活捉、处决了杀害进步人士林少颜的凶手柯成忠。海盗余部曾一度逃离南澳。但不久又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因英轮汉阳号被动案，英国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国民政府派汕头守军团长陈庭雄率部来岛清剿海盗。但陈庭雄部官兵扰民并不亚于海盗，“ 清剿 ”未果。

海盗巨魁吴品三、曾伯崇、陈顺三人的结局如何呢？陈顺于 1926 年底，在厦门率 12 名海盗伪装乘客，混进一艘轮船，船尚未开行，即被一名水手发觉，警察立即将陈捕获，数日后在厦门被处决。吴品三 1933 年春，在闽南诏安县被其“ 义弟 ”林国光告密，被捕后，解往汕头市处死。而最为可笑的是曾伯崇的落网。 1928 年，曾伯崇被官军追剿，逃到汕头西北方的揭阳县棉湖镇。夜间，邻人准备杀猪，喊道：“ 莫让逃掉！抓住拿绳绑起来…… ”曾误认为是在抓他，急忙翻墙逃窜，跳墙时跌折了腿，此时有官军在棉湖镇抓赌，曾翻墙跌倒时惊动了四邻和官兵，遂被捕处死。

鲁生

民国两次南北建都之争

在民国时期的 38 年间，围绕着是建都南京抑是建都北京这个问题，发生过两次激烈的争论。

第一次争论发生于 1912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独立，脱离清政府。1911 年 12 月 29 日，独立各省代表一致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翌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但这个新生的政权基础非常脆弱，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被迫妥协退让。2 月 13 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同时推荐北洋军阀集团的头目袁世凯继任。然而孙中山对袁世凯仍是存有戒心的。他在辞职咨文中，向参议院提出的辞职的三项条件，第一条就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孙中山提出建都南京，要求袁世凯到南京任职，这是一个调虎离山之计，其目的是想把袁世凯调离封建主义统治的老巢，以削弱其势力。孙中山的这一主张，首先引起同盟会内部的一场争论。章太炎、宋教仁和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一些议员都强烈反对奠都南京。他们认为建都南京，无异于放弃满蒙。2 月 13 日，章太炎致书参议院，力主建都北京。章太炎声称：“ 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其可以为首善之居哉！谋国是者，当规度利病，顾瞻全势，慎以言之，而不可以意气争也。 ”在宋教仁、章太炎的影响下，一些参议员也倾向于建都北京。2 月 14 日，参议院讨论临时政府设置地点问题。投票者 28 人，主北京者 20 票，主南京者 5 票，主武昌者 2 票，主天津者 1 票。孙中山接到参议院的议决案后，异常气愤。一面依法咨交参议院复议，仍主定都南京；一面急召参议院中的同盟会员李肇甫、黄复生等，严责他们不应为袁氏张目。黄兴尤其怒不可遏，声色俱厉地对他们说：“ 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在孙、黄的严责下，参议院于 2 月 15 日举行复议。投票者 27 人，以 19 票多数通过建都南京。此外，6 票主北京，2 票主武昌。直隶、奉天、江苏、云南、陕西、山西 6 省则始终主都北京。终于通过了孙中山的主张。

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的争论甫告结束，与北洋派的争端又起，而且日趋激烈，最后终于败下阵来。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深知北京是自己的势力中心，他岂肯轻易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老巢北京，而到南京来受革命党势力的约束？早在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就明白电告北方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 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 ”。在参议院通过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一再电催其南下就职。工于谋算的袁世凯表面上并不拒绝南下，却以“ 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署 ”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借口，一味拖延。2 月 18 日，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魏宸组、刘冠雄、纽永建、宋教仁、王正廷、汪精卫等为欢迎员，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就职。袁世凯知硬抗难以奏效，转而又玩弄了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2 月 27 日，蔡元培等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布置了隆重的次迎仪式。在与蔡元培等谈话中，袁世凯诈称“ 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 ”。接着又假惺惺地召集陆军各统制和民政首领商讨留守人员和南下路线。欢迎团被袁世凯的这番虚伪表演蒙蔽了。大家对袁的南下深信不疑。正当欢迎团庆幸大功即将合成之时，袁世凯却于 29 日唆使曹锟的第三镇在北京城发动兵变。变兵四出烧杀抢掳。欢迎团驻地更是首当其冲。变兵“ 毁门而入 ”，“ 行李文件等，掳掠一空 ”，蔡元

培等于仓皇之中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3 月 1 日、2 日，保定、天津等地的北洋驻军也如法炮制。北京兵变发生后，中外反动势力借机发难，一致叫嚷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等北洋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蛮横地声称“临时政府必须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也与北洋派遥相呼应，纷纷指责孙中山“一念虚骄”，“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副总统黎元洪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

至此，孙中山不得不再次向袁世凯让步。同意临时政府暂设北京，袁世凯不必南下受职。3 月 6 日，南京参议院议决准许袁世凯以电报向南京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4 月 2 日，

南京参议院正式议决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这场建都之争以北洋军阀集团的获胜而告结束。

第二次建都之争发生于 1928 年，其结果与前一次相反，主南京者获胜。

这次南北建都之争是由北方实力派阎锡山、冯玉祥挑起的。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建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抗。1927 年 6 月，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李烈钧等南京政府军政要员移樽就教，前往徐州与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会议，以拉拢冯玉祥。在徐州会议期间，冯玉祥对吴稚晖说：“我们将来还是迁到北京去吧？”冯的提议，当即遭到吴稚晖的反对。吴回答道：“很好，不过你可愿东交民巷存在吗？”冯玉祥一时为之语塞。不过当时北京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之下，北伐还未完成，所以，这次争论也就没有继续下去。随后，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迁到南京，南京正式成为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1928 年 6 月，北伐军占领天津、北京，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驱逐到关外。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与天津同为特别市。委阎锡山为平津卫戍总司令。华北各省成为阎锡山、冯玉祥两大军事集团的势力范围。阎锡山接收平津后，旧话重提，再次挑起建都之争。阎锡山在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称：“首都问题，北伐完成后，东省满蒙之应付及外交均愈重要。以地言，北京为便。”由于这次建都之争是国民党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吵，所以阎、冯不便自己出面与中央政府争论。只是暗中指使北方派的文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主张建都北京。所以，这次建都之争更多地表现出学术探讨的特点。1928 年 7 月，《国闻周报》第 5 卷第 25 期发表的地理学家白眉初《国都问题》一文是主张建都北京的代表作。白氏的文章从“历史的观察”、“地势之评判”、“外侮之应付”、“现状之宏隘”等 4 个方面，对北京与南京两城作了全面的比较，其结论是建都北京较南京为宜。文章指出，历史上北京建都 800 多年，在此建都者，代代强盛。而南京地势低洼，不据国疆上游，夏期湿热，民风文弱。历史上，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委靡之气太重。南京建都 400 余年，在此建都者平均每代不过 45 年，而且除明朝外，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非偏安即年促”，是亡国之都。白氏并断言：“国都迁此，自决失败已耳。……假令总理生至今日，亦当幡然改计，以建都北京为宜也。”接着，叶叔衡也发表文章，支持白眉初的观点，并且针对南京是孙中山生前指定的首都这一理由指出，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主张奠都南京的时候，袁世凯正在北京；孙中山临终遗嘱的时候，北京还在张作霖势力控制之下。因此，孙中山主张定都南京是因时制宜的一个措施，并非不可改变。其实，孙中山的眼光极为远大，他的“建国方略”是注重向北发展的。文章要求国民

党政府效法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的故事，舍南京而立都北京，以“竟中山先生之志，而奠民国之基础”。

为了维护南京的首都地位，蒋介石集团的政客和文人纷纷发表谈话和文章，对建都北京的言论进行驳斥。1928 年 6 月 4 日，蒋介石的策士吴稚晖在南京市党部的演讲中，阐述了建都南京的理由。吴稚晖指出：第一、建都南京是总理理想的主张。总理还要将遗体安葬在南京；第二、从地理位置，看南京与北京同在中央。从陆上看，南京似乎偏东，但从海面上说起来，南至新加坡，东面和日本划分起来，也不少；第三、北京虽然较为整齐，不过只能算是历史上的陈列物。红墙头，黄墙头，不能就可算是首都。南京虽然暂时简陋，但南京临近上海，投资巨大，建设起来容易；第四、上海是一个欧美往来轮船必经过的地方，又是舆论的中心，首都在宁，有上海作为传达处，更是好上加好。总之，“首都建在南京已无问题”。张继也在上海报刊发表文章，反对在北京建都，支持吴稚晖的论调。接着，《申报》总编龚德柏秉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意旨，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驳白眉初君〈国都问题〉》的文章，对北方派文人建都北京的议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文章一开头即指责白眉初对于近代国都之意义毫无了解，竟以 18 世纪以前之理论来论现代之国都，根本上已属错误。他指责白氏文章本身“或误因为果，或误果为因，或冠履倒置，或牵强附会，或互相矛盾，或支离破碎。……并滥引似是而非之历史地理，以炫其淹博，图欺世人，不知识者已窃笑于旁矣。”并且在攻击白氏文章中“论列强之侵略”与“使馆保卫界之纠葛”两段，与“日人所希望者如出一辙”，武断地认为这是为“外人作说客，为帝国主义作走狗”。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定都南京“不特可免脱各国之平时占领，长受城下盟之苦，且可除旧布新，一扫恶习，以渐入于振拔强盛之域。”“总理独见及此，固非庸俗所能窥其深远也”。龚德柏的文章，火药味很浓。这种以高帽子压人的论战方式就足以使人免开尊口。此后，南北文人的笔战开始沉寂下来。

在南北文人引经据典，大打笔墨官司的同时，国民党一些地方党部和要人也相继发表通电，支持定都南京。6 月 18 日，李济深致电南京，主张定都南京。28 日，广州市党部指导委员金发出通电、指出“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当南北冲要，于军事、政治、文化、商业，均占重要位置，非北京可及”，请国民党中央迅速决定定都南京，“讵容再有异议”。

这次建都之争是国民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力斗争的一种表现。阎、冯等北方实力派，因为北京在他们势力范围内，建都北京，便于他们插手和控制中央政府，孤立蒋介石，而南京政权的基础是江浙财团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南京与上海近在咫尺，是蒋介石集团的大本营，他们当然要像昔日袁世凯死抱住北京不放那样，坚守石头城了。在这场南北对垒中，由于蒋介石控制了中央政府，可以开动舆论工具大肆宣传，而且又有总理遗训作为根据，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阎、冯等北方派见事无可为，遂不得不偃旗息鼓。这场争论也就不了了之。

张学继

国民党军队上将军衔的授任

（一）

早在 1926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国民党军队中就已部分地实行了军衔制度。熊斌、薛岳等 1927 年即已获得上将军衔。1928 年 10 月成立的军事参议院至 1935 年前后所任的上将军事参议就达三、四十人之多。但是这一时期，由于战事频仍，军事长官的任免变动极为频繁，军衔制度也极其混乱，上将军衔的授任较滥。为了适应国民党在军事上统一的需要，1934 年 6 月南京国民政府制订了《陆海空军官佐任命暂行条例》（《国民政府公报》1934 年 6 月），规定“ 上将需经实职年资已满并于国家建设有殊勋的中将晋任 ”。1935 年初，为改变军阶过滥的现象，当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以“ 陆军官阶过滥，殊非尊重名器之道 ”为由，呈请国民党中央。提出减少任命上将员额，及一部份上将改叙中将的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二期）同年 3 月 30 日公布了《特级上将授任条例》、《上将任官施行条例》（《国民政府公报》1935 年），规定“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为特级上将 ”；“ 陆军上将分一级、二级 ”。根据这一规定，同年 4 月任蒋介石为特级上将；冯玉祥等 7 人为一级上将；陈调元等 21 人为二级上将。有一批原上将衔改叙任中将，如薛岳、熊斌、孙连仲、石敬亭、鹿钟麟、张之江等均由原上将军衔改叙任中将。由于当时所确定的上将员额偏少，必然引起一些矛盾。1936 年初，为解决国民党高级将领中“ 合于晋任上将之规定，但受上将员额所限 ”不能晋任的问题，在陆军中已有的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军衔之外，又增设了“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按当年 2 月 29 日公布的《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国民政府公报》1985 号）规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授予符合晋任上将但受着员额所限而不能晋任的将领。并规定“ 陆军二级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之中将择优特补 ”。其“ 服制与第二级上将同；俸薪仍照中将最高俸额支给 ”。此条例还规定“ 中将加上将衔人数不得超过上将员额。按此规定，1936 年至 1937 年共叙任了 28 人为中将加上将衔，此后虽有出缺和增补，国民党军队中在任的上将，包括中将加上将衔，限制在 60 人左右。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国民党军事档案中看到国民党军委会铨叙厅 1944 年 11 月付印的《将官资绩簿》上将名单，明确记载该年上将员额为 60 人。

（二）

报刊上对国民党任命了多少上将说法不一，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除了资料依据不足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把军衔（即官位）和职阶两者混淆，因此在人数计算上就出现不同。我认为国民党任命了多少上将应该按照 1935 年和 1936 年公布的两个条例，即是由国民政府正式叙任的上将（包括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为根据，而把担任过上将职阶而官位即军衔只有中将或没有官位的排除在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军队官佐的职阶和官位是两个含义不同的名称。职阶是指该员所任军职的相应军衔，即该军职能叙任的最高军衔，而官位是指该员根据资历、功勋的条件所叙任的军衔。

（三）

授任上将军衔按《陆海空军官佐任命条例》规定，其条件主要是取决于“资历和功勋”。但我们如能对各个时期所授上将区分不同类型作一些综合分析，便不难看出，国民党军队中任命上将的主要依据是军事将领的地位、实力、作用。我想以 1935 年至 1949 年正式授任上将的 77 人为例，作一些分析。这 77 人大致可分如下几类：

（1）各个派系有军事实力的头面人物。如晋军的阎锡山，东北军的张学良，西北国民军的冯玉祥，桂军的李宗仁、白崇禧，粤军的陈济棠等。

（2）握有实权的军事机构的最高主省长官，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训练总监唐生智，海军部长陈绍宽，军事参议院正副院长陈调元、张之江，参谋总长程潜，抗战时期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张治中，军令部长徐永昌，参军长吕超，军事委员会常委李烈钧，航委会主任钱大钧。

（3）握有较大军事实力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如抗战前驻各地的绥靖公署主任，抗战期间的各战区司令长官，如何成濬、朱绍良、刘峙、顾祝同、杨虎城、蒋鼎文、龙云、徐源泉、卫立煌、孙连仲、薛岳、余汉谋、陈仪、张发奎、鹿钟麟、马鸿逵、盛世才、朱绶光、王树常、黄绍竑、刘兴、黄旭初。

（4）抗日前线和反共战场上重要的军事将领，如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军委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追堵红军长征的第四路总指挥何键，第十一路总指挥刘镇华。又如：抗战爆发前地处前线的华北、东北一些任军长、总指挥的重要将领，包括万福麟、宋哲元、韩复榘、商震、傅作义、于学忠、杨爱原、刘建绪、李品仙、夏威、张自忠、廖磊等。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为抽调川军出川抗日，接连授予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唐式遵、孙震、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等八个川军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抗故胜利前夕至解放战争期间，又晋升了胡宗南、汤恩伯、孙蔚如、罗卓英、刘士毅、马步芳新起的将领为陆军上将。

（5）出使国外的重要军事代表团团长，如出使苏联的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贺耀祖，抗战胜利后作为战胜国代表派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总上所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任的上将，在当时都是具有军事实力，有重要地位，对当时政治、军事各方面能施加影响的重要的人物。

（四）

据档案资料，国民党军队正式授任上将的名单如下：（一）特级上将

蒋中正 1935 年 4 月 1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二）一级上将

阎锡山 1935 年 4 月 2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冯玉祥 1935 年 4 月 2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46 年 7 月 27 日退役。

张学良 1935 年 4 月 2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主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西安事变后被监禁，1945 年 2 月 5

日退役。

何应钦 1935 年 4 月 2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部长。

李宗仁 1935 年 4 月 2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朱培德 1935 年 4 月 2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办公厅主任。

唐生智 1935 年 4 月 2 日任，授衔财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训练总监部总监。

陈济棠 1935 年 4 月 2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陈绍宽 1935 年 9 月 6 日任海军一级上将，授衔时为军

委会海军部部长。

陈 诚 1936 年 9 月 26 日由中将晋加上将衔，时为驻赣绥靖军预备军总指挥、军委会宜昌行辕副主任。1939 年 5 月 2 日晋任二级上将时为军委会政治部部长。1947 年 2 月 21 日晋任陆军一级上将，时任参谋总长兼任东北行辕主任。

（三）二级上将

陈调元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何成濬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驻鄂绥靖公署主任，1946 年 7 月 26 日退役。

朱绍良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驻甘绥靖公署主任。

韩复榘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第三路总指挥。

宋哲元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第二十九军军长。

刘　湘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刘　峙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驻豫绥靖公署主任。

万福麟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第五十二军军长，1946 年 7 月 27 日退役。

何　键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第四路总指挥。

白崇禧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前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军总司令，后任军委会军训部部长。

刘镇华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第十一路总指挥，1945 年 11 月 5 日退役。

顾祝同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驻赣绥靖公署主任。

商　震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第三十二军军长。

傅作义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第三十五军军长。

徐永昌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第三十三军军长。

于学忠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第五十一军军长。

杨虎城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蒋鼎文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龙　云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

徐源泉 1935 年 4 月 3 日任，授衔时为鄂湘川边区“剿匪”总司令，1946 年 7 月 26 日退休。

杨爱源 1935 年 12 月 10 日任,授衔时为第三十四军军长,山西清乡督办。

程　潜 1936 年 1 月 11 日任，授衔时为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李烈钧 1936 年 12 月 31 日任，授衔时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卫立煌 1936 年 9 月 26 日由中将加上将衔，时为湘鄂赣边区清剿主任。1939 年 5 月 2 日晋任二级上将，时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孙连仲 1936 年由中将晋加上将衔，时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1942 年晋任二级上将，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薛　岳 1936 年 9 月 26 日由中将晋加上将衔，时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1944 年 9 月 29 日晋任二级上将，当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余汉谋 1936 年 9 月 12 日任中将晋加上将衔，时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广东绥靖公署主任。抗战时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1946 年 6 月 13 日晋升二级上将，后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邓锡侯 1937 年 3 月 11 日由陆军中将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四十五军军长、军委会重庆行营副主任。1947 年 2 月 21 日晋升二级上将。时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熊式辉 1937 年 9 月 2 日由陆军中将晋加陆军上将衔，前任军委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江西省军管区司令，后任军委会委员。1947 年 2 月 21 日晋为二级上将，时为东北行辕主任。

陈　仪 1937 年 9 月 2 日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时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1947 年 2 月 21 日晋为二级上将，时任台湾行政长官。

（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

张发奎 1936 年 9 月 12 日任陆军中将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苏浙边区主任，后任四战区司令长官。

张治中 1935 年 4 月 4 日任陆军中将，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36 年 9 月晋加陆军上将衔，不久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

钱大钧 1935 年 4 月 4 日任陆军中将，时任军委会委员长行营参谋长、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1936 年 9 月 26 日 晋加陆军上将衔，后曾任全国航空委员会主任。

鹿钟麟 1936 年 1 月 22 日任陆军中将，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同年 9 月 26 日晋加陆军上将衔，后任军法执行总监、冀察战区司令。

马鸿逵 1936 年 l 月 22 日任陆军中将，同年 9 月 26 日晋加上将衔，不久任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刘建绪 1935 年 4 月 5 日任陆军中将，1936 年 9 月 26 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为第二十八军军长、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

张之江 1936 年 1 月 22 日任陆军中将，同年 9 月 26 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副院长。1946 年 7 月 27 日退役。

盛世才 1936 年 9 月任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时任新疆边防督办。

吕超 1937 年 1 月 8 日任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时任国民政府参军长。1946 年退役。

李品仙 1936 年 1 月任中将，1937 年 3 月 11 日任陆军中将晋加上将衔，时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朱绶光 1936 年 1 月 22 日任陆军中将，1937 年 3 月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为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

夏威 1936 年 1 月 22 日任陆军中将。1937 年 4 月 14 日晋加上将衔，时任十五军军长。后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

王树常 1935 年 4 月 5 日任陆军中将，时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37 年 6

月 7 日晋加上将衔，时任兰州绥靖公署主任。1946 年 7 月 27 日退役。

黄绍竑 1937 年 9 月 2 日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时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黄旭初 1937 年 9 月 2 日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时任广西省军管区司令。

刘文辉 1936 年 2 月 15 日任陆军中将，1937 年 9 月 18 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

杨森 1936 年 2 月 15 日任陆军中将，1937 年 9 月 18 日晋加上将衔，时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

杨杰 1935 年 4 月 4 日任陆军中将，1937 年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参谋本部次长。

刘兴 1935 年 4 月 5 日任陆军中将，时任驻赣第二绥

靖区司令官。1937 年 10 月 22 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驻贵绥靖公署代理主任。1945 年 11 月 5 日退役。

贺耀祖 1935 年 4 月 4 日任陆军中将，曾任参谋次长。1937 年 10 月晋加陆军上将衔，后作为中国特使派往苏联。

唐式遵 1936 年 2 月 25 日任陆军中将，1938 年 10 月 24 日晋加上将衔，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孙震 1936 年 2 月 25 日任陆军中将，1939 年 5 月 2 日晋加上将衔，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张自忠 1935 年 4 月 9 日任陆军中将，时任第三十八师师长。1939 年 5 月 2 日晋加上将衔，时任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

卢汉 1940 年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潘文华 1936 年 2 月 25 日任陆军中将，1940 年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

王缵绪 1936 年 2 月 25 日任陆军中将，1940 年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王陵基 1939 年 11 月 14 日任陆军中将，1940 年 5 月 5 日加上将衔，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廖磊 1937 年 4 月 14 日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时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1939 年病死。

汤恩伯 1935 年 4 月 8 日任陆军中将，时任驻赣预备军第三纵队指挥官。1944 年晋加上将衔，时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

胡宗南 1935 年 4 月 9 日任陆军中将，时任第一师师长。1945 年 10 月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黄琪翔 1946 年 6 月 13 日任陆军中将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罗卓英 1935 年 4 月 5 日任陆军中将，时任驻赣预备军第二纵队指挥官。1946 年 6 月 13 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青年军总监，后任东北行辕副主任。

刘士毅 1940 年 4 月任陆军中将，时任军训部次长，1949 年 5 月任总统府参军长，加陆军上将衔。

马步芳 1936 年 1 月 28 日任陆军中将，1949 年 7 月由西北军政副长官升任长官时晋加上将衔。孙蔚如 1937 年叙任陆军中将，时任第三十一军团长后升任第四集团军司令。1945 年开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后由中将晋加上将衔。

马占山 1936 年 1 月 22 日任陆军中将，时任东北抗日先遣军总司令。1945 年抗战胜利后晋加上将衔。

万仁元

民国首次评定市花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加强对城市的管理，于 1928 年 7 月颁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按两法规定：将城市划分为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种。全国当时有北平、广州、南京、上海、天津、青岛、汉口七个特别市，享有与省平级的特殊行政地位。两法的颁布实施拉开了民国时期市政建设的序幕。当时中国的市政建设尚处于草创阶段，所以初期的市政措施多是“适应世界潮流之趋势，援照欧美各国之先例。”20 年代末期，各特别市评定市花活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全面展开并风靡一时的。欧美各国的省与联邦，常有标举名花以表扬荣誉的惯例，如美国的每一州都有作为该州象征的植物。行政地位与省平级的各特别市，遂仿此成例。竞相评定本市的市花。

南京被定为首都后成为“首善之区”，在评选市花的活动中更是一马当先，为各市首倡。1928 年冬，南京市长刘纪文提

议以兰花为市花，以表现首都的特色。刘在建议中写道：“考花之种类，实繁有徒，而芬芳独著者，惟兰足以当之。……古人尊之为王者之香，以其幽香清远，冠绝群芳也。今选之为市花，盖喻兰之清而愈香，卓然为群市之冠之意也。”刘的提议经市政会议议决，最终确定以兰花为南京的市花。南京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个拥有市花的城市。

北平也紧随其后，市政府于 1928 年冬决定以菊花为市花。公布市花的告示写道：“菊花独敷葩艳于寒天风夜之中，体御轻飘，见一往无前之努力。身披铁甲，作百折不回之斗争。……不羡池水之芙蓉，似彻底革命。愿比秋山之松柏，得最后成功。较之趋炎附势，与桃李争荣者，其天生傲骨，正使其所以殿后芳也。”北平市政当局想以菊花清廉高洁、威武不屈的精神来显示故都的市政风范，用意可谓深矣。

1929 年元月，天津市政府提议以竹为市花，“以三叶代表三民主义，以青节表示市政精神”。提议经市政会议议决批准。以竹做为天津市花，既可以表示该市劲直不屈的精神，也与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古语不谋而合。

产于闽粤地区的红棉，深得广州市民的喜爱，未定为市花之前，广州各校的学生徽章多镌以红棉，足见粤人对红棉的爱好之深。这次评定市花，红棉自然众望所归。广州市政府顺应民意，于 1929 年 1 月决定以红棉为市花，一来显示广州的特产花卉，二来以红棉的花繁叶茂、经冬不调象征广州市民的革命无畏精神。

上海市花的产生颇费周折。1929 年 1 月中旬，上海市六区党部向市政府建议以莲花为上海市花。该市社会局却决议以莲花、月季、天竹三者之一为上海市花，呈请市长择定。后经市政会议决议，由社会局再增添若干种可备选择的花卉，送请市党部代征民众意见后决定上海市花。于是社会局添拟棉花、牡丹、桂花三种，连前次所拟共六种花卉送交市党部代征民意。市宣传部制表 30000 份，于 4 月 1 日起发放各基层党部、民众团体，转向市民征求意见，还在上海各报刊登意见表三天。最后经市民投票公决，与上海经济联系密切、关乎国计民生的棉花以绝对优势荣膺上海市花。上海也由此首创向市民公开征求意见、由市民投票公决市花的评选办法。

1929 年 10 月，汉口悬赏征求市花。该市社会局于次年 1 月间应征市花，选出桂花、水仙、海棠三种，呈市政府择定。1930 年 2 月南京《新中华报》载：“汉市府决定以榴花为本市市花。”寓意若何，未见报端。大概是仿西

俗，以榴花表示博爱精神，并以榴花萼瓣赤红如火象征辛亥首义的革命精神及先烈的鲜血。

在《特别市组织法》颁布后不足两年的时间里，七个特别市除青岛外都选定了市花。评定市花的时尚也由特别市向普通市蔓延推广。在特别市评定市花的同时,昆明市于 1928 年 11 月经市长建议选定独盛天下的茶花为市花；宁波市于 1929 年春由市政府决定以莲花为市花；长沙市也于 1929 年 6 月选定菊花为市花。

赵可